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戰國秦漢室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楊振紅 鄔文玲 主編

簡帛研究

二〇一六
· 秋冬卷 ·



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 來源集刊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 來源集刊

簡帛研究

二〇一六
· 秋冬卷 ·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戰國秦漢室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楊振紅 鄔文玲 主編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簡帛研究. 2016. 秋冬卷 / 楊振紅, 鄔文玲主編.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495-9651-5

I. ①簡… II. ①楊…②鄔… III. ①竹簡—中國—
文集②帛書—中國—文集 IV. ①K877.5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7) 第 066352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 541001)
網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張藝兵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衡陽順地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陽市雁峰區園藝村 9 號 郵政編碼: 421008)

開本: 889 mm × 1 194 mm 1/16

印張: 18.5 字數: 500 千字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0 001~1 200 冊 定價: 100.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本輯要目

- | | |
|-----------------------------|---------|
| 清華簡《厚父》校釋四則 | 白于藍 吳 祺 |
| 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與《左傳》“鄭伯克段於鄢”新識 | 熊賢品 |
| 出土秦漢曆書綜論 | 陳侃理 |
| 論秦律的罪數處罰——以“岳麓書院藏秦簡”為中心 | 陳松長 溫俊萍 |
| 稅田與取程：秦代田租征收方式蠡測 | 王 勇 |
| 里耶秦簡所見券類文書的幾個問題 | 張 弛 |
| 孔家坡漢簡《日書》短札四則 | 鄔可晶 |
|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校讀札記四則 | 范常喜 |
| 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釋地五則 | 馬孟龍 |
| 北大漢簡《六博》補論（三則） | 謝 坤 |
| 敦煌馬圈灣出土藥方簡補釋 | 劉樂賢 |
| 河西漢簡所見“堦”字釋讀商兌 | 何茂活 |
| 走馬樓三國吳簡吳昌長朱表盜米案相關問題研究 | 孫東波 楊 芬 |

顧 問

[日] 永田英正 李學勤 林甘泉 裘錫圭 [英] 邁克爾·魯惟一 饒宗頤

編輯委員會主任

李均明 卜憲群

主 編

楊振紅* 鄔文玲*

編輯委員

卜憲群 王天然 [韓] 尹在碩 邢 文 李均明 宋艷萍*
汪桂海 馬 怡 [日] 初山明 侯旭東 莊小霞* 凌文超*
孫 曉 [日] 富谷至 陳松長 梁滿倉 鄔文玲* 曾 磊*
楊 英 楊振紅* 蔡萬進 趙 凱 劉 馳 劉樂賢 戴衛紅*

(顧問、編委以姓氏筆畫為序排列，加“*”者為本輯執行編輯)

徵稿簡約

一、本刊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的專業性學術刊物，歡迎與下述內容相關的論文投稿：

1.出土簡帛的辨識、考證；2.根據出土簡帛考辨史實，研究中國古代各種制度、思想文化以及社會發展狀況；3.有代表性的國外簡帛研究譯文；4.簡帛研究綜述；5.簡帛研究論著評論；6.簡帛研究論著索引；7.簡帛學理論與方法的總結、探討。

二、本刊提倡嚴謹的學風，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相互尊重的自由討論。本刊發表的文章均不代表本刊意見，由作者文責自負。

三、本刊祇接受首發投稿。已在正式出版物和網絡上刊發者，均不視為首發。

四、來稿請提交一份文本稿，一份電子文稿（電子郵件或磁盤）。

五、本刊實行雙向匿名專家審稿制度。稿件中請勿出現作者個人信息。有關作者姓名、單位、聯繫方式等，請另紙提供。

六、本刊對刊登的稿件擁有為期兩年的專有版權。作者如有異議和特殊要求，請於投稿時聲明。請勿一稿兩投。

七、本刊處理來稿期限為60個法定工作日。逾期未接到通知，作者有權對自己的稿件另行安排。因本刊經費緊張，來稿一律不退，請作者自留底稿。

八、來稿請寫明作者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工作單位、職稱或職務、通訊地址、郵政編碼、電話號碼和電子郵箱，以便聯繫。

來函請寄：

北京市建國門內大街五號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

曾磊 收

郵編：100732

電子郵件請寄：jbyj2005@126.com

內容簡介

《簡帛研究二〇一六（秋冬卷）》共收錄戰國楚簡、秦簡、漢簡、三國吳簡研究論文、研究述評、會議綜述、書評等28篇。內容包括簡帛文字校釋、文義辨析與文本解讀，利用簡帛材料研究戰國至三國時期的制度、社會、經濟、文化、地理等問題，評介簡牘學最新動態和成果。集中反映了當前簡帛學研究的最新進展和熱點、焦點問題。

責任編輯：羅文波

責任技編：李春林

封面設計：廣大迅風藝術

林 林



目 錄

| | |
|-----------------------------------|-------------|
| 釋《上四·昭王毀室》簡5的“專”字 | 張 峰/1 |
| 清華簡《厚父》校釋四則 | 白于藍 吳 祺/6 |
| 試論清華簡《繫年》中的幾個多字謚 | 羅小華/15 |
| 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與《左傳》“鄭伯克段於鄆”新識 | 熊賢品/21 |
| 出土秦漢曆書綜論 | 陳侃理/31 |
| 秦守官、假官制度綜考 | |
| ——以秦漢簡牘資料為中心 | 王 偉/59 |
| 論秦律的罪數處罰 | |
| ——以“嶽麓書院藏秦簡”為中心 | 陳松長 溫俊萍/80 |
| 稅田與取程：秦代田租征收方式蠡測 | 王 勇/86 |
| 秦簡所見“巫咸”兩考 | 王 強/94 |
| 放馬灘秦簡中的標識符號及其功用初探 | 孫占宇 魏 芳/101 |
| 里耶“取鮫魚”簡與秦統一初期的文化建構 | 李 斯 李筆戎/115 |
| 里耶秦簡所見券類文書的幾個問題 | 張 弛/125 |

| | |
|--|-------------|
| 里耶秦簡“展……日”的釋讀 | 伊 强/140 |
| 嶽麓秦簡《猩、敞知盜分贓案》與楚墓早期盜掘 | 蔣魯敬/147 |
| 孔家坡漢簡《日書》短札四則 | 鄔可晶/154 |
|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遣冊校讀札記四則 | 范常喜/163 |
| 馬王堆漢墓帛書《天文氣象雜占》零識 | 洪德榮/170 |
|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編聯小議 | 韓厚明/180 |
| 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釋地五則 | 馬孟龍/188 |
| 北大漢簡《六博》補論(三則) | 謝 坤/199 |
| 敦煌馬圈灣出土藥方簡補釋 | |
| ——爲紀念謝桂華先生而作 | 劉樂賢/206 |
| 河西漢簡所見“塹”字釋讀商兌 | 何茂活/214 |
|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札記(十則) | 姚 磊/227 |
| 尹灣漢簡《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所見“薰毒”試析 | 呂 壯/239 |
| 走馬樓三國吳簡吳昌長朱表盜米案初探 | 孫東波 楊 芬/248 |
| “帝國模式”的生成與演化 | |
| ——讀《秦漢軍制演變史稿》 | 崔建華/264 |
| “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系列活動: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 |
| | 袁雅潔/273 |
| 代地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 | 單印飛/285 |

釋《上四·昭王毀室》簡5的“專”字*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張峰

內容提要 上博簡第四冊《昭王毀室》簡5諸家釋為“事”的字應改釋為“專”，與簡4“塿”意思一樣，均應讀為“祔”，訓為合葬。如此釋讀，也能得到相關文獻的支持。

關鍵詞 昭王毀室 事 專 合葬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毀室》(以下簡稱《上四·昭》)5有一句話：“曰：虐不知其尔薨，尔古須既祿安從事。王遲冗於坪澣卒以夫_飲_於坪澣。因命至俑毀室。”整理者陳佩芬將這句話斷讀為：“曰：吾不知其尔葬，尔古鬚既格，安從事。王徙居於平漫，卒以大夫飲酒於平漫，因令至俑毀室。”并訓“古鬚”為“古稀”，謂人年七十為古稀；將“安”訓為“於”；將“從事”訓為“治事”。^①後來孟蓬生、劉樂賢、董珊、陳偉、張崇禮、單育辰、黃人二等均對此句有過研究，^②梁靜對之前的各家說法也有過集釋。^③其中爭議較大的是“尔古須既祿安從事”這句話的釋讀。

* 本文是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戰國楚簡所見《詩》類文獻整理與研究”(15XYY009)階段性成果；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57期面上資助項目“清華簡《詩》類文獻整理與研究”(2015M570952)階段性成果。

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86頁。

② 孟蓬生：《上博竹書(四)閒話》，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5日。劉樂賢：《讀上博(四)札記》，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5日。董珊：《讀〈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四)〉雜記》，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20日。陳偉：《關於楚簡“視日”的新推測》，簡帛研究網，2005年3月6日，又收入其著《新出楚簡研讀》，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189頁。張崇禮：《讀上博四〈昭王毀室〉札記》，簡帛網，2007年4月21日。單育辰：《占畢隨錄之五》，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8年1月17日。黃人二：《上博藏簡〈昭王毀室〉試釋》，《考古學報》2008年第4期，461-473頁。

③ 梁靜：《上博(四)〈采風曲目〉等六篇集釋》，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37-47頁。

(1) 孟蓬生指出“墓”當讀爲“墓”；“古須”當讀爲“姑須”，義爲“姑且等待”；“安”，用同“焉”，訓爲“乃”。句子意思是“你姑且等落成典禮之後再遷葬你父親的遺骨吧”。

(2) 劉樂賢也認爲“墓”讀“墓”，“古須”讀“姑須”。

(3) 董珊將這句話讀爲“尔古(胡、何)須(待)既落(落)安(焉)從事？”意思是“你怎麼待到已經落祭纔來呢？”認爲含有輕微責怪的意思。

(4) 陳偉讀爲“尔胡鬚既落焉從事？”後又讀爲“尔故須既爲從事？”

(5) 張崇禮讀爲“尔姑須，既落，焉從專。”將諸家釋爲“事”的字改爲“專”，認爲即《周禮·春官·小宗伯》“卜葬兆，甫窆，亦如之”之“甫”，鄭玄注“甫”爲“始也”是不正確的，應訓爲“挖墓穴”。“從專(甫)”指的是(王)同意尔(即簡文的“君子”)挖墓穴，簡4“私自塿”指的是“私自挖墓穴”。後來放棄這種觀點，將二字均改讀爲“敷”，訓爲陳，“私自塿”意思是“私自來向君主報告這件事”；“從敷”意思是昭王“批准了君子的報告”。^①

(6) 單育辰讀爲“尔姑須，既落，焉從事”，將“塿”讀爲“拊”。

(7) 黃人二讀爲“尔古鬚既格，焉從事”，訓“焉”爲“則”。將簡4的字釋“塿”讀“搏”，訓爲“聚”，指的是“搏聚一起并葬”。


按，諸家釋爲“事”或“塿”、“搏”的字分別作：

 (下用“A”代替)

 (下用“B”代替)

兩者對比我們認爲前者當從張崇禮釋爲“專”，與後者右側所從相同。理由如下。

先來看楚簡標準的“事”字：


 (包 213)

 (上四·內 6)

 (清壹·皇 1)

 (上五·姑 7)

而“專”除了上舉“塿”所從外，楚簡還作：

 (清壹·金 4)

 (上九·陳 11“敷”所從)

 (上九·舉 31)

兩者相比，很明顯區別僅在中部：“事”中間類似“甘”形，楚簡無一例外；而“專”中間所從或爲“田”形，或爲“日”形。“專”金文作：

 (毛公鼎 集成 2841B)

 (柞伯鼎)


 (王孫遺鬲鐘 集成 261.2)^②


① 參見張崇禮《釋〈景公瘞〉中的“敷情不偷”》，簡帛研究網，2007年7月30日；單育辰《占畢隨錄之五》文後張崇禮評論。

② 字形參見董蓮池編著《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374-375頁。


“專”本從又，“𠂇”聲(而“𠂇”又是從田的),𠂇旁上部或聲化爲“父”。^① 楚簡中間所從的“日”形均爲“田”的訛書,這種現象楚簡常見,尤其表現在合體字中,筆者有過詳細的論述。^② 這裏試舉幾例以見一斑(前者爲正體,後者爲訛體)。

奮: (上五·三1)

𡗗: (郭·性34)

畜: (上三·周20)

𡗗: (上六·用8“蓄”所從)


廟: (上三·周42)


𡗗: (清叁·琴10)


當然,還有很多本從類似“日”形的部件,却訛成“田”形,如:

壹: (上一·孔14“鼓”所從)





𡗗: (清肆·筮58)

莫: (上五·第8)

𡗗: (上五·姑4)

良: (清壹·皇8)

𡗗: (清壹·耆14)

可見楚簡合體字中“田”形、“日”形之間常互訛,無別。A所從中部形最上部一筆與下面的形筆畫乃一筆,顯然不是“事”所從的類似“甘”形。張崇禮說:“仔細核對照片,發現此字中間還有一豎”,查驗圖版,發現A字中間橫筆下面確有一豎筆,上部似沒有。有兩種可能:一是上部筆畫殘,那麼中間是“田”;二是橫筆下面的豎筆屬於竹簡癢痕,則爲“日”。若是前一種,則是“專”無疑;若是後一種,所謂的“日”實際爲“田”的訛書,形體與上舉 (上九·舉31)相同。此類訛書也發生在《清壹·祭》18的“專”上,其辭例爲:“曰:‘三公,𡗗求先王之恭明德。’”今本《逸周書·祭公》無此句話,整理者釋爲“事”。^③ 從文義及字形上

① 參見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1645-1646頁。

② 參見張峰《楚系簡帛文字訛書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48-49頁。另外,一些相關論著或多或少提到過古文字或戰國文字中的此類現象,如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337頁;劉雲《戰國文字異體字研究——以東方六國文字爲中心》,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119-120頁;何家興《戰國文字構形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後出站報告,2012,111-128頁;孫合肥《戰國文字形體研究》,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499-510頁。具體可參看張峰論文“綜述”部分所引,不再贅述。







③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175頁。

看,明顯是“專”字,讀爲敷。^①亦是中間發生訛書。

諸家之所以將 A 釋爲“事”,除了字形相近外,很可能是“從事”連言的原因,但“從事”在簡文中不管作何解釋都明顯不通。A 具體如何讀,還要聯繫前文,下面根據各家意見,參以己意,用通行字釋寫與本文討論相關的簡文如下:

昭王爲室於死浞之滹,室既成,將落之。王誠邦大夫以飲酒。既荆,齋之,王入,將落。有一君子,喪服曼廷,將蹠閨……糴人弗敢止,至 2 閨。卜命尹陳省爲視日,告:“僕之母辱君王,不幸僕之父之骨在於此室之階下。僕將埏亡老,³以僕之不得并僕之父母之骨,私自埏。”卜命尹不爲之告。“君不爲僕告,僕將召寇。”卜命尹爲之告。[王]⁴曰:“吾不知其尔墓,尔姑須。”既落焉,從專。王徙處於坪滿,卒以大夫飲酒於坪滿。因命至墉毀室。⁵

上引各家說法中,孟蓬生、張崇禮和黃人二對文意的理解都值得關注,根據簡文“并僕之父母之骨”,“私自埏”可能與合葬有關,與後文“從專”說的應是一回事,這一點張崇禮已經指出。“私自”一詞出現較早,如《莊子·徐無鬼》:“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也出現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簡 77、78、79 中,^②後面一般接動詞。張崇禮訓“埏”爲挖墓穴,先不說這種行爲是否得當,但先秦并未見此用法,擅改鄭注似也不恰當。後改讀爲“敷”,文義亦有不合情理之處。黃人二將 B 釋爲“埏”讀爲“搏”,釋字不確,且“搏”的集聚義更多表示抽象的含義,說“君子”將父母兩個實體集聚在一起終覺未安。單育辰讀“埏”爲“拊”,^③完全正確,惜并未引起太多注意。“專”滂母魚部。拊,《說文·示部》從“付”聲,付,幫母侯部。文獻從“專”之字與從“付”多見相通之例。^④《禮記·檀弓下》:“周公蓋拊。”鄭玄注:“拊謂合葬。合葬自周公以來。”孔穎達疏:“周公以來蓋始附葬。附即合也,言

① 參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祭公之顧命〉研讀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1 年 1 月 5 日。可惜的是,李學勤主編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所附“字形表”(213 頁)及沈建華、賈連翔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文字編》(上海:中西書局,2014,85 頁)均列在“事”字頭下。類似誤釋的例子還有很多,這裏再舉一例。《上二·容》30“均”作,李守奎等云:“‘里’當是‘日’與‘土’之訛。”(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1-5)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600 頁。)楚簡“均”一般從土從旬作(上四·曹 35),而可看作“日”訛爲“田”,祇不過“土”的筆畫與“日”的筆畫連在了一起,不連的如(郭·唐 2)。《清伍·三壽》有下面兩個字:(簡 17)、(簡 23),整理者將前者隸定爲“均”,後者隸定爲“畱”,“字形表”將二字分屬兩個字頭下(參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222-223 頁),顯然不確,二者就是一字。

② 參見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9-20 頁。

③ 在論文初稿中,我們讀“埏”爲“拊”,後來網上檢索到單育辰早已有此觀點,是我們不應該有的疏忽,故不敢掠美。單育辰并未過多展開論述,下文的論述權當作補充。特此說明。

④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1,365-368 頁。

將後喪合前喪。”^①考古發掘的戰國中晚期九連墩楚墓，已經實行夫妻合葬。^②簡文“私自塋”的意思是君子私下合葬。簡5的“專”亦應讀為“祔”，“從專”指昭王同意合葬。

《昭王毀室》的核心是昭王之室坐落在“君子”父親墳墓上，君子不能合葬其父母，特向昭王請求，昭王最後答應合葬。董珊已指出可以跟《禮記·檀弓上》、《晏子春秋·內篇諫下》“景公路寢臺成逢於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晏子春秋·外篇第七》“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中三條文獻相關聯，^③其中《檀弓上》“請合葬焉”、《內篇諫下》“請命合骨”、《外篇第七》“恐力不能合祔”等詞語可以跟簡文的“塋”或“專”相比觀，足證“專”讀為“祔”可從。

簡文“吾不知其尔墓，尔姑須。既落焉，從專”，諸家均認為這句話全部是“王曰”的內容，我們認為可能祇有前兩句是“王曰”的內容，至於“既落焉，從專”乃是作者敘述話語。“既落焉”對應簡1的“將落”，表達的是已然的事實。“從”可訓為聽從、依順、依從。《墨子·號令》：“不從令者斬。”“從專”指的是“既落”之後昭王答應君子父母合葬。“‘吾不知其尔墓，尔姑須。’既落焉，從專。王徙處於坪澇，卒以大夫飲酒於坪澇。因命至墉毀室”，此時的場景是昭王將要舉行落祭之禮，卜命尹將君子的話上報給昭王，昭王對君子說：“我不知道這是你父親的墳墓，你姑且等待一會。”緊接着，昭王舉行落祭之禮，進行完畢，答應了君子合葬其父母的請求。隨後昭王來到坪澇，命至墉^④毀室。“既落焉”後面的話都是作者的敘述，且簡文前後相呼應，即：“既落”呼應“將落”，“卒以大夫飲酒”呼應“王誠邦大夫以飲酒”。“既”顯然應訓“已經”，《尚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傳：“既，已也。”^⑤“既”+動詞+“焉”表示已然事實的結構也見於古書，如“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并產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⑥另外，簡文也透露出祇有落祭完成纔能飲酒的事實。

注：感謝匿名審稿專家的意見，使小文避免了很多錯誤。對於專家的意見，本文均已採納。

①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龔抗雲整理，王文錦審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228頁。

② 劉國勝：《湖北棗陽九連墩楚墓獲重大發現》，《江漢考古》2003年第2期，30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棗陽市九連墩楚墓》，執筆者：王紅星，《考古》2003年第7期，13頁。

③ 董珊：《讀〈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四）〉雜記》。

④ 至墉，整理者認為是人名或職官名（參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186頁）。似非，可能是動賓結構。

⑤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2，119頁。

⑥ 《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3116頁。

清華簡《厚父》校釋四則*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白于藍 吳祺

內容提要 本文參照傳世典籍和出土文獻,對清華簡《厚父》篇中的部分字句進行新的解釋。將“叅”讀作“嘉”,訓為美、大;將簡文“佳(惟)曰其勤(助)上帝鬲(亂)下民之匿(慝)王廼渴(竭)隳(失)其命”斷讀為“佳(惟)曰其勤(助)上帝。鬲(亂)下民之匿(慝)王,廼渴(竭)隳(失)其命”;將“漙”讀作“僭”,訓為“差也”,指出簡文“天命不可漙(僭)”與傳世典籍中的“天命不僭”“天命弗僭”可相參;將“𢇛”讀作“癡”,訓為狂,指出簡文“𢇛(癡)淫(狂)”與“庚(康)樂”用法對應,均為同義複詞。

關鍵詞 清華簡 《厚父》 校釋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一書中見有《厚父》篇,^①公布至今,研究文章層出不窮。本文擬在諸家研究的基礎上,對簡文個別字詞的釋讀談點看法。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 本文為2013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攻關項目《秦漢六朝字形全譜》(13&ZD131)、2014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聲系及資料庫建設》(14BYY163)中期成果。

①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

該篇簡 1 有一段話，整理者釋文如下：

□□□□王監劼(嘉)練(績)，聒(問)前文人之觀(恭)明惠(德)。

關於“劼”字，整理者注【一】：“‘劼’爲‘嘉’字省變（參李學勤《戎生編鐘論釋》，《文物》1999 年第 9 期；馬楠《〈尚書〉、金文互證三則》，《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 年第 11 期）。《書·盤庚下》：‘用降我凶德，嘉績於朕邦。’”^①子居認爲“當讀爲原字”，訓爲慎。^②王寧認爲“所謂‘劼績’當即《酒誥》所說的‘劼毖殷獻臣’之績，‘劼’是‘劼毖’的省語”。^③馬文增認爲當讀爲“桀”，指夏桀。^④

按，所謂“劼”字，原形作“𠄎”。該字從力從吉，整理者隸定作“劼”，正確可從，但認爲其是“‘嘉’字省變”則仍有可商。清華簡中標準寫法的“嘉”字很常見，作：

𠄎(《保訓》簡 7)

𠄎(《皇門》簡 2)

𠄎(《耆夜》簡 4)

𠄎(《耆夜》簡 6)

𠄎(《芮良夫毖》簡 20)

𠄎(《三壽》簡 25)

對比可知，標準寫法的“嘉”字與本簡之“劼”字的寫法差別很大，均左上從“禾”，難以省變爲“吉”形。從前引整理者的注釋可以看出，將“劼”釋爲“嘉”是來源於李學勤和馬楠的觀點。核檢原文，李、馬立論的依據是戎生編鐘當中的“劼”字，該字原形作“𠄎”，出現在“劼遣鹵責（積）”之銘文當中。李、馬均指出該銘可以和晉姜鼎“嘉遣我易（賜）鹵責（積）千兩（輛）”之銘相對照，由此得出“劼”爲“嘉”字省體這一結論。事實上，晉姜鼎早已亡佚，今僅有銘文摹本流傳，摹本中所謂“嘉”字的原形作“𠄎”，很難認定就是“嘉”字。金文中“嘉”字很常見，作：

𠄎(伯嘉父簋)

𠄎(右走馬嘉壺)

𠄎(沈兒鐘)

𠄎(中山王響大鼎)

𠄎(陳侯作嘉姬簋)

𠄎(邾公鉶鐘)

對比可知，金文中“嘉”與“𠄎”寫法差別亦很大，均左上從“豆”，未見有省變爲“吉”形者。可見，將“𠄎”釋爲“嘉”缺乏堅實的字形依據，整理者說“‘劼’爲‘嘉’字省變”，很難令人信服。新近公布的清華簡第六冊《子產》篇簡 7 有字作“𠄎”，字形與“𠄎”一脈相承。就字形而言，

①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111 頁。

② 子居：《清華簡〈厚父〉解析》，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2015 年 4 月 28 日。

③ 王寧：《清華簡五〈厚父〉之“厚父”考》，簡帛網，2015 年 4 月 30 日。

④ 馬文增：《清華簡〈厚父〉新釋、簡注、白話譯文》，簡帛網，2015 年 5 月 12 日。

“𡗗”“𡗗”與“𡗗”“𡗗”均從力從吉，當是一字。“𡗗”“𡗗”右下所從之三捺或兩捺很可能是裝飾性“羨畫”，無實在意義。至於其他諸說，或文法不通，或望文生義，亦難以令人信從。

“𡗗”字見於《說文》，筆者認為在簡文中似當讀作“懿”。據《說文》，“𡗗”從吉聲，^①“懿”從壹聲，^②而“壹”亦從吉聲。^③可見“𡗗”“懿”二字古音相近，當可相通。

“懿”字古有美、大之義。《爾雅·釋詁下》：“懿，美也。”《詩·大雅·烝民》：“好是懿德。”毛《傳》：“懿，美也。”《詩·周頌·時邁》：“我求懿德。”鄭玄《箋》：“懿，美也。”《書·無逸》：“徽柔懿功。”蔡沈《集傳》：“懿，美也。”《漢書·韋玄成傳》：“惟懿惟奐。”顏師古《注》：“懿，美也。”《玉篇·壹部》：“懿，大也。”《資治通鑑·陳紀八》：“自非懿戚重臣。”胡三省《注》：“懿，專久而美也，大也。”均其例。簡文之“𡗗(懿)績”即美績、大績之義。“懿績”一詞見於典籍，如：

《三國志·吳書·陸遜傳》：“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

《晉書·王導傳》：“懿績克宣，忠規靡競。”

《魏書·高佑列傳》：“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

《全梁文·江淹〈王光祿為征南湘州詔〉》：“今宜重敷善政，申此懿績。”

《文心雕龍·隱秀》：“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

《說文》：“𡗗，慎也。”前引戎生編鐘銘“𡗗遣鹵責(積)”和晉姜鼎銘“𡗗遣我易(賜)鹵責(積)千兩(輶)”之“𡗗”，似均可訓為慎。事實上，李學勤原文中已經指出戎生編鐘銘“‘𡗗’字《說文》訓為‘慎也’，慎遣本來是很通順的”，但因其認定晉姜鼎之“𡗗”字必是“嘉”字，才將戎生編鐘銘之“𡗗”字亦改釋為“嘉”。清華簡第六冊《子產》篇簡7之“𡗗”字出現在“此胃(謂)𡗗勅”之語中，其義待考。

二

該篇簡5—7有一段話，整理者釋文如下：

古天降下民，執(設)萬邦，復(作)之君，復(作)之市(師)，隹(惟)曰其勩(助)上帝鬲(亂)下民。之匿(慝)王廼渴(竭)輓(失)其命，弗甬(用)先折(哲)王孔甲之典刑，真(顛)復(覆)𡗗(厥)惠(德)，湍(沉)湍于非彝，天廼弗若(赦)，廼述(墜)𡗗(厥)命，亡

① 《說文》：“𡗗，慎也。从力吉聲。《周書》曰：‘汝𡗗毖殷獻臣。’”

② 《說文》：“懿，專久而美也。从壹从恣省聲。”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指出“‘从恣省聲’四字，蓋或淺人所改竄，當作从心从欠，壹亦聲。”上古音壹、懿俱為影母質部字，兩字雙聲疊韻。段《注》所改當屬可信。

③ 《說文》：“壹，專壹也。从壺吉聲。”

𠂔(厥)邦。隹(惟)寺(時)下民堆帝之子,咸天之臣民,廼弗慙(慎)𠂔(厥)惠(德),甬(用)叙才(在)服。

這段文字講述的是厚父對王所提出的“其才(在)寺(時)後王之卿(享)國,祿(肆)祀三后,永叙才(在)服,隹(惟)女(如)怡(台)”這一問題的回答。

從上引釋文可以看出,簡文中“隹(惟)曰其勤(助)上帝𠂔(亂)下民之匿(慝)王廼渴(竭)𠂔(失)其命”這段文字,整理者是在“民”“之”二字間斷讀。整理者同時在注釋【二四】中指出,此段文字與《孟子·梁惠王下》所引《尚書》語句相似。^①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馬楠提出不同的斷讀方法,將該句斷讀為“惟曰其勤(助)上帝亂下民之匿(慝),王廼渴(竭)𠂔(失)其命”,認為該句意為“謂君王本當助上帝治下民之過惡,而王廼不如此”。^② 學者多從其說。^③ 筆者認為,以上兩種斷句方式均有可商。

按,整理者指出此段文字與《孟子》所引《尚書》語句相似,這是十分正確的。為論述方便,先將整理者所引《孟子》相關文句引錄如下: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需要說明的是,關於《孟子》所引《尚書》這段文字,自古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斷讀方法。一種是以趙岐《孟子章句》為代表,是在“寵之四方”之“之”字下斷讀,將“寵之”上讀,將“四方”下讀,謂:“《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另一種是以孫奭《孟子疏》和朱熹《孟子集注》為代表,是在“帝”字下斷句,將“寵之四方”作一句讀。孫奭《孟子疏》云:“此《周書》之文也……言天生下民,而立之君師以治以教之,惟曰其在助相上帝,寵安四方,有善有惡皆在我,天下安有敢違越其志者也。”朱熹《孟子集注》則說:“《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除此之外,清人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則提出不同的斷讀方案,雖亦主張在“帝”字下斷讀,但將“寵之”讀為

①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113頁。

②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簡第五冊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2015年4月8日。

③ 子居:《清華簡〈厚父〉解析》,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2015年4月28日;王寧:《清華簡五〈厚父〉之“厚父”考》,簡帛網,2015年4月30日;郭永秉:《論清華簡〈厚父〉應為〈夏書〉之一篇》,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7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王坤鵬:《簡論清華簡〈厚父〉的相關問題(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5年6月26日;《清華五〈厚父〉初讀》,簡帛網“簡帛論壇”,2015年4月13日,19樓,蚊首發言;67樓,youren發言,2015年4月27日。

一句,“四方”與“有罪無罪惟我在”連讀爲一句,云:“寵,尊居也。言天降生下民,爲作之君,爲作之師者,惟曰其助天牧民,故尊寵之,使居君師之任。”又云:“以助天光寵之者,謂以其能助天,故光寵之。作兩句解,誼乃明。今趙氏聯言助天光寵,意旨不明。”焦循《孟子正義》則將趙岐和江聲兩說并列,未作取捨。但今人楊伯峻仍贊同趙岐《孟子章句》的讀法,將之翻譯爲:“《書經》說:‘天降生一般的人,也替他們降生了君主,也替他們降生了師傅,這些君主和師傅的唯一責任,是幫助上帝來愛護人民。因此,四方之大,有罪者和無罪者,都由我負責。普天之下,何人敢超越他的本分(來胡作妄爲)?’”同時對朱熹的斷讀方法提出批判:“朱熹《集注》把下文‘四方’連接‘寵之’作一句,全文讀爲:‘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是不對的。”^①

筆者認爲,將簡文與《孟子》所引《尚書》文字加以比對,既然簡文“帝”字下爲“亂”字,而《孟子》所引《尚書》“帝”下爲“寵”字,這就說明不論簡文還是《孟子》,均當在“帝”字下斷句,否則兩種資料將無法對應。若依整理者或馬楠對簡文的斷句,祇能認爲《孟子》中漏抄了“亂下民”或“亂下民之匿(慝)”;若依趙岐《孟子章句》的斷句,則祇能認爲簡文中漏抄了“寵之”。通過簡文與《孟子》對讀,正可證明前引有關《孟子》斷讀的諸說中,當以孫奭和朱熹之說爲是。江聲雖亦在“帝”字下斷句,但其將“寵之”讀作一句,將“之”解釋爲代詞,指代君和師,不合常理,難以令人信服。

綜上所述,這段簡文應當重新斷讀如下:

古天降下民,執(設)萬邦,復(作)之君,復(作)之師(師),佳(惟)曰其勤(助)上帝。商(亂)下民之匿(慝)王,廼渴(竭)輓(失)其命,弗甬(用)先折(哲)王孔甲之典刑,真(顛)復(覆)畢(厥)惠(德),湍(沉)湍于非彝,天廼弗若(赦),廼述(墜)畢(厥)命,亡畢(厥)邦。佳(惟)寺(時)下民堆(共)帝之子,咸天之臣民,廼弗愆(慎)畢(厥)惠(德),甬(庸)叙才(在)服?^②

簡文“商(亂)下民”是用來修飾“匿(慝)王”,而“匿(慝)”字則又是用來修飾“王”。“慝”字之訓爲“惡”,爲典籍常訓,^③故“商(亂)下民之匿(慝)王”猶言亂下民之惡王。其後“廼渴(竭)輓(失)其命”直至“述(墜)畢(厥)命,亡畢(厥)邦”均是用以描述“亂下民之慝王”的種種惡行以及所造成的惡劣後果。

① 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60,32-33頁。

② “堆(共)”字從整理者“一說”的看法讀。整理者指出:“‘堆’讀爲‘共’,《禮記·內則》注‘猶皆也’,與下‘咸’字同義。下民共帝之子。”可從。《墨子·法儀》:“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與簡文可相參。“甬(庸)”字從郭永秉《論清華簡〈厚父〉》應爲《夏書》之一篇讀,訓爲何。

③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814頁。

三

該篇簡 9—10 有一段話，整理者釋文如下：

於(鳴)庠(呼)，天子！天命不可湏，斯民心難測，民弋(式)克共(恭)心芻(敬)悞(畏)，畏不恙(祥)，姁(保)教明惠(德)，愆(慎)裒(肆)祀。

關於“湏”字，整理者注【三六】：“此字右邊形體近‘恩’，可隸作‘湏’，讀為‘撞’，指衝撞。也可能是‘法’的訛字，‘法’常讀為‘廢’。《書·大誥》‘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孔傳：‘不敢廢天命。’”^①馬楠認為“湏”當讀作“聰”，有聞、查之義。^②網友苦行僧認為此字當是“酗”之異體，有沉迷之義。^③黃國輝認為此字當讀為“從”。^④程浩認為此字與清華一《祭公之顧命》簡 15“沁”字形體略同，應釋為“沁”，訓為終結、廢止。^⑤

按，“湏”字原形作“𣎵”。楚簡文字中“心”字和“心”旁十分常見，未見有在“心”上加一短橫者。就字形而言，程浩所釋不確，整理者隸為“湏”正確可從。但是，整理者與其他諸說讀為“撞”“聰”或“從”均缺乏典籍依據，難以令人信服。

筆者認為，“湏”當讀作“僭”。上古音“湏”為清母東部字，“僭”為精母侵部字。二字聲母同為齒音，韻部上古音東、冬、侵三部關係密切，^⑥例可相通。

典籍中從“恩”聲之字與從“僂”聲之字有相通之例。《周禮·地官·廛人》：“掌斂市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鄭玄《注》引杜子春云：“總當為僂。”段玉裁《周禮漢讀考》：“杜蓋謂為聲之誤，二字雙聲也。”《周禮·地官·肆長》：“斂其總布，掌其戒禁。”鄭玄《注》引杜子春云：“總當為僂。”《周禮·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注》引上《周禮·地官·廛人》：“掌斂市次布、僂布、質布、罰布、廛布。”“總布”正作“僂布”。而典籍中從“僂”聲之字與從“僭”聲之字亦常可互通。《易·豫·九四》：“勿疑朋盍簪。”馬王堆漢墓帛

①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114 頁。

②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簡第五冊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2015 年 4 月 8 日；馬楠：《清華簡第五冊補釋六則》，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 6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225—226 頁。

③ 《清華五〈厚父〉初讀》，簡帛網“簡帛論壇”，2015 年 4 月 9 日，1 樓，苦行僧發言。

④ 黃國輝：《清華五〈厚父〉補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5 年 4 月 27 日。

⑤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簡第五冊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2015 年 4 月 8 日。

⑥ 參于省吾《釋邑、呂兼論古韻部東冬的分合》，收入其著《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463—471 頁；曾憲通《從“蚩”符之音讀再論古韻部東冬的分合》，《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1997；沈培《上博簡〈緇衣〉篇“卷”字解》，饒宗頤主編《華學》第 6 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顏世鉉《楚簡“流”、“讒”字補釋》，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

書本《周易》“僭”作“讒”。《詩·小雅·巷伯》：“取彼讒人。”《後漢書·馬援傳》引“讒”作“讒”。《荀子·哀公》：“君子固讒人乎！”《韓詩外傳》卷二“讒”作“讒”。《史記·陳丞相世家》：“无畏呂嬖之讒也。”《漢書·陳平傳》“讒”作“讒”。均其例。可見“僭”當可讀作“僭”。

“僭”字古有差義。《廣雅·釋詁四》：“僭，差也。”《詩·大雅·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毛《傳》：“僭，差也。”《詩·小雅·鼓鐘》：“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孔穎達《正義》：“又以爲雅樂之萬舞，以爲南樂之夷舞，以爲羽籥之翟舞，此三者皆不僭差。”《詩·商頌·殷武》：“不僭不濫，不敢怠遑。”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僭之本義爲以下擬上，引伸之爲過差。”《書·咸有一德》：“惟吉凶不僭，在人。”僞孔《傳》：“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賞不僭而刑不濫。”孔穎達《正義》：“僭謂僭差。”《左傳》僖公九年：“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杜預《注》：“僭，過差也。”《左傳》哀公五年：“不僭不濫，不敢怠皇。”杜預《注》：“僭，差也。”《太玄·周》：“何德之僭否。”范望《注》：“僭，差也。”《後漢書·楊震列傳》：“僭恒陽若。”李賢《注》：“僭，差也。”均其例。

《書·大誥》：“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僞孔《傳》：“天命不僭差。”孔穎達《疏》：“天命必不僭差。”僞古文《書·湯誥》：“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僞孔《傳》：“僭，差也。”孔穎達《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此“天命不僭”“天命弗僭”與簡文“天命不可僭(僭)”可以相參，但語義有所不同。前者是說天命不會僭差，後者是說天命不可僭差或不可僭差天命。《晉書·石季龍載記》：“天命不可違，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天命不可僭(僭)”與此“天命不可違”語義相仿。

《漢書·翟方進傳》：“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於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顏師古《注》：“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漢書·翟方進傳》：“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顏師古《注》：“言必信之矣。”按，此兩處“僭”字，顏《注》均以“不信”解之，未確。《漢書》此“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即前引《書·大誥》之“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僭”亦當訓爲差。“僭差”當爲同義複詞。“予不敢僭上帝命”即我不敢僭差上帝之命。簡文“天命不可僭(僭)”之“僭(僭)”字與此“予不敢僭上帝命”語義相仿，“僭”字用法相同。

需要說明的是，前引整理者注釋中還提到該字“可能是‘法’的訛字”，讀爲“廢”，并引《書·大誥》“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孔《傳》“不敢廢天命”爲證。這也是有問題的。首先，就字形而言，說“𠄎”字是“法”的訛字，缺乏字形依據。楚簡文字中“法”字疊出繁見，未見有與此字類似的寫法。其次，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早已據《書·大誥》篇“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指出“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中的“替”當爲“僭”之訛字，應讀爲“僭”。

四

該篇簡 13 有一段話，整理者釋文如下：

母(毋)湛于酉(酒)。民曰隹(惟)酉(酒)甬(用)槐(肆)祀，亦隹(惟)酉(酒)甬(用)庚(康)樂。曰酉(酒)非飮(食)，隹(惟)神之卿(饗)。民亦隹(惟)酉(酒)甬(用)敗(敗)畏(威)義(儀)，亦隹(惟)酉(酒)甬(用)慝(恒)瘞(狂)。

關於“慝(恒)瘞(狂)”之“慝(恒)”字，整理者未作解釋。網友暮四郎認為當釋為“亟”，讀作“極”，形容程度之深，“極狂”即深重之狂。^①馬文增認為“慝”當讀為“很”，為暴戾之義。^②

按，楚簡文字中“亘”“亟”字形有別，整理者釋為“恒”可信。楚簡文字中“恒”“極”音近可通，^③故從音讀上看，暮四郎將之讀作“極”亦無不可。但從用法上講，典籍中未見“恒狂”或“極狂”等類似的說法，此二說均缺乏必要的書證。上古音恒為蒸部字，很為文部字，二字韻部相隔，典籍中亦未見相通例證，故馬文增的看法亦難以令人信服。

筆者認為，此字於此似當讀作“癡”。“癡”從疑聲，“慝”從亘聲。上古音“亘”為見母蒸部字，“疑”為疑母之部字。聲母同為牙音，韻部陰陽對轉。古音很近，例可相通。筆者曾指出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乙本《德經》中的“菑”與“骸”二字均應讀為“骸”，^④而典籍中從“亥”聲之字與從“疑”聲之字亦可相通。《後漢書·虞詡列傳》：“勿令有所拘閔而已。”李賢《注》：“閔與礙同。”《玉篇·門部》：“閔，止也。與礙同。”《玉篇·石部》：“礙，止也。亦作閔。”可見，簡文之“慝”當可讀作“癡”。《廣雅·釋詁三》：“狂，癡也。”《莊子·逍遙游》：“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陸德明《釋文》引李云：“狂，癡也。”《玉篇·犬部》：“狂，癡癡也。”可見“癡”“狂”同義，“癡狂”當為同義複詞。而且，該詞典籍習見，如：

《淮南子·俶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

《論衡·率性》：“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

《論衡·論死》：“物與人通，人有癡狂之病。”

《論衡·刺孟》：“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遨戲也。癡狂之人，志不求食，遨戲之人，亦不求食。”

簡文前有“亦隹(惟)酉(酒)甬(用)庚(康)樂”語。《爾雅·釋詁上》：“康，樂也。”《詩

① 《清華五〈厚父〉初讀》，“簡帛”網“簡帛論壇”，2015年4月19日，32樓，暮四郎發言。

② 馬文增：《清華簡〈厚父〉新釋、簡注、白話譯文》，簡帛網，2015年5月12日。

③ 白于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615頁。

④ 白于藍、黃巧萍：《讀秦漢簡帛札記》，《中國文字研究》第17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0-61頁。

·唐風·蟋蟀》：“無已大康。”毛《傳》：“康，樂也。”《漢書·董仲舒傳》：“夙夜不皇康寧。”顏師古《注》：“康，樂也。”可見，“康樂”亦為同義複詞。“康樂”一詞典籍亦習見，義同安樂。《周禮·秋官·司寇》：“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禮記·樂記》：“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大戴禮記·禮察》：“導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樂。”《風俗通義·正失》：“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均其例。簡文“𢇛(癡)瘿(狂)”與“庚(康)樂”均為同義複詞，用法對應。

試論清華簡《繫年》中的幾個多字謚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羅小華

內容提要 清華簡《繫年》中的“晉莊平公”，文獻作“晉平公”；“晉簡公”，傳世文獻作“晉定公”；“秦翼公”，傳世文獻作“秦哀公”；“晉敬公”，文獻又作“哀公”“懿公”；“衛幽侯”，傳世文獻又作“衛懿公”“衛哀公”。上述五個謚號應該都是多字謚：“晉莊平公”“晉簡公”和“秦翼公”都是雙字謚，“晉敬公”和“衛幽侯”都是三字謚。

關鍵詞 清華簡 繫年 多字謚

2011年12月，由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著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出版。整理者指出：“《繫年》有許多內容可補充傳世文獻的不足，和《尚書》、《春秋》經傳、《國語》和《史記》等互校，多有異同。”^①其史料價值不僅體現在朱鳳瀚先生所說的“《繫年》記載了諸多周代重大問題，如周代設立‘三監’、‘共和執政’的確切含義、周平王東遷、秦人的源流等”，還體現在一些細微處，如古代君主的謚號。^②現在，我們想談談《繫年》中另外幾個多字謚——“晉莊平公”（簡91、96、99）、“晉簡公”（簡109、110）、“秦翼公”（簡105）、“晉敬公”（簡111）和“衛幽侯”（簡19）。

1.“晉莊平公”。《繫年》簡91“晉莊平公即位元年”，簡96“晉莊平公立十又二年”，簡99

①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135頁。

② 參張春海《清華簡〈繫年〉或有助填補周代研究空白》，《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12月22日第2版。

“晉莊平公即世”。^①又省作“平公”。簡 92、95“平公率師會諸侯”，簡 92-93“平公立五年”。^②傳世文獻中也記作“平公”。《史記·晉世家》：“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③《呂氏春秋·去私》：“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④

2.“晉簡公”。《繫年》簡 109“晉簡公立五年，與吳王闔閭”，簡 110：“晉簡公會諸侯，以與夫差王相見於黃池。”又省作“簡公”。簡 100：“簡公即位。”整理者指出：“昭公三十一年爲晉定公元年，簡文則稱簡公，下第二十章同。晉東（簡）公，即晉定公，名午。”^⑤蘇建洲先生指出：“傳世文獻未見‘晉簡公’的稱號，且謚號‘簡’‘定’不能替換……《繫年》將‘晉定公’寫作‘晉簡公’，可能是傳聞有異，或是說有聲音的因素在其中。”^⑥而“簡”和“定”作爲謚號，又都見於《逸周書·謚法解》：“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大慮靜民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爽曰定”。^⑦據此，我們懷疑，“簡”和“定”都是這位晉公的謚號。也就是說，這位晉公是雙字謚。

3.“秦翼公”。《繫年》簡 105：“秦翼公命子蒲、子虎率師救楚，與楚師會伐唐，縣之。”整理者指出：“《左傳》定公四年楚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史記·秦本紀》亦作‘哀公’，索隱云：‘《始皇本紀》作瑯公。’今本《始皇本紀》作‘畢公’。簡文作‘異公’。”^⑧王輝先生指出：“‘異’疑讀爲‘翼’，《逸周書·謚法解》：‘剛克爲伐曰翼。思慮深遠曰翼。’……秦異公即秦哀公……‘哀’與‘異’字形不接近。上古音‘異’職部喻紐，‘哀’微部影紐，聲韻亦有距離。但古音微部與之部（職爲之部入聲）字可通轉……‘異、哀’雖可通用，但當以‘翼’爲正字……‘秦哀公’應改稱爲‘秦翼公’……在整個春秋戰國時代，謚‘翼’者絕少，而謚‘哀’者則不鮮見，秦‘哀公’改稱‘翼公’，對謚法研究也有重要意義。”^⑨“哀”爲微部影紐，“翼”爲職部喻四。二者聲韻并不接近。而且，“哀”和“翼”在《謚法》中都有記載。據此，我們懷疑，“哀”和“翼”是雙字謚。李零先生曾總結出秦國有厲共公、肅靈公、元獻公、惠文王、悼武王或武烈王（當爲三字謚）、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等國君均有雙字謚，秦孝公也可能謚“孝平王”。^⑩另外，據文獻記載，古人還是有

①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177、180 頁。

②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177 頁。

③ 《史記》卷三九《晉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59，1683、1684 頁。

④ 許維通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卷一《去私》，北京：中華書局，2009，29 頁。

⑤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180、186 頁、182 頁注 9、187 頁注 5。

⑥ 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璿：《清華二〈繫年〉集解》，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713 頁。

⑦ 朱右曾：《逸周書匯校集訓校釋》卷六《謚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93、94 頁。

⑧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184 頁、185 頁注 4。

⑨ 王輝：《一粟居讀簡記（六）》，《古文字研究》第 30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362-363 頁。

⑩ 李零：《楚景平王與古多字謚》，《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6 年第 6 期。

用“翼”作為謚號的，祇是時代稍晚。《後漢書·陰興列傳》：“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興曰翼侯。”^①《三國志·蜀書·法正傳》：“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②由此可見，“翼(翼)”“哀”應為雙字謚。

4.“晉敬公”。《繫年》簡111“晉敬公立十又一年”整理者指出：“晉敬公，見《竹書紀年》：‘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晉世家》索隱)據《史記》，晉敬公名驕，有別謚哀公、懿公。簡文所記晉國世系始自獻公，終烈公止，中間祇缺出公一世未見。據《竹書紀年》出公在位二十三年推算，晉敬公十一年當在周貞定王二十八年。”^③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卷三二云：“《晉世家》明云：‘立昭公曾孫驕為哀公。’《趙世家》又謂驕是懿公，則哀懿自是一人之謚，猶周貞定王，《左傳》正義引《世本》，或稱貞王，或稱定王也，《竹書》又謂哀懿公即敬公耳。傳謂敬公是昭公之孫，孫即曾孫，猶《魯頌》謂僖公為周公之孫。蓋孫是後裔之大名，非必皆子之子也。奔齊奔楚及在位年數，與《史記》各殊，此聞見異詞，而《竹書》以晉人晉事，當不誤也。”^④“敬”“哀”和“懿”作為謚號，均見於《逸周書·謚法解》：“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善合法典曰敬”；“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溫柔聖善曰懿”。^⑤我們懷疑，“敬”“哀”和“懿”都是這位晉公的謚號。換句話說，這位晉公是三字謚。

5.“衛幽侯”。《繫年》簡19：“幽侯滅焉。”整理者指出：“被狄攻滅的衛侯，《左傳》稱‘衛懿公’，《論衡·儒增》稱‘衛哀公’，簡文則作‘幽侯’，謚法互異。”^⑥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戰國簡讀書小組認為：“‘幽’蓋誤字，涉上文‘周幽王’而誤。”^⑦蘇建洲先生認為：“‘幽’，影紐幽部，三等開口；‘懿’，影紐脂部，三等開口；‘哀’，影紐微部，一等開口。幽部與脂部、微部古音有密切的關係……總之，從聲音來看，‘幽’確實與‘懿’‘哀’相近，符合通假的條件……‘公’‘侯’爵稱確實可以互稱……後來看到朱曉海先生認為‘參照《左傳》，卷二二〈宣公十年〉，頁382：改葬(鄭)幽公，謚之曰靈’，則‘懿’未嘗不可能乃後來的改謚。”^⑧我們懷疑，“幽”“懿”“哀”等三字都是謚號，即三字謚，與上文中的“晉敬公”亦稱“哀公”“懿公”相同。“哀”和“懿”，詳上文。“幽”，《逸周書·謚法》：“蚤孤隕位曰幽，雍遏不通曰幽，動靜亂常曰幽。”^⑨

① 《後漢書》卷三二《陰興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1132頁。

② 《三國志》卷三七《法正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961頁。

③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186頁、187頁注10。

④ 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5頁。

⑤ 朱右曾：《逸周書匯校集訓校釋》卷六《謚法》，97、98、95頁。

⑥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144頁、145頁注10。

⑦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戰國簡讀書小組：《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繫年〉書後(二)》，簡帛網，2011年12月30日。

⑧ 蘇建洲、吳雯雯、賴怡璇：《清華二〈繫年〉集解》，237-238頁。

⑨ 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卷六《謚法》，98頁。

上述五個謚號中,“晉莊平公”“晉東公”和“秦異公”都是雙字謚,“晉敬公”和“衛幽侯”都是三字謚。

雙字謚在古代文獻中比較常見。李零先生在對文獻中周、東周、秦、趙、魏、韓、燕、楚等國的雙字謚進行總結之後,指出:雙字謚的“年代範圍約與戰國相終始,幾乎各國都有,有些甚至可以一代代排起來(如周和秦、趙稱王以後),可見是一種普遍現象。它使我們考慮,現存文獻所見的單字謚,恐怕還有不少原來也是雙字謚;其省稱之例,或用上字,或用下字,并不固定,也未必局限於文獻所錄的某一種”。^①關於一字謚與雙字謚的關係,《白虎通·謚》有言曰:“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謚,質者以兩言爲謚。故湯死後稱成湯,以兩言爲謚也。”^②李零先生認爲此說“實不足信”,并提出新說:“謚者益也,一不足而二,二不足而三,都是後來加上去的。”^③李說可謂卓識。

至於三字謚,童書業先生曾指出:“周代謚號往往多至二、三字,而文獻中常簡稱其主要之一字,如衛武公之爲‘睿聖武公’,齊靈公之爲‘桓武靈公’是也……又若韓桓惠王亦稱‘悼惠王’,‘宣惠王’亦稱‘威侯’,秦悼武亦稱‘武烈王’,則或爲三字謚,蓋古謚法頗爲錯出也。《檀弓下》:‘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則古謚法三字似爲常例。”^④李零先生不僅提出了新的見解(詳上文),還列舉了更多例證。這些例證,有的見於傳世文獻:“《國語·楚語上》左史倚相說衛武公(前812—前758)死後謚爲‘睿聖武公’,‘武’字更是由三字謚省稱。還有上文的雙字謚有些有兩種叫法,如秦武王或作‘悼武王’,或作‘武烈王’;趙王遷或作‘幽潛王’,或作‘幽繆王’;魏惠王或作‘惠文君’,或作‘惠成王’;韓宣王或作‘宣惠王’,或作‘鄭威侯’,或作‘鄭宣王’;韓桓惠王或作‘悼惠王’。這些雙字謚也有可能是由三字謚拆讀。”也有不少是見於出土文獻的。西周穆王銅器班簋“班非敢覓,作昭考爽謚曰‘大正’”中的“大正”,是“以‘大正’爲雙字謚,或連‘昭’爲三字謚”;西周共王銅器史牆盤中記有“粵古文王;迅圉武王;憲聖成王;慎哲康王;弘魯昭王;祁顯穆王”,都“是在冠以謚稱的王號前別加二字稱美之……它們前面的兩個字,除‘粵古’和釋讀尚有疑問的‘迅’字……均可與《逸周書·謚法》相印證。”叔弓罇中的“孝武靈公”、遼仲之子匚罇中的“有成惠叔”和“有成惠姜”、禾簋中的“懿恭孟姬”、陳侯因脊敦中的“孝武桓公”等,也都是三字謚。^⑤

① 李零:《楚景平王與古多字謚》。

② [清]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卷二《謚》,北京:中華書局,1994,70-71頁。

③ 李零:《楚景平王與古多字謚》。

④ 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校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345頁。

⑤ 李零:《楚景平王與古多字謚》。

將童書業、李零二位先生的意見綜合起來考慮，就可以揭示出古代多字謚的基本情況：謚號是從單字發展到多字（先雙字，後三字）的。雙字謚在文獻中很常見，經常省稱為單字。三字謚早在商周時期就已經出現，在文獻中又往往省稱為雙字或單字，其省稱如李零先生所言“或用上字，或用下字，並不固定”。關於多字謚的省稱，古代學者也有所發現，如清人顧炎武就曾指出：“古人謚有二字三字，而後人相沿止稱一字者。”^①

關於多字謚出現的時代，李零先生總結說：“古多字謚的出現並不始於戰國，而是濫觴於商周，盛行於春秋，和單字謚相隨，也有很早的來源。”^②另外，李先生還提及了衛、晉二國雙字謚的使用情況，可與《繫年》的記載互證。李先生指出：“《國語·楚語上》左史倚相說衛武公（前812—前758年）死後謚為‘睿聖武公’……楚平王的雙字謚，年代不僅早於楚系最早的獻惠王（即惠王），也早於上述年代更早的秦厲共公和周貞定王，已經上延到春秋時代，是可補文獻之缺的重要發現。”^③從時代上看，衛懿公在位時期要晚於衛武公。既然衛武公已經使用三字謚，那麼衛懿公使用雙字謚是很正常的。當然，也不排除衛懿公有三字謚。晉莊平公在位時期與楚平王差不多，甚至稍早。這不僅印證了李先生雙字謚可以“上延到春秋時代”的論斷，還可以將晉、衛二國使用雙字謚的時段上限大大提前。可見，晉、衛二國的雙字謚也是出現得比較早的。

綜上所述，清華簡《繫年》中的“晉莊平公”，文獻作“晉平公”；“晉簡公”，傳世文獻作“晉定公”；“秦翼公”，傳世文獻作“秦哀公”；“晉敬公”，文獻又作“哀公”“懿公”；“衛幽侯”，傳世文獻又作“衛懿公”“衛哀公”。除“晉莊平公”是明確記載外，其他四個謚號的情況均不明顯。但實際上，《逸周書·謚法解》不僅收有謚號“柬（簡）”“異（翼）”“敬”和“幽”，還收有謚號“定”“哀”“懿”。這就說明，“柬（簡）”和“定”，“異（翼）”和“哀”，“敬”和“懿”“哀”，“幽”和“懿”“哀”都不是偶然出現的錯誤，而應該理解為雙字謚和三字謚。在文獻中，雙字謚和三字謚都存在省稱情況。省稱時，並沒有固定為某一字。這幾個多字謚，尤其是“晉簡公”“秦翼公”“晉莊平公”和“衛幽侯”的記載，幸賴《繫年》得以保存。雙字謚的使用時段上限，也幸賴《繫年》得以提前。

附記一：《逸周書·謚法解》另有一處“思慮深遠曰翼”。他本有作“明”者，學者有將其訂正為“趕”“固”的，亦有學者對各字進行解說的。^④此條當係重出。《文獻通考·王禮考》

① [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樂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309頁。

② 李零：《楚景平王與古多字謚》。

③ 李零：《楚景平王與古多字謚》。

④ 參黃懷信《逸周書匯校集注》卷六《謚法解》，744—745頁。

作：“思慮果敢曰趯。”^①《謚法》卷三作：“意慮深遠曰趯。”蘇洵解釋說：“趯者，取其警而後行，深慎之稱也。趯或作畢。”^②我們懷疑“翼”從“異”得聲，於是有了“異”；“異”“畢”形近，“異”訛成了“畢”。“趯”，則應該是在“畢”的基礎上疊加了“走”旁。而“趯”的出現，大概是因為“趯”字殘損。“趯”所從的“旱”，與“畢”的繁體很接近。至於為何會出現“固”字，則不得而知了。

附記二：春秋時期，晉國曾有兩位“翼侯”。《左傳》隱公五年：“翼侯奔隨。”^③此翼侯指晉鄂侯。桓公三年“逐翼侯於汾隰”。^④此翼侯指晉哀侯。這兩處翼侯之“翼”，都是指地名，而非謚號。《史記·晉世家》：“翼，晉君都邑也。”司馬貞索隱：“翼本晉都也，自孝侯已下一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⑤秦哀公在清華簡中寫作“秦異(翼)公”，會不會與晉哀侯稱“翼侯”存在某種聯繫？

①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二二《王禮》，北京：中華書局，1986，1111 頁。

② [宋]蘇洵：《謚法》卷三，《叢書集成新編》第 31 冊，臺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46 頁。

③ 《春秋左傳正義》卷三隱公五年，1727 頁。

④ 《春秋左傳正義》卷六桓公三年，1746 頁。

⑤ 《史記》卷三九《晉世家》，1638 頁。

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與 《左傳》“鄭伯克段於鄆”*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後流動站 熊賢品

內容提要 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中的地名“郕(鄆)”，即《左傳》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鄆”中的“鄆”，其地在今偃師南。“鄭伯克段於鄆”的歷程為鄭國軍隊從新鄭出發，攻打位於其西北部、段所在滎陽地區的“京”；其後段從“京”逃往其西部的偃師南之“鄆(郕、鄆)”，並於此被鄭國軍隊打敗；之後段渡過黃河而逃亡至今輝縣市。

關鍵詞 清華簡 鄭文公問太伯 左傳 鄭伯克段於鄆

《左傳》隱公元年記載有“鄭伯克段於鄆”，關於其中的“鄆”地所在，歷來爭論較多，筆者亦對此問題有所關注。近來在閱讀新出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的時候，認為篇中的地名“郕(鄆)”，應當是《左傳》“鄭伯克段於鄆”的“鄆”，其地在偃師南緱氏鎮附近。現撰成此文，並請專家賜正。

一 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中的地名“郕”

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中有如下記載：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大遺址與河洛三代都城文明研究”(13&ZD100)、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五十九批面上資助“清華簡《繫年》與戰國王年問題研究”(2016M590177)的階段性成果。

世及吾先君武公,西城伊澗,北就郟(鄔)、劉,縈厄郢(蔦)、筓(邛)之國。^①

整理者引《左傳》隱公十一年:

王取鄔、劉、蔦、邛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緝、樊、隰郕、櫓茅、向、盟、州、陘、隤、懷。^②

並將簡文與《左傳》中的地名相對照,認為簡文中的地名:(1)“郟(鄔)”就是典籍中的“郟(鄔)”,並指出典籍中也有時候作“鄢”,如《國語·鄭語》的記載:

……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騫、曆、華,君之土也。^③

而公序本《國語》中則將“鄔”作“鄢”, (2)“劉”,在紀河南偃師西南; (3)“郢”即“蔦”,在河南孟津東北; (4)“筓”“邛”在河南沁陽西北。^④ 上述意見都是比較合理的。

整理者將“郟(鄔)”與“鄢”相聯繫的意見可從。筆者認為,從文獻的用例來看,古地名“鄢”既有可能是“鄢陵”的省稱,也有可能實際上是表示“郟(鄔)”的。而之所以“鄢”也存在實際上是表示“郟(鄔)”的可能,與它們在形、音上的相近有很大關係。首先,從文字形體上來看,劉釗先生曾指出古文字中存在“焉”“烏”形體訛混的現象,^⑤是很有道理的。從相關字形上來看,“焉”“烏”在秦文字中的字形有些相近,“烏”字形體,如《毛公鼎》(《集成》2841,西周晚期)“𪚩”,目前一般據之,認為“烏”是一個鳥形的象形字,秦文字中“烏”字形體尤其值得注意,如“𪚩”^⑥“𪚩”^⑦及《說文》篆字“𪚩”,這些與下文將要討論到的秦文字中的“焉”,形體有些近似了。而“焉”字的形體,如下列:

𪚩《中山王厝壺》(《集成》9735,戰國) 𪚩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168 𪚩《說文》

篆字 𪚩碧落碑

季旭昇先生曾分析“焉”字的構型,指出《中山王厝壺》中本字從鳥、從正,可能是會意字;秦文字可能從鳥、從佳,也有可能整個字為象形。^⑧ 將上述“烏”“焉”的形體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在秦文字中兩者的形體較為接近。

①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六)》,上海:中西書局,2016,119頁。

②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76-77頁。

③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463頁。

④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六)》,122頁。

⑤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140頁。

⑥ 袁仲一:《秦代陶文》,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351頁。

⑦ 許雄志:《秦印文字彙編》,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1,72頁。

⑧ 季旭昇:《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316頁。

而在文獻中的具體例證，除上引清華簡整理者等很多學者指出的，公序本《國語》中存在“鄆”作“鄆”之外，目前筆者所見還有另外一例，如清代學者洪頤煊曾指出：

《淮南子·人間訓》“楚共王與晉人戰於鄆陵”，《左氏》作鄆陵，字形相似，故經典常相亂。^①

依洪頤煊此條，則表明在其所見的《淮南子》版本中，存在將“鄆陵”寫作“鄆陵”的現象。而現在常見的《淮南子》此條記載，則一般是“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鄆陵”，^②由此表明在《淮南子》中也曾經存在“鄆”“鄆”相作的現象。故據上述《國語》《淮南子》的例證來看，可以說明古文獻中存在“鄆”“鄆”相作的現象。

同時，從古音上來看，“鄆”“鄆(鄆)”的古音關係也很密切。文獻中有同一地名因為讀音相近而异寫的用例，依此，更為重要的是，從音韻上來說，“於”“烏”“焉”兩者就有很密切的聯繫。“焉”“鄆”為影紐元部，“於”“烏”為影紐魚部字，它們聲母相同，而韻部魚、元通轉，因此“焉”“鄆”與“於”“烏”在古音上相近。其次，也有相關用例，如楚簡中有“於”“鳴”互作的用例，如上博簡《詩論》“於(鳴)虐(乎)！前王不忘”；^③此外，“闕”，《說文》解釋為“闕，遮擁也。從門，於聲”，文獻中有其與“焉”互作的用例，^④如《史記·曆書》：“歲名焉逢攝提格”，《索引》：“焉逢，《漢書》作‘闕逢’，亦音焉，與此音同”，《爾雅·釋天》“太歲在甲曰闕逢”；又《爾雅·釋天》“在卯曰單闕”，《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司馬貞《索隱》引孫炎本作“蟬焉”。故可見“鄆(鄆)”“鄆”在讀音上的聯繫也是非常密切的。

綜上，雖然目前我們還無法確定文獻中所見的“鄆”“鄆”互作，是由於形體的訛誤，還是由於音接近而造成的异寫，但由相關材料已經可見“鄆(鄆)”“鄆”從讀音到字形上關係都較為密切。因此我們在考慮文獻所見“鄆”地的時候，除去為“鄆陵”省稱的可能外，還要考慮到是“鄆(鄆)”地的可能，而這正是文獻中常見的同地名异寫的關係。

由之，結合這一思路和簡文上述關於偃師西南之“鄆(鄆)”的記載，給我們思考《左傳》“鄭伯克段於鄆”的地理問題，補充了相關的材料。

二 《左傳》“鄭伯克段於鄆”所在的新認識

學界關於《左傳》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鄆”所在有不同意見，現依據出現的時間順序列

① [清]洪頤煊：《讀書叢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21頁。

②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1249頁。

③ 白于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匯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262頁。

④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176頁。

舉如下：

(一) 柘城說

《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僞縣”顏師古注引應劭語：

應劭曰：“鄭伯克段於鄆是也。”師古曰：“鄆音偃。”^①

并認為陳留郡僞縣“鄭伯克段於鄆是也”，即今河南柘城縣北。《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柘城縣”的“鄆城”條下記載“縣北三十里有鄆城，當是鄭伯克段處”，^②清代學者洪亮吉對此說論述甚為詳盡：

《漢書·地理志》陳留郡，應劭曰：“鄭伯克段於僞，是也。”今考杜《注》潁川鄆陵縣既非；趙匡以為當作鄆，一無確據，又係改字，亦非也。惟應劭之說最足依據。僞縣，前漢屬陳留，後漢屬梁國，作鄆。陳留郡在春秋時大半屬鄭。且《傳》上云“至於廩延”，杜注：“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廩延至僞既屬順道，又渡河至共亦便，明克段之地為陳留僞縣無疑。^③

當代學者荆貴生先生認為克段於鄆的“鄆”不在河南鄆陵縣，而在今僞城（遠襄集），認為“僞”（今柘城縣僞城）在新鄭的正東，在京的東南方向。當子封率兵從西南而來時，共叔段可以從京之東門逃出，又朝東南方向逃到僞；當莊公從東方來伐僞時，共叔段又可以從僞的北門逃出，朝北跑到廩延，然後過河向正西的共國逃去；兩次逃奔均合乎情理，不與鄭軍所來的方向相逆，從而他將克段於鄆的“鄆”定在今僞城（遠襄集）。^④

但此說歷來也遭到一些質疑，如《嘉慶一統志》卷一九四《歸德府·古迹》：

僞縣故城：在柘城縣北……《漢書·地理志》注：‘應劭曰：鄭伯克段於鄆是也。’……《寰宇記》：在柘城縣北二十九里。按潁川有鄆陵，故屬鄭地，在今開封府鄆陵縣西北，此陳留之僞非也。應劭說誤，《元和志》《寰宇記》俱仍其謬。^⑤

清代學者沈欽韓《左傳地名補注》：

鄆：《方輿紀要》：‘鄆陵城，在開封府鄆陵縣西南。’……《寰宇記》：‘鄆城，在宋州柘

① 《漢書》卷二八，北京：中華書局，1999，1256 頁。

② [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2356 頁。

③ [清]洪亮吉撰，李解民點校：《春秋左傳詁》，北京：中華書局，1987，2 頁。

④ 荆貴生：《“鄭伯克段於鄆”的“鄆”》，《中國語文》1995 年第 2 期，收入其著《荆貴生語言文字論集》，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121-126 頁。

⑤ 《嘉慶重修一統志》，北京：中華書局，1986，9579-9580 頁。

城縣北二十九里。’鄭伯克段之地疑遠。”^①

可見，關於柘城說，尚有一些難以解釋之處。

(二) 鄆陵說

“鄆陵”在文獻中有時候也簡稱為“鄆”，如《戰國策·韓策三·建信君輕韓熙》記載“秦出兵三川，則南圍鄆，蔡、邵之道不通矣”，此處的“鄆”就是“鄆陵”。晉杜預提出“鄆”在“潁川郡鄆陵縣”，此後學者多從之，如楊伯峻先生認為“鄆”地在今河南省鄆陵縣北而稍西，^②這種意見也成為目前較為通行的主流看法。^③但需要注意的是，(1)《春秋》與《左傳》中既出現了地名“鄆”，也出現了地名“鄆陵”，二者有時并非一地；(2)從出土文獻的記載來看，秦之“鄆”與“鄆陵”并非一地，所見有秦“鄆印”“鄆丞之印”，其地在秦碭郡（漢之陳留郡）；又有“僞陵丞印”，其地在秦潁川郡（亦漢之潁川郡）。^④另外，有學者認為《左傳》隱公元年的“鄆”就是同書成公十六年中的“鄆陵”，這是由於鄭國滅鄆以後初用原名、後來才改名為鄆陵。對於這一觀點，荆貴生先生指出滅國改名的現象一般發生在政權交替不久之時，而從隱公元年到成公十六年，相隔一百多年，這是改名說的不足之處，^⑤筆者認為此說有道理。

因此也可以推測，我們要探討的《左傳》此處之“鄆”，可能也與鄆陵不是同一地。其次，即使認為“鄆”是“鄆陵”，也面臨學界多指出的地理上較為蹊蹺的問題。

(三) 偃師說

一些學者認為“鄆”是“鄆”字之訛，據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其中《史記·鄭世家》“段出走鄆”，唐張守節《正義》：“鄆，音烏古反。今新鄭縣南鄆頭有村，多萬家。舊作‘鄆’，音偃。杜預云：‘鄆，今鄆陵也。’”認為“鄆”在新鄭南之鄆頭村。而唐陸淳《春秋集傳辨疑》卷一引趙匡說，認為應當是在鄭之西部，位於今河南偃師西南：

趙子曰：鄆當作鄆，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年乃屬周。左氏曰：王取鄆、劉、蔿、邾之田於鄭是也。傳寫誤為鄆字。杜注云：今潁川鄆陵，誤甚矣。按從京至鄆非遠，又是鄭地，段所以有兵衆，故曰克。若遠走至鄆陵，已出境，即無復兵衆，何得云克？又傳曰：自鄆出奔共，即自鄆過河向共城為便路，若已南行至鄆陵，不當奔共也。^⑥

① [清]沈欽韓：《左傳地名補注》，《皇清經解續編》（卷五九七），1頁。

②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7頁。

③ 胡安順：《“鄭伯克段於鄆”考辨》，《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及《“鄭伯克段於鄆”的“鄆”字考辨》，《西安教育學院學報》1997年第2期；韓益民：《“鄭伯克段於鄆”地理考》，《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張德恒：《鄭伯克段發微——并釋〈叔於田〉兩首》，《太原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

④ 王偉：《秦璽印封泥職官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363、606頁。

⑤ 荆貴生：《“鄭伯克段於鄆”的“鄆”》，121-126頁。

⑥ [唐]陸淳：《春秋集傳辨疑》，影印文淵閣四庫叢書-經部一四〇春秋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599-600頁。

此說也先後有一些學者贊同,如《漢書補注》所引清代學者徐松的意見,也認為“然則克段者,緱氏之鄆;晉楚遇者,此僑陵(按:即今日之河南鄆陵),皆與陳留之僑陵無涉”。^①清代學者汪價《中州雜俎》卷二“烏焉互舛”條也認為“《石經·春秋》‘鄭伯克段於鄆。’趙匡云:‘鄆當作鄆。’”^②當代學者郭聲波先生也認為克段之地是“鄆”,應在晉緱氏縣西南(今河南偃師縣南),但不贊同張守節認為“鄆”在新鄭南之鄆頭村的看法。^③賀江、辛志賢、王家康先生也對偃師南部說表示了贊同。^④從現在的討論來看,“偃師”以南說是這一種解釋的主流意見。

(四) 滎陽說

清代學者呂調陽《群經釋地》、近代學者程發軔先生等贊同此說,如程先生認為“鄆”與“旃然”為同一地,祇是在讀音上的急緩之別;而旃然為水名即“索”水,由此可以確定“鄆陵”在滎陽一帶,即後世之索城。^⑤

從學者的討論來看,爭議較多,有時候同一學者的意見就搖擺不定,如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書中即同時見到有“柘城說”與“鄆陵說”,本書卷七《河南道三》“宋州”之“寧陵縣”條記載:“故鄆城在縣南五十三里,漢之鄆縣。鄭伯克段於此。”^⑥而卷八《河南道四》“許州鄆陵縣”記載:“本漢舊縣,屬潁川郡。春秋,鄭伯克段於鄆,晉楚戰於鄆陵,并此地。”^⑦在一書中有兩種意見,表明其意見不定。不過,整合上文的討論來看,關於“鄭伯克段於鄆”的“鄆”地所在,上述幾種意見中,“柘城說”“鄆陵說”都還存在一定的問題,而“滎陽說”主要立足於古音學,證據實際上也不多;相較之下,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的記載則或為“偃師說”補充了相關資料。綜合文獻與簡文“北就鄆(鄆)、劉”的記載,可見“鄆(鄆)”是在新鄭以北,由此可以否定唐張守節提出的新鄭南部鄆頭村說。另一方面,清洪亮吉曾認為趙匡“以鄆為鄆,一無確據,又係改字”,清代程恩澤也有類似的觀點,^⑧從而否定偃師說。現在我們從相關文獻來看,被他們否定的意見其實反而是有道理的。

①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漢書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302頁。

② [清]張燾纂、汪介人著:《津門雜記·中州雜俎》,揚州:廣陵書社,2003,489頁。

③ 郭聲波:《鄭伯克段疑不在鄆》,《人文雜誌》1986年第4期。

④ 賀江:《鄆地存疑》,《中華文史論叢》第15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00頁;辛志賢:《左傳地名考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3期;王家康:《鄭伯克段之“鄆”地在哪裏》,《文史知識》2014年第2期。

⑤ 程發軔:《春秋地名斟注》,《臺灣師大學報》1959年第4期;又《春秋地名圖考》,《臺灣師大學報》1961年第6期;羅師孔:《〈鄭伯克段於鄆〉之“鄆”》,《光明日報》2014年4月8日第16版。

⑥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184頁。

⑦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209-210。

⑧ [清]程恩澤撰,[清]狄子奇箋:《國策地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10頁。

三 “鄭伯克段於鄢”的歷程

於此，我們再來具體分析一下“鄭伯克段於鄢”的具體歷程。《左傳》隱公元年記載：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即位，爲之（按：即共叔段）請制……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大叔完聚……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於鄢。”^①

首先看這段記載中涉及的“鄢”之外的幾個地名：

（1）制。關於“制”地所在，首先要看“制”與“北制”的關係問題，《左傳》隱公五年記載有“北制”：

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杜預注：北制，鄭邑，今河南城皋縣也，一名虎牢。^②

襄公十年記載有“制”：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杜預注：梧、制，皆鄭舊地。^③

關於“制”與“北制”是否爲同一地，學界意見不一。一些學者認爲并非爲同一地，如日本學者竹添光鴻認爲在汜水縣西者爲制，即虎牢，而在鄭州北者，爲北制。^④而《括地志》認爲兩者爲一：

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周時名北制，在敖山之陽……鄭州汜水縣，古東虢國，亦鄭之制邑，漢之成皋，即周穆王虎牢城。^⑤

目前較多學者贊同祇有“制”地。^⑥筆者也認爲“制”可能也就是“北制”，參照文獻中有“蘭”又名“北蘭”的例子，如見於《史記·六國年表》記載的“北蘭”“蘭”爲同一地，公元前372年，在魏國一欄有“衛聲公元年，敗趙北蘭”，趙國一欄有“伐衛，取都鄙七十三。魏敗我蘭”。故依之，“制”與“北制”很有可能爲同一地。

①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11-14頁。

②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浦衛忠等整理：《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97頁。

③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浦衛忠等整理：《春秋左傳正義》，890頁。

④ [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卷一一，明治三十六年井井書屋本。

⑤ 賀次君：《括地志輯校》，北京：中華書局，1980，177、179頁。

⑥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10-11、45頁。

其次,“制”是否爲虎牢,也是應當注意的。班固認爲“成皋,故虎牢,或曰制”,^①學者自後多認爲二者爲同一地,但也有學者認爲并非是一地,“制”應當是在虎牢附近。^②本文贊同兩者應當爲一地之說。

(2)京。滎陽縣東南二十餘里處。^③

(3)西鄙、北鄙。楊伯峻先生認爲上述二地可能是指鄭國西部與北部邊境一帶地區。^④

(4)廩延。有學者認爲其地是在今河南延津縣,如杜預注:

(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⑤

清代學者顧棟高認爲:

舊城在今河南開封府延津縣北十五里。黃河故道自新鄉東流徑衛輝府汲縣南七里,謂之棘津。又東二十里爲延津。^⑥

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爲應當在今河南滑縣。清代學者劉文淇據《水經注》的記載,認爲:

廩延即今滑縣,唐之滑州,漢、晉爲白馬縣。杜預謂酸棗縣之延津,遠矣。^⑦

而清楊守敬則認爲廩延在滑縣說有誤,應當是在延津:

《方輿紀要》《(大清)一統志》直云鄭廩延邑,亦曰酸棗,則是鄭地,在今延津縣……且《注》下文明言衛之平陽亭在廩延南,安得鄭之廩延邑在平陽北乎?^⑧

本文暫從“廩延”在延津之說。

(5)共。一般認爲是在河南新鄉以西、焦作東北的輝縣市,其地有“共北山”,《漢書·地理志》:“共北山,淇水所出”,《水經注》:“共山,在共伯故國北,所謂共北山也。”上博簡《容成氏》“共、滕之間”,其中的“共”也就是本地。^⑨

雖然“廩延”還不好直接確定,但是關於另外幾處地點的所在,已經有大致比較可靠的認識,從而爲我們探討“鄆”的所在,提供了重要的基點。而確定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篇中的地名“郕(鄆)”,也就是《左傳》“鄭伯克段於鄆”的“鄆”,與上述相關地名整體範圍分布

① 《漢書》卷二八《地理志》,1253-1254 頁。

② 韓益民:《“鄭伯克段於鄆”地理考》,《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4 期。

③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11 頁。

④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12 頁。

⑤ [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8 頁。

⑥ [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972-974 頁。

⑦ 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9 頁。

⑧ 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408、412-413 頁。

⑨ 陳偉:《〈容成氏〉共、滕二地小考》,《新出楚簡研讀》,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165-168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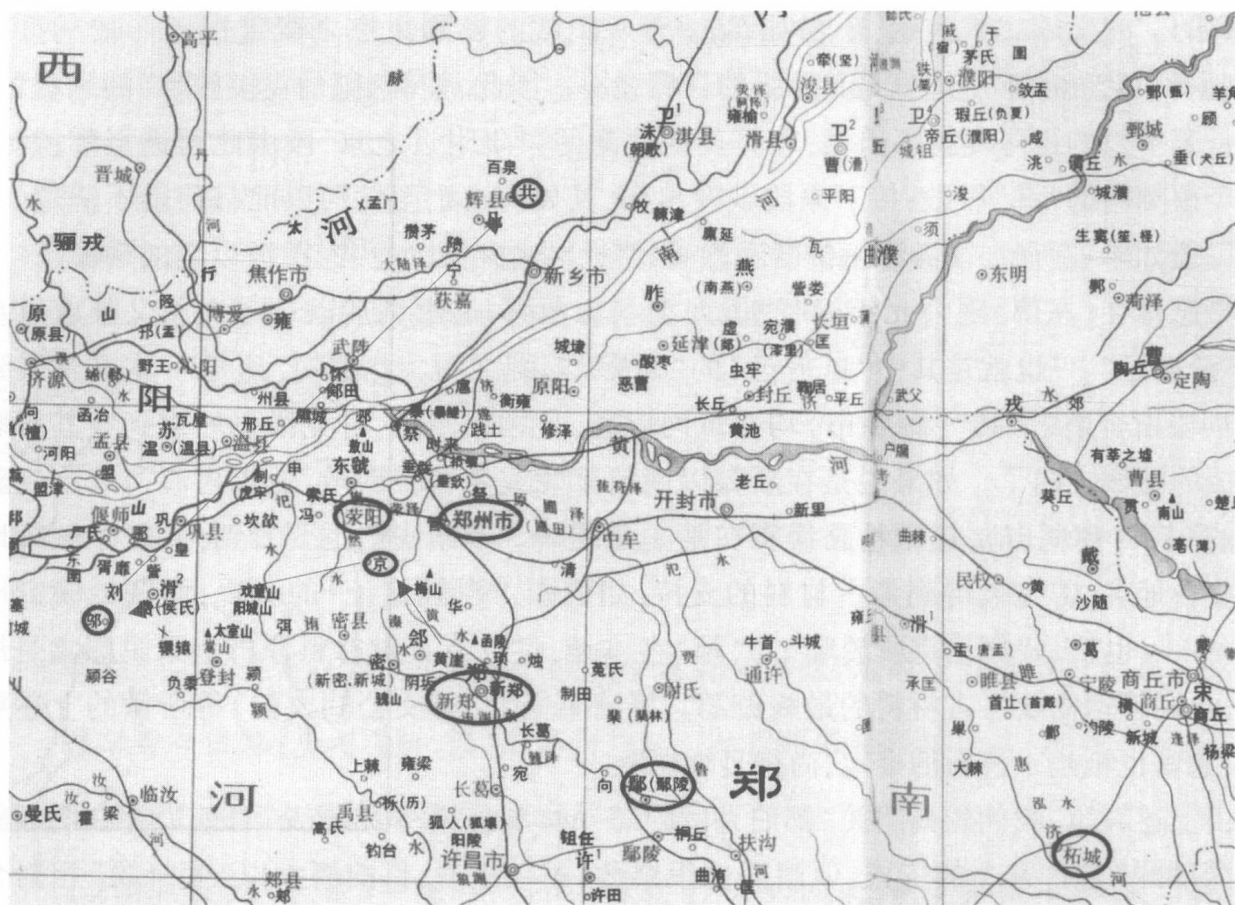
是相宜的。簡文的記載表明，不僅如《左傳》所記載的鄭國東遷之後重視地形較為重要的“制”地等，而“郕(鄢)”地也是其擴張的目標之一。因此，整個“鄭伯克段於鄢”的過程如下：首先是鄭子封的軍隊從新鄭出發，攻打其西北部的滎陽附近之京，段由此西逃至鄢；其後段又在今偃師南的“鄢”戰敗；接下來段戰敗出奔，其如何逃亡至黃河以北目前還不清楚，路線很有可能如學者所說，從孟津一帶度過黃河，然後再逃到偃師東北、黃河以北的輝縣市一帶，這一帶應當在《左傳》隱公元年記載“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①也就是其中“貳於己”的“北鄙”範圍之內。此處的“廩延”(本文暫采延津說)，與段所奔逃之“共”(輝縣市)均在黃河以北，且相距不遠，可見段仍然逃到與其有聯繫和支援的區域之內了。如果說是在新鄭以南的鄢陵或者柘城戰敗，然後再渡河逃跑到新鄭以北的“共”(輝縣市)，這兩種路線實在是頗爲蹊蹺。不過我們也要看到，文獻中偃師地區的一些古地名，曾先後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如劉國、^②滑國遺址^③的發現；而關於偃師地區“郕(鄢)”、也就是“鄭伯克段於鄢”之“鄢”在本地，從已有文獻材料分析上來說應當是最爲合理，也同樣還需要考古材料的最終確認。據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等所做的上述路線擬定，應當也祇是一種新的推定，尚待日後檢驗。

由上述討論，我們認爲關於“鄭伯克段於鄢”的“鄢陵說”“柘城說”目前尚存在明顯的問題；“滎陽說”有古音上的依據，但證據也很單薄；相較來說，目前應當以“偃師說”相對合理一點。借助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北就郕(鄢)”的記載，將之與傳世文獻相比較，它應當就是《左傳》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之地，在今日之偃師西南部。上述地名“郕”“鄢”“鄢”的互作，應當與形體、讀音相近有關。總之，我們認爲《左傳》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所在，很有可能就是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篇中的“郕”也就是“鄢”，在偃師南。“鄭伯克段於鄢”前後的行程，大體路線可以如下圖所示。

①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12頁。

② 劉曉景：《劉國史迹考略》，《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

③ 趙芝荃：《河南偃師“滑城”考古調查簡報》，《考古》1964年第1期。



(底圖取自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春秋·鄭宋衛”,地圖出版社1982)

附記:感謝匿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出土秦漢曆書綜論*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陳侃理

內容提要 曆書是人類有計劃地命名和安排時間的產物，反映出製作者和使用者的時間觀念及其遵循的時間秩序。目前所知年代較為確定的出土秦漢曆書共 83 件，按照內容和形制等因素，可以分為曆日和曆朔兩類，分別包括二型、三型，各若干式，呈現出一定的發展繼承關係。秦漢曆書主要有查日期和歲時節日、加注記事以及配合日書占視吉凶三種功能，結合了“曆法”和“選擇”兩類知識。曆書可以是使用者自己製作，也可能來自多元化的公共性渠道，曆朔和曆日安排往往不盡統一。這種情況，為思考當時人的時間觀念以及秦漢國家與社會時間秩序的構成，提供了啟示。

關鍵詞 曆書 曆法 時間觀念 時間秩序

人類借助日月星辰的周期性變化來觀測和度量時間，發明了年、月、日等時間單位，又用表格等形式，系統而連續地譜排出特定時段內的年月日，形成實用性的文書，我們稱之為曆書。^① 曆書是人類有計劃地命名和安排時間的產物，反映出製作、使用者的時間觀念和所遵循的時間秩序。

* 本文為教育部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專項資金資助項目“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形成的早期發展研究”（201311）階段性成果。

① 本文統稱為曆書的文獻，學者也稱為曆日、曆表、曆譜等。這些稱謂各有缺陷，不足以或不適於概括所有出土秦漢曆書。選擇“曆書”一詞作為統稱，意在用現代名詞去指稱一個古稱難以涵蓋的範圍，並不表示此類文獻中的每一件都必須以“曆書”為名。根據文獻自題名，將某件或某幾件特定的曆書稱為“質日”“曆日”等，也是可行的。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曆書”有時也用於指稱記載曆法或時日選擇數術的書，與本文用的概念不同。

20世紀初以來,甘肅、內蒙、湖北、湖南、山東、江蘇等地出土了大批秦漢時期的曆書。目前,對這些資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復原、定年和分類,二是討論命名和性質,三是通過所載曆朔干支推定秦漢曆法。這些方面,已有不少成果問世。隨着新材料的刊布和研究不斷推進,上述工作又可以進一步充實和深入。首先,部分曆書的復原和定年值得推敲;其次,有必要設計一個新的分類體系,使之能夠容納迄今發現的所有秦漢曆書,反映它們之間的差別、聯繫及發展的綫索,在此基礎上重新認識秦漢曆書的功能、性質和來源;最後,在深入了解曆書中曆朔資料的性質後,還應反思秦漢曆法推定的前提和方法,重新認識秦漢帝國的時間觀念與時間秩序,探究其背後的社會和政治狀況。

我在2012年發表《秦漢的頒朔與改正朔》一文,^①涉及前面提到的最後一個問題。此後繼續探索秦漢帝國時間秩序的形成過程,做了一些初步的思考。^②本文實際上是這一系列工作的基礎,初稿草成於2011年初,次年10月提交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出土文獻研究所主辦的第一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作為會議論文宣讀,得到評議人凌文超先生等學界同仁的指正。舊稿近年來又陸續修改,增補了新發表的資料和研究成果,希望能夠為相關研究提供一點資料上的方便,也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一 出土秦漢曆書的類型

出土秦漢曆書最早是20世紀初斯坦因在考察敦煌漢代屯戍遺址時發現的。羅振玉、王國維將其中的編冊年曆分為“橫讀式”和“豎讀式”兩類。^③20世紀中葉,日本學者森鹿三將居延出土的漢曆分為三類,增加了一種僅以單簡書寫每月朔日和八節、三伏所在的簡易類型。^④陳夢家的工作更加系統和完善,他明確提出以形制為標準,將曆書分為五類。^⑤此後做過漢簡曆書綜述的陳久金、張永山都接受他的體系。^⑥閔尾史郎則另闢蹊徑,從功能角度考

① 陳侃理:《秦漢的頒朔與改正朔》,余欣主編《中古時代的禮儀、宗教與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48-470頁。

② 陳侃理:《秦漢時期的歲星和歲陰——從馬王堆帛書中的太陰說起》,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中華書局聯合主辦“《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修訂”國際研討會會議論文,2015年6月;《數字紀日的產生與通行》,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主辦“出土文獻與學術新知”學術研討會暨第四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會議論文,2015年8月,後改題《序數紀日的產生與通行》,刊於《文史》2016年第3輯。

③ 羅振玉、王國維編著:《流沙墜簡》,北京:中華書局,1993。

④ 森鹿三:《居延出土の漢曆について》,《史泉》22,1961。

⑤ 陳夢家:《漢簡年曆表叙》,《考古學報》1965年第2期,後收入其著《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

⑥ 陳久金:《敦煌、居延漢簡中的曆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張永山:《漢簡曆譜》,任繼愈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天文卷》第一分冊,鄭州:大象出版社,1993。後來,張永山據居延五鳳三年曆書木牘,增加了一種“單板環讀式”,也是形制分類。

慮，將曆書分為正曆和略曆兩種。^①

近幾十年來，秦漢曆書不斷出土。尹灣漢簡、周家臺秦簡、張家山漢簡等墓葬中的新發現，將出土曆書的時代上溯至秦，地域擴展到南方，內容和形式也更加多樣，以往的分類逐漸顯得粗率或不够周延。本世紀以來，吉村昌之和劉樂賢分別對曆書分類做了新的探索。他們按照內容將曆書分為年曆和月曆，然後再進行細分。吉村昌之試圖收錄以往發現的全部曆書，逐一解說。^② 劉樂賢文除分類外，還着力分析各類曆書的定名、內容和功能，是目前最為系統的綜論。^③

上述分類研究已經提供了認識曆書基本的框架，但如果要進而研究時間觀念、時間秩序及其發展變化，還需抓住曆書中最能夠反映時間觀念以及時代和地域特征的因素，提出一個更能夠反映曆書內涵及其發展的新分類體系，為解讀其中的歷史信息做好準備。我設想的分類體系包括類、型、式三級。這個分類體系的核心標準是曆書的內容，用以劃分“類”和“型”，形制則作為“式”的主要劃分標準。在形制因素中，首先考慮書寫格式和閱讀方式。曆書的功能需要結合曆書以外的因素進行推測，因而僅作為分類的參考。由於曆書兼有文獻和實物的雙重屬性，本文所用的類型概念與考古學研究器物的類型學概念不完全相同，這也是需要說明的。

根據內容，出土秦漢曆書首先可以分為“曆日”和“曆朔”兩類。曆日類曆書的特征是，每一日占據獨立的一格或一行，每日的干支下都保留有加注的空間。“曆朔”類則不具備上述特征，而僅以記載每個月的朔日干支為主要內容。以下分別介紹這兩類曆書。為求論述簡明，每一式下以典型曆書為例說明本式特點，帶叙同式曆書，對個別有疑問者略做考辨。^④

（一）曆日類曆書

曆日類曆書可分為二型七式。以下用大寫字母表示型，羅馬數字表示式，分別介紹。

曆日類 A 型（年曆型）：以年為最小單位，不分割使用。此型分為 7 式，下面以各式中年代最早的曆書為序，由早到晚依次介紹。^⑤

① [日] 関尾史郎：《甘肅新出漢代曆樣木簡の基礎的整理》，《東アジア—歴史と文化》2，1993。

② [日] 吉村昌之：《出土簡牘資料にみられる曆譜の集成》，富谷至主編《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3。

③ 劉樂賢：《秦漢曆日的內容及功用》，《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古羅馬和秦漢中國——風馬牛不相及乎》，北京：中華書局，2011。

④ 本文述及各種出土曆書，一概採用出土地加年代組成的簡稱。西北漢簡按照通行習慣冠以“敦煌”“居延”，必要時加上出土位置（探方號）以示區分。其他簡牘，如江蘇連雲港尹灣漢墓簡牘曆書簡稱“尹灣某年曆書”，嶽麓書院藏秦簡曆書簡稱“嶽麓某年曆書”等。具體出處見於腳注，正文中不再一一說明。

⑤ 本文曆書的定年絕大部分依據學界普遍認可的意見，個別未見成說的則自行推定。對定年存在爭議或者無法確定年代的曆書，正文或注釋中會另行說明。

I 式(逐日干支六欄橫讀式):一般包括 2 支月名簡和 57 支或更多的干支簡,分六欄橫向連讀,每欄兩月,合為一年十二個月,如有閏月則單獨附於最末。有些曆書實例在月名簡中不包含干支,則干支簡的數量相應增加。該式的典型形態可參看文末所附示意圖一。

此式中的嶽麓書院藏秦始皇二十七年曆書是已發現秦漢曆書中年代最早的。^① 此書現存竹簡綴合後共 54 支,原應由 60 支竹簡組成。^② 其中一支簡正面無字,背書“七年質日”,“七”字上方殘斷,推測原應有“廿”字。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質日”自題。其餘 59 支簡分六欄寫滿 354 個干支,正好是六大六小共十二個月的日數。其中包含 2 支寫有月名的簡,其一自上而下分六欄書有“十月戊寅”“十二月丁丑”“二月丙子”“四月乙亥”“六月甲戌”“八月癸酉”,各月名下的干支表示該月朔日。另一支月名簡寫有十一月至九月,共六個奇數月的月名和朔日干支。前一月名簡的“十月戊寅”是秦始皇二十七年的元旦,從此開始向左橫讀,經“己卯”至“丁未”,共 30 日而十月畢。再往左接另一支月名簡,該簡第一欄書“十一月戊申”即下一個月的朔日。由此左數 29 日至“乙亥”而十一月畢,是為本書的最後一支簡。然後再返回開頭的第一支月名簡,從第二欄“十二月丁丑”起左數。如此往復六次,至末簡的第六欄“辛未”而一歲終。

嶽麓秦簡中另有秦始皇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兩件曆書,^③亦屬此式。屬於此式的還有:北京大學藏秦簡牘秦始皇三十一年曆書、三十三年曆書,^④周家臺秦簡秦始皇三十四年曆書,^⑤張家山 M336 號墓文帝前元七年曆書,^⑥睡虎地 M77 號墓文帝前元十年至後元七年的十組曆書。^⑦ 這些曆書中不少有自題篇名“某年質日”,如嶽麓秦簡的三件曆書(分別自題“𠄎七年質日”“卅四年質日”“卅五年私質日”)、睡虎地 M77 號墓曆書中的多種(題有“元年質日”“七年質日”等),以及張家山文帝七年曆書(自題“七年質日”)。至少可以說明,此類曆書在秦至漢初的南郡一帶有較統一的名稱。它們之間有一細微差別,即月名簡有的同時包含朔

①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3-9、47-65、177-179 頁。

② 《嶽麓書院藏秦簡(壹)》提供的“釋文連讀本”(177-179 頁)所復原的秦始皇二十七年質日僅包含 59 支簡,在 06/0564、07/0616 兩簡之間還應補入一支簡。

③ 均收入《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三十四年質日見 10-18、67-89、180-183 頁,三十五年質日見 19-24、91-106、184-186 頁。

④ 見拙文《北大秦簡中的方術書》,《文物》2012 年第 6 期,90-91 頁。

⑤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圖版 11-17 頁,釋文與考釋 93-99 頁。

⑥ 該曆書全文尚未發表,僅有簡介,見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張家山兩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92 年第 9 期,4 頁。該文將此墓編為 136 號,後整理者更改為 336 號。

⑦ 此 10 組曆書全文均未發表,此據簡報,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雲夢縣博物館《湖北雲夢睡虎地 M77 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08 年第 4 期,35 頁。簡報中稱“(此類簡)一般一組為一年。每枚簡自上而下分為六欄,首枚簡書寫當年雙月的六個月名及其大小,在記列各月干支的竹簡之後,復有一簡書寫當年單月的月名及其大小,其後再記各月干支。如果當年有閏月,閏月的月名(後九月)及其干支記在最後。在一些干支之下,還記有一些事件。首枚簡的背面多題有‘某年質日’,如‘元年質日’‘七年質日’等等。”上述特點正與本式相符。簡報還根據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曆表》,判斷這幾組簡的時間跨度為西漢文帝前元十年(前 170)至後元七年(前 157)。

日干支和月份大小(如嶽麓秦始皇二十七年、三十四年曆書),有的祇包含朔日(如嶽麓秦始皇二十七年曆書)或月大小(如北大秦簡秦始皇三十一年曆書),還有的多數月份祇標明大小而少數月又注出朔日(如嶽麓秦始皇三十五年曆書)。這個差別對曆書的使用似無實質性影響,故不再因之另行分式。

Ⅱ式(簡首干支六欄橫讀式):一般以60支簡為一編,每簡上端注一個干支,順序編次,干支下分六欄橫向連讀,每一欄格表示一日,日名即對應的簡首干支。月份名及月大小注於表示該月朔日的欄格內。本式包括周家臺秦簡秦始皇三十六年附三十七年曆書^①及孔家坡漢簡景帝後元二年曆書。^②該式的典型形態可參看示意圖二。

孔家坡曆書由60支簡編成,每簡上端依次寫有六十干支,起於辛未,終於庚午。第5簡(原誤排為第1簡)干支為乙亥,第一欄殘損處應書有“十月大”,此格即表示該年十月朔日乙亥,是本年曆日的起始。從此格後左數第30支簡,上端干支為乙巳,第一欄書“十一月小”,即表示十一月朔日乙巳。再左數至全篇末簡後返回首簡,從第二欄起向左讀數至第4簡,此欄格書“十二月大”,表示十二月朔日甲戌。依此類推,至九月戊辰歲終。

周家臺秦簡發表早於孔家坡漢簡,其中的秦始皇三十六年附三十七年曆書是兩年合用一編,情況較為複雜。根據劉國勝的復原,^③該曆書的形式基本同於孔家坡曆書,而有兩點特殊。首先,全篇末簡的簡背書有“卅六年日”四字,應是篇題,結合各月朔日,可以確定本書為秦始皇三十六年的曆日。其次,該書中有十二個干支的上方又寫有正月至十二月的月名,下方寫有“大”或“小”字,組成如“十月辛亥小”“十一月庚辰大”“十二月庚戌大”等的十二組月朔形式,經考證,是秦始皇三十七年曆朔。劉國勝認為,此書應是以三十六年曆日為主,三十七年曆日可能是利用了上年曆日,而在其基礎上標注出月份而成。^④我贊同這個觀點。

本式與Ⅰ式的主體都分六欄橫向連讀。在Ⅰ式的基礎上,根據一年中的十二個月的大小挪動月名位置,對齊各月干支,一并移至簡首,即可得到Ⅱ式。這樣變形帶來兩點改進:一是書寫簡便,無需每日注出干支;二是每日欄格中可以加注的空間相應增大。Ⅱ式可能是在Ⅰ式的基礎上發展而成。不過,Ⅱ式並沒有最終取代Ⅰ式。周家臺秦墓中,屬Ⅰ式的三十四年曆書與屬Ⅱ式的“卅六年日”同時并存。Ⅰ式在Ⅱ式出現之後仍長期流行,Ⅱ式則可能并

①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圖版18-24頁,釋文與考釋99-102頁。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圖版117-122頁,釋文注釋191-194頁。整理者最初的編連有誤,本文所據為經武家璧改正後的編連復原,見武家璧《隨州孔家坡漢簡〈曆日〉及其年代》,《江漢考古》2009年第1期,120-126頁。

③ 整理者最初未能正確編連,後經程鵬萬等學者討論,由劉國勝完成了最為準確的復原。參程鵬萬《周家臺秦墓所出秦始皇三十六、三十七年曆譜簡的重新編聯》,《史學集刊》2006年第3期;劉國勝《關於周家臺秦簡69-130號的簡序編排問題》,《簡帛》第4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④ 劉國勝:《關於周家台秦簡69-130號的簡序編排問題》,《簡帛》第4輯,31頁。

未真正廣泛傳播。I式的真正繼承者,應是下面將要介紹的Ⅲ式曆書。

Ⅲ式(簡首日序十二欄橫讀式):一般以31支簡為一編,首簡分十二欄書寫十二個月的月名及月大小,其餘各簡均在簡首書寫序數或序數式日期,以下分十二欄對應首簡的十二個月,依次書寫干支和曆注,橫向連讀。該式的典型形態可參看示意圖三。

已出土屬本式的曆書很多,包括:銀雀山元光元年^①以及敦煌太始二年、^②肩水金關 T21 元鳳六年、^③肩水金關 T26 元鳳六年、^④肩水金關元平元年、^⑤肩水金關本始二年、^⑥居延本始四年、^⑦敦煌本始四年、^⑧敦煌地節元年、^⑨敦煌元康元年、^⑩肩水金關元康三年、^⑪敦煌元康三

① 該曆書照片未發表,有關介紹及復原摹本見羅福頤《臨沂漢簡所見古曆概略》,《古文字研究》第11輯,北京:中華書局,1985,41-42頁。

②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簡號1919,T.XIV.iii.7。以下所引曆書簡冊,凡出此書者,均以書名後括注簡號的方式表示出處。該簡定年據吉村昌之《出土簡牘資料にみられる曆譜の集成》,富谷至主編《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476頁。

③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2,簡號73EJ T21:139。該書所收曆書殘簡的復原和定年據羅見今、關守義《〈肩水金關漢簡(貳)〉曆簡年代考釋》,《敦煌研究》2014年第2期;程少軒《肩水金關漢簡“元始六年(居攝元年)曆日”復原》,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5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本曆書名稱中的T21表示考古發掘時第21號探方。探方標示簡牘的出土位置,在本文中視為劃分不同曆書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肩水金關遺址不同探方出土的曆書殘簡,即使從曆朔安排上看屬於同一年,且書體、形制完全一致,應是同時所作,本文仍因出土位置有別而加以區分,在命名時加注探方號以示區別。

④ 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3,簡號73EJT26:178、218。以下所引曆書簡冊,凡出此書者,均以書名後括注簡號的方式表示出處。該書所收曆書的復原和定年據黃艷萍《〈肩水金關漢簡(叁)〉紀年簡校考》,《敦煌研究》2015年第2期;程少軒《〈肩水金關漢簡(叁)〉數術類簡牘初探》,楊振紅、鄔文玲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五(秋冬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對於存在多種定年可能的曆書殘簡,黃艷萍根據同探方出土簡牘的年代區間縮小範圍,作了定年。本文予以采信,本曆書就是一例。

⑤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1,簡號73EJT5:56-58。《肩水金關漢簡(壹)》所見各曆書的復原及定年,根據程少軒《〈肩水金關漢簡(壹)〉曆譜簡初探》,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簡帛文獻與古代史——第二屆出土文獻青年學者國際論壇論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5;羅見今、關守義《〈肩水金關漢簡(壹)〉八枚曆譜散簡年代考釋》,《敦煌研究》2012年第5期。

⑥ 《肩水金關漢簡(叁)》(73EJT26:6)。

⑦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簡號111·6,《乙》84版。以下所引曆書簡冊,凡出此書者,均以書名後括注簡號的方式表示出處。

⑧ 參敦煌市博物館《敦煌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文物調查及漢簡考釋》,《簡帛研究》第2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374頁。

⑨ 參敦煌市博物館《敦煌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文物調查及漢簡考釋》,《簡帛研究》第2輯,373-374頁;及同書所載殷光明《敦煌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曆譜〉述考》一文,376-385頁。

⑩ 《敦煌漢簡》(1835,T.XI.ii.6)。此簡沙畹、羅振玉考為永興元年(153),說見羅振玉、王國維編著《流沙墜簡》,91頁。羅見今考慮敦煌簡的年代上下限及同出紀年簡後,認為當是元康元年曆,說見羅見今《敦煌漢簡中曆譜年代之再研究》,《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93-94頁。今從之。

⑪ 《肩水金關漢簡(壹)》(73EJT10:273、276)。

年、^①敦煌神爵三年、^②敦煌五鳳二年、^③肩水金關 T23 五鳳三年、^④肩水金關 T30 五鳳三年、^⑤肩水金關五鳳四年、^⑥敦煌甘露元年、^⑦肩水金關 T23 甘露二年、^⑧肩水金關 T29 甘露二年、^⑨肩水金關 T6 黃龍元年、^⑩肩水金關 T26 黃龍元年、^⑪肩水金關初元元年、^⑫肩水金關初元三年、^⑬肩水金關 T10 永光元年、^⑭肩水金關 H1 永光元年、^⑮居延建昭三年、^⑯居延建始元年、^⑰敦煌鴻嘉四年、^⑱居延元延元年、^⑲居延建平二年、^⑳額濟納元始元年、^㉑敦煌元始五年、^㉒肩水金關 T9

① 羅振玉、王國維編著：《流沙墜簡》，圖版 15-18 頁，考釋 83-84 頁。

② 羅振玉、王國維編著：《流沙墜簡》，圖版 19 頁，考釋 84-86 頁。

③ 《敦煌漢簡》(1807, T. VI. b. ii. 4)，定年據羅見今《敦煌漢簡中曆譜年代之再研究》，《敦煌研究》1999 年第 3 期，93 頁。吉村昌之定為元始二年，今不取。

④ 《肩水金關漢簡(貳)》(73EJT23:593)。

⑤ 《肩水金關漢簡(叁)》(73EJT30:187)。

⑥ 《肩水金關漢簡(叁)》(73EJT32:9)。

⑦ 《敦煌漢簡》(1178, 79.D.M.T18:18)，定年據吉村昌之《出土簡牘資料にみられる曆譜の集成》，富谷至主編《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482 頁。

⑧ 《肩水金關漢簡(貳)》(73EJT23:751)。

⑨ 《肩水金關漢簡(叁)》(73EJT29:69)。

⑩ 《肩水金關漢簡(壹)》(73EJT6:70)。

⑪ 《肩水金關漢簡(叁)》(73EJT26:144)。

⑫ 《肩水金關漢簡(叁)》(73EJT32:8)。

⑬ 《肩水金關漢簡(壹)》(73EJT9:115)。

⑭ 《肩水金關漢簡(壹)》(73EJT10:272)。

⑮ 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肆)》，上海：中西書局，2015，簡號 73EJH1:4。該書所見曆書復原參許名瑄《〈肩水金關漢簡(肆)〉曆日校注》，簡帛網，2016 年 3 月 5 日，下文不再出注。

⑯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北京：中華書局，1994，簡號 EPT43·285。按：據簡文一月二十一日戊寅，推斷是年正月戊午朔，當是建昭三年。以下所引曆書簡冊，凡出此書者，均以書名後括注簡號的方式表示出處。

⑰ 《居延新簡——甲渠候官》(EPS4T1·17)，據羅見今、關守義《〈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六年曆譜散簡年代考釋》，《文史》第 46 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55 頁。

⑱ 《敦煌漢簡》(2272, T. X X III. c.023+T. X X III. 1. i. 013)，定年據馬伯樂《中國古文書》，陳久金重新綴合，見陳久金《敦煌、居延漢簡中的曆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118 頁。又見勞幹《漢晉西陲木簡新考》，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5，圖版 52，釋文 13-14 頁。

⑲ 《居延漢簡甲乙編》(503·5，《甲》1923)，考釋定年見陳久金《敦煌、居延漢簡中的曆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119 頁。

⑳ 《居延漢簡甲乙編》(506·18，《甲》2004)，考釋定年見陳久金《敦煌、居延漢簡中的曆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119 頁。

㉑ 曾磊：《額濟納漢簡所見曆譜考釋》，孫家洲主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312-313 頁。

㉒ 《敦煌漢簡》(1122, 79.D.M.T13:15)，定年據吉村昌之《出土簡牘資料にみられる曆譜の集成》，富谷至主編《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487-488 頁。

居攝元年、^①肩水金關 T23 居攝元年、^②居延居攝三年、^③肩水金關 T23 居攝三年、^④肩水金關 T24 居攝三年、^⑤額濟納始建國三年、^⑥肩水金關始建國天鳳五年、^⑦居延建武元年、^⑧居延建武六年七年、^⑨居延永元十七年、^⑩敦煌永興元年^⑪曆書等。西北邊塞遺址出土的漢簡中還有一些殘簡亦屬此式,由於殘缺過甚,缺少足够的曆朔信息而無法確定年代,暫不列入討論。^⑫

此式曆書絕大多數出土於邊塞屯戍遺址,殘缺嚴重,唯一基本完整的是墓葬出土的銀雀山武帝元光元年曆書。該曆書出土於山東臨沂銀雀山 2 號漢墓,由 32 支簡編成。首簡有書題“七年視日”。第二簡分十三欄,由上至下依次書十月至後九月(閏月)月名及月大小。其餘 30 支簡簡首依次書數字“一”至“卅”,數字下分十三欄對應第二簡的十三個月,每欄從左至右橫向按順序書寫干支,表示一個月的二十九或三十天。一些干支下還有八節、反支等簡單的曆注。本式其他曆書雖多殘缺,根據現存簡片,大致可以判斷均采取類似形式,與元光元年曆書最明顯的差別是改以正月為歲首。這是太初改曆造成的時代性差異。^⑬

本式曆書月縱日橫,編冊橫讀,與 I 式類似,祇是分欄數目不同,可以視為 I 式的變體。

① 《肩水金關漢簡(壹)》(73EJT9:282)。

② 《肩水金關漢簡(貳)》(73EJT23:317、901、315+702、318、902、264、903、904、593+837+835+860、691+802、801+760、269+803、316、908、840、211、879、992)。

③ 《居延漢簡甲乙編》(166·8、9,《乙》120 版),考釋定年見陳久金《敦煌、居延漢簡中的曆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119 頁。

④ 《肩水金關漢簡(貳)》(T23:332)。

⑤ 《肩水金關漢簡(貳)》(T24:305+497+498A)。該書與 T23 所出同年曆書形制、書體皆異,不屬於同一簡冊。

⑥ 劉樂賢:《額濟納漢簡數術資料考》,《歷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175-176 頁。

⑦ 《肩水金關漢簡(肆)》(73EJF1:52)。

⑧ 《居延新簡——甲渠候官》(EPT65·100、189、239-241、324),據羅見今、關守義《〈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六年曆譜散簡年代考釋》,《文史》第 46 輯,52-53 頁;及吉村昌之《出土簡牘資料にみられる曆譜の集成》,富谷至主編《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493-495 頁。

⑨ 《居延新簡——甲渠候官》(EPF22·636-638)。陳久金據《中國古代天文文物圖集》圖版三六:2 所載 EPF22·636 考出為建武六年、七年曆書,見其撰《敦煌、居延漢簡中的曆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119-120 頁。後羅見今、關守義又指出同出的 637、638 兩枚殘簡亦屬同一曆書,見其撰《〈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六年曆譜散簡年代考釋》,《文史》第 46 輯,49-50 頁。

⑩ 《居延漢簡甲乙編》(37·40,《乙》32 版),此簡定年有疑,參陳久金《敦煌、居延漢簡中的曆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120-121 頁;吉村昌之《出土簡牘資料にみられる曆譜の集成》,富谷至主編《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498 頁。

⑪ 《敦煌漢簡》(1835,T.VI.c.i.6),定年據吉村昌之《出土簡牘資料にみられる曆譜の集成》,富谷至主編《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498-499 頁。

⑫ 有些簡可以推斷屬於某幾年,但無法確定是哪一年,限於體例,本文也未收入,可參看前引各位學者的研究。

⑬ 另有一種敦煌馬圈灣出土漢簡曆書,現存 12 枚簡,收入《敦煌漢簡》,簡號 373-384。簡首數字最小為“三”,最大為“二十八”,形式、讀法均與上述相同,但僅分三欄書寫三個月的干支,占據全簡上部約四分之一的區域,以下空白。由於無法確知所載為何月,故不能根據曆朔定年。此曆書未載全年曆日,嚴格來說并非年曆,因其他形式與本式相同,附注於此備考。

將Ⅰ式曆書中的奇數月欄插入偶數月欄之間,就非常接近本式了。已知所有Ⅲ式曆書,時代均晚於Ⅰ式。Ⅰ式曆書年代均在漢景帝以前,最晚為文帝後元二年(前157);Ⅲ式曆書年代,最早者即銀雀山元光元年(前134)視日,屬武帝前期,其餘均在太初改曆以後,特別是宣帝以後。考慮到這兩式曆書均有相當數量的實例,合計占曆日類年曆的絕大多數,可以認為兩者時代先後相錯的現象并非偶然,很可能存在繼承和取代關係。本式與Ⅰ式還有一個重要差別,即在簡首標示表示日期的數字序號,絕大多數曆書的序號後還帶有“日”字。Ⅰ式曆書則沒有日期。標注日期數字,反映序數紀日法興起,體現出秦漢時間觀念的演進。^①

另外值得說明的是,西北邊塞遺址出土的年曆絕大多數屬於此式,很可能是當時屯戍系統中由官方機構製作和頒行的通用形式。^②

Ⅳ式(簡首日序六欄橫讀式):包括尹灣漢墓出土的元延二年曆書^③和日照海曲漢簡武帝後元二年曆書,^④形式與Ⅰ式形式基本相同,僅有兩個差別。一是以正月歲首,如尹灣元延二年曆書的兩枚月名簡所載月份,分別是“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和“二月、四月、六月、八月、十月、十二月”,與Ⅰ式曆書月名簡起於十月和十一月不同。這是由於太初改曆,以正月為歲首所致。二是在簡首增加表示日期的數字。尹灣元延二年曆書每枚干支簡簡端都有數字序號“第一”“第二”“第十”“第廿”等,標示各簡干支分別是每月的第幾日。日照海曲武帝後元二年曆書形式基本相同,祇是數字序號沒有“第”字。這兩件曆書出土地相近而與Ⅰ式曆書的出土地相距很遠,其特殊性可能包含有地域因素。但考慮到這兩件曆書的年代至少比Ⅰ式曆書晚70至150多年,似更應從發展變化的角度去探究差異產生的原因,故將之與Ⅲ式曆書并列,理解為Ⅰ式的另一種變體。

Ⅴ式(半年拆分六欄橫讀式):分六欄橫讀,僅見居延天鳳六年曆書^⑤一例。此種曆書應是Ⅲ式的變體,不同之處在於,不以奇偶數拆分全年的十二個月,而是以上下半年拆分,正月至六月為一組,七月至十二月為一組。

① 拙文《序數紀日的產生與通行》對此有詳細討論。此文刊出後,我纔注意到江陵鳳凰山10號漢墓所出景帝前期的簡文中有序數紀日。拙文原將序數紀日的產生定在武帝時期,過度強調了太初改曆為序數紀日產生創造條件的意義,是不對的,應當更正。

② 敦煌懸泉簡中提到昭帝時有“行曆日詔書”,說明當時國家已有頒下曆日的制度。詳參拙文《秦漢的頒朔與改正朔》,456頁。

③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編:《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3,61-67、138-144頁。

④ 劉紹剛、鄭同修:《日照海曲簡〈漢武帝後元二年視日〉研究》,《出土文獻研究》第9輯,北京:中華書局,2009,49-59頁。

⑤ 《居延新簡——甲渠候官》(EPT65·18、19、20、195、232-237),據羅見今、關守義《〈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六年曆譜散簡年代考釋》,《文史》第46輯,54-55頁;及吉村昌之《出土簡牘資料にみられる曆譜の集成》,富谷至主編《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491-492頁。

VI式(數牘合編分欄橫讀式):此式亦僅見兩例,即額濟納建武八年(或永元十一年)^①和敦煌永元六年曆書。^② 額濟納建武八年曆書僅存一殘牘,正背面分別分欄書寫有二月、三月的日期和干支。敦煌永元六年曆書亦僅存一殘牘,有照片。據羅振玉的釋文和復原,該牘正背兩面分別書寫。正面分別三欄,第一欄首列書“十二月大”,以下書一日至十五日之日期、干支、神煞,第二欄為十六日至三十日,第三欄則為七月二十七至三十日。背面現存兩欄,第一欄為閏月一日至十二日,第二欄為十三日至二十三日。根據上述情況,推測此牘可能原與其他五到六塊木牘合編為一年的曆書,具體形式已無可考。此牘中為何將七月末尾數日與十二月曆日混寫於一面,就很難解釋,祇能等待將來出土發現的提示了。

VII式(分欄直讀式):迄今僅發現一例,即《流沙墜簡》所載五鳳元年曆書。^③ 此書僅存一簡,且未附照片。據羅振玉提供的釋文看,簡正面上方縱寫大字“八月丁亥小”,以下書每日干支,起丁亥終癸卯。簡背上方縱寫大字“八月”,以下干支起甲辰終乙卯。正面兩面顯係相接連讀,合為八月朔日至二十九日之干支。每一干支均橫向書寫,與上方“八月”等字不同,可視為分欄。推測此簡應非單獨使用,而是與其他十二、三枚簡合編為一冊,每月一簡,首簡分欄書數字日期,與各月支干支對應。若然,則此類曆書亦為年曆,自成一式。^④ 此式似與Ⅲ式有關,Ⅲ式縱欄、橫欄互換即成此式。不過未見簡影,此式在干支下是否還留有加注的空間,也不得而知。

以上7式,共67種。其中I式17種,Ⅲ式42種,兩者之和接近總數的九成,可說是曆日類年曆的主體。

曆日類B型(月曆型):以月為使用單位,每月可獨立查閱。迄今出土的此型曆書可分為3式。

I式(橫讀式):本式不分欄,書寫在木牘上。有居延本始二年十一月、^⑤居延神爵元年(元康五年)五月^⑥兩種。

① 說見劉樂賢《額濟納漢簡數術資料考》,《歷史研究》,2006年第2期,176-177頁。

② 羅振玉、王國維編著:《流沙墜簡》,圖版20頁,考釋88-91頁。羅見今對此定年有疑,並認為七月曆日與十二月并非同年,而是後加上去的。說見羅見今《敦煌漢簡中曆譜年代之再研究》,《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94-95頁。此說證據尚不充分,今不取。此外,《居延新簡——甲渠候官》所載EPT65·425號木牘,鄧文寬認為是東漢永元二年(90)曆書,見其著《居延新簡〈東漢永元二年(90)曆日〉考——為紀念王重民先生百年誕辰而作》,《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考索》,319-327頁。若然,則似當屬本式。但從圖版看,鄧氏的釋讀不無疑問,該曆書形式和年代仍不明確。故本文暫不收入該牘,存此備考。

③ 羅振玉、王國維編著:《流沙墜簡》,86頁。又見《敦煌漢簡》(1709,T.VI.b.i.192)。

④ 吉村昌之認為是本書是月曆,見吉村昌之《出土簡牘資料にみられる曆譜の集成》,富谷至主編《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499-500頁。這一可能亦無法排除,錄此備考。

⑤ 《居延漢簡甲乙編》(457·19,《乙》258)。定年據張永山《漢簡曆譜》,任繼愈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天文卷》,223頁。

⑥ 《居延漢簡甲乙編》(179·10,《甲》1017)。另有一件(202·9,《乙》141),陳夢家定為神爵元年曆譜,陳久金存疑,按此非曆譜。

本始二年十一月月曆木牘，橫列直書，首行寫大字“十一月大”，以後為是月干支日期，起於“壬子一日”，至十六日而後殘斷。其中四日、六日、八日下，分別注有“寢兵”“冬至”“盡”字樣。神爵元年五月月曆木牘文字完整，形式與上述相同，唯右端“五月大”前尚有一行小字，云“四月廿九日庚戌寢兵”。陳夢家將此牘定為“穿繫橫讀式”曆書，認為全本應由十二支簡組成。^① 森鹿三則注意到此牘加注有四月晦日“寢兵”，與上述本始二年十一月木牘也注有“寢兵”一事聯繫起來，結合居延簡中元康五年（即神爵元年）夏至寢兵詔書的下行文書，認為該月曆木牘是詔書的附件。^② 我贊同森鹿三的意見。這是一種為特定目的製作的曆書。

Ⅱ式（縱讀式）：縱向分欄書寫在木牘上。屬本式的有尹灣漢墓元延三年五月木牘，^③以及連雲港花果山漢初出土的兩種元壽二年十月木牘。^④ 兩者的出土地同屬西漢東海郡，形制非常相似。

尹灣元延三年五月木牘出土時長 23 厘米，寬 7 厘米，分別相當於漢代的一尺和三寸，是標準的一尺牘。此牘分三欄。第一欄分九行，大字隸書，首行書“五月小”，後八行書本月神煞所值干支。第二、三欄小字草書全月 29 天的干支和日期，有四個干支日期下還加注有記事性的文字。^⑤ 從圖版看，此牘沒有編連或穿繫的痕迹，背面亦無字，應是單獨使用的月曆木牘。

花果山漢墓出土的 9 號木牘，長 6.4 厘米，寬 5.7 厘米，殘損嚴重。整理者最初認為內容類似於《日書》。現在參考尹灣木牘，可以判定此牘屬同類月曆。從摹本看，花果山 9 號木牘分欄書寫，由於殘斷較甚，僅存上二欄。第一欄大字隸書，首行書“□月□”，次行書“建日亥”。^⑥ 以下三行均為三字一行，前兩字皆漫漶不清，末字分別“未”“寅”“壬”，當是神煞所值。由“建日亥”，可知此為建亥之月（即十月的月曆）。第二欄小字草書，首行全殘，第二至第三行據釋文分別為“壬辰二日”“癸巳三日”“甲午三日”，是本月的干支日期。由此推得，該月朔日為辛卯。同出簡牘中，有元壽二年十月至三年三月曆朔（7 號木牘，介紹詳下），而

① 陳夢家：《漢簡年曆表叙》，《漢簡綴述》，235 頁。

② 森鹿三：《論敦煌和居延出土的漢曆》，收入其著《東洋學研究——居延漢簡篇》，京都：同朋舍，1975，中譯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第 1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113-128 頁。陳久金也認為神爵元年五月月曆木牘是同年夏至寢兵詔書的附件，說見陳久金《敦煌、居延漢簡中的曆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113-115 頁。

③ 《尹灣漢墓簡牘》，3、22、128 頁。

④ 此兩種木牘整理者編為 8 號、9 號，僅有摹本及初步釋文，見李洪甫《江蘇連雲港市花果山出土的漢代簡牘》，《考古》1982 年第 5 期，476-480 頁。

⑤ 關於此牘的具體情況，可參看劉樂賢《尹灣漢墓出土曆日及相關問題》，《簡帛數術文獻探論》，266-272 頁。

⑥ “建日亥”，李洪甫讀為“年日亥”，摹本亦將首字寫得近似“年”字。但“年日亥”文義不通，而隸書“建”字右半邊與“年”字形相近，根據尹灣元延三年五月月曆的文例，可知此當作“建日亥”。

元壽二年(前1)十月即爲辛卯朔。據此,上述花果山9號木牘可確定爲元壽二年十月月曆。此牘與尹灣木牘出土地同屬西漢東海郡,時間僅相差10年,格式相同,應可反映當時該地區月曆木牘較爲統一和穩定的形式。此式月曆包含了記事的空間,在功能上與I式不同。

花果山漢墓還出土了一塊殘牘(8號),分八行寫有某月十七至二十四日的干支和日期。據摹本所示“甲寅廿四日”等曆日數據,可以推知本月朔日爲辛卯。聯繫上述9號木牘,推測很可能也是元壽二年十月的月曆,但干支字體與9號木牘不同,不能綴合。此牘殘缺過甚,無法確認是否分欄縱讀,今暫附錄於此。^①

Ⅲ式(多行木簡式):本式包括居延居攝元年六月、^②居延建武二年三至五月^③兩種。它們形狀窄長,屬多行書寫的木簡,與書寫尹灣月曆的尺牘(長寬比約3:1)迥異。

居攝元年六月木簡上端大書“六月”二字,無月大小、神煞等記錄。所載干支日期分欄書寫,每欄四日,一個月的日期干支應有八欄,今存其六。建武二年三至五月月曆書寫的一枚木簡的正背兩面,與居攝元年六月木簡一樣,分欄書寫,每欄四日。兩者可歸入一式,但也有明顯的不同。建武月曆除寫有月大小外,還在兩面上抄寫了三個月的月曆,四月月曆前半部分書寫在正面三月月曆下,後半則寫在背面五月月曆之上。這就不是一簡一月了。^④

本式月曆與連雲港出土的兩種月曆木牘差別明顯,可能原與其他簡牘編連使用,用途可能也不一致。^⑤

(二) 曆朔類曆書

“曆日類”曆書均列每日干支,下面介紹的“曆朔類”曆書則僅記每月朔日干支和月大

① 周家臺秦簡秦二世元年曆朔木牘的背面分欄寫有當年十二月的干支,吉村昌之將其視爲月曆(見吉村昌之《出土簡牘資料にみられる曆譜の集成》,富谷至主編《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505-506頁)。我認爲它是收到曆朔木牘後爲計算距離嘉平的天數而書寫的干支表,並非用作十二月的月曆,因此不收入此處。詳參陳侃理《秦漢的頒朔與改正朔》,余欣主編《中古時代的禮儀、宗教與制度》。

② 《居延漢簡甲乙編》(290·11A,《乙》220),考釋定年見陳久金《敦煌、居延漢簡中的曆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119頁。

③ 《居延新簡——甲渠候官》(EPT65·101),據羅見今、關守義《〈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六年曆譜散簡年代考釋》,《文史》第46輯,51-52頁。

④ 另外,《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中還載有一枚殘牘(EPT8·12),最上分四行寫有某月二十二至二十五日的干支和神煞,以下殘斷。根據“廿四日己巳建”等文字,可以推斷此月爲建巳之月,即四月,朔日爲乙巳。查朔閏表可知,此牘屬元康元年(前65)的可能性最大。由於根據殘牘無法推斷它原來是否記載了整月的曆日,或與其他牘板合編爲年曆,故暫不入正文,附此備考。

⑤ 此外,張家界古人堤東漢簡牘中也有一種類似於月曆的文獻。據整理者介紹,它“書寫於漢律牘之背面,共計三段,可綴連爲一篇,其首爲:‘……五月朔……戊戌一,己亥二……’,一直排至‘甲子廿七’,以下殘破。”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南張家界古人堤遺址與出土簡牘概述》,《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2期,70頁。此牘格式不明,且無法定年,故本文暫不收入,附此備考。

小。有時它備有便於速查的干支表,但不再為每一天的干支安排獨立位置。這類曆書按照所包含的時段長度,可以分為“單年型”“數月型”和“多年型”。

曆朔 A 型(單年型):分為二式。

I 式(月朔式):羅列全年各月朔日及月大小,有時加注重要節日。本式迄今共發現二件,皆為木牘,分別是周家臺秦二世元年^①和敦煌永光五年^②曆書。

周家臺秦二世元年曆書木牘,正面分兩欄書全年十二個月的朔日干支及月大小。第一欄起於“十月乙亥小”,終於“四月壬申小”;第二欄起於“五月辛丑小”,終於“九月己亥大”。兩欄文字共占去木牘正面的上半。在下半空白區域的中間,寫有一個“大”字,墨迹較淺,似為後來加注。木牘背面右上書“以十二月戊戌嘉平月不盡四日”,嘉平即臘日。這塊木牘很可能是秦代國家頒布曆朔和重要節日的記錄。^③

敦煌永光五年曆書書寫於一枚木牘的正反兩面。正面分二欄,上欄第一行書“永光五年”四字,第二至五行依次書正月至四月每月的月名、朔日干支和月大小,下欄共四行,依次書五月至八月。木牘背面不分欄,五行依次為九至十二月。各月下加注二分、二至、四立八個主要節氣及伏、臘所在日。九月條的下方,還注有“□高五尺”四字,其義未詳。^④

這一類型的曆書注明全年月朔、節日,祇需借助甲子表,即可由之推出每一天的干支,或每一干支所對應的日期。它實際上提供了全年的曆日,但祇供查詢,無法加注。

II 式簡曆式:在 I 式所含內容外,還配上六十甲子表,以便查詢。屬此式的,有肩水金關五鳳三年、^⑤尹灣元延元年、^⑥敦煌永始四年^⑦三件曆書。具體而言,前兩件與後一件又有區別。

肩水金關五鳳三年曆書過去被張永山稱為“環讀式曆譜”。它寫在長 23.2 厘米,寬 5.1 厘米的一尺牘上,共有四列文字沿四邊構成環形,所有文字都自外向內書寫。上列從左至右

①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圖版 25 頁,釋文與考釋 103-104 頁。

② 羅振玉、王國維編著:《流沙墜簡》,圖版 19-20 頁,考釋 86-88 頁。

③ 拙文《秦漢的頒朔與改正朔》詳細討論了這塊木牘的性質,可參考。

④ “□”所代表的字,羅振玉未作釋讀,從圖版看,或許是“垣”字,缺末筆。

⑤ 此曆書出土於肩水金關遺址,最初發表時僅有正面照片,見《中國古代天文文物圖集》圖版三六: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又收入張永山《漢簡曆譜》,任繼愈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天文卷》第一分冊,227、237 頁。最新的正背面清晰照片收入《肩水金關漢簡(叁)》。

⑥ 《尹灣漢墓簡牘》,3、21、127 頁。

⑦ 《敦煌漢簡》(2267, T. X X II. f. 1)。該牘定年有爭議,此據陳久金(《敦煌、居延漢簡中的曆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118-119 頁)、羅見今(《敦煌漢簡中曆譜年代之再研究》,《敦煌研究》,1999 年第 3 期,95-97 頁)說。

依次書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這六個奇數月的朔日干支和月大小,下列則是偶數月。左右兩列分別書 24 和 25 個干支,與上下兩列的朔日干支正好構成一個環形的六十甲子表。從左上角的“正月戊寅大”開始,逆時針讀數,轉過半圈至右下角的“二月戊申小”,再轉半圈至上列的“三月丁丑大”,如此循環將近六圈,至右列上方第二個干支“壬申”(此時代表十二月壬申晦),便數完全年的 354 日。在部分干支下,加注有二分、二至、四立和三伏日,與 I 式比較,知是當時曆書的慣例。該曆書的背面還抄寫有該年二月的月曆,其中干支“乙卯”下書“到”字,可能是收到該木牘的記錄。這一情況與周家臺秦二世元年曆書類似,很可能反映了西漢中期的頒朔情況。此外,干支“戊申”到“乙丑”的下方有一般用於表示完成某事的記號“卩”,說明該月曆可能還有其他的用途,現在已不得而知。

尹灣元延元年曆書的形式基本同於上述,僅有幾處小的差別。第一,該年閏正月,故下列書有閏月,並且數讀循環增加半圈。第二,各月均先書月名、大小,再書朔日干支,且月名、大小用大字,干支用小字。與五鳳三年曆書相比,這樣更能體現六十甲子表的完整性。第三,該年十月、十二月均為甲午朔,兩者都加注在同一個“甲午朔”字樣上方。五鳳三年曆書中,七月、九月均乙亥朔,處理方式則是增寫一行“乙亥朔”。兩種處理方式相比,前者在數讀甲子循環時無需跳數,亦更為方便。第四,該曆書除二分、二至、四立和三伏外,還加注有臘日,並且每一節日上方都注明月日。從這四點差別看,元延元年曆書的製作顯得更為成熟細緻。

仔細審讀上述兩件曆書,可以發現它們的精巧設計並非憑空產生,將它們與之前介紹的曆日類 A 型 II 式中的兩件曆書相對比,不難找到某種聯繫。程鵬萬已經指出,這類曆書與周家臺秦始皇三十六、三十七年曆書格式相同。^① 具體而言,它們的主體部分都由各月大小和六十甲子表構成,實質都是在甲子表的相應位置添注月名表示曆朔,並利用六十甲子循環紀日的原理,用一個干支對應一年中的多個日期。這類環讀式的簡曆,或許就是從曆日 A 型 II 式曆書發展而來的。

本式的第三種,敦煌永始四年曆書與上述兩種差別相對較大。此曆書木牘左、右和下部均殘缺。從殘存部分看,最上欄四行從左至右分別書三月、五月、七月、九月的朔日和月大小,其下書六十甲子,分欄橫讀。推測原有五欄,每欄自右至左書十三個干支,第五欄僅書八個干支,故全部殘缺不見。干支下注有八節和伏日。對比居延五鳳三年、尹灣元延元年木牘,可知此牘同為簡曆式年曆。估計原來上欄為六個奇數月的朔日和大小,最下欄則還有寫

^① 程鵬萬:《周家臺秦墓所出秦始皇三十六、三十七年曆譜簡的重新編聯》。

有六個偶數月的朔日和大小。月份沒有按照一般習慣從右至左書寫，而是從左往右，或許是受環讀式年曆的影響。

如上所述，本式年曆木牘的設計十分巧妙，使全年的每一天都能找到對應但非獨占的位置，事實上構成了簡單的年曆。它既可視為曆日表（曆日類 A 型 II 式）刪除記事功能後的“縮略版”，也可看作月朔式年曆（曆朔類 A 型 I 式）的“增強版”。

曆朔 B 型：數月型。此型曆書記載多個月的曆朔，可在一年中，也可以跨年。此型包括敦煌元鳳三年正月至八月、^①連雲港花果山元壽二年十月至三年三月^②兩件。

敦煌元鳳三年曆書見於《敦煌漢簡》一書，整理者未綴合，釋文也有一些錯誤。今將兩殘片左右綴合後，可見上半部分分兩欄寫有二月至八月的月朔。第一欄存三行，分別書“二月壬辰朔”（“壬辰”，原釋文誤作“辛亥”）、“三月辛酉朔”、“〔四〕月辛卯朔”；第二欄完整，分四行書五到八月的月朔。據此七個月朔可以推定，此為元鳳元年曆書。“二月壬辰朔”前殘缺一角，按文意原當有“正月壬戌朔”等字。該曆書木牘的下半部分，寫有候長和戍卒的得錢記錄。據此推測，這方木牘選取一年中的特定數月，可能是專門用於配合得錢計算的，並非一般性的曆書。

花果山元壽二年十月至三年三月曆書木牘，與之前提到的花果山元壽二年十月月曆木牘同時出土，可以互證繫年。從摹本看，該曆朔木牘豎讀，上下皆空白，僅在中部分六行寫有六個月的朔日。根據整理者的釋文，六行文字從右至左分別是“十月〔辛〕卯朔”“十一月〔庚〕申朔”“十二月〔庚〕寅朔”“正月己未”“二月己丑”“三月”。整理者對比《二十史朔閏表》，認為與元壽二年十月至元始元年二月的曆朔相吻合。我同意這個定年。不過有一個疑問，漢末早已以正月為歲首，為何這塊木牘卻從十月開始呢？這或許可以結合同出簡牘得到解答。同出的 1 號木牘是一則法律文書，記載了四次刀劍傷人事件，時間分別是“十月十四日甲辰”“十月十七日丁未”“十一月二日”“十一月六日□丑”。據所記日期的干支推算，與元壽二年十月、十一月相符。由此推測，記載元壽二年十月至次年三月月朔的這方曆書木牘，很可能與 1 號木牘的法律文書有關，是為處理發生在元壽二年十至十一月的持刀傷人案服務的。

綜上所述，可知出土所見記載數月曆朔的木牘都與一般性的曆書不同，是針對某一特定

① 《敦煌漢簡》（1413-1414）。《敦煌漢簡》（1415）書“四月辛卯朔小”，以下空白，應亦屬此年，但不能綴合。

② 該木牘整理者編為 7 號，僅有摹本及初步釋文，見李洪甫《江蘇連雲港市花果山出土的漢代簡牘》，《考古》1982 年第 5 期，476-480 頁。

需要定制的。這與曆日 B 型 I 式曆書中的配合寢兵儀式的兩種月曆木牘有相似之處。

曆朔 C 型:多年型。此型曆書集合多年以上的曆朔編成,目前已發表的僅有湖北江陵張家山 M247 號墓出土的漢初朔閏編^①一種。此外,張家山 M258 號墓也出土了一件曆書,年代在“文帝前元五年(前 175)或稍後”。整理者在概述中將之與 M247 號墓出土朔閏編合併介紹,未說明兩者是否有別,^②或屬同類。^③

張家山 M247 號墓漢初朔閏編現存竹簡 18 枚,記載漢高祖五年(前 202)至呂后二年(前 186)共十七年的各月朔日干支。以高祖六年為例,格式如下:“六年:十月戊午,十一月丁亥,十二月丁巳,正月丙戌,二月丙辰,三月丙戌,四月乙卯,五月乙酉,六月甲寅,七月甲申,八月癸丑,九月癸未小。”如遇閏年,還會加上後九月的朔日和月大小。一般一年一簡,如正面寫滿則轉至背面書寫。

此朔閏表中有兩年還在全年月朔寫完之後,加注有使用者個人的大事。高祖五年後注:“……新降為漢。九月……”^④惠帝元年後注:“六月病免。”這兩件事是朔閏表主人仕宦生涯的重要節點,前者是為漢臣的開始,後者是仕宦的結束。這類私人記事說明張家山朔閏表帶有較重的個人色彩,不能理解為官方文書。

以上,本文將目前所知年代較為確定的出土秦漢曆書共 83 件,分為 2 類 5 型。現在列出下表,以便通覽。表中的曆書後都注明年代,希望借此體現出曆書發展的先後關係和時代特征。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圖版 3-4 頁,釋文 129-130 頁。

②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 年第 1 期,14-15 頁。

③ 阜陽雙古堆漢簡中出土了約 200 片寫有干支的殘簡,胡平生認為是《漢初朔閏表》,見其撰《阜陽雙古堆漢簡數術書簡論》,《出土文獻研究》第 4 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28-29 頁。這批簡的圖版和編連釋文均未公布,僅能通過胡平生的介紹得知其中還包括了寫有月份的殘片。從部分錄文看,多數殘片中相鄰兩干支的差數為 29 或 30。但胡平生也指出,“有幾個碎片上的干支上下排次不足一月,有的僅十天,有的僅數天”。如果認為這篇簡是朔閏表,則無法解釋這個現象。我懷疑,這批簡可能是某年質日,即曆日 A 型 I 式,上下排次不足一月的干支殘片,應屬附在最後單獨編排的閏月簡。由於未見正式整理報告,還不能最終確定該書性質,故暫不收入本文。

④ “新降為漢九月”六字寫在一枚殘簡上,整理者認為屬漢高祖五年,張金光則以之屬高祖四年,見其撰《釋張家山漢簡〈曆譜〉錯簡——兼說“新降為漢”》,《文史哲》2008 年第 3 期。他認為,“新降為漢”與“六月病免”不同,不是寫在全年月朔之後,而是繫於當月之下。因此,據下文九月可知“新降為漢”當在八月。高祖四年八月,恰好簽訂鴻溝之約,中分天下。江陵在鴻溝之西,故正在此時“降為漢”。這一觀點有待商榷。首先,推測“新降為漢”繫於當月之下,與這組簡的文例不合。其次,鴻溝之約分天下,祇是劉邦和項羽之間劃分勢力範圍,不僅沒有將臨江王統治的江陵地區直接劃歸漢國或漢朝統治,而且未得到臨江王的認可。鴻溝之約後,臨江國與漢國仍彼此獨立。張家山漢簡主人降漢,應在高祖五年十二月(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擊破臨江王共敖前後,不會早至四年八月。當然,將此簡繫於高祖五年也有一個疑問。此殘簡文字書於正面,從圖版看,原來絕不可能與高祖五年四至九月的月朔寫在同一支簡上。這樣高祖五年就必須有兩支簡,與其他各年均為一簡的情況不同。考慮到這一年是該朔閏編的首年,也是朔閏編主人“新降為漢”之年,情況特殊,需要記錄的事又較多,書寫在兩支簡上,尚可理解。基於上述原因,本文仍采用整理者的意見。

表一：出土秦漢曆書分類一覽表

| | | | |
|-------------|------------|-------------------------|---|
| 曆 日 類 | A 型 年曆型 | I 式 逐日干支六欄橫讀式 | 1.嶽麓秦始皇二十七年(前 220) 2.北大秦始皇三十一年(前 216) 3.北大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4.周家臺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 5.嶽麓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 6.嶽麓秦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 7.張家山漢文帝前元七年(前 173) 8-17.睡虎地漢文帝前元十年至後元七年(前 170 至前 157) 10 種 |
| | | II 式 簡首干支六欄橫讀式 | 1.周家臺秦始皇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前 211、前 210) 2.孔家坡漢景帝後元二年(前 142) |
| 曆 日 類 | A 型 年曆型 | III 式 簡首日序十二欄橫 讀式 | 1.銀雀山元光元年(前 134) 2.敦煌太始二年(前 95) 3.肩水金關 T21 元鳳六年(前 75) 4.肩水金關 T26 元鳳六年(前 75) 5.肩水金關元平元年(前 74) 6.肩水金關本始二年(前 72) 7.居延本始四年(前 70) 8.敦煌本始四年(前 70) 9.敦煌地節元年(前 69) 10.敦煌元康元年(前 65) 11.肩水金關元康三年(前 63) 12.敦煌元康三年(前 63) 13.敦煌神爵三年(前 59) 14.敦煌五鳳二年(前 56) 15.肩水金關 T23 五鳳三年(前 55) 16.肩水金關 T30 五鳳三年(前 55) 17.肩水金關五鳳四年(前 54) 18.敦煌甘露元年(前 53) 19.肩水金關 T23 甘露二年(前 52) 20.肩水金關 T29 甘露二年(前 52) 21.肩水金關 T6 黃龍元年(前 49) 22.肩水金關 T26 黃龍元年(前 49) 23.肩水金關初元元年(前 48) 24.肩水金關初元三年(前 46) 25.肩水金關 T10 永光元年(前 43) 26.肩水金關 H1 永光元年(前 43) 27.居延建昭三年(前 36) 29.居延建始元年(前 32) 29.敦煌鴻嘉四年(前 17) 30.居延元延元年(前 12) 31.居延建平二年(前 5) 32.額濟納元始元年(1) 33.肩水金關 T9 居攝元年(6) 34.肩水金關 T23 居攝元年(6) 35.居延居攝三年(8) 36.肩水金關 T23 居攝三年(8) 37.肩水金關 T24 居攝三年(8) 38.額濟納始建國三年(11) 39.肩水金關始建國天鳳五年 40.居延建武元年(25) 41.居延建武六年、七年(30、31) 42.居延永元十七年(105) |

續表

| | | | |
|-----|------------|-----------------------|--|
| 曆日類 | A 型 年曆型 | IV 式 簡首日序六 欄橫讀式 | 1.海曲武帝後元二年(前 87) 2.尹灣元延二年(前 11) |
| | | V 式 半年拆分六 欄橫讀式 | 1.敦煌五鳳元年(前 57) |
| | | VI 式 數牘合編分 欄橫讀式 | 1.居延天鳳六年(19) |
| | | VII 式 分欄直讀式 | 1.額濟納建武八年(32)或永元十一年(99) 2.敦煌永元六年(94) |
| | B 型 月曆型 | I 式 橫讀式 | 1.居延本始二年十一月(前 72) 2.居延神爵元年五月(前 61) |
| | | II 式 縱讀式 | 1.尹灣元延三年五月(前 10) 2.連雲港花果山元壽二年十月(前 1)(9 號) 3.連雲港花果山元壽二年十月(前 1)(8 號) |
| | | III 式 多行木簡式 | 1.居延居攝元年六月(6) 2.建武二年三至五月(26) |
| 曆朔類 | A 型 單年型 | I 式 月朔式 | 1.周家臺秦二世元年(前 209) 2.敦煌永光五年(前 39) |
| | | II 式 簡曆式 | 1.居延五鳳三年(前 55) 2.尹灣元延元年(前 12) 3.敦煌永始四年(前 14) |
| | B 型 數月型 | | 1.敦煌元鳳三年(前 78) 2.連雲港花果山元壽二年十月至三年三月(前 1-1) |
| | C 型 多年型 | | 1.張家山 M247 號墓漢初曆朔(前 202-前 186) 2.張家山 M258 號墓漢文帝曆朔(前 175 或稍後) |

已出土秦漢簡牘數量很大,上面的曆書搜集一定存在遺漏、疏誤,應該隨着新資料的公布和研究的推進不斷更新,^①甚至分類本身也可能有所調整。不過,現有的框架已經足以幫助我們瞭解秦漢曆書的大致情況,開始進一步的研究。

① 比如印臺漢簡、松柏漢簡中包含有曆書,有關介紹參看鄭忠華《印臺墓地出土大批西漢簡牘》、朱江松《罕見的松柏漢代木牘》,荊州博物館編著《荊州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204-208,209-212 頁。其中松柏漢簡曆書,主要是漢武帝建元、元光年間的,見《湖北荊州紀南松柏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 年第 4 期,24-32 頁。這些曆書尚未公布,形制不清,本文暫時無法將其列入討論。此外,西北漢簡中《肩水金關漢簡》第五冊以及敦煌懸泉漢簡等未發表資料中,應該還有不少曆書。

二 秦漢曆書的功能、性質與演變

曆書的基本功能是查日子，此外，不同類型的曆書還各自具有一定的特殊功能，性質也未必相同。下面就在前文的分類研究基礎上，討論出土秦漢曆書的功能、性質及其演變。

秦漢曆書的功能可以大致分為下列三項。^①

第一，用於查日期和歲時節日。查日期是曆書最基本的功能，可以作為判斷某種書或文書是否屬曆書的標準。不少曆書還標注有歲時、節日信息。如曆日類的銀雀山元光元年曆書，曆朔類的居延五鳳三年、尹灣元延元年、敦煌永光五年曆書等，都注明了二分、二至、四立這八個節氣所在的日期。這些曆書和孔家坡漢景帝後元二年曆書等，還加注了臘日、伏日，都是與當時日常生活和國家行政關係最密切的節日。

多數曆書的查日期和歲時節日功能是通用的，也有部分曆書具有特殊針對性。前文已經介紹，曆日 B 型 I 式的居延本始二年十一月和神爵元年五月兩種月曆，分別是同年夏至寢兵詔書的附件，專為寢兵儀式製作發布。連雲港花果山出土的元壽二年十月至三年三月曆書，很可能專門服務於元壽二年十至十一月持刀傷人案的處理。

第二，加注記事。曆日類曆書中的每日都在書中占據獨立的一格或一行，保留了加注的空間。加注內容有神煞，有記事。加注記事至少從秦代開始就已經是曆書的重要功能，在墓葬和邊塞屯戍遺址出土曆書中均有發現，^②絕大多數見於曆日類年曆型曆書，尤其是自題名為“質日”的一類。除年曆外，尹灣元延三年五月月曆木牘的部分日期干支下，也有用不同字體書寫的記事文字。屬曆朔類的張家山漢初朔閏編中，亦包含“新降為漢”和“六月病免”這樣的記事文字。這些文字可能就是從曆日記事中移錄的。

第三，配合日書占視吉凶。這項功能主要反映在加注神煞上，而這些神煞可以在秦漢時代流行的日書中查到對應的吉凶。曆書中神煞的字體通常與月名、干支一致，應是在製作過程中就寫上的，構成曆書原本的一部分。這說明，配合日書占視吉凶是這類曆書設計製作時已經預設的固有功能。

曆書標注神煞的方式，目前所見有三種。一種主要見於曆日類 A 型 I 式和 III 式曆書，加注在表示日子的干支下方。北大秦簡的兩件曆書，都有部分干支下加注建除，^③是目前所知最早加注神煞的曆書。第二種加注法，是在曆書的開頭或末尾添加分欄書寫神煞的簡。簡冊編連後，神煞與每月相應的干支位於同一橫欄中，現存最完整的典型是屬於曆日類 A 型 III

① 蕭從禮《秦漢簡牘“質日”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3月8日）一文，提出秦漢曆表簡冊有查找時日、作為出行宜忌指南和案頭記事三項基本功能，與本文觀點近似，可參看。

② 劉樂賢搜集過曆書干支下記事的例子，參看其著《簡帛數術文獻探論》，264-266頁。

③ 參看拙文《北大秦簡中的方術書》，《文物》2012年第6期，90-91頁。

式的肩水金關居攝元年曆書。根據程少軒的研究,這部曆書除在干支簡中注建除外,末尾還用獨立的簡添加了血忌、月殺、土禁、九魁、刑德、小時、大時等神煞。^① 第三種加注方式,見於曆日 B 型 II 式的尹灣元延三年五月和連雲港花果山元壽二年十月(9 號)兩種月曆,即在月曆木牘的上方,寫明本月的神煞所在日辰。用第一種方式加注的神煞,通常較為簡略,一般祇有建除和反支。用第二、第三種方式標示的神煞則較複雜,除建日、反支外,還有血忌、八魁、復日、白日、月殺、解衍、月省等。以前有學者將注有較多神煞的曆書認作日書,或視為占家專用。事實上,加注神煞並沒有改變曆書的性質,也不能替代日書的功能,這與唐宋的具注曆日是不同的。對此,後文還將論及。

秦漢曆書上述三項功能,不僅有主次之分,它們的演變也有各自不同的軌迹。查日期是曆書最基本的功能,查詢歲時節日、加注記事和配合日書占視吉凶是附屬功能。曆書的功能的發展變化,主要在後者。

曆書的加注記事功能在秦代已經形成。嶽麓書院藏秦簡的三件曆書、北大秦簡的兩件曆書以及周家臺秦始皇三十四年曆書,都有加注記事,數量有的二、三十條,有的多達五十餘條。時代較晚的尹灣元延二年曆書,記事數更有 186 條,超過一半的日期都有加注。^② 上述曆書都出土於墓葬,比較私人化,有的還有自題“私質日”。正如蘇俊林所說,這類質日儘管有不少記事頗具行政色彩,但性質仍然是私人的記錄,並非官文書。^③ 不過,“私質日”題名的存在也說明還有官方的質日,里耶秦簡中就發現了這樣的例子。秦代要求縣令史定期輪流至設在地方的宗廟巡視,稱為“行廟”。里耶秦簡中的一份文書要求“行廟者必謹視中□,各自署廟所質日”。此處提到的“廟所質日”,就是放在宗廟中的一件官文書。它的形式應與墓葬所見秦代質日相似,每日下有記事的空間。輪到行廟的令史,於其中簽署自己的名字,表示按時完成工作。該文書木牘的背面則書寫有秦始皇二十七年十一月至五月的行廟記錄,格式為“某月某日令史某行廟”。^④ 這些記錄應該就是根據宗廟處的“質日”摘錄而成的。“廟所質日”這類放在官方機構中為官員所用的文書,還承擔了類似考勤的功能,與私人所用的質日很不相同,兩者所包含的記事在數量和性質上也有區別。西北邊境屯戍遺址中發現的漢代曆日,性質應更接近於這種“廟所質日”,屬於官文書。這些官用曆日中很少見到記事,可能主要是用於查日期和占吉凶。

① 程少軒:《肩水金關漢簡“元始六年(居攝元年)曆日”復原》。

② 已發表曆書記事數量統計,參看蘇俊林《關於“質日”簡的名稱與性質》《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4 期,表 2、表 3,20、21 頁。

③ 參看蘇俊林《關於“質日”簡的名稱與性質》,《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4 期,18、22 頁。

④ 關於“令史行廟”文書的復原和介紹,見陳偉主編《里耶秦簡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78-80 頁;又可參看魯家亮《里耶秦簡“令史行廟”文書再探》,《簡帛研究二〇一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曆書中出現用於占視吉凶的神煞，最早見於北大秦簡秦始皇三十一年、秦始皇三十三年曆書，僅有建除一種。除此以外，已知的秦及漢武帝以前曆書均未注神煞。此後，曆書加注神煞的情況逐漸普遍，加注的種類也呈增長趨勢。相當於漢武帝元光元年的銀雀山漢簡《七年視日》，未注建除而有反支。敦煌漢塞所出宣帝本始四年曆書兼注建除和反支，連雲港海曲武帝後元二年曆書則注刑德，比較特殊。在西北邊塞遺址發現的西漢中期以後的曆日中，加注建除已成通行做法，如敦煌元康三年、居延建平二年、居延建武元年、居延建武六年七年曆日等等，皆是其例。西漢晚期，還出現了加注的神煞種類更為豐富的曆書類型。形制較為特殊的敦煌永元六年曆書木牘，包括建除、反支、八魁、血忌四種神煞。^① 尹灣元延三年五月木牘在最上一行以“建日午”“反支未”“解衍丑”“復丁癸”“召日乙”“月省未”“月殺丑”“□□子”的敘述形式，說明了九種神煞在本月中所在的干支。前文述及的肩水金關居攝元年也注有八類神煞。

加注神煞的普遍化和神煞種類的增加，說明曆書配合占視吉凶的功能日益突出，反映出漢代社會知識和信仰氛圍的變化。選擇類數術經過戰國秦漢之際的大發展，進入漢代以後日益成熟，運用也更加廣泛，影響社會各個階層和不同領域。西北漢簡曆書中的神煞，表明選擇數術已經滲透到日常行政和軍事活動中來。這些曆書的來源，可以追溯到朝廷的頒曆，其中的神煞安排也很可能來自中央。

秦漢曆書加注神煞的變化趨勢，可以與後代“曆日”和“具注曆日”的發展聯繫起來。江曉原、鄧文寬先後研究過秦漢到唐宋曆書的變化及其原因。江曉原指出曆注中吉凶宜忌從無到有的變化，^② 鄧文寬將之稱為從“曆日”到“具注曆日”的轉變。^③ 我要強調的是，這個變化是曆書占視吉凶功能自身發展的過程，而非外部因素導致的質變。從敦煌吐魯番的出土發現來看，曆書上的自題名“曆日”一直延續到唐武宗時期，自唐僖宗時期以後則使用“具注曆日”。^④ 也就是說，加有詳細曆注的“具注曆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仍然沿用“曆日”的名稱。這說明，是否注有複雜的曆忌內容，在當時使用者看來並不影響曆日的本質，而題名的變化也不代表形制和內容上的根本轉變。“具注曆日”仍然是“曆日”。

唐宋以後的具注曆日與秦漢曆書最大的差別，不是曆注的有無和繁簡，而是前者在曆注

① 此外，《居延新簡——甲渠候官》所載 EPT65·425 號疑似曆書的木牘，在干支日期下注有建除、五行、反支、復日、天李、八魁、血忌、往亡等神煞，或許也是曆書加注神煞的例子。

② 江曉原：《曆書起源考》，《中國文化》第6期，155頁。

③ 鄧文寬：《從“曆日”到“具注曆日”的轉變——兼論“曆譜”與“曆書”的區別》，《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考索》，194—204頁。

④ 陳昊：《“曆日”還是“具注曆日”——敦煌吐魯番曆書名稱與形制關係再討論》，《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6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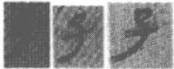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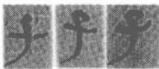
中直接說明具體事務在當天的宜忌,可以脫離日書直接占視吉凶。^① 曆法和選擇兩種知識在曆日中日益結合起來。與此相應的另一個變化,是記事功能退出了具注曆日。正如劉樂賢所說,秦漢曆書中所見的記事性文字“在後來的具注曆日中是完全看不到的”。^②

三 秦漢曆書的製作與使用

進一步發掘出土秦漢曆書作為史料的意義,還需進入它作為實用曆書存在的歷史時空中,研究它是如何被製作和使用的,特別關注其背後的人的活動。秦漢曆書的製作者和使用者是誰,所根據的曆朔來自哪裏? 使用者如何獲得曆書,又怎樣使用它們? 曆書的製作和使用反映了怎樣的時間秩序和社會狀況? 這些問題都有待研究解答。

從已發表的材料來看,秦漢曆書的製作和使用情況較為複雜。曆書製作者和使用者往往并不同一。比較同出於周家臺 30 號秦墓的秦始皇三十四年和三十六年曆書,不難發現前者的干支寫法總體上較為拘謹,後者則寫得隨意些,出鋒的筆劃較多。典型的例子,如“子”字的寫法,三十六年曆書“子”字的鈎筆均有明顯出鋒,三十四年曆書則否。又如“寅”字,三十六年曆書“寅”字“ㄣ”的豎點和鈎筆都向下拖長,幾乎包住下部,三十四年曆書“寅”字的這兩筆都較短(見表二)。據此可知,這兩件曆書不是出自同一書手。周家臺秦始皇三十六年曆書還上添加有三十七年的月朔,與原有干支一起組成了三十七年曆書。添加這些內容的應是該曆書的使用者,所用書體與三十六年曆書的原有文字也有差異。最明顯的是三十六年曆書月名中“二”“三”“五”等字的長橫均不出鋒,而所補三十七年月名的相應文字,長橫均出鋒(見表三)。這類書體差異,足以表明該曆書的製作者與使用者不是同一人。有助於進一步說明這一問題的是,兩年的曆書首尾不相連續。三十六年曆書九月辛巳小,則歲末為己酉日;三十七年曆書稱十月辛亥小,歲首與己酉之間隔了一天庚戌。顯然,兩年的曆朔并非來自同一個源頭。



表二:周家臺秦簡秦始皇三十四年、三十六年曆書書體比較表

| | 周家臺秦始皇 三十四年曆書 | 周家臺秦始皇 三十六年曆書 |
|---|---|--|
| 子 |  |  |







① 唐宋曆日多在某日下明確注出嫁娶、出行、修宅等事項的吉凶宜忌。

② 劉樂賢:《秦漢曆日的內容及功用》,《古羅馬和秦漢中國——風馬牛不相及乎》,363 頁。

續表

| | | |
|---|---|--|
| | 周家臺秦始皇 三十四年曆書 | 周家臺秦始皇 三十六年曆書 |
| 寅 |  |  |

表三：周家臺秦簡秦始皇三十六年曆書三十六年、三十七年月名書體比較表

| | | |
|---|---|--|
| | 三十六年月名 | 三十七年月名 |
| 二 |  |  |
| 三 |  |  |
| 五 |  |  |

那麼，這些曆書來自什麼渠道，或者說它的製作者是誰？周家臺曆書亦可提供些許線索。周家臺秦始皇三十六年曆書出土時與《日書》為一組，兩者書體一致，很可能是同時製作、配合使用的。^① 由於秦代《日書》不太可能通過官方渠道頒布，推測該曆書也應來源於非官方渠道。曆書的製作者可能是書商，也可能是兼營書籍的“日者”或其他。這樣的曆書製作者在當時應有多家并存。曆書在形制上存在差異，採用不同的神煞系統，很可能就是不同製作者的風格差異所致。總之，使用者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獲取曆書，自行製作的曆書中曆朔安排的來源也是多元的。這種多元性對理解曆書的史料價值十分重要。出土曆書中的所謂“抄誤”，即可由此出發來重新認識。

此前學者在使用曆書的曆朔數據時，往往會指出曆書的“抄寫錯誤”。認定“抄誤”的理由，主要有三種。一是曆書中的干支前後不相連貫，從該曆書本身即可判定抄寫有誤；二是曆書所載曆朔，與出土官文書或他件曆書所見曆朔不合；三是曆書所載曆朔，與學者復原的當時曆法推算所得的數據不合。後兩種認定抄誤的理由共同預設了一個前提，即當時全國的所有場合都使用曆朔一致的曆書。曆書來源的多元性，恰恰動搖了這一前提。

出土曆書抄誤是可能存在的，但抄誤的產生一般都有可追溯的原因，能夠通過校勘的一般原則加以識別和解釋。比如周家臺秦始皇三十四年曆書的 26、27、28 號三支簡，把“辛酉”誤寫成“辛丑”。“酉”“丑”古音同屬幽部，三支簡中的第一個抄誤應是音近致訛，後兩個則是涉上文而訛。這樣的抄誤是可以認定的。

^① 參看夏德安《周家臺的數術簡》，《簡帛》第 2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然而,學者根據上述第二、第三兩種理由判斷的“抄誤”,都是與所謂“正確”的干支相差一日。仍以周家臺秦始皇三十四年曆書為例,研究秦漢曆法復原問題的學者,多認為該曆書的三月乙丑朔、五月甲子朔、七月癸亥朔和後九月癸巳朔都抄寫有誤,需要移動一日,分別改為三月丙寅、五月乙丑、七月甲子和後九月壬辰。^① 新近公布的嶽麓秦簡正好也包括秦始皇三十四年曆書,它的曆朔安排與學者“校正”周家臺曆書後的結果完全一致。這似乎證明了學者對周家臺曆書“抄誤”的判斷。但這樣的“抄誤”在校勘學上無法解釋。很難想像抄寫者會將“丙寅”抄成“乙丑”,“乙丑”抄成“甲子”,並且之後所有的干支都移動了一格而不自知。

周家臺和嶽麓秦簡兩種秦始皇三十四年曆書所載曆朔的差异,不宜認定成“抄誤”,而應理解為採用了不同的曆朔安排。劉信芳即持這種觀點。他還發現,曆書中九月的最後一日“壬”“辰”二字分別被塗有一粗筆(第58簡第六欄),應是使用者的校改,因此曆書中九月的晦日祇能是辛卯,而後九月朔日則實際上已被使用者改正為壬辰。如此,該曆書也就不存在“三個月連大”這樣不合平朔法的“硬傷”了。^②

類似的情況,還見於嶽麓秦始皇二十七年曆書。該曆書載是年八月朔日為癸酉,而里耶8-133號秦木牘記有“廿七年八月甲戌朔”,^③較嶽麓曆書晚一日。此里耶木牘屬官文書,所載曆朔固然可以認為是當地官府所用,但并不能因此斷定嶽麓曆書必為抄寫錯誤。事實上,這些被認為是“抄誤”的曆朔歧異,恰恰是尤為寶貴的資料。它們反映出不同地域、不同場合、不同個人之間的使用曆差异,進而可以啟發我們討論當時曆書使用的實際狀況。

秦漢國家行頒朔之制,應有官方製作的曆書,舉國上下實際使用的曆法尚未完全統一。春秋戰國以來長期分治局面造成的各種地區差异,也包括用曆的差异。秦始皇當然做過曆法統一的努力,但效力僅限於政府機構,不同的曆法仍在民間廣泛流行。《史記·曆書》云:“幽、厲之後……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此機祥廢而不統。其後戰國并產,在於強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這就是說,秦代未及改變戰國時期曆法不統一的狀況。這種狀況到漢代仍長期延續。

① 較早的代表性論述見張培瑜、彭錦華《周家臺三〇號秦墓曆譜竹簡與秦、漢初的曆法》,《關沮秦漢墓簡牘》附錄三,231-232頁。

② 劉信芳:《周家臺秦簡曆譜校正》,《文物》2002年第10期,80-83頁。三月連大,是此前研究者認為周家臺秦始皇三十四年曆書存在抄誤的最重要證據。此外,之前研究者所認為的晦日錯誤,也已經劉信芳指出,為復原本脫簡所致,並非曆書本身的抄誤。我同意劉氏的觀點,並贊同他復原出土曆書的方法。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圖版30頁,釋文16頁。

漢初郡國并行，諸侯國官方所用曆朔就與漢朝不盡一致。^① 民間更有多種曆法同時流行。漢武帝太初改曆時，曾“選治曆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曆者，凡二十餘人”共同參與。^② 可見民間曆法修習者衆多。這些民間曆家分爲不同的流派，所治曆法各不相同。《漢書·律曆志上》云東周以降疇人子弟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曆》”。此所謂“古六曆”又皆見於《漢書·藝文志》，其實就是漢代政府和民間傳習和行用的曆法。^③ 民間治曆者衆多，不同曆法廣泛傳習，秦漢時代的實用曆法當然也不可能完全統一。

參照唐宋時期的情況，秦及漢初實用曆法不統一是不難理解的。平岡武夫曾概述唐代因計算方法混亂和觀念影響，導致實際用曆不統一的情況。^④ 敦煌出土唐宋曆日的朔日，與同年中原曆往往有一二日之差，遇有閏年差別更大；與中原曆閏在同月者極少，往往有一月之差。^⑤ 即使在中原地區，民間小曆和私修曆書流行，也常與官方曆法不同。曆書出版發行渠道多元，官府無力禁止。^⑥ 流行印刷曆日的時代尚且如此，在祇有手抄本曆書的秦漢時期，曆書的多樣性就更不言而喻了。

從秦漢時代曆書的多樣性出發，至少有兩方面的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

首先，時間的測度出於人爲，曆書事實上決定了使用者對時間的認知。在統一的標準不存在或不被接受時，曆書顯示的時日無論是否符合王朝的頒朔或今天的推算，對當時的使用者來說都是可信和準確的。由此，同一時刻在不同的人之間可能存在差異。比如秦始皇二十七年八月的甲戌日，對里耶木牘的書寫者而言是朔日，對嶽麓秦簡的使用者來說則是朔後一日。這一天之前的癸酉日，或爲八月朔日，或爲七月晦日，甚至不屬同一個月份。以今天的觀念，這將會造成不小的混亂。但古人以干支紀日，無論如何安排月份和朔日，任意一天在干支序列中的位置都是唯一而且確定的。因此，不同曆法安排曆朔的差異，不會構成嚴重的問題。現在人們習慣使用的序數紀日廣泛流行則是稍晚的事，日前最早見於鳳凰山 10 號

① 比如，據《春秋繁露·止雨》載，董仲舒爲江都相時教令，江都易王二十一年（即漢武帝元光元年）八月朔日爲甲申。然而，銀雀山元光元年曆書及據《漢書·五行志上之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之記載推得的是年八月朔日，則均爲乙酉。由此可知，武帝初年江都國所用曆朔與漢朝不同。詳見拙文《〈春秋繁露·止雨〉二十一年八月朔日考》，《史原》復刊第 4 輯，2013。

② 《漢書》卷二一《律曆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975 頁。

③ 所謂“古六曆”，西晉杜預已經認爲“未必時王之術”，而是後人依托，南朝祖沖之進一步指出它們的創作時代都在周末漢初。此後學者，一般都公認“古六曆”的實際製作和行用年代在戰國秦漢之際。參看張培瑜等《中國古代曆法》上冊，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327-335 頁。

④ 參看平岡武夫《唐代的曆》“序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⑤ 鄧文寬：《敦煌吐魯番曆日略論》，《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考索》，98 頁。

⑥ 參看周榮寶《唐宋歲末的曆書出版》，《學術研究》2003 年第 6 期，102-104 頁。

漢墓中的F組記事文書簡,時在景帝前期。^①上文提到,曆書中出現數字序號即是這個過程的反映。

其次,曆朔制定和曆書製作,實際上是安排時間秩序的行爲。曆法的統一,或由國家頒布曆朔施行於天下,不僅是國家權力控制地方和社會的要求,也是儒家理想政治秩序的重要內容。司馬遷說:“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②他把國家正朔是否頒行於天下,亦即曆法是否統一,視爲天下有道或無道的標準。參考秦漢曆書的實際使用狀況,司馬遷等人極力推動的改正朔運動,應可得到新的理解。^③

結 語

本文研究出土秦漢曆書的類型,在此基礎上討論了它們的性質、功能與演變,最後推測曆書的製作和使用情況,嘗試發掘其中蘊含的歷史信息。所得結論,可大致歸納爲以下三點。

一、出土秦漢曆書分爲“曆日類”和“曆朔類”,兩類又可各分若干型和式。不同類型的曆書之間可能存在一定的發展繼承關係,其中古人稱爲“質日”“視日”或“曆日”的年曆表數量衆多,是秦漢曆書的主體。此類曆書的發展演變,尤其能够反映秦漢時代時間觀念和時間體系的變化。

二、秦漢曆書主要有查日期和歲時節日、加注記事以及配合日書占視吉凶三種功能。其中,查日期是曆書最基本的功能。加注記事功能則是曆日類曆書所特有的。占視吉凶的功能往往內含於曆書之中,在秦漢時期以加注神煞的形式不斷發展,至唐宋時代,曆書已經可以脫離日書獨立實現此項功能。可見,“曆法”和“選擇”兩類知識在實際運用中往往緊密結合,共同包括在古人的時間觀念之內。

三、秦漢曆書可以是使用者自己製作,也可能來自多元化的公共性渠道。秦漢用曆呈現多樣性,官方曆書和不同流派的民間曆書共存,曆朔和曆日安排往往不盡統一。這種情況,爲思考當時人的時間觀念以及秦漢國家與社會的時間秩序的構成,提供了啓示。

2011年2月11日初稿

2016年9月2日改定

^① 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中的圖版,釋文及裘錫圭先生的考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134-138、146-147頁。

^② 《史記》卷二六《曆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1258頁。

^③ 參看陳侃理《秦漢的頒朔與改正朔》,載余欣主編《中古時代的禮儀、宗教與制度》,448-470頁。

| | | | | | | |
|------|---------|------|--------|--------|-----|--------|
| 壬戌 | …… | 乙未 | 十一月甲午小 | …… | 乙丑 | 十月甲子大 |
| 辛酉 | …… | 甲午 | 正月癸巳小 | …… | 甲子 | 十二月癸亥大 |
| 庚申 | …… | 癸巳 | 三月壬辰小 | …… | 癸亥 | 二月壬戌大 |
| 己未 | …… | 壬辰 | 五月辛卯小 | …… | 壬戌 | 四月辛酉大 |
| 戊午 | …… | 辛卯 | 七月庚寅小 | …… | 辛酉 | 六月庚申大 |
| 丁巳 | …… | 庚寅 | 九月己丑小 | …… | 庚申 | 八月己未大 |
| 簡 59 | 簡 33-58 | 簡 32 | 簡 31 | 簡 3-30 | 簡 2 | 簡 1 |

| | | | | | | | | | | | | | | | | |
|----|----|----|------|-----|-----|-----|-----|-----|----|----|-----|------|-----|-----|-----|-----|
| 癸亥 | …… | 庚子 | 己亥 | 戊戌 | 丁酉 | 丙申 | 乙未 | 甲午 | …… | 庚午 | 己巳 | 戊辰 | 丁卯 | 丙寅 | 乙丑 | 甲子 |
| | | | 十一月小 | | | | | | | | 十月大 | | | | | |
| | | | | 正月小 | | | | | | | | 十二月大 | | | | |
| | | | | | 三月小 | | | | | | | | 二月大 | | | |
| | | | | | | 五月小 | | | | | | | | 四月大 | | |
| | | | | | | | 七月小 | | | | | | | | 六月大 | |
| | | | | | | | | 九月小 | | | | | | | | 八月大 |

示意圖三：曆日類 A 型Ⅲ式

| | | | | | |
|-----|-----|-------|----|----|-----|
| 三十日 | 廿九日 | | 二日 | 一日 | |
| 癸巳 | 壬辰 | | 乙丑 | 甲子 | 正月大 |
| | 壬戌 | | 乙未 | 甲午 | 二月小 |
| 壬辰 | 辛卯 | | 甲子 | 癸亥 | 三月大 |
| | 辛酉 | | 甲午 | 癸巳 | 四月小 |
| 辛卯 | 庚寅 | | 癸亥 | 壬戌 | 五月大 |
| | 庚申 | | 癸巳 | 壬辰 | 六月小 |

續表

| | | | | | |
|------|------|--------|-----|-----|------|
| 三十日 | 廿九日 | | 二日 | 一日 | |
| 庚寅 | 己丑 | | 壬戌 | 辛酉 | 七月大 |
| | 己未 | | 壬辰 | 辛卯 | 八月小 |
| 己丑 | 戊子 | | 辛酉 | 庚申 | 九月大 |
| | 戊午 | | 辛卯 | 庚寅 | 十月小 |
| 戊子 | 丁亥 | | 庚申 | 己未 | 十一月大 |
| | 丁巳 | | 庚寅 | 己丑 | 十二月小 |
| 簡 31 | 簡 30 | 簡 4-29 | 簡 3 | 簡 2 | 簡 1 |

秦守官、假官制度綜考

——以秦漢簡牘資料爲中心*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王 偉

內容提要 “守官”與“離官”相對而言,是指長官在職但因外出、病休等不在署時指派的臨時居守者,是依據法律規定臨時指派符合某種條件(如秩級達到一定要求)的官吏駐守官署并代爲處理相關事務的一種便宜措施。“假官”與“真官”相對而言,是“真官”離職(職位空缺或無法行使職權)時的代理者,一般由官員自薦或上級(包括“真官”)授權,使任“假官”者在約定時間內假借真官的職權行事,也可以離署辦事。

關鍵詞 秦 守官 假官 秦漢簡牘

“假官”“守官”均見於文獻記載,是秦漢官制中一項特殊而重要的內容,舊有的注解和今人的研究結論均有較大分歧。^① 隨着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里耶秦簡和嶽麓秦簡資料的相繼刊布,其中有關官吏選拔和某守、假某的內容使“假官”“守官”的問題有複雜化的傾向。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秦印集成暨新秦印文字編”(16BYY120)的階段性成果。

① 高敏:《從雲夢秦簡看秦的若干制度》,其著《雲夢秦簡初探》(增訂本),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193-196頁;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濟南:齊魯書社,1985,362-365頁;武普照:《秦漢守官制度考述》,《山東師大學報》(社科版)1988年第4期;[日]大庭脩著,林劍鳴等譯:《秦漢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424-441頁;安作璋:《秦漢官吏法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93,65-70頁;王剛:《秦漢假官、守官問題考辨》,《史林》2005年第2期。

一 秦漢守官、假官研究概述

(一) 先秦兩漢時期的“守官”

戰國時已有守官。《戰國策·秦策五》：“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秦下甲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臣少為刀筆吏，以官長而守小官，未嘗為兵首，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高誘注：“姚本：‘守相，假也。’鮑本：‘守，假官也，馬為之。’”^①戰國三晉兵器有“守相”，如守相廉頗鉞和守相信平君鉞等。^②

楚漢戰爭和兩漢時期，守官逐漸普遍化、制度化。《史記·曹相國世家》：“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田儋列傳》：“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己，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又《靳歙傳》“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③

《漢書·百官公卿表》記有多種守官，如“水衡都尉守”“光祿大夫公孫遺守少府”“守衛尉不害”“守衛尉遺”“守京兆尹樊福”“守京兆尹潁川太守黃霸，數月還故官”“守大鴻臚”等。^④又《漢書·賈捐之列傳》“……可試守京兆尹”；《趙廣漢列傳》“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尹翁歸列傳》“以高弟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王尊列傳》“征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薛宣朱博列傳》“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以高弟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黃霸傳》“守丞相長史……征守京兆尹”。^⑤

《漢官舊儀》和《漢舊儀》均記載：“丞相史物故，調御史少史守丞相史，若御史少史。監祠寢園廟，調御史少史屬守，不足，丞相少史屬為倅，事已罷。”又《漢官典職儀式選用》載：“（侍御史）公法府掾屬高第補之，初稱守，滿歲拜真”。^⑥

對於傳世文獻中的“守官”含義，歷來就有不同理解。建國後秦漢簡牘大量湧現，如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里耶秦簡和嶽麓秦簡等，其中“縣名+守丞”和縣鄉級職官或官署名後加

① 范祥雍：《戰國策箋證》（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65、468頁。

②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6419-6421、6428頁。

③ 上引分別見《史記》卷五四《曹相國世家》、卷九四《田儋列傳》、卷九八《靳歙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2027、2646-2647、2710頁。

④ 《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北京：中華書局，1962，745-857頁。

⑤ 上引分別見《漢書》卷六四《賈捐之列傳》，卷七六《趙廣漢列傳》《尹翁歸列傳》《王尊列傳》，卷八三《薛宣朱博列傳》，卷八九《黃霸傳》，2837、3199、3201、3208、3233、3387、3629、3631頁。

⑥ [清]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1990，40、72、207頁。

“守”兩類職官名稱的數量和種類迅速增多,但新資料的增加非但未能解決原有分歧,反而引起了更大爭論。除了早期因所據資料有限而做出的錯誤判斷如“遷陵守丞”是郡守丞外,^①目前研究者對於以上資料中“守”含義的理解可歸納為以下幾種:

第一,或認為是指官員的試職、試守、試用,如趙翼《陔余叢考》卷二十六“假守”條:“其官吏試職者皆曰守……凡試職皆曰守,如今初任官有試俸之例也。”^②高敏據睡虎地秦簡相關內容指出“(守)是一種試用的官吏”,並將《漢書·陳勝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之“守令”和“守丞”解釋為“試用之縣令”和“試用之縣丞”,還認為《漢書·兩粵朝鮮傳》“(趙佗)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為守、假”之“守”“是試用之意”。^③張家山漢簡《具律》:“縣道官守丞毋得斷獄及讞。相國、御史及兩千石官所置守、假吏,若丞缺,令一尉為守丞,皆得斷獄、讞獄,皆令監臨卑官,而勿令坐官。”整理小組“守,試守”的觀點得到張傳漢、蔡萬進等學者支持。蔡萬進對此進一步解釋:“‘試守’未拜為‘真’的縣、道丞無有斷獄及奏讞的權力,則縣道官府中具有斷獄和奏讞權力的官員祇有令、長、真丞”。^④此外,周家臺三十號秦墓出土秦始皇三十四年曆譜中的“守丞”,整理者認為“守”是“試守”之意。^⑤王剛認為:“守官為試用官,可轉為真官,屬於編制內的官員……有時守官與本官可以同置。”^⑥劉正華在將“守”解釋為“表示機構負責人”的同時,又認為“守丞”之“守”為“試守”。^⑦高天霞等認為“在漢代官制體系中,官吏試掌某職可稱‘守’”。^⑧此外,藍野雖然認為“守”是“除官試守”,但又將“守”義釋為“求”,認為“守某官”就是“求某官”,“試守某官”就是“試求某官”。^⑨

第二,或認為“守”為“長官”之義。其中楊宗兵認為,里耶秦簡中的守、丞和守丞均指“長官”,秦時縣一級的長官“守”“丞”或“守丞”即行“縣令、長”之實,却無“縣令、長”之名。^⑩李昭君認為:“從里耶秦簡的情況看,縣級有守、丞等……郡、縣、鄉皆有守,似乎構成一規整之組織系列”。^⑪鄒水傑認為:秦代縣行政主官稱謂有令、嗇夫和守三種,嗇夫也是縣主官的

① 范毓周:《關於湖南龍山里耶出土秦代簡牘郵書檢的幾個問題》,簡帛網,2002年8月15日。

② [清]趙翼:《陔余叢考》,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年,546-547頁。

③ 高敏:《雲夢秦簡初探》(增訂本),194-195頁。

④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48頁;張傳漢:《〈二年律令〉丞與守丞的職權區別》,《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3期;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131頁。

⑤ 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97頁。

⑥ 王剛:《秦漢假官、守官問題考辨》。

⑦ 劉正華:《再論里耶秦簡中的“守”和“守丞”》,《延安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

⑧ 高天霞、何茂活:《漢代“守令”“令史”“守令史”考辨——兼論〈肩水金關漢簡〉中的相關官稱》,《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

⑨ 藍野:《說〈史記·陳涉世家〉“守令”“守丞”》,《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4期。

⑩ 楊宗兵:《里耶秦簡縣“守”、“丞”、“守丞”同義說》,《北方論叢》2004年第6期。按,縣令為秦制無可辯駁,如里耶秦簡8-1119號:“書三封,令印,二守府、一成紀。”

⑪ 李昭君:《兩漢縣令、縣長制度探微》,《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

一種稱謂;並認為“守”應該不是“試守”或“代理”的意思,而是與嗇夫類似的官稱,同樣表示當時各官署的最高長官。^① 後來鄒氏又表達了類似的看法:認為秦代縣與縣下各級部門小吏之長官皆可稱“守”,以表示“長官”之義;同時“令”和“嗇夫”是當時并存的行政長官稱號。就縣佐官而言,里耶秦簡中的“守丞”出現非常頻繁,似不能簡單以“試守”來解釋。“守丞”不是文獻記載中那些“試守”後即真的守丞。^② 李斯認為里耶秦簡中的“縣嗇夫”祇是一種非正式的泛稱,意為縣的主官,可能指令,也可能指守。縣主官可能兼有守和令,即主管軍事的“守”和主管治民的縣令長。^③ 上引劉正華文認為“守”與“嗇夫”相對應,是“嗇夫”的具體稱謂,表示機構負責人。此外,還有將“守”當做一種掌管、主管的泛稱,如陳松長認為秦簡中反復出現的“守”字,除“郡守”之“守”是固定的官名外,其他如“司空守”“少內守”“田官守”“都鄉守”等“守”字均是掌管、主管的意思。^④

第三,或認為是指(臨時)代理、兼攝,如《資治通鑑》卷七《秦二世元年》胡三省注引宋劉敞《漢書標注》云:“原父曰:……守,謂非正官,權守者耳。余按……原父以此守為‘權守’之守,良是。”^⑤ 楊樹達《漢書窺管》卷四:“守丞,謂權守丞者。”^⑥ 睡虎地秦簡《除吏律》:“有興,除守嗇夫、假佐居守者,上造以上不從令,貲二甲。”整理小組注“守、假,意均為代理,居守,留守。”^⑦ 日本學者大庭脩認為:“所謂‘守官’,就是代理某官,即卑秩(或卑位次)的官兼任高秩(或高位次)之職……被置為守官的官是在沒有本官的情況下,守者既有自己的本職,同時又成為守官,即一人兼任二官。”^⑧ 李學勤認為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中的“蒼梧守竈”“攸守”“都是代理縣職的守令”,而里耶秦簡中的“都鄉守”和“守丞”分別是“都鄉的代理負責人”和“代理縣丞”。^⑨ 陳治國等認為里耶秦簡中縣的“守”和“守丞”是代理縣令、代理縣丞,並引睡虎地秦簡證明“任命代理官員臨時負責工作的做法是秦漢時期‘守官’制度的重要內容……這些法律制度規定,政府機構的主要領導不在時,應任命臨時代理的官員‘守’主持工作,說明秦時的守官制度已經非常完備。”^⑩ 此後又重申“秦及西漢初期的‘守官’應是臨時代理的

① 鄒水傑:《秦代縣行政主官稱謂考》,《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2期。

② 鄒水傑:《里耶簡牘所見秦代縣廷官吏設置》,《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按,此文還引用了何雙全、陳偉和李昭君等人類似的觀點,見該文注釋[13]、[14]、[15]。

③ 李斯:《里耶秦簡所見縣主官稱謂新考》,《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

④ 陳松長:《〈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校讀(八則)》,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簡牘學研究》第4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

⑤ 《資治通鑑》卷七“秦二世元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255頁。

⑥ 楊樹達:《漢書窺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52頁。陳增傑:《〈陳涉世家〉“守令”“守丞”解》,《溫州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1期。

⑦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128頁。

⑧ [日]大庭脩著,林劍鳴等譯:《秦漢法制史研究》,438頁。

⑨ 李學勤:《〈奏讞書〉解說(下)》,《文物》1995年第3期。李學勤:《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年第1期。

⑩ 陳治國:《里耶秦簡“守”和“守丞”釋義及其它》,《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3期。

官員，而無試守之意”。^① 黃海烈認為“里耶秦簡中守丞，或為丞的另一別稱，或為代理縣丞^②。”陳松長據嶽麓書院藏秦簡相關資料指出：“將‘守’（按，此指《史記·陳涉世家》的“守令”“守丞”）解讀為‘權攝’之義纔好理解……至於所謂的‘守吏’，應該都是臨時攝管某一部門官吏的泛稱”。^③ 孫聞博據里耶秦簡資料認為，“秦代正式縣令或無‘守’這一稱謂。縣令、官嗇夫、鄉嗇夫所加‘守’字為代理之義。秦及漢初，‘守丞’是縣丞在職，因故不在署時的一種權宜設置，丞歸即罷，不具有試守性質”。^④ 陸德富認為“守”應是守官之意，指縣的負責人。^⑤

此外，秦濤認為里耶秦簡中的“守”主要是長官不在時由某官員代為留守官署坐班之意；又說“至於‘試守’之意，則恐怕更是漢朝郎官制度成熟以後，緣於官吏實習需要而產生的後起義項”。^⑥

第四，或認為“守官”除了試守、試用、試署的含義外，在某些情況下還有兼攝、代理的意思，如安作璋、熊鐵基指出“守為試署性質……稱職者即可為真”，又說“守，除試守之意外，還有兼、攝之意。”^⑦較早系統論述秦漢守官制度的是武普照《秦漢守官制度考述》，文中指出“秦漢守官制度，即官吏的試用制度……守官即試任某官的意思……秦律中所載守官，多為原官不在時試署，兼含有代理、兼攝的意義。”文中又將漢代守官分為“離職出守”“兼職出守”和“假代試守”等三種類型，其中“（假代試守）漢朝任官，遇有官缺，無適當人選補缺時，則擇取官吏代行其事，有時這種攝代含有試守的意義，攝代稱職便可轉為真除。”^⑧又前引王剛《秦漢假官、守官問題考辨》一文將“守官”區分為“守缺”和“試守”兩類，並說“守缺是在官員出缺的情況下，代為掌權，其適用範圍及先決條件是給定了的。而試守作為對官吏的試用……”新出里耶秦簡整理者：“守丞”之“守”也不一定如我們理解的是“試”或“代理”之意。^⑨此外，張俊認為：“漢代守官通常是指試用官吏。守官之‘守’也有“兼攝”“代理”涵義。相對於正式官吏任職於某職事來說，試用守官、兼攝守官、代理守官，在守職期間都是試用。文獻所載守官基本上都具有試用、兼攝或代理這三個特征中的至少一種特征。”^⑩

① 陳治國、農茜：《從出土文獻再釋秦漢守官》，《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第36卷（專輯），2007年9月。

② 黃海烈：《里耶秦簡與秦地方官制》，《北方論叢》2005年第6期。

③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

④ 孫聞博：《里耶秦簡“守”、“守丞”新考——兼談秦漢的守官制度》，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⑤ 陸德富：《試說戰國至秦代的縣級職官名稱“守”》，《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1期。

⑥ 秦濤：《秦律中的“官”釋義——兼論里耶秦簡“守”的問題》，《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

⑦ 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362頁。

⑧ 武普照：《秦漢守官制度考述》，《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民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4期。

⑨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

⑩ 張俊：《漢代守官制度研究》，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1。

第五,“某守”是官方文書習語,表自謙。鄔文玲認為:“‘某守’在文書中也是一種相對固定的用語。多用於發文主官的自稱,帶有‘自謙’的成分。”但作者又說“這一結論仍然有諸多不周延之處……因而不能排除‘守丞’為縣丞離署時暫時代理其職的居守之丞的可能性”。^①

第六,未做定論。如里耶秦簡最初的整理者指出:秦時縣鄉吏員的設置較傳世文獻記載要複雜得多。“守丞”之“守”也不一定是“試”或“代理”之意。^②于振波認為“即使里耶秦簡中的‘守’……是長官的泛稱,也不能因此否定‘縣令’確為秦制這一事實……至於‘守’,有可能是上任之前的代理縣令,也可能另有含義,待考”。^③王彥輝認為“‘××守’之‘守’的含義,可以確定者有‘試官’‘臨時代理’之義,其餘義項尚有待進一步分析”。^④

綜上,可以看出研究者不僅搜羅了《史記》和《漢書》記載的秦末、楚漢戰爭和兩漢時期有關“守官”的史料,還充分利用了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和新出里耶、嶽麓秦簡中“某守”和“某守丞”類資料。尤其隨着里耶秦簡資料的逐步公布,研究焦點集中在“縣名+守丞”和縣鄉級職官或官署名後加“守”等兩類職官名稱含義的探討上。諸家基於幾乎同樣的材料和古書注解,但結論却因對“守”的理解不同而導致諸多分歧。這說明面對豐富且龐雜的材料,研究者差异化的理解導致對“守官”的性質和秦漢時“守官”的設置、發展過程和任用條件等相關制度尚無清晰的認識。

(二) 先秦兩漢所見的“假官”

戰國時期有“假相”“假相國”。《史記·趙世家》:“(孝成王)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又《廉頗藺相如列傳》:“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⑤

秦時郡有“假守”,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有“南陽假守騰”,《漢書·項籍傳》“會稽假守通”,注引張晏曰:“假守,兼守也。”^⑥“假守”亦見於多件秦上郡戈。^⑦

楚漢戰爭期間有“假王”“假上將軍”“假左丞相”等名目,與這些假官職務相對應的是“真”。《史記·高祖本紀》“立景駒為假王”,《陳涉世家》“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留侯世家》“景駒自立為楚假王”(《漢書·張良傳》同);《淮陰侯列傳》“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漢書·韓信

① 鄔文玲:《“守”、“主”稱謂與秦代官文書用語》,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12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163頁。

② 張春龍、龍京沙:《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

③ 于振波:《說“縣令”確為秦制——讀里耶秦簡札記》,《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3期。

④ 王彥輝:《〈里耶秦簡(壹)〉所見秦代縣鄉機構設置問題蠡測》,《古代文明》2012年第4期。

⑤ 《史記》卷四三《趙世家》、卷八一《廉頗藺相如列傳》,1828、2448頁。

⑥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232頁。《漢書》卷三一《陳勝項籍列傳》,1797頁。

⑦ 王輝、王偉:《秦出土文獻編年訂補》,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69、73、116頁。

傳》所記略同)；^①又《漢書·高帝紀》：“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顏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故曰非君王意。”《漢書·陳勝傳》“乃以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乃相與立羽為假上將軍”，顏師古注曰：“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為假。”《曹參傳》：“漢二年，拜為假左丞相……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②

兩漢時期又出現了秩級較低的“假吏”“假丞”“假佐”等，如《漢書·李廣蘇建傳》“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顏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陳湯傳》：“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節使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王尊傳》：“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顏師古注引蘇林：“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也。”《漢書·王莽傳》載王莽居攝期間“群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又“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後王莽“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③《後漢書·光武帝紀》“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顏師古注：“軍假吏，謂軍中權置吏也。”此外，《後漢書·百官志》載：“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為副貳。”^④

上文所引諸家研究中，對“假”的解釋可歸納為以下兩種看法：

第一，多數研究者認為是兼攝、代理，如趙翼《陔余叢考》卷二十六“假守”條：“秦漢時官吏攝事者皆曰假，蓋言借也……凡此皆言攝也，非真假之假也。”^⑤金少英《秦官考》說：“趙之‘假相’‘假相國’，其官稱應為‘相’與‘相國’。《史記·項羽本紀》正義云：‘假，攝也。’南陽有假守騰、其後吳廣為假王，項羽為假上將軍，亦皆兼攝之義。”^⑥安作璋、熊鐵基認為“假有攝事之意，非真假之假……上至丞相，下至軍候丞，均有以假為稱者，此皆為攝事之官。”^⑦王剛認為“假官為非正規的官員，暫時權代而已，事罷則撤，不可轉為真官，屬於編制外的官員”。^⑧

第二，也有學者認為“假官”是試用，如高敏認為：“假守是郡守的一種兼官、試職，與正式

①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卷四八《陳涉世家》、卷五五《留侯世家》、卷九二《淮陰侯列傳》，352、1953、2036、2621 頁。

② 《漢書》卷一《高帝紀》、卷三一《陳勝傳》、卷三九《曹參傳》，46-50、1789、1803-1804、2016 頁。

③ 《漢書》卷五四《李廣蘇建傳》、卷七〇《陳湯傳》、卷七六《王尊傳》、卷九九《王莽傳》，2460、3014、3233、4086 頁。

④ 《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卷一一四《百官志》，北京：中華書局，1965，51、3564 頁。

⑤ [清]趙翼：《陔余叢考》，546 頁。

⑥ [清]孫楷撰、徐復訂補：《秦會要訂補·附錄》，北京：中華書局，1956，463 頁。

⑦ 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第三編），364-365 頁。

⑧ 王剛：《秦漢假官、守官問題考辨》。

的郡守不同”，又據睡虎地秦簡相關內容指出：“（守）是一種試用的官吏”“‘假佐’的‘假’，則同‘假守’的‘假’相同，也是一種試用職務。”^①

此外，文獻中“假守”連言而分表不同意義，如《史記·南越列傳》：“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親黨為郡縣之職或假守。”^②此事亦見載於《漢書》，其《西南夷兩粵朝鮮傳》云“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為守假。”顏師古注：“令為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③因顏注“假”“守”分言，可見二者含義應有所區別。

（三）小結

由以上概述可以看出，“守官”“假官”資料分布和研究狀況有如下特點：

第一，先秦兩漢文獻所見“守官”“假官”的記載較為豐富，但關於戰國和秦的相關資料較少。相比而言，楚漢戰爭期間“假官”資料較為集中^④；兩漢時期，尤其是西漢中期以後的“守官”資料異常豐富。

第二，由於秦漢簡牘資料的引入而使得對“守官”的研究較為集中和深入，成果較多但觀點有較大分歧；“假官”的研究成果較少，且理解上與“守官”有重合之處。我們認為，導致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者將文獻所見戰國秦漢間的“守官”“假官”情況未做時間層次和秩級上的區別，即未對戰國至秦漢時期的相關資料做分段的共時分析，且將中央、郡和縣等層級混在一起討論。

第三，研究者對兩漢“守官”資料的闡釋較為充分，如守官人選資格、程式化的術語表達、固定化的守官期限以及考核等方面的認識較為一致；但對戰國和秦時“守官”“假官”含義和性質的認識仍不清晰。主要原因在於直接反映先秦“守官”“假官”的語境化史料欠缺，且當時所能利用的秦漢出土文獻資料較少。新出里耶秦簡中有異常豐富的“守官”資料，但因文義和語境問題使得此前的各種理解面臨新的挑戰，使問題有複雜化的傾向。

第四，此前的“守官”“假官”研究多以“秦漢連言”，實則是“以漢概秦”，並呈現“漢詳而秦略”的特點，對秦時相關情況研究不夠具體和深入；要麼僅限於新出秦簡資料，而較少顧及古書注疏的訓釋成果。此外，最主要的是很少有將“假官”和“守官”結合起來，在詳細瞭解二者的區別與聯繫的基礎上探討二者的性質、適用範圍以及各自發展和完善的過程等問題。

① 高敏：《雲夢秦簡初探》（增訂本），193-194頁。

② 《史記》卷一一三《南越列傳》，2967頁。

③ 《漢書》卷九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3847頁。

④ 前引王剛《秦漢假官、守官問題考辨》文也提到“假官的例子多集中於秦時及楚漢相爭時期”。

二 秦漢簡牘所見守官、假官資料的初步研究

近數十年來，秦出土文獻資料與日俱增，其中包含着豐富的秦職官名稱使得進一步研究秦代守官和假官制度有了良好的基礎。此外，漢初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也有關於守官、假官的相關規定，對研究秦時守官、假官制度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 睡虎地秦簡中有關守官、假官的法律條文

睡虎地秦簡中有反映秦時官吏任免的法律條文，現將直接與守官、假官有關的 3 條簡文列舉如下：^①

(1)《秦律十八種·置吏律》：“官嗇夫節(即)不存，令君子毋(無)害者若令史守官，毋令官佐、史守。”

整理小組譯文：官府的嗇夫如果不在，叫辦事不出差錯的有爵的人或令史代理，不要叫官府的佐、史代理。此條簡文是秦官吏管理上存在代理制度的直接證據之一。簡文所謂的“不存”應該是指官員在職，但因公外出或病休等臨時不在官署或短時不能處理本職工作的情况，而不是指該職位無人擔任而空缺。這樣理解，除依據簡文含義之外，還有一個有力證據，即：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賊入甲室，賊傷甲，甲號寇，其四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寇，問當論不當？審不存，不當論；典、老雖不存，當論。”

整理小組譯文：“有賊進入甲家，將甲殺傷，甲呼喊有賊，其四鄰、里典、伍老都外出不在家，沒有聽到甲呼喊有賊，問應否論處？四鄰確不在家，不應論處；里典、伍老雖不在家，仍應論罪。”^②可見“不存”不是指職位空缺。

(2)《秦律十八種·內史雜》：“苑嗇夫不存，縣為置守，如廐律。”

整理小組譯文：苑囿的嗇夫不在，由縣安排代理其職務的人員，依《廐律》行事。此處的“苑嗇夫不存”也應與上一條“官嗇夫節(即)不存”的情況一樣。祇是因為苑嗇夫的職位較為特殊(或屬中央的少府機構直轄)，本需要上級機關任命，但在苑嗇夫因故短時間內不在官署或不能履行職責時，所在縣有職責為其臨時安排代為處理相關事務的人員。

(3)《秦律十八種·除吏律》：“有興，除守嗇夫、段(假)佐居守者，上造以上不從令，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八開精裝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56-57、62-63、79-80 頁。按，下文所引睡虎地秦簡簡文及譯文均出自此書，不贅注。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八開精裝本)，116 頁。

貲二甲。”

整理小組注：“守、假，意均為代理……居守，留守。”整理小組譯文：戰爭時征發軍隊，任命留守的代理嗇夫和佐，爵在上造以上的人不服從命令，罰二甲。

徐富昌對秦時官吏任免的形式和程式做了系統梳理，其中有“官吏必須經過正式任命”和“官吏調職不准帶走佐屬”的規定，如《置吏律》：“除吏、尉，已除之，乃令視事及遣之；所不當除而敢先見事，及相聽以遣之，以律論之。嗇夫之送見它官者，不得除其故官佐、吏以之新官。”該書又歸納了“每年定時任官”的規定，如：《置吏律》：“縣、都官、十二郡免除吏及佐、群官屬，以十二月朔日免除，盡三月而止之。其有死亡及故有夬（缺）者，為補之，毋須時。”“在補缺未完成期間，縣必須要有指定其職務的代理人”，又據“苑嗇夫不存，縣為置守”的規定指出：“以此來看，縣級佐屬或官嗇夫在補缺官員未到任之前，也會有職務代理人。”^①

總之，睡虎地秦簡中有關官吏任免的規定似乎主要反映的是秦統一前夕縣級職官的情況。可以推測，秦時對郡縣官吏的任免應該有一系列嚴格而詳細的法律規定，對各級官吏因外出或病休等原因而不能正常處理公務所導致的官署機構主官事務需要臨時代為處理等特殊情況，肯定有相關的應急處理措施，祇是因材料所限未完全反映出來而已。睡虎地秦簡中，縣級職官不能在曹署理事而需要其他官員臨時代理有明確的身份限制，某些代理官員的委任有明確的責任主體。另外，據“守嗇夫”和“段（假）佐”的表述來看，“守”和“假”的含義應該存在區別。

（二）嶽麓秦簡中有關守官、假官的法律條文

嶽麓書院藏秦簡中有反映秦時“守官”情況的一條簡文，即嶽麓秦簡 0370 號：“郡尉不存，以守行尉事，泰守不存，令尉為段（假）守，泰守、尉皆不存，令吏六百石以上及守吏風莫（模？）官……”^②

前文所述諸家對秦漢時期“守官”“假官”研究中，此條簡文幾未見引用。從簡文中郡守寫作“泰守”的寫法來看，此條簡文是秦統一後有關郡級官吏守官、假官的法律條文。其中“郡尉不存”的情形與《秦律十八種·置吏律》“官嗇夫節（即）不存，令君子毋（無）害者若令史守官，毋令官佐、史守”的情況高度一致，即郡尉在職但因故臨時不能在官署理事時，郡守可“以守行尉事”，即以郡守的身份臨時代為處理郡尉的相關事務；而郡守在職但因故臨時不能在官署理事時，“令尉為段守”，即郡守以命令的形式讓郡尉充當“假守”。之所以要“令

① 有關官吏任免的相關規定及詳細論述參徐富昌《睡虎地秦簡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445-448 頁。

② 陳松長：《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2 期。此外，里耶秦簡 8-657 號：“琅邪段【守】□敢告內史、屬邦、郡守主：琅邪尉徙治即【墨】□”，簡文中的“琅邪段守”所稟報的對象有內史、屬邦和郡守（秩級均高於郡尉），所述事項是琅邪尉遷徙治所至即墨，文書中用“敢告”說明是上行文書。以上種種迹象表明，簡文中的“琅邪段守”很可能就是暫由琅邪尉兼任者，與嶽麓秦簡 0370 號中“令尉為段（假）守”的規定十分契合。

尉”，蓋因郡尉秩級較郡守低，本沒有資格處理郡守事務，但特殊情況下允許秩級較高的郡守授權給秩級較低的郡尉，而郡尉是被臨時授權。總之，雖然二者都是一種臨時兼攝職務，即本官回歸之後所兼攝之事隨即交還本官，但二者本質區別在於，“以守行尉事”是高秩級臨時代理低秩級職務；而“令尉爲段（假）守”是低秩級臨時代理高秩級職務，其前提是須由高秩級官員授權認可。

文獻所見兩漢時期官員“行……事”之例甚多，如《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侯石坐爲太常，行太僕事”；《留侯世家》中張良此前未有職務，而劉邦在出征前使“留侯行少傅事”；《南越列傳》南海尉任囂臨死前讓時任龍川縣令的趙佗“行南海尉事”；《淮南衡山列傳》“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劉）逸”；《酷吏列傳》張湯爲御史大夫而“湯數行丞相事”；^①又《漢書·匡衡傳》“少府忠行廷尉事”等。^②其中與嶽麓秦簡所述情況最爲接近的是《南越列傳》所記趙佗事。據《史記·南越列傳》載：^③

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

因南海尉任囂病重不能處理郡務的情況下的臨時委託，在任囂死之前，趙佗僅是以龍川縣令身份臨時代爲處理郡尉所管轄事務，若任囂病癒返回郡尉崗位，則趙佗仍是龍川縣令。文中趙佗以低秩級的縣令“行南海尉事”，不完全符合嶽麓秦簡所反映的秦律規定，但任囂明言“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可見以低秩級“行南海尉事”是不得已而爲之；且通過“即被佗書”的舉動說明南海尉任囂是在病中書面授權，讓趙佗代理自己處理郡尉事務。結合當時混亂局勢來看，任囂委託郡尉事務基本上是按照秦時律法規定來執行的，祇因局勢混亂，與上級聯繫中斷且郡中無人可用，故任囂祇能召趙佗委託郡務。

以上所列其他反映漢代官員“行……事”的例子，恐怕也與趙佗暫時兼攝南海尉的情況一樣，即原任官員因故暫時不能在曹署履職時，暫由另一有本職工作的官員臨時代爲處理相關事務，原官員一旦返回工作崗位，則代理關係立即解除，二人各司其原職。

① 上引分別見《史記》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卷五五《留侯世家》、卷一一三《南越列傳》、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卷一二二《酷吏列傳》，961-962、2046、2967、2077、2143 頁。

② 《漢書》卷八一《匡衡傳》，3346 頁。

③ 《史記》卷一一三《南越列傳》，2967 頁。

因嶽麓秦簡反映的情況並不是職位空缺，而是郡守或郡尉“不存”，即本官在職但臨時因故不能在官署理事時的應急措施，故《秦漢官制史稿》中“‘行’，乃是官缺未補，暫由他官攝行之意”的說法不能涵蓋秦統一後的實際情況。^① 至於高秩級和低秩級之間的相互臨時代理，以及所要兼攝的職位是官員因故臨時不能在官署履職，抑或是原官員調離、病故等而新官尚未到任而導致該職位短時空缺，秦代和兩漢時期的情況容許有一定的發展變化。

總之，從嶽麓秦簡和文獻所見秦漢官員“以某行某事”的情況來看，均是在有官員因故臨時不能在曹署履職，另一官員在原職務不卸任的基礎上臨時兼攝以保證該機構因主官暫時不能處理事務的情況下照常運轉，而且這種臨時代理的做法都得到了上級的委任或法律規定的許可。

最後需要考慮的是，因為官員暫時不能在曹署理事的原因繁多，或因公外出，或因私病休等，也不排除像南海尉任囂那樣在任因病亡故，而新任命的官員因人員遴選、消息遲滯或路途遙遠等原因暫未到任所導致的“官缺未補”情況。雖然《秦律十八種·置吏律》規定“其有死亡及故有央(缺)者，為補之，毋須時”，即不必等到國家統一規定任免時間內即可進行官員的補缺，但在新舊官員交接的時間差內，一定是遵循和執行着嶽麓秦簡郡守和郡尉之間那種相互臨時代理的法定程式，以此保證官僚機構的正常運轉。

(三) 秦簡牘、兵器和封泥所見其他類型的守官、假官資料

除以上秦簡牘中有關守官、假官的法律規定外，秦出土文獻中還有一些守官和假官名稱及信息，主要可分為以下四類：

第一類，中央級的守官和假官名稱，如“內史守”(里耶秦簡 8-228 號)和“段御史”(里耶秦簡 8-528 號)。^② 此外，紹興西施山遺址出土的二年屬邦守戈銘文“二年屬邦守蓐造，工室建，工後”，其中的“屬邦守”應是屬邦機構的守官。^③

第二類，郡級職官中暫未見“守官”而僅見一些“假官”名稱，如“洞庭段守”(里耶秦簡 8-759、8-2114 號，《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④9-712 號)、“琅邪段【守】”(里耶秦簡 8-

① 按，《秦漢官制史稿》第三編第二章“任用制度”第一節“任用方式”中對說：“所謂‘行’，乃是官缺未補，暫由他官攝行之意。兩漢時期有以低級官吏攝行高一級官吏職務者……有以同級官吏而相互攝行者……也間有以高級官吏攝行低級官吏之事者……有以文官行武官事者……也有以武官行文官事者……總之，攝行較為普遍這是在遇有官缺，而一時無適當人選補缺採取的一種臨時措施。”參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第三編》，369-370 頁。

② 以下所引里耶秦簡資料除特別注明外均出自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③ 郭永秉等指出：“‘屬邦守’是官名，‘蓐’是人名。根據‘屬邦之印’封泥，可知秦代‘屬邦’這一官署的長官稱‘屬邦’，但這應是‘屬邦守’的簡稱。”參見郭永秉等《紹興博物館西施山遺址出土二年屬邦蓐戈研究——附論所謂秦廿六年丞相戈》，收入其著《古文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10 頁。今按，我們認為秦時“屬邦”既是官署名稱又是職官名稱，“屬邦守”是因故臨時代理屬邦職務的守官名稱，“屬邦”不是“屬邦守”的簡稱。

④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陳偉主編《簡帛》第 10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657 號)、“廬江段守”(《綜述》^①0556 號)、“南郡段守”(《綜述》0083、0163 號;《嶽麓書院藏秦簡(叁)》^②025、040 號;里耶秦簡 8-974 號)、“清河段守”(《綜述》0374 號)和“洞庭段卒史”(里耶秦簡 8-78 號)等。

第三類,縣級守官和假官名稱。^③ 秦時縣級守官和假官資料種類繁多,其中“守官”類資料有“縣名+守”,^④如“江陵守”(《嶽麓書院藏秦簡(叁)》061 號)、“沙羨守”(《嶽麓書院藏秦簡(叁)》003 號)、“州陵守”^⑤(《嶽麓書院藏秦簡(叁)》001、004、013、025、031、040 號)等。此外,還有“泰山守”(《綜述》1114 號),因暫不能確定秦時設有泰山郡,故“泰山守”亦可能是泰山縣令所置之守。

有“縣名+守丞+人名”或“守丞+人名”式,這種形式的數量最多;有“守××丞”(《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⑥11-34 號)。還有大量的“縣級職官名+守”,如畜官守、庫守、田官守、田守、倉守、發弩守、都府守、少內守、司空守、(縣)尉守、廐守等。

此外,新刊秦封泥還有“陽安之守”(圖一),^⑦此封泥印面無界格,文字風格古拙,顯示其時代較早,時代或為秦統一前。秦封泥另有“陽安”(圖二)和“陽安丞印”(圖三),^⑧均有界格。《漢書·地理志》載陽安是汝南郡屬縣,在今河南省駐馬店市南。秦無汝南郡,陽安縣秦時屬淮陽郡或陳郡。目前所見秦縣職官和機構的封泥中,縣名與“守”同時出現的例子僅見“陽安之守”一種。因秦郡封泥中暫無“郡名+之守”式,且“陽安”秦時為縣的可能性極大,故“陽安之守”封泥中“守”字的含義頗難索解。若將此“守”字理解為秦簡牘資料所常見的縣級職官名稱中的“守”類職官用印,則僅憑“陽安之守”的孤例難以定論。按照我們的理解,“守”類職官是臨時代理的性質,沒有專門的印信,日常處理公務仍是以縣令、丞等正式設立的職官和官署用印行事;秦郡級璽印封泥中也同樣也沒有“段”類,也是相同的道理。鑒於以

① 陳松長:《嶽麓書院所藏秦簡綜述》,《文物》2009 年第 3 期。按,以下簡稱《綜述》。

②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

③ 按,本文內容暫不涉及鄉里級別的守官和假官。需要指出的是,秦時鄉里職官名稱中也有一些守官和假官的資料,如鄉守、都鄉守、段校長。我們認為,鄉里職官名稱中的“守”“假”與中央和郡縣級別的職官名稱中的“守”“假”的含義應該相同。

④ 秦兵器有廿二年臨汾守暉戈,見王輝、王偉編著《秦出土文獻編年訂補》,133 頁。銘文“臨汾守”有歧說,李學勤《〈秦讞書〉與秦漢銘文中的職官省稱》(收入其著《重寫學術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99-300 頁)認為是“臨汾守令”的省稱。郭永秉等《紹興博物館西施山遺址出土二年屬邦蓐戈研究——附論所謂秦廿六年丞相戈》(222 頁)以為“當從舊說理解為河東郡守”。今按,“臨汾守”的銘文涉及秦郡縣長官的稱謂和“守”的含義問題,加之秦兵器題銘中像“縣名+守”所造兵器僅此一例,故此處暫不將廿二年臨汾守暉戈納入討論範圍。

⑤ 州陵為秦縣而非秦郡,參王偉《嶽麓書院藏秦簡所見秦郡名稱補正》,《考古與文物》2010 年第 5 期。

⑥ 里耶秦簡牘資料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陳偉主編《簡帛》第 10 輯。

⑦ 楊廣泰:《新出陶文封泥選編》,文雅堂稿本,2015,115 頁。

⑧ “陽安”封泥見於楊廣泰《新出陶文封泥選編》,115 頁;“陽安丞印”封泥見於周曉陸、路東之《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306 頁。

上諸多未知因素,此“陽安之守”封泥暫闕而不論。



圖一



圖二



圖三

縣級“假官”類資料有“段倉”(里耶秦簡 8-459、8-1559、8-2371)、“段丞”(里耶秦簡 8-2)、“段令史”(里耶秦簡 8-802)、“段令佐”(里耶秦簡 8-1231)和“段少內”(里耶秦簡 8-936、8-1771)等。

第四,里耶秦簡中有直接反映秦時縣吏假官的三條簡文,即里耶秦簡 8-919 號:“謂令佐唐段爲畜官”;里耶秦簡 8-1231 號:“倉吏見三人,其一段令佐”;《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一)》11-34 號:“守遷陵丞六……”第一條簡文中的“令佐唐”與“(少內)沈”同簡出現兩次(里耶秦簡 8-886、8-888+8-936+8-2202),且“段少內唐”亦出現兩次(里耶秦簡 8-888+8-936+8-2202、8-1771),此外,同層簡文還有“司空唐”(里耶秦簡 8-886)。據此推斷以上簡文中的“唐”可能是同一人。這些不同職務雖有可能非一時所任,但也能部分反映秦時縣吏守官和假官的實際情況。第二條簡文是說共有倉吏三人,其中一人“段”爲令佐。第三條簡文殘斷,但“守××丞”格式尚屬首次出現,彌足珍貴。此簡文所透露的信息可使秦時縣級“守丞”是臨時委派的性質得一有力證據。也可以使里耶秦簡中守丞人選的頻繁更換得到合理的詮釋。

就以上所列各層級的守官、假官資料來看,秦時自中央至郡縣均有守官和假官現象存在。“守”“假”大量并存,且在各層級均有分布的情況也說明其含義應該存在差異,但秦時各級官吏大量臨時代理其他官署或職官事務的情況,是否意味着當時已經形成像漢代那樣較爲完備的官吏試守和兼攝制度呢?對此,大庭脩認爲:“如果一個完備的官僚組織,在按照規定進行管理的官僚尚未齊備之前,實行官吏的兼任,那麼,這應該說是因方便行事的例外情況,它的本身不會形成制度。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制度所規定的官吏沒有缺員或沒有意外情況,是不會存在官吏的兼任的。”^①而據秦簡牘資料所見的守官和假官情況來看,均是“因方便行事的例外情況”,故在“官吏沒有缺員或沒有意外情況,是不會存在官吏的兼任的”,即秦時應該不存在像漢代那樣較爲制度化、規範化的官吏試守制度。睡虎地秦簡和嶽麓秦簡中關於守官和假官的法律條文應該僅是針對官員“方便行事的例外情況”所做的法律上的限定,目的是對官員的行爲做出限制,防止其違規指定代理人員而導致官署事務被延誤。總

^① [日]大庭脩著、林劍鳴等譯:《秦漢法制史研究》,424 頁。

之，秦時應不存在常態化的一人兩職式的“官吏的兼任”制度。

(四) 張家山漢簡所見守官、假官資料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時代為呂后二年，所反映西漢初年情況對於秦律令有着較高參照價值。其中《具律》102-106 號簡文云：^①

縣道官守丞毋得斷獄及讞。相國、御史及二千石官所置守、段吏，若丞缺，令一尉為守丞，皆得斷獄、讞獄，皆令監臨庫官，而勿令坐官。事當治論者，其令長、丞或行鄉官視它事，不存，及病，而非出縣道界也，及諸都官令長、丞行離官有它事，而皆其官之事也，及病，非之官在所縣道界也，其守丞及令長若真丞存者所獨斷治論有不當者，令真令長、丞不存及病者皆共坐之，如身斷治論及存者之罪。唯謁屬所二千石官者，乃勿令坐。

簡文規定了審理案件的官員級別、代理人員的辦案場所，以及特殊情況下審理案件人員資格認定及其出現失誤後的責任認定等信息，可詳析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縣道的令長有斷獄和讞的權力，而縣道令長所授權的“守丞”沒有。

第二，相國、御史以及二千石以上秩級的官吏所臨時授權的“守官”和“段吏”有斷獄和讞的權力；在郡守之丞空缺的情況下，可讓郡尉臨時充當郡守之丞，這個臨時充當郡守丞的尉也有斷獄和讞的權力。

第三，以上本無斷獄和讞權力的官員在行使臨時代理職務之斷獄和讞的職能時，祇能“監臨庫官”而“勿令坐官”，即對這些代理官員審理案件的場所有嚴格限制。

第四，對於在職能範圍內應該處理的事務，縣道和都官的令、長、丞因外出公幹，或不在官署或生病等不能在官署履職，且行跡沒有超出所管轄縣道邊界的情況下，其所委託的代行職責者（如守丞和令長的真丞）在官署履職時如果工作出現失誤，那些離署的官員（不論是出外辦公，還是生病）也要負連帶責任（與他們親自審理案件和在官署正常辦公期間出現差錯所需要負的責任一樣）。

第五，祇有這些離署的官員是去謁見“屬所二千石官”的上司，纔可以不用負連帶責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簡文中“守（吏）”與“假吏”、“守丞”與“真丞”對舉，其含義當有區別。

三 秦守官、假官的性質與特征

通過上面對秦及漢初出土文獻所見守官、假官資料的初步分析，秦時守官、假官的面貌逐漸清晰。以下基於對秦及漢初出土文獻中守官、假官資料初步分析結果，吸收秦漢守官、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23 頁。

假官已有的研究成果,并結合戰國至楚漢戰爭期間有關假官、守官的記載,對秦假官、守官的特征加以歸納,將二者在性質上予以區分。

(一) 守官、假官之“官”的意義

要區分守官、假官的性質,有必要首先對守官、假官中的“官”的含義做出合乎文意和語境的理解。以往研究守官、假官的論著,無論將“守”和“假”解作長官,或試職、試守、試用,或代理、兼攝,對“官”字似乎未做深究,全部理解做職官或職位。未對守官、假官中的“官”的含義進行落實,也是此前研究的結論產生諸多分歧的重要原因。

《說文·宀部》“官,吏事君也”,但《說文》之訓應為後起義。^① 官之本義應為房舍、館舍。《論語·子張》:“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賈誼《新書·耳痹》:“百世名實因閑官為積。”引申義指官府、官署、曹署。《管子·權修》:“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眾,官不可以無長。”《禮記·曲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鄭玄注:“官謂版圖文書之處也。”《玉藻》篇:“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鄭玄注:“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又《檀公》篇:“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文中官、宮對舉,可見官應指官府、官署。

秦濤《秦律中的“官”釋義——兼論里耶秦簡“守”的問題》一文通過對目前面世的秦律的考察,認為沒有哪一個“官”字可以作為官吏、即具體的人來解,而多數應當作職能部門解。該文還進一步指出,睡虎地秦律中的“官”與里耶秦簡中的“曹”應該是同實而异名。^② 我們認可秦濤將秦簡資料中“官”字絕大多數情況下的含義確定為職能的機構、部門,即官署、曹署的結論。此外,秦簡中的“官”字當做“官府”的例證還可以稍作補充。如嶽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74/1590 號有“官中多草”,^③顯然應理解為官署中長滿了荒草;又《新見里耶秦簡資料選校》8-145+9-2294 號“五人繕官”,可與里耶秦簡 8-244 號“四人繕官”對讀,^④“官”可以被修繕,可見“官”無疑應是官署、曹署。

總之,秦時“守官”之“官”應當做官署、官府來理解。

(二) 秦“守官”的性質與特征

所謂“守官”,與“離官”相對而言,是指長官在職但因外出、病休等不在署時所指派的臨時居守者,是依據法律規定臨時指派符合某種條件(如秩級達到一定要求)的官吏代為處理相關事務的一種便宜措施,守官一般需要居守在官署。見於《戰國策》和三晉兵器的職官名“守相”說明戰國時已有守官制度。

① 李學勤主編:《字源》(下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1255 頁。

② 秦濤:《秦律中的“官”釋義——兼論里耶秦簡“守”的問題》。

③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142 頁。

④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二)》,204 頁;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121 頁。

睡虎地秦簡中有“令君子毋害者若令史守官”(《置吏律》)和“縣爲置守”(《內史雜》)。其中的“守官”即指駐守官署,“縣爲置守”意即讓所在縣代爲指派駐守官署的人員。嶽麓秦簡 0370 號:“郡尉不存,以守行尉事,泰守不存,令尉爲段(假)守,泰守、尉皆不存,令吏六百石以上及守吏風莫(模?)官……”其中的“守吏”,亦即留守在官署的官吏。

這種臨時指派官吏駐守在官署代爲處理相關事務,應源自文獻所稱的“居守”。《左傳》成公十六年:“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瑩居守。”又襄公二十六年《傳》:“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①《史記·留侯世家》:“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②(《漢書·張良列傳》同。)《漢書·百官公卿表》:“邛侯李壽爲衛尉,坐居守擅出長安界使吏殺人下獄死。”《漢書·張耳陳餘列傳》:“……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顏師古注:“爲代相國而居守。”又《爰盎晁錯列傳》:“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③《後漢書·李通傳》:“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④文獻所見“居守”即留守,留守之處多是國都、官署和職位。

“居守”亦見於秦簡。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除吏律》:“有興,守嗇夫、段(假)佐居守者,上造以上不從令,貲二甲。”簡文的“居守”即留置於官署中代爲處理相關事務的官員。“居”與“行”的意義相對,官署機構的主官因故出行,故需要臨時指派人員“居守”,以便保證官署機構的正常運轉。

《說文·宀部》:“守,守官也……寺府之事也。”官爲官署、曹署義,則“守官”就是留守、居守於官署的代爲辦理相關事務的人員。“寺府”即“府寺”,是官舍或官員的府邸、官署,“寺府之事”即指官署的日常事務。

此前的研究中將“守”理解爲“長官”或“官方文書習語”的看法顯然太過籠統;理解爲試職、試守、試用也是“以漢律秦”,即用漢代已經發展的較爲成熟的官員試守制度來解釋秦時官員留守官署代理事務現象;理解爲臨時代理、兼攝,庶乎近於真相,但其表達的重點在於代理或兼攝具體的職務、職位,未側重“官”的官署、曹署意義。

總之,秦代“守官”的主要特征是長官在職不在署時的臨時居守者,一般需要居守在官署。其重點不是代理或兼攝職權,更沒有漢代那種普遍化的“試守”之義。除此之外,秦時“守官”的特征還有:

第一,臨時性。“守官”官吏是官署主官臨時指派,主官返回官署後,這種臨時代爲處理官署事務的委託關係隨即結束。這樣的臨時性也能解釋爲什麼里耶秦簡中陽陵縣和遷陵縣

① 《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二八、卷三七,北京:中華書局,1980,1917,1988-1989 頁。

② 《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2046 頁。

③ 《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卷三二《張耳陳餘列傳》、卷四九《爰盎晁錯列傳》,789、1839、2300-2301 頁。

④ 《後漢書》卷一五《李通傳》,575 頁。

的“守丞”人選變換頻繁,同一個人既可以臨時代理縣令,又可以臨時代理縣丞。

另外,這種臨時性或如大庭脩所言“是因方便行事的例外情況,它的本身不會形成制度”,但秦時緣法為治,律令的規定或即定制,秦簡牘等資料中大量的“守官”現象和法律規定與漢代的“試守”制度之間或許並不是線性的進化關係。

第二,“守官”官吏的秩級和表述方式。從秦簡資料所見情況來看,縣級有“若令史守官”,是令史受縣令指派駐守官署,屬低秩守高秩;“苑嗇夫不存,縣為置守”是縣令長給地處於該縣的“苑嗇夫”指派官吏駐守官署,雙方秩級大概相當。據嶽麓秦簡“令尉為假守”的情況看,見於睡虎地秦簡的“段(假)佐居守者”似乎也是低秩“居守者”被稱為“假”的例子;但秦簡似未見縣令代理其他縣吏職務的事例,詳情暫闕。

對於郡級職官,郡守代行低於自己的郡吏職權時似不用“守”字表述,而說成“以守行某事”;或因郡守的名稱本身就含有一個“守”字,再用“守”表述可能有歧義或重複,或因郡守本就是全權負責郡務,代理其他郡吏職務時不必駐守於郡尉、郡司馬等下屬的官署。由此反推秦縣令長代理縣尉、縣司空、縣司馬等吏員事務時也不必親自駐守其下屬官署理事。對於秩級低於郡守的郡吏臨時被指派代理郡守職務時,則需要郡守授權。其中郡尉代理郡守時被稱為“假守”;其他郡吏代理郡守和郡尉職務時對代理者的秩級有一定要求,可能需要至少六百石以上的官吏。

因材料所限,秦時中央機構指派人員留守官署的情況不可確知,但從秦簡所見“內史守”“段御史”和“屬邦守”等名稱來看,應該也存在與郡級官署類似的“守官”規定。綜合來看,低秩級官吏被臨時指派駐守高秩級官員的官署時多使用“假”來表述。

第三,本官和“守官”官吏職務的存廢。無論什麼原因導致本官離開官署,本官的職務仍在,僅是暫時不能親自處理事務,即祇是“離官(官署)”而未“離職”。對於被臨時指派來“守官”的官吏來說,僅是臨時代為處理相關事務,其原先的職務亦不會免除,其處於臨時的身兼二職狀態,即既“兼官(官署)”又“兼職”;而前引王剛《秦漢假官、守官問題考辨》文所說“有時守官與本官可以同置”主要是漢代官員“試守”的情況,不能統括秦代。

需要注意的是,應該也會存在本官離開官署後陣亡或病故等特殊原因,而新任官員不能及時到任時,則“守官”的官吏便由“兼官+兼職”變成了“守官+守缺”。這種“守官+守缺”後來成為漢代官員“試守”的一種類型。

第四,罪責連帶關係。據張家山漢簡所見律令的相關規定,本官指派駐守官署的人員如處理事務不當而導致的罪責,本官和“守官”的官吏都要問責。

此外,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除吏律》:“有興,除守嗇夫、段(假)佐居守者,上造以上不從令,貲二甲。”簡文是戰時選拔“守官”官吏的規定,即在有軍事行動時,被指派留守官署的“守嗇夫”和“段(假)佐居守者”要聽從高秩級官員的安排,否則要“貲二甲”。

(三) 秦“假官”的性質與特征

所謂“假官”，是與“真官”相對而言，是指“真官”離職（職位空缺或無法行使職權）時的代理者，一般是由官員自薦或上級（包括“真官”）授權，使任“假官”者在約定時間內擁有“真官”的職能和權威、假借真官的職權行事，也可以離署辦事。秦時“假官”也是一種臨時應急措施。

戰國時期三晉趙有“假相”和“假相國”，如《史記·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又《廉頗藺相如列傳》：“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①據這兩條史料所記，可知廉頗先因戰功封爵為信平君，職務晉升為“假相國”，兩年後“假相（國）”人選變成了“大將武襄君”，但從一年後“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的記述來看，廉頗很可能在“大將武襄君”任“假相（國）”時即已升任“真相國”。綜合來看，《廉頗藺相如列傳》對廉頗職務晉升的記述較為準確，而《趙世家》的記載可能有脫文或省略。

秦郡有“假守”，除前引《秦始皇本紀》“南陽假守騰”和《漢書·項籍傳》“會稽假守通”外，還見於多件秦上郡戈。據前引嶽麓秦簡 0370 號簡文“秦守不存，令尉為段（假）守”的規定，秦時郡守可指派郡尉臨時代理其職權，稱為“假守”。之所以稱為“假守”，就是因為正式的郡守仍在職。郡尉在一定時間內可以行使郡守職權，但其本職仍是郡尉，且郡尉代理郡守期間沒有“郡守”的正式名稱和秩俸等相關待遇。

據秦兵器銘文資料，可知秦時郡守有監造兵器的權力和職能。其中上郡假守監造的兵器有昭襄王卅八年上郡段守鼂戈、莊襄王元年上郡段守暨戈和兩件秦王政三年相邦呂不韋矛。^②由兵器題銘多三級監造，即紀年後有監造者+工師（丞）+工的格式來看，前兩件戈由假守監造，說明擔任“假守”者可行使“真守”的權力；而兩件三年相邦呂不韋矛却是“相邦呂不韋”與“上郡假守”共同監造，似乎表明秦王政時代“假守”雖仍可以有代理形式，但“假守”職權似乎受到一定限制，即製造兵器時需要與相邦共同監造。

“假官”較集中的時期是秦末的反秦義軍和楚漢戰爭這樣的特殊時期。秦末至楚漢戰爭期間的“假官”或是為方便控制局勢的自封或是臨陣授予的名號，如吳廣為假王、景駒自立為楚假王、韓信自言“願為假王便”、項羽為假上將軍（顏師古注：“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為假”）等。因時局混亂，各路反秦力量急需樹立權威以便控制局勢、積聚力量和籠絡人心，故多臨陣自創名號以方便統領，但又因沒有公認的統一權威來授予，故暫以“假王”“假上將軍”等名號來稱呼這種臨時代理某一職務的狀態。據韓信先協勢“願為假王便”，而後劉邦“遣張良

^① 《史記》卷四三《趙世家》、卷八一《廉頗藺相如列傳》，1828-1829、2448 頁。

^②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17291、17299、17683、17684 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2 冊 370、380-381 頁，33 冊 119、120 頁。

操印,立韓信爲齊王”的情況來看,“假官”可以轉爲“真官”,但必須得到權威的正式認可并被授予憑證(印綬)。又據漢初曹參在“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而後來劉邦“即皇帝位”後“參歸相印”的記載來看,任“假官”期間可以使用“真官”的印信,但“假官”完成使命後若不被授命爲“真官”則需要交還印綬。王莽爲“假皇帝”期間的情況亦與此相類。

“段”本義或是“借”,其分化字“假”與“真”相對,《說文·人部》:“假,非真也。”^①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贖。’可(何)謂‘真’?臣邦父母產子及產它邦而是謂‘真’。”張家山漢簡有“段大母”“段母”“段子”等。《說苑·正諫》中嫪毐自稱“吾乃皇帝之假父也”,漢唐人注疏中所引齊人茅焦進諫始皇說:“陛下車裂假父。”以上文例之“段(假)”都與“真”相對,行爲主體與所任職務或身份的關係爲臨時的、合法的,但不是固定或真實的。如“假+親屬稱謂”就表示二者之間沒有名稱上所標明的那種血緣關係,這種關係是可以變動的。

文獻有“假攝”連言,如《荀子·儒效》:“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爲也。”《左傳》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杜預注:“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禮。”^②又《史記·項羽本紀》記載“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而《高祖本紀》“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及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③可見項羽矯命誅殺“真”上將軍宋義後,因未得到懷王授命和認可而祇能做“假上將軍”,即暫時以“次將”的身份代理“上將軍”行使職權。總之,“假官”之“假”與“真”相對,意爲代理職權。漢代王莽曾被太后稱爲“假皇帝”,後來王莽“即真天子位”,“假皇帝”即代理皇帝的職權,而不能理解爲“試着當皇帝”。

綜上所述,秦代“假官”的本質特征是“非真”,其內涵核心點是以低秩級代行高秩級(“真官”)的全部職權,即卑秩代行高職,同時“假官”沒有“真官”的名位與秩俸,秦代“假官”的實質也是一種臨時應急措施。除此之外,秦時“假官”的特征還有:

第一,臨時性和合法性。“假官”與經過選拔和官方正式任命的“真官”相對,是在尚未設置“真官”的職官名目,或“真官”因故不能履職,或形勢危急時無法通過正常程式產生“真官”等特殊狀況下,由上級(包括“真官”本身)臨時授權或同僚推舉,抑或願意擔任“假官”的人員自薦而產生。

第二,設置“假官”的目的是使擔任“假官”的人員在擁有了“假官”名號後可以行使與“真官”同樣的職能和權威,以便於掌控局勢。

① 按,“段”字的構形和本義尚無定論,《說文·又部》“段,借也”亦闕釋字形;但“借”義與“非真”之義也有關聯。參李學勤主編《字源》,255、709頁。又按,里耶秦簡8-135:“前日言競陵蓋陰狼假遷陵公船……司空自以二月段狼船……”其中“假”“段”同時出現且均爲“借”義,可見秦漢時期“段”“假”二字或可互用。

② 《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0,1715頁。

③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卷八《高祖本紀》,305、356、361頁。

第三,“假官”的秩級。任“假官”之前,其自身職務的秩級低於所對應“真官”的秩級,如嶽麓秦簡律文規定“令尉爲假守”;任“假官”之後,任職者不能享受“真官”的秩級和待遇,即低秩級官員被臨時徵調以行使更高級別的職權却並沒有與之暫行的高職權對應的高秩俸。

第四,“假官”和“真官”職務的存廢。“假+職官名”是一個臨時名稱,而其中的“職官名”可分爲兩種情況:一是此前已產生的職官名稱,如相國、郡守、上將軍和皇帝;二是臨時確立或授予的名目,如反秦力量中的各種假王。“假官”就是基於“真官”的名目而加“假”字而來。

“假官”名稱一般祇會短時存在,事畢即撤銷,如曹參任“假左丞相”,事畢後便交還了相印。“假官”亦可能在代理“真官”職權期間與“真官”共存,但在原任“真官”返回或新任“真官”就職後,這種臨時代理亦會隨即結束。也有在“假官”代理行使“真官”職權一段時間後便轉任“真官”的情況,如韓信先爲“假齊王”,後劉邦封其爲“齊王”,王莽先爲“假皇帝”而後“即真天子位”。

此外,漢代“假司馬”和“軍假司馬”等軍職是“假+職官名”在漢代的發展,即“假”衍生出來副、貳的含義後與某些職官名稱固定而產生的,如《續漢書·百官志》所載之“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爲副貳”。

(四) 小結

經過對秦漢“守官”和“假官”資料的分析,在確定其各自性質的基礎上,對二者的性質和特征做了歸納,通過對比可以看出秦時“守官”和“假官”都是臨時代理,前者重在駐守官署而後者重在行使職權。秦時中央和地方各級行政機關普遍存在這種“守官”和“假官”的臨時代理現象,秦簡牘所見相關法律規範似可說明秦時各級官吏臨時代理的舉措已有實際的操作規範,而與漢代將試守或兼攝作爲職位晉升中的必要步驟的做法似有一定的區別。

附記:匿名審稿人對本文提出了專業而又富有建設性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論秦律的罪數處罰 ——以“嶽麓書院藏秦簡”為中心*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陳松長 溫俊萍

內容提要 秦律中關於罪數的處罰一般適用“累論”與“相逕”兩種方式。累論即積累論罪，即每一行為算一罪并且判一刑，然後積累論罪；“相逕”與“累論”相對，如果罪狀相及或者相關，數罪合并為一罪，僅判一刑。但是在一般適用原則之外也有特殊情況，本無關聯的犯罪行為以“相逕”論罪，或者相互關聯的行為却明確規定“不當相逕”，其中當論者是否“端為”對於案件的具體裁決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關鍵詞 秦律 相逕 累論 端為

罪數問題是指按一罪處罰還是數罪并罰的問題。關於罪數的處罰原則最早見於《二年律令·具律》中：“一人有數罪，以其重罪罪之。”^①後來《唐律疏議·名例》也有“二罪從重”處罰原則的規定，採用的都是吸收原則，即重罪吸收輕罪。^②因而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考察也主要集中在漢唐律中。秦律中是否有罪數處罰原則，一直無史可證。

《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中的“暨過誤失坐官案”提到了關於數罪處罰的兩種方法，即“累論”和“相逕”，第一次給我們提供了秦代實施數罪處罰的具體案例，為方便討論，先將釋文彙錄如下：

* 本文為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嶽麓秦簡與秦代法律制度”(11JZD013)的階段性成果。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22頁。

② 南玉泉：《論漢唐律的罪數與處罰》，《理性與智慧：中國法律傳統再探討》，中國法律史學會2007年學術研討會文集，2007年11月12日，234頁。

·敢瀝(讞)之:【丞】暨自言曰:邦尉下(?)□更(?)戌令,□誤(?)弗傳邦侯;女子蓄馬一匹,買(賣)。卿(鄉)遣……;①權;□谿卿(鄉)倉天窓(窗)容鳥;公士豕田橘將陽,未瘠(斤)自出,當復田橘,官令戌,掾(录)弗得;走偃未當傳,官傳弗得;除銷史丹爲江陵史,【簿】未定與從事;廿一年庫計,劾繆(謬)弩百。凡八劾。以羸(累)論暨。此過誤失及坐官毆(也)。相逕,羸(累)論重。謁瀝(讞)。

【視獄:廿一年】六(?)月(?)己未劾不傳(?)戌(?)令;其七月丁亥劾幹;其八月癸丑劾非(系);其辛未劾窓(窗);豕;其丁丑劾偃;廼十月己酉暨坐丹論一甲;其乙亥劾弩。言决(決)相逕,不羸(累)。它如暨言。却曰:不當相逕。暨言如前。詰暨:

“羸(累)論有令,可(何)故曰羸(累)重?可(何)解?暨曰:“不幸過誤失,坐官弗得,非敢端犯灋(法)令,赴隧以成私毆(也)。此以曰羸(累)重。毋(無)它解。”

它如前。問如辭(辭)。●鞫之:“暨坐八劾:小犯令二,大誤一,坐官、小誤五。已(已)論一甲,餘未論,皆相逕。”審。疑暨不當羸(累)論。它縣論。敢瀝(讞)之。吏議:“貲暨一甲,勿羸(累)。”②

暨是一位縣級屬官,他被控告有八項罪名,就是簡文中所說的“八劾”,最初“言决相逕,不累”,③後却曰:“不當相逕”,也就是以“累論”論處。對此,暨不服,提出上訴。暨在上訴的過程中提出“不幸過誤失,坐官弗得,非敢端犯灋(法)令,赴隧以成私毆(也)”,認爲處罰過重,請求上讞。

經郡部審理,認爲暨受到八次檢舉:“小犯令二,大誤一,坐官小誤五”。已經判處過貲一甲,其餘的沒有判處,并且都相互關聯,確鑿有據。

郡署屬官(或都吏)最後裁決:處暨貲一甲,不用累計,不當累論。

暨坐八劾分別是:因疏忽,未能將邦尉下達□更戌令傳於邦侯;有一女子有一匹馬,(違法犯令)將其賣了,鄉(嗇夫)派……;權;未覺察到糧倉的窗口有洞,鳥可以進去吃糧食;未及時核查豕的擅自離崗;未及時發覺偃不當傳籍;任命銷史丹爲江陵史,“丹”在未正式登記於江陵的簿籍之前便已經參與了江陵縣的政務;劾弩的時候被發現有一百張的誤差。

在這個案例中,暨不服“累論”的理由是這“八劾”之間相互關聯,如果以“累論”論處,判重了。最後的判決結果也是“勿羸(累)”。但是仔細分析這“八劾”的具體描述,實在難以看

① [德]史達:《嶽麓秦簡〈爲獄等狀四種〉新見的一枚漏簡與案例六的編聯》,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補充了J15一枚簡,將案例內容完善。

②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145-149頁。今根據陶安所著《嶽麓秦簡復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對釋文進行了修訂。

③ “言决相逕,不累”:整理者認爲是說判決相互關聯,不(應該)累論;黃傑認爲“言决”是一個固定用法,是說在向上級報告判罰時是采用“相逕”的判處方式,沒有數罪并罰。詳見黃傑《〈嶽麓書院藏秦簡(叁)〉釋文注釋商補》,《簡帛》第10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19頁。

出個中的具體聯繫。勉強地說,唯一的關聯就是這八劾都是其在擔任官職期間的失職所造成的,如果依此判定“八劾”本身存在實質性的聯繫就顯得十分牽強。為何最後的裁決結果也是相逕,勿累? 其中原因還是值得做一簡要分析。^①

該案件的判決,經歷了由“相逕”到“累論”再到“相逕”的曲折過程,可知秦律中關於罪數量刑的原則并非絕對明確,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搖擺空間。那麼,究竟什麼因素在數罪俱發的處罰原則上起着影響作用? 解決這個問題,還需要結合當時的具體司法適用來仔細探討。

《秦律十八種·效律》“爲都官及縣效律:其有贏、不備,物直(值)之,以其賈(價)多者罪之,勿贏(累)”。^② 也就是說都官和縣核驗物資財產時,如出現有超出或不足規定數額的情形,每種物品都應該單獨估價,然後按其中價值最高的來論罪,而不是把各種物品的價值累積在一起論罪。雖然這裏指的是物資的效核,與犯罪的性質有所不同,但也至少可以說明在當時確實存在着以“累論”論處這一司法適用規則。另外,也可以說明相關聯的犯罪行爲在論罪時,一般采用“相逕”,數罪并一刑,取其中處罰較重的一刑作爲量刑依據。《法律答問》“士五(伍)甲盜一羊,羊頸有索,索直(值)一錢,問可(何)論? 甲意所盜羊毆(也),而索係羊,甲即牽羊去,議不爲過羊”。^③ 士五(伍)甲盜竊了一只羊,但是羊的脖頸上有一根繩,繩價值一錢,對於甲的處罰應以不超過盜羊來議罪。其實在這一個案例中甲已經有兩種犯罪行爲,分別是盜羊和盜繩,但是甲的初衷是盜羊,盜繩是伴隨盜羊而發生的,二者相互關聯,再者盜羊和盜繩的罪名是相同的,也可以將此認爲是一罪,然後判處一刑,所以並沒有把盜羊和盜繩的贓值進行累積,在論罪的時候也要求以不超過盜羊的贓值來議罪。《法律答問》“把其段(假)以亡,得及自出,當爲盜不當? 自出,以亡論。其得,坐臧(贓)爲盜;盜罪輕於亡,以亡論”。^④ 假設某人攜帶借用的官有器物逃亡,如果是自首,就按照《亡律》的相關規定論處;如果被官府捕得,那麼將會有兩種罪名,即“盜”和“亡”,“盜”的處罰如果輕於“亡”,就以“亡律”的相關規定來論處。這樣看來,“盜”和“亡”是兩個不同的犯罪行爲,或是逃亡的時候無意攜帶了借用官府的器物,或是意欲將官府的器物據爲己有而逃亡,總之相互關聯。因而也沒有“累論”論處,而是“相逕”并且以一重罪來處罰。

由此,秦律對罪數的認定規則應該是依據行爲所觸犯罪名的不同,而不考慮犯罪者的主觀意圖,也就是說形式上成立數罪即可。確定罪數以後,在具體的處罰過程中,纔會考慮行

① 張伯元認爲秦王政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兩年中,秦攻燕,魏亡,李信、王翦伐楚。戎馬倥傯、兵事不斷。在這種非常時期,糧倉、箭弩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資源,因而當是屬於特殊時期的特殊關聯。詳見張伯元《“累論”與數罪并罰》,《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8輯,52頁。

②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壹)》,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143頁。

③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壹)》,194頁,改釋繫爲係。

④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壹)》,233頁。

爲之間的關聯性，也就是說不同的犯罪行爲俱發，且罪行之間相互關聯，一般是以“相逕”論處，然後取一重罪來處罰。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後世一直適用的“數罪并罰”原則至少在秦已經開始孕育。那麼，犯罪行爲之間如果并無關聯，究竟該如何處罰呢？

《法律答問》“誣人盜直(值)廿，未斷，有(又)有它盜，直(值)百，乃後覺，當并臧(贓)以論，且行真臯(罪)、有(又)以誣人論？當貲二甲一盾”。^①如果最後的處罰是并臧以論，事實上當時并不存在“貲二甲一盾”之類的法定刑，^②顯然是將其分爲兩種不同的犯罪行爲即“盜”和“誣”。《法律答問》“告人盜百一十，問盜百，告者可(何)論？當貲二甲。盜百，即端盜駕(加)十錢，問告者可(何)論？當貲一盾。貲一盾應律，雖然，廷行事以不審論，貲二甲。”^③端盜駕(加)十錢，貲一盾應律，根據《盜律》^④的相關規定，盜廿錢貲一盾，誣人反坐，故貲一盾是對“誣人盜直(值)廿”的處罰，“貲二甲”則是對盜直(值)百的處罰。所以，在這個案例中，將“盜”和“誣”兩種犯罪行爲“累論”論處。

還有《法律答問》“上造甲盜一羊，獄未斷，誣人曰盜一豬，論可(何)毆(也)？當完城旦”。^⑤“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完爲城旦舂”可以看出其將“一羊”和“一豬”的贓值進行了“累論”，處罰爲“完爲城旦舂”。

當然以上所述爲數罪俱發時的一般處罰規則，但是這種處罰原則並沒有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因而在具體實行的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例外情況，比如本無關聯的行爲以“相逕”論罪，或者本該“相逕”的罪行却明確規定“不當相逕”，其中應當是有其他的因素影響裁決。

首先以“暨過誤失坐官案”爲例來分析：“暨坐八劾：小犯令二，大誤一，坐官小誤五。已論一甲，餘未論，皆相逕。審。疑暨不當羸(累)論。它縣論，敢奏讞之。吏議：貲暨一甲，毋羸(累)。”如此，暨共有八劾，小犯令二、大誤一、因做官而連坐的小誤五。而且，他任命銷史丹爲江陵史，“丹”在未登記於江陵的簿籍之前便已經參與了江陵縣的政務，因此連坐被處以貲一甲的懲罰。

上文提到這“八劾”本身實在難以看出其中的具體聯繫，唯一可以確認的共同點就是皆爲其在擔任官職期間的失職所造成的“過誤失”。對此暨在上訴的供詞中提到“不幸過誤失，坐官弗得，非敢端犯灋(法)令，赴隧以成私毆(也)。此以曰羸(累)重。毋(無)它解”。對於何謂“過誤失”，嶽麓書院藏秦簡的整理小組云：過誤失，疑爲過失和誤失，分別與後文的“小犯令”和“大/小誤”相對應。“過”似指因不遵守法令即所謂“犯令”“廢令”^⑥而造成的失

①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壹)》，200頁。

② 堀毅：《秦漢法制史論考》，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253頁。

③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壹)》，196頁。

④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16頁。

⑤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壹)》，201頁。

⑥ 《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可(何)如爲‘犯令’‘法(廢)令’？律所謂者，令曰勿爲，而爲之，是謂‘犯令’；令曰爲之，弗爲，是謂‘法(廢)令’毆(也)。

當;“誤”則指寫錯、數錯等技術性錯誤,“誤”又以失當之輕重分為“大誤”“小誤”。《嶽麓秦簡·賊律》“爲券書,少多其實,人戶、馬、牛^①以上,羊、犬、彘二以上及諸誤而可直(值)者過六百六十錢,皆爲(1244)大誤;誤羊、犬、彘及直(值)不盈六百六十以下及爲書而誤、脫字爲小誤。小誤,貲一盾;大誤,貲一甲”(1246+1395)。^②如此“誤”爲寫錯這一技術性錯誤而造成的貲財損失,且“大誤”與“小誤”之分水嶺是直(值)是否過六百六十錢。綜上,不管是由“過”還是“誤”造成的失當結果,對於行爲的主體來說,他們肯定熟知失當結果所受的貲罰,必不會故意爲之,而都應是無意的行爲,或者是無奈選擇的結果。如《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失期”^③“失火”^④等結果,斷然都不是故意而爲之的。

《法律答問》中記錄:士五(伍)甲盜,以得時直(值)臧(贓),臧(贓)直(值)過六百六十,吏弗直(值),其獄鞫乃直(值)臧(贓),臧(贓)直(值)百一十,以論耐,問甲及吏可(何)論?甲當黥爲城旦;吏爲失刑罪,或端爲,爲不直。^⑤吏如果在捕獲甲時對其贓值進行估計,值過六百六十,但是其在審訊時才估算,值百一十,如此,吏爲失刑,也就是用刑不當;緊接着就強調,如果吏端爲,也就是故意如此的話,吏的罪名就是“不直”,辦案不公。“失刑”與“不直”這兩個罪名之間的區別就是是否“端爲”。“甲告乙盜牛若賊傷人,今乙不盜牛、不傷人,問甲可(何)論?端爲,爲誣人;不端,爲告不審。”^⑥同樣“端爲”在對於甲的裁決中也起到了關鍵作用。

那麼,在“暨過誤失坐官案”中,暨共有八劾,都也是“過誤失”,“非敢端犯法令”,所以,最後對其的處罰也是毋累論;如果暨是“端爲”,故意“犯令”,等待他的可能就是“累論”。因而,是否是故意行爲所造成的失當結果,可能是“數罪問題”處罰所依據的一個重要標準。

再看《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一條令文:

廿七年三月乙卯御史言:留書,數書同日偕留,皆犯令毆。其當論者,皆不當相還,其駕(加)者亦不當相還,及皆不當與它論相還,及論獄失者,其同獄一鞫,有數人者,皆當人坐之。^⑦

根據《秦律十八種》和《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行書律》^⑧規定,行書不急者,都要求日畢,勿

① 此處或抄漏了“一”字。

②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142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徭律》:“失期三日到五日,誅;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

④ 《睡虎地秦墓竹簡·內史雜》:“有不從令而亡、有敗、失火,官吏有重罪,大嗇夫、丞任之。”

⑤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壹)》,196頁。

⑥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壹)》,198頁。

⑦ 正在整理中的釋文,待刊布。

⑧ 《秦律十八種·行書律》:“行命書及書署急者,輒行之;不急者,日晡(畢),勿敢留。留者以律論之。”《嶽麓書院藏秦簡·行書律》:“行書律曰:傳行書,署急輒行,不輒行,貲二甲。不急者,日晡(畢)。留三日,貲一盾;四日【以】上,貲一甲。二千石官書不急者,毋以郵行。”

敢留，留書就要按律論罪。“數書同日偕留”當是屬於“留書”中比較嚴重的一種特殊情況，“皆犯令毆（也）”說明行書的過程中滯留其中的任何一件文書，都屬於犯令行爲。一日留一書或者留數書都屬於“留書”犯令行爲，依據當時一般的處罰原則，相關聯的犯罪行爲是可以“相還”按一罪來論處的，但令文却明確規定不當“相還”。

“其駕（加）者亦不當相還，及皆不當與它論相還”。《嶽麓書院藏秦簡·行書律》規定“留三日，貲一盾；四日【以】上，貲一甲”。^①《興律》規定“其非乏事【毆（也），及書已具】□留弗行，盈五日，貲一盾；五日到十日，貲一甲；過十日到廿日，貲二甲；後有盈十日，輒駕（加）一甲”。^②其駕（加）者當是指留書的日期滿足以上得任何一條，當駕（加）罪時也不能相還；另外，和當論者的其他犯罪行爲也不能相還，而是要累積論罪。

令文中還有一種情況也規定了不能相還“論獄失者，其同獄一鞫，有數人者，皆當人坐之”，即吏在獄鞫同一案件的過程中有失刑，而此案件的當論者又不止一人，那麼論吏的罪時，也不當相還，而應該“人坐之”；也就是說在判決過程中吏對一人有失刑就該論一罪，然後累積論罪。

以上所述，無論是“留書”還是“失刑”的相關事件，本該“相還”論處，而令文却明確規定“不當相還”。其中原因，除了所行文書的特殊性亦或說所鞫獄案件的特殊性之外，應還有其他原因。

根據秦《行書律》的相關規定，留書，本就是犯令；數書偕留，就屬於比較嚴重的犯令情況。一日留一書，可能是相關官吏的疏忽導致的失誤，那麼一日之內數書偕留呢？除了工作的疏忽之外，相關官吏的消極怠工或者擅離崗位等人爲因素也應該考慮，很可能就是“端爲”導致了這一比較嚴重的犯令行爲，因而本是該相還的行爲，却規定“不當相還”。再者，在吏鞫獄的過程中，同一案件，對數人的裁決“失刑”，除了工作疏忽，對相關法律規定不熟知等，是否還應考慮故意爲之的因素呢？也就是說很可能正是當論者的“端爲”導致了違法犯令行爲，才使得令文明確規定“不當相還”。

這樣看來，秦律中關於罪數的處罰原則在嚴格的法律規制之外，存在着一定的闕漏。在這一類犯罪行爲的具體裁決過程中，主觀因素起着決定性地作用。發展到西漢，這種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大，“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③就是最好的證明。

①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131 頁。

②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147 頁。

③ 《漢書》卷五《景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148 頁。

稅田與取程：秦代田租征收方式蠡測^{*}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王 勇

內容提要 通過對秦簡中“稅田”的考察，結合秦代田租征收中採用了“取程”的形式判斷，在由勞役地租到分成租的變革中，秦的做法是從總農田中劃出部分稅田做為農田產量的採樣標本，根據稅田產量確定“程”，作為計算同類作物產量的基本單位，以此為標準對其餘農田征收田租。

關鍵詞 稅田 程 田租征收

秦代征收的田地稅包括田租與芻稾。其中芻稾的征收方法，睡虎地秦簡《田律》明確記載：“入頃芻稾，以其受田之數，無狃（墾）不狃（墾），頃入芻三石、稾二石。”但關於田租的征收，目前尚沒有發現明確的法律條文。學界過去普遍認為秦代田租與西漢一樣，是根據實際耕種畝積，結合政府估定的正常年份平均畝產量，按照法定的比率確定固定租額征收；或者認為與芻稾的征收方式一樣，採用“以頃計征”。近年來彭浩先生提出一種新的看法，認為秦代征收田租是從農戶耕種的農田中劃出一部分做為“稅田”，比例大致是總面積的十分之一，稅田的全部收成就是田租。^① 這一看法得到很多學者認同，被認為是秦代征收田租的普遍做法，至少是法定的方式之一。^② “稅田”見於里耶秦簡、嶽麓秦簡《數》與張家山漢簡《算數書》

^{*} 基金項目：教育部留學回國基金項目“出土文獻與秦漢農業研究”（教外司留 2015311 號）階段性成果。

^① 彭浩：《談秦漢數書中的“輿田”及相關問題》，簡帛網，2010 年 8 月 6 日

^② 于振波：《秦簡所見田租的征收》，《湖南大學學報》2012 年第 5 期；孫銘：《簡牘秦律中的田租征收事務》，《農業考古》2014 年第 6 期；臧知非：《說“稅田”：秦漢田稅征收方式的歷史考察》，《歷史研究》2015 年第 3 期。

等出土文獻，但筆者研讀後覺得，這些材料并不足以支持這種新的看法，故在此提出淺見，求教於方家。

“稅田”在嶽麓秦簡《數》與張家山漢簡《算數書》的租稅類算題中多次出現，與之相對應的概念是“輿田”。這些算題中輿田的田租都是按照總產量的一定比率計算，稅田的田租則是按照總產量計算。嶽麓秦簡《數》中又有題曰：“租誤券。田多若少，藉令田十畝，稅田二百卅步，三步一斗，租八石。·今誤券多五斗，欲益田，其述（術）曰：以八石五斗爲八百。”（簡 0939）^①十畝田中劃出稅田二百四十步，稅田與耕地的比例爲 1:10，與戰國時期通行的十一之稅也是一致的。數學算題的設計不可能完全虛構，而是會依據實際情況，這些算題似乎能夠體現秦代田租征收中，存在按一定稅率從總農田中劃出部分稅田而取其全部產出的方式。

那麼，這會不會是秦代田租征收的普遍方式？這種可能性應該不大。我們可以來看嶽麓秦簡《數》中輿田田租的計算方法。按照學者理解，輿田是指登記在圖、冊上的土地，也就是符合受田條件者得到的土地。^②輿田在《數》中分別出現於 7 例租稅類算題和 2 例術文中。但是這些算題與術文中的輿田田租，祇有一例可能採用了先確定稅田數量，然後計算稅田產量的方式。即簡 1653：“禾輿田十一畝，[兌]（稅）二百六十四步，五步半步一斗，租四石八斗，其述（術）曰：倍二[百六十四步爲]……”文中的“[兌]（稅）”字迹模糊，整理者是根據筆劃痕迹和算題內容判斷爲“兌”。而其餘諸例都是直接從農田總面積起算，然後按租率確定稅額。這反映出秦代田租征收中，根據農田總產量與法定比率確定田租應該纔是最普遍的做法。當然，如果認爲《數》中的稅田田租算題體現的是秦代田租征收中從總農田中劃出稅田之後的步驟，則反映以稅田所產全部做爲田租的算題還是有相當比例的。這就牽涉到對於稅田的理解，這個問題稍後再論述。

如果不是普遍做法，秦代田租征收是不是可能存在兩種不同的征收方式？這同樣是有疑問的。嶽麓秦簡《數》和張家山漢簡《算數書》租稅類算題中有部分租誤券的例子。除了上引簡 0939 外，還有：

禾兌（稅）田卅步，五步一斗，租八斗，今誤券九斗，問幾可（何）步一斗？得曰：四步九分步四而一斗。述（術）曰：兌（稅）田爲實，九斗（簡 0982）爲法，除，實如法一步。（簡 0945）《數》

租禾。稅田廿四步，六步一斗，租四斗，今誤券五斗一升，欲與□（簡 0817）□[步

①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貳）》，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4 頁。下引嶽麓秦簡《數》簡文均出自該書。

② 彭浩：《談秦漢數書中的“輿田”及相關問題》。

數],幾可(何)步一斗?曰:四步五十一分步卅六一斗,其(簡 1939)以所券租數爲法,即直(置)與田步數,如法而一步,不盈步者,以法命之。(簡 0816)《數》

今臬兑(稅)田十六步,大臬高五尺,五步一束,租五斤。今誤券一兩,欲與步數,幾可(何)一束?得曰:四步八十一分七十(簡 0788)六一束。欲復之,復置一束兩數以乘兑(稅)田,而令以一爲八十一爲實,亦[令所與步一爲八十一,不分者,從之以爲](簡 0775)法,實如法一步。(簡 0984)《數》

稅田 稅田廿四步,八步一斗,租三斗。今誤券三斗一升,問幾何步一斗。得曰:七步卅七〈一〉分步廿三而一斗。術(術)曰:三斗一升者爲法,(簡 68)十稅田爲實。令如法一步。(簡 69)《算數書》

誤券租禾誤券者,術(術)曰:毋升者直(置)稅田數以爲實,而以券斗爲一,以石爲十,并以爲法,如法得一步。其券有[斗]者,直(置)與(與)(簡 93)田步數以爲實,而以券斗爲一,以石爲十,并以爲法,如法得一步。其券有升者,直(置)與田步數以爲實,而以(簡 94)券之升爲一,以斗爲十,并爲法,如·[法]得一步。(簡 95)《算數書》

租吳(誤)券 田一畝租之十步一斗,凡租二石四斗。今誤券二石五斗,欲益與其步數,問益與幾何。曰:九步五分步三而一斗。術(術)(簡 96)曰:以誤券爲法,以與田爲實。(簡 97)《算數書》

這些誤券所涉及的都是稅田田租。^① 稅田田租是按照田畝總產量計算,相對於需要根據田畝總產量和一定比率共同計算的與田田租,計算過程當然更爲簡單一些。如果算題設計依據實際情況,相對複雜而更容易出錯的與田田租應該更可能出現誤券。這是讓人疑惑的地方。而更讓人疑惑的是算題所體現出來的對於稅田租券出錯後的處理方式。租券有誤寫,不是修改錯誤,而是“欲益與其步數”,即增減征收標準,來求得應收田租與實際田租的吻合。如上引最後一例,征收標準本來是“十步一斗”,一畝二百四十步,租應爲二百四十除以十乘以一,等於“二石四斗”。現在因爲誤寫成“二石五斗”,於是將征收標準改爲“九步五分步三而一斗”,那麼二百四十除以九又五分之三乘以一,等於“二石五斗”。這些誤券的例子中,祇有《數》簡 0939 算題不是通過“益與步數”使應納田租額與誤券相一致,而是在“誤券多五斗”的情況下“欲益田”。《數》簡 0939 惜不完整,不過這裏的“益田”很可能祇是“益與步數”的另一種表達方法。《數》有題:“爲積二千五百五十步,除田十畝,田多百五十步,其欲減田,藉令十三斗,今禾美,租輕田步,欲減田(簡 0813)令十一步一斗,即以十步乘十畝,租二石者,積二千二百步,田少二百步。(簡 0785)”可見,題中所謂“減田”事實上就是將田租征收標準從“十三步一斗”調整到了“十一步一斗”,即征收一斗的農田減少二步。如果上

① 這些算題中祇有最後一例沒有明確說是稅田,但這裏“田一畝……凡租二石四斗”,“二石四斗”應該是“田一畝”的總產量。

述對誤券的理解正確，而且相信其反映社會現實，那就意味着在征收田租時可以任意提高或壓低征收標準，徇私舞弊、接受賄賂都不用擔心沒有合理的藉口，提倡“以法治國”的秦朝統治者絕不可能允許這種不合理現象的存在。既然如此，以往對於稅田的認識可能有不全面的地方。

二

里耶秦簡 8-1519 是遷陵縣一份有關田租征收的文書，其中也提到了稅田：

遷陵卅五年𡗗(墾)田與五十二頃九十五畝，稅田□頃□□

戶百五十二，租六百七十七石，率之，畝一石五；

戶嬰四石四斗五升，奇不率六斗。（正）

啓田九頃十畝，租九十七石六斗。六百七十七石

都田十七頃五十一畝，租二百卅一石。

貳田廿六頃卅四畝，租三百卅九石三。

凡田七十頃卅二畝·租凡九百一十。（背） 8-1519^①

文書中的墾田與是遷陵縣當年新開墾的農田，總數五十二頃九十五畝。稅田畝數不清，但如果稅田的全部收成即是田租，按照這部分新墾農田共計收租六百七十七石及“畝一石五”計算，稅田應為四頃五十一畝。有學者識別出“稅田□頃□□”中“頃”前一字為“四”，與計算出來的數據一致，^②反映出這種推算是合理的。簡文背面是遷陵各鄉的數據，啓陵墾田九頃十畝，都鄉墾田十七頃五十一畝，貳春墾田廿六頃卅四畝，合計五十二頃九十五畝，與正面第一行的墾田總數相等；啓陵田租九十七石六斗，都鄉田租二百卅一石，貳春田租三百卅九石三，合計六百七十七石九斗，與正面第二行的田租總數接近。但是，在遷陵三鄉各自的數據中並沒有包括稅田數量。里耶簡 8-1519 是遷陵縣卅五年的田租統計，最重要的當然是全縣總數，而非各鄉明細。但是文書背面既然列出各鄉的與田數與所得租量，這些數據肯定不會沒有意義，這可能與方便上級部門對所征田租的核對有關。不管各鄉上報的統計文件中是否另有該鄉的稅田數及相關數據，這件文書中各鄉數據有“與田數”而無“稅田數”的事實，已經能夠說明與田數與田租關係更為直接。如果秦代征收田租是從農戶耕種的農田中劃出一定數量的稅田，然後以稅田的產出作為田租，那麼相對於農田總數，稅田數量與田租的關係應該更為直接。然而有關部門在彙報各鄉田租征收情況時，却強調農田總數而完全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75 頁。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345 頁。

不提及稅田數量,似乎有點不合情理。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文書在列出遷陵縣的墾田數、稅田數、戶數後,便是“租六百七十七石,率之,畝一石五”。這裏的“畝一石五”顯然不是針對墾田,因為數據不吻合,祇能是針對稅田。而由“稅田若干頃,租若干石,率之,畝若干”這一表述,筆者推測稅田的主要作用可能在於估算單位面積的平均產量,用做該地區田租征收的產量依據。春秋戰國時期的地稅變革,總的趨勢是廢除助耕公田的勞役地租,在把田地分配給耕者,發展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個體農業經營的基礎上,推行分成制的實物地租。然而,如果嚴格遵循統一的分成比例,勢必要逐一核實各戶農田產量,從而形成浩繁的稅收稽管負擔,這是任何政府機構都難以承受的。因此,從田租征收的現實需要出發,官府必須簡化征收的具體程式。例如漢代田租征收,《鹽鐵論·未通》記載“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可見名義上是分成,實際采取的却是不分肥瘠不分豐歉的定額稅率,至於當時稅畝定額的確定,也是簡單取數年間的平均產量。稅田的出現,同樣應該與簡化田租征收程式有關。

從龍崗秦簡的記載看,秦代田租的征收過程中採用了“取程”的形式,簡文中多次提到程、程租、虛租、敗程、遺程、匿田等內容。在嶽麓秦簡《數》與張家山漢簡《算數書》的租稅類算題中,“程”是計算田租的基本單位,通常表述為“若干步一斗”,即收穫一斗糧穀所需要的步數。以程為標準,可以將若干步的畝換算成若干程,程數與一斗之積即是該塊農田的田租。當然,這是針對稅田而言,如果是輿田,則還要在此基礎上乘以征收比率。學者指出:“以‘若干步一斗’的方式計算田租率有以下幾種方便之處:首先,一斗是一個整數,容易計算;其次,一斗所合土地的步數(程)較小,容易計算小塊土地的田租率。”^①“取程”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田租征收,但“程”的確定也變得非常重要。睡虎地秦簡《倉律》規定“程禾、黍□□□□以書言年,別其數,以稟人”,可見程要依據年成豐歉確定。《數》與《算數書》的算題顯示,秦代不同作物有不同的程,同一作物的不同品種有不同的程,同一作物品種的程也是有區別的,而且程的步數可以“益粟”,也就是說並沒有統一的標準。在實際田租征收中,“程”的確定很可能就是根據當地稅田的產量。

嶽麓秦簡《數》有則計算臬田田租的術文:

為臬生田,以一束兩數為法,以一束步數乘十五,以兩數乘之為實,實如法一步。臬步數之述(術),以稅田乘(簡 0952)一束兩數為實,租兩數為法,如法一步。(簡 0758)

這裏的“一束步數”即臬田的程。臬是大麻雄株,纖維用於織麻布。因為用途不同,臬田

^① 楊振紅:《從新出簡牘看秦漢時期的田租征收》,《簡帛》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31-342頁。

的程採用“若干步一束”，而不同於一般糧食作物的“若干步一斗”。術文前半部分是已知泉田的田租重量、一束步數（程）、一束重量，求泉田面積。之所以要“乘十五”，是因為泉田按產量的十五分之一課稅。^①可見這是關於泉與田的租稅計算公式。術文後半部分是已知稅田面積、一束重量、田租重量，求一束步數（程）的公式。值得注意的是，這裡“與泉步數之術”，根據術文所指，似乎要“與”的是前半部分泉與田的一束步數，而術文的計算，依據的却是泉稅田的產量數據。即便術文前後兩部分可能並沒有直接關係，“與泉步數之術”也明顯表現了泉田“程”的確定需要以稅田為根據。這可能就是與田與稅田在現實中的區分。

由於同一地區自然條件相同，儘管年成有豐歉，通常情況下，祇要付出的勞力相當，同種作物在相同年份的單位面積產量不會有大的差異。根據稅田產量來確定“程”，然後將之做為標準用於同類作物的田租征收，而不是逐一核實農田產量，是官僚行政管理理性化追求的體現。

三

結合上述對於稅田的理解，對於秦代田租的征收方式可以得出進一步的認識。《商君書·墾令》稱“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說明秦代田租征收是與農戶占有的田畝面積和畝產量直接相關的。農戶占有的田畝面積相對固定，政府將之登記在簿籍上，每年祇需根據新墾農田與農田轉讓情況進行調整，並不十分繁瑣。而畝產量因為土地、作物的不同，氣候條件的變化，年年都有區別，而且量非常大，每年逐一核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秦代的做法是從總農田中劃出部分稅田作為農田產量的採樣標本，根據稅田產量確定“程”，作為計算同類作物產量的基本單位，以此為標準對其餘農田征收田租。於是對作為田租征收基礎的農田產量的核對，就轉化為對部分稅田產量的掌握，工作量大大減少了。^②

“程”是用來計算農田產量的，由於不同地區作物產量存在差異，程沒有全國統一的標準。但程的適用範圍太窄，也會削弱作為樣本的意義。秦代田租征收中，程最可能是以鄉為單位。里耶秦簡 8-1519 遷陵縣田租征收文書中，啓陵、都鄉、貳春的畝均田租各不相同，各鄉農田產量不同可能是主要因素，文書的彙報內容反映出鄉在當時是相對獨立的納稅統計單位。影響農業產量的有天、地、人三方面的因素。一鄉之內由於地勢、肥瘠、灌溉等條件的不同，土地所產當然可能存在差別。但是對於“天時”，祇能主動順應，“地利”，包括地勢、肥

① 嶽麓秦簡《數》里的每一例“泉與田”算題都是取十五分之一的租率。肖燦：《從〈數〉的“與（與）田”、“稅田”算題看秦田地租稅制度》，《湖南大學學報》2010 年第 4 期。

② 由於對里耶簡所見民戶籍簿理解不同，部分學者認為秦始皇統治時期遷陵縣戶口不超過 200 戶，而且秦漢時期確實有部分偏遠地區的縣戶口不多，在這種情況下，逐戶確定產量並非不可能。但遷陵縣戶口數量學界尚無一致意見，國家制度的設計也必須面向最普遍的情況，而非顧及個別特例。

瘠、灌溉等,却可以通過人工進行選擇與改變。因此一鄉範圍內以同一稅率征收田租是可能的,事實上還能促使農民改良農田、提高產量,這應該也是秦統治者所希望的結果。龍崗秦簡中有枚關於程田的簡:“程田以爲臧(贓),與同灋(法)。田一町,盡□盈□希□。”(簡133)學者指出:這枚“程田”簡與龍崗簡中其他關於“程”“程租”“租”以及“匿田”的簡,“應是針對鄉部嗇夫、部佐等鄉官部吏征收田租制定的專門法律”。^①可見,確定程的工作可能由鄉官部吏組織進行,同樣稅田的劃分也應該是他們的任務。由於程的適用範圍爲鄉,因此每個鄉都要有用於各自取樣的稅田,而且本地種植的不同作物也都要分別劃分稅田。嶽麓書院藏秦簡《爲吏治官及黔首》有“部佐行田,度稼得租”。^②部佐“度稼”,在核查墾田數的同時,應該也包括登記農田種植的作物。這樣在“程”確定後,就可以在倉庫坐等農戶前來繳納田租。

稅田產量是確定程的標準,既關係到政府租稅的實現,又關係到農戶的田租負擔,應該會有一套嚴格的管理程式,至少其收穫與上繳的過程會有官府派人監管或組織人力統一收取,以防止農戶隱瞞產量的情況。因此稅田儘管非常普遍,數量却不能劃得太多,否則基層官吏稅收稽管的任務還是會很繁重。里耶秦簡8-1519田租征收文書反映,遷陵縣卅五年新墾田五十二頃九十五畝,其中稅田經計算,大致是四頃五十一畝,稅田約占墾田總數的8.52%。這個比重很可能是偏大的。因爲新開墾的農田產量是比較低的,不可能采用根據熟田產量確定的“程”,這部分農田的產量必須單獨核算。一般而言,每個鄉當年新墾農田的數量所占比重不會太大,單獨取樣不見得是最便捷的做法,而且取樣的結果不具有延續性。筆者猜想,新墾農田可能根本就沒有采用取程的方法,而是直接根據田租率劃出相應比例的農田做爲稅田,將稅田全部產出做爲田租。

一般熟田劃分稅田時,出於節省稅田所在農田田租征收步驟的考慮,同樣可能采用根據田租率的相同比例從農田中劃分稅田的辦法。在這種情況下,稅田的產量也就是其所在農田的田租,嶽麓秦簡《數》與張家山漢簡《算數書》算題中租的數字有時表示的其實就是產量。然而這種情況的存在,並不足以表明劃分稅田而收取其全部產出構成了秦代田租征收的方式。稅田的主要目的還是確定田租征收標準。秦代田租征收前,對於農田產量會根據常年收成有預先的判斷,這可能是爲了做好財政開支的預算,但最終會根據以稅田爲代表的實際產量進行征收。上引嶽麓秦簡《數》算題“藉令十三斗,今禾美,租輕田步,欲減田令十一步一斗”,即體現了這種實際情況。由於當年“禾美”,農田產量高於往年,收穫一斗所需農田面積要低於預計的十三步,所以根據實際產量將“程”調整到了十一步一斗。這也就可以解釋前面提出的疑問了。嶽麓秦簡《數》和張家山漢簡《算數書》租稅類誤券算題涉及的都是

① 楊振紅:《龍崗秦簡諸“田”、“租”簡釋義補正——結合張家山漢簡看名田宅制的土地管理和田租征收》,《簡帛研究二〇〇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79-98頁。

②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113頁。

稅田，而且是通過增減每程的步數使得田租標準與實際的征收數量相吻合，不是說明官吏在征收田租時可以任意提高或壓低征收標準，而是必須根據當年稅田的實際產量來確定田租征收中要採用的標準，同時將之與預計標準進行比較，以提高來年預算的準確性。至於遷陵縣在彙報下屬各鄉田租征收情況時，祇彙報農田總數與田租數，而沒有稅田數量，原因也不言而喻了。

張家山漢簡《算數書》成書年代的下限是西漢呂后二年，但算題的形成年代並不一致，許多算題都是出自戰國時期的秦地。^① 而在《算數書》之外，西漢文獻中並沒有稅田與程租的痕跡，反映出秦代與西漢在田租征收方式上存在很大差異。通過稅田與取程，秦代對田租征收程序有所簡化，但在實際中仍然堅持了分成租，對不同地區的農田、種植不同作物的農田、不同豐歉年份的農田根據產量區別對待。西漢田租雖然原則上仍是分成租，實際却是根據常年產量確定田租額，採用統一定額租。這種做法當然進一步簡化了田租征收程式，而且看上去相當公平，却因為忽視了百姓的支付能力，而容易導致《鹽鐵論·未通》中文學所批評的“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現象。

① 彭浩：《張家山漢簡算數書注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4-5 頁。

秦簡所見“巫咸”兩考*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王 强

內容提要 巫咸是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出土文獻中多見記載。本文認為里耶秦簡與放馬灘秦簡中的“巫帝”所指可能為巫咸。放馬灘秦簡中的“巫帝陰”應該連讀作“巫帝咸”,是對巫咸的一種特殊稱謂。睡虎地秦簡《日書》中兩見“巫堪”,很可能是巫咸的一種異寫。

關鍵詞 秦簡 巫咸 放馬灘 睡虎地

巫咸是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文獻記載中既是治國有方的良臣,又是通徹天地的神巫,還是出色的天文學家。關於其生活年代、形象演變乃至籍貫、性別等都不乏研究。在研讀出土簡帛的過程中,筆者發現有幾處鬼神名可能是巫咸的異稱或異寫,見於放馬灘秦簡和睡虎地秦簡。敬請專家批評指正。

一 放馬灘秦簡的“巫帝陰”

先將整理者釋讀的簡文抄錄如下:

占病祟:除(餘)一天毆,公外;二[地],社及立(位);三人鬼,大父及殤;四[時],大過及北公;五音,巫帝、陰、雨公;六律,司命、天□;七星,死者;[放乙 350]八風,相、菟

*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簡帛學大辭典(項目批准號:14ZDB027)”的階段性成果,並得到“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博士創新資助項目”資助。

者；九水，大水毆。〔放乙 192〕

據程少軒先生研究，這段內容是根據餘數占卜致人生病的作祟鬼神。^① 古代先民長期將疾病災異的原因歸結為神靈鬼怪作祟，如《論衡·辨祟篇》云：“世俗信禍祟，以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歡笑，皆有所犯”。簡文正是這種思想的體現。簡文中出現的鬼神名，有的見於傳世古書，有的見於其他出土文獻，還有一部分則首次出現、含義不明，如“大遏”“公外”“相”“莨者”以及我們下面要討論的“巫帝陰”等。

晏昌貴先生將五音之後的鬼神斷讀為“巫帝、陰雨公”而無說。^② 而在給程少軒先生的回信中則指出“‘巫帝’‘雨公’皆可考”，^③但同樣沒有作詳細考證說明。程先生後來對此作了補充論述，他說：

“巫某”古書常見，“巫橐一帝？”可能也是一位神巫的名字。《三合卦占》“靈巫”凡兩見，恐與此“巫橐”有關。倘“橐”確是“帝”，它也有可能是《山海經·大荒西經》的“巫抵”：“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暴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抵為端母脂質部，帝為端母支錫部，兩部古音相近。放馬灘簡有時稱“日失”，睡虎地秦簡作“日虎”，上博簡篇題“容成氏”即“容成氏”，“虎”與“失”、“氏”與“氏”皆是脂質部與支錫部相通之例。古書“氏”“氏”又多混同，“抵”係“抵”之誤也不一定。群巫恰在“靈山”之上，與前舉“靈巫”合。當然“巫帝”也可能就是簡單指群巫之首。“雨公”當即“雨師”，為司雨之神。“陰”，文獻中一時找不到可能對應之鬼神，但既名“陰”，無非有“陰間之神”“北方之神”“月亮之神”等可能。而“陰”屬“五音”，我們推測恐與“音”“陰”諧音有關。^④

“巫抵”即巫帝的觀點最早由丁山先生提出，但沒有詳細討論。^⑤ 程先生認為“陰”與“音”諧音有關的意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缺少具體的例證。因此這兩個觀點，至少在今天看來都很難讓人信服。不過程先生認為“‘巫帝’也可能就是簡單指群巫之首”則頗具卓識。《里耶秦簡(壹)》一書著錄第八層第 461 號大木方，^⑥內容為秦統一後的更名記錄，其中一條內容為“毋敢謂巫帝曰巫”，意思是從今以後禁止再用“巫帝”的稱呼，而要改稱“巫”。對此游逸飛先生認為：

① 程少軒：《放馬灘簡式占古佚書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169 頁。

② 晏昌貴：《天水放馬灘秦簡乙種〈日書〉分篇釋文(稿)》，《簡帛》第 5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8 頁。

③ 參見程少軒《放馬灘簡式占古佚書研究》，170 頁。

④ 程少軒：《放馬灘簡式占古佚書研究》，170-171 頁。

⑤ 此點蒙程少軒先生提示。丁說見其著《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3，196 頁。

⑥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68 頁。

“巫帝”一詞前所未見，當為“巫中之帝”，指群巫之長，即“大巫”。《漢書·地理志》記載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巫帝”也許為楚國所獨有。秦始皇自稱皇帝，又禁止巫者稱“帝”，無疑想獨占“帝”的名號。^①

其說大致可從，祇是從放馬灘秦簡看，“巫帝”似并非楚國所獨有。^② 但可以肯定的是，歷史上確實存在過“巫帝”的稱呼，後由於秦代改制纔棄而不用。

孫占宇先生據此將前文所論鬼神名斷讀作“巫帝、陰、雨公”。^③ 新近出版的《秦簡牘合集》沿襲了這一意見。不過問題并未解決，“雨公”固然容易理解，可以不論，但是“巫帝”和“陰”的具體含義為何，皆需進一步探討。後世文獻中有眾多巫者，學者對此有研究，^④而有資格加尊號為“巫帝”的，我們認為可能性最大的應該就是巫咸。

其實巫咸稱巫帝，文獻中雖無明文記載，但還是有一些蛛絲馬迹可尋。《說文·巫部》云：“古者巫咸初作巫。”《史記·封禪書》云：“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⑤之興自此始。”又言“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司馬貞《索隱》云：“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漢書·郊祀志》顏師古注：“巫先，巫之最先者也。”巫咸在這些文獻中都被視為巫之始祖。其生時既為群巫之首，不難想像死後很容易成為生人心目中居於上天的巫神，^⑥這在戰國以來的出土和傳世文獻中表現得特別明顯。清華簡《楚居》載：“麗不

① 游逸飛：《里耶秦簡8-455號木方選釋》，《簡帛》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92-93頁。需要說明的是。“巫帝”字樣最早見於甲骨卜辭，過去曾被一些學者誤認為一個名詞。現在我們知道，帝當讀作禘祭之禘，巫為前置賓語。關於這一問題可參看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150-153頁；楊逢彬：《試論“巫帝”刻辭的結構》，《武漢大學學報》1998年第5期。

② 關於放馬灘秦簡的抄寫年代，過去一度認為在戰國時期，相關討論可參看孫占宇《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概述”，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3，1-2頁。日本學者海老根量介結合秦國所特有的“黔首”“毆”等字的使用情況，論定竹簡的抄寫年代當為秦代，其說可從。據里耶更名方的規定，放馬灘秦簡似不應再有“巫帝”這一稱謂，其原因可能是竹簡抄寫於秦統一後不久，抄寫者失察，改而未盡。海老根氏在解開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兩處“也”字時談到：“根據程少軒先生的研究，該篇（筆者按：指《鐘律式占》）是《日書》中獨立的一篇文獻，與其他內容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繫。與六國文獻有關的字詞如此集中出現在《鐘律式占》中，這似乎暗示着《鐘律式占》篇是根據六國系統的鈔本而鈔寫的。因此我們推測《日書》乙種中的2例‘也’來自六國系統的鈔本，本來就是這樣寫的，後來秦人在鈔寫這個占法的時候，把大部分的‘也’都改為‘毆’，但不小心忘記改換那兩個‘也’。”說見海老根量介《放馬灘秦簡抄寫年代蠡測》，《簡帛》第7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9-170頁。不過“巫帝”的存在是否與底本來源有關有待研究。

③ 孫占宇：《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219頁。

④ 李零：《先秦兩漢文字史料中的“巫”》，收入其著《中國方術續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41-79頁。林富士：《漢代的巫者》，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

⑤ 日本學者瀧川資言考證云：“愚按下咸字疑衍。或云當作覲，或云當作祝。”說見《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28頁。

⑥ 烏丙安認為：“原始人類意識發展的依據是經驗，其中從人的死亡經驗和人做夢的經驗中派生出一個原始思維的觀念，即靈魂觀念。這種觀念認為人死後肉體與靈魂分開了，靈魂不死。”（烏丙安：《中國民俗學》（新版），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4，295頁。）晏昌貴引英國學者簡·艾倫·赫麗生的觀點認為：“從巫師到神并不是隔着不可逾越和（筆者按：核對原書應作“的”）鴻溝。”（晏昌貴：《巫鬼與淫祀》，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177頁。）

從行，潰自脅出，妣列賓於天，巫𡗗(咸)賅其脅以楚，抵今日楚人。”^①妣列是楚先人鬻熊的妻子，簡文記載其子熊麗出生時脅生，妣列“賓於天”得到巫咸的救助。據此巫咸居於上天不言而喻，故《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②前引程少軒先生文所引《山海經·大荒西經》亦云群巫“升降”於天地之間，且在排列次序上巫咸亦居首位。秦詛楚文刻石之《告巫咸文》數以巫咸與皇天上帝相提并論，如“不畏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巫咸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可見，其在秦人心目中也是居於上天的大神。此外《山海經·海外西經》還講到：“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也。”袁珂先生指出：“巫咸國者，乃一群巫師組織之國家也。”^③由名稱看這一國家也當是以巫咸為領袖。

古人崇信鬼神，魯迅曾談到：“中國本來信鬼神的，而鬼神與人乃是隔離的，因欲人與鬼神交通，於是乎就有巫出來”。^④因此巫在古人心目中一度占據非常重要的位置。《國語·楚語》記載楚昭王與觀射父的對話，觀射父說：“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結合以上這些材料可以推論，巫咸初為現實社會中的人臣，因其職掌與巫卜有關，在後世作為“古巫之先有靈者”，被視作居於上天的大神，受到人們的頂禮膜拜，為顯示其地位之尊崇，人們遂賦予其“巫帝”的稱號。需要注意的是，這裏的“帝”義為天神而非人王，早期文獻皆如此，如《荀子·強國》云：“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楊倞注：“帝，天神也。”顧頡剛、劉半農、魏建功等先生都已指出這一點。^⑤劉半農先生在文中談到：

但若有什麼一個人王，生前有過相當的功業成威權，死後人民敬畏不止，也就可以把他尊稱為“帝”，而且替他造起許多神話來……社會上的事物漸漸進化了，後人不知道事物的起源，就有些好事的人造出一兩個假古人來，說某事某物是他造的，有如西洋人說亞當造人，中國人說蒼頡造字之類，世人不察從而信之，而且信仰有加（例如妄人向“四目蒼聖”像跪拜），比之於天神，尊之為“帝”。^⑥

① 釋文採用寬式隸定。“巫𡗗”讀作“巫咸”，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楚居〉研讀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5日。

②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36頁。

③ 袁珂：《山海經校注》（最終修訂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200頁。

④ 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收入《魯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319頁。

⑤ 劉復（半農）：《“帝”與“天”》，《古史辨》第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0-27頁。魏建功：《讀〈帝與天〉》，《古史辨》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7-32頁。

⑥ 劉復（半農）：《“帝”與“天”》，22頁。

這些分析對於理解“巫帝”稱號的形成，無疑也是適用的。

假定我們對“巫帝”的解釋可信，那麼“陰”當如何理解呢？我們注意到，餘數一到九的鬼神名多是兩個，因此“巫帝陰雨公”似也當以解釋為兩個鬼神名為好。我們認為可以斷讀作“巫帝陰、雨公”。陰、咸古音韻部相同，皆為侵部，聲母一為影母，一為匣母，皆屬喉音，音近可通。在出土文獻中也能找到二者相通的例證，如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甲篇》中咸池的咸字寫作淦、滄兩種形體；今本《周易》“咸”卦，阜陽本《周易》作“咸”，馬王堆帛書本、上博本皆作“欽”。淦字從今得聲，淦、欽聲旁為金，金亦從今得聲，陰字基本聲符也是今，自然也可以與咸相通。因此“巫帝陰”即“巫帝咸”，或是對巫咸的一種尊稱，這與前文論述“巫帝”指稱巫咸可以互證。

巫在出土文獻中有時以作祟致人生病的形象出現，如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十二支占卜篇”多有“巫為眚”的記載眚義同祟。巫咸在甲骨文中已經出現，稱“咸戊”，有時省稱作“咸”。^① 其中就有巫咸作祟的記載，可舉如下兩條卜辭為例：

咸戊害王。

咸戊弗害王。[《合集》10902]

貞：咸允左王。

貞：咸弗左王。^②[《合集》248 正]

從格式上來說，巫帝咸與秦王政、趙簡軼之類的表述類似，也并不奇怪。^③ 程少軒先生看過本文初稿後提示筆者：“是否存在這樣的可能：底本是‘巫帝’，後因禁用巫帝之稱，底本‘帝’下加注‘陰(咸)’，抄手不明所以，徑抄作‘巫帝陰(咸)’。這種現象楚簡頗常見。”^④ 雖然目前尚無更多證據，但這顯然是非常值得重視的意見。丁山先生過去曾錯誤地認為甲骨卜辭“巫帝”就是指巫咸，並據詛楚文稱巫咸為“丕顯大神”，位次略低於“皇天上帝”，推測“疑至晚周之世，列國祭典，尚有尊巫咸為‘巫帝’者”。^⑤ 現在看來，丁先生的出發點雖然有誤，但所得出的結論却是非常正確的。

①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365 頁。傳世文獻也有省稱巫咸為“咸”的例子，見於《楚辭》等，可參看顧頡剛《“彭咸”》，收入《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201-202 頁。

② 左為不便、違戾之義，參趙鵬《談談殷墟甲骨文中的“左”、“中”、“右”》，《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4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③ “趙簡軼”的稱呼見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周訓》篇，參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40 頁。

④ 這是程先生 2015 年 7 月 7 日給筆者郵件的內容。

⑤ 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196 頁。

二 睡虎地秦簡中的“巫堪”

睡虎地秦簡的兩條材料分見《日書》甲種的“病”篇和乙種的“有疾”篇，簡文如下：

戊己有疾，巫堪行、王母爲祟，得之於黃色索魚、董酉。壬癸病，甲有閑，[睡甲 72 正貳] 乙酢。若不酢，煩居邦中，歲在西方，黃色死。[睡甲 73 正貳]

戊己有疾，巫堪、王父爲姓(肯)，□□□索魚、董□□□□閑，乙酢，不酢，□□邦中，中歲在西，人黃色死，土日。[睡乙 184]

兩處簡文中的“巫堪行”與“巫堪”處於作祟、爲咎之前，顯然也是鬼神名。諸家觀點可以看王子今先生的總結：

劉樂賢按：“《日書》乙種作‘巫堪’。巫堪行三字不易解，據文意推測似是某巫作祟的意思，巫名不可考。”吳小強《集釋》：“堪，巫的姓名，壞神名，見《莊子·大宗師》。”今按：吳說可能是據《莊子·大宗師》：“堪壞得之，以襲昆侖。”司馬彪注：“堪壞，神名，人面獸形。”成玄英疏：“昆侖山神名。襲，入也。”吳小強似將“堪壞，神名”讀作“堪，壞神名”，其說似未可從。《山海經·大荒西經》：“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所謂“巫堪”，疑心與《山海經》“巫真”有關。^①

先說“巫堪行”，我們認為應該斷讀作“巫堪、行”，指巫堪和行兩種神靈。^②“行”指行神，爲“五祀”之一，習見於出土簡帛。^③天星觀楚簡中“巫”與“行”、新蔡楚簡中“靈君子”與“行”都有在同一條禱辭中並列出現的情況。^④

“巫堪”之名，研習諸家多已指出“巫”表身份，“堪”是巫之名。諸家觀點中，吳小強先生之說不管是否如王子今先生分析的那樣是誤讀了司馬彪的注文，總之就《莊子·大宗師》原文來看，“堪壞”整體爲神名，與單名堪的“巫堪”恐怕不可等同。至於王子今先生讀堪爲真，雖可與《山海經》對應，但堪爲溪紐侵部字，真爲章紐真部字，侵、真二部古書相通的例子較少，尤其找不到甚、真二聲字相通的例證。而且，儘管《山海經》等古書記載有衆多巫者，但除巫咸外皆很少出現，比如巫真即僅見於《山海經》。因此要說巫堪即巫真恐需要更多的證據。

① 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病〉篇釋讀》，《秦文化論叢》，2003，154 頁。

② 晏昌貴先生引用該條簡文時已斷讀作“巫堪、行”，說見其著《巫鬼與淫祀》，176 頁。近出《秦簡牘合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沒有斷讀。

③ 晏昌貴：《巫鬼與淫祀》，134-137 頁。

④ 晏昌貴：《天星觀卜筮祭禱簡釋文輯校》，收入《簡帛術數與歷史地理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143 頁。宋華強：《新蔡葛陵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375 頁。關於“靈君子”與“巫”的關係，可參看宋華強《楚簡神靈名三釋》，武漢大學簡帛網，2006 年 12 月 17 日。

我們認為簡文“巫堪”可能也是巫咸的一種異寫，這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論證。

首先，巫咸常被認為可以作祟致人生病，相關材料已見上文。

其次，堪和咸讀音更為密切，堪為溪紐侵部，咸為匣紐侵部，韻部相同，聲紐均為喉牙音。古書中從甚聲與今聲之字相通之例甚多，^①又如前文已經談到的，從今與從咸得聲之字每可相通，故堪、咸存在通假的可能。不僅如此，堪與清華簡《楚居》中假借為咸的戔讀音也很密切，如《周禮·考工記》“以朱湛丹秫”，鄭玄注：“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漢書·晁錯傳》：“漸車之水”，顏師古注：“漸讀曰澣”。堪、湛并從甚得聲，澣從戔得聲，可知堪、戔亦可通假。因此“巫堪”讀作“巫咸”從讀音上看較之讀作“巫真”更加合理。

最後，從用字現象看，巫咸在出土文獻中的寫法複雜多變，詳後文，最明顯的例子是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甲篇》“上朔”章兩處巫咸儘管處於相鄰的兩行，竟然也分別用“無鉞”和“無戔”表示。^②這種用字現象的成因，一方面可以解釋為書手抄寫過程中用字無定，另一方面也可從選擇術數文獻的構成性質來考慮。這些實用性的選擇術數文獻皆具有雜抄性質，來源往往不一，用字也就難免出現不統一的現象。傳世文獻中巫的名字也存在異寫現象，如《山海經·海內西經》記載：“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窶窶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郝懿行考證，巫履、巫凡、巫相三巫即《大荒西經》“十巫”之巫禮、巫盼、巫謝。^③從這一角度出發，睡虎地《日書》於“巫減”之外又用“巫堪”指稱巫咸就不足為怪了。

巫咸在出土文獻中至今已出現多次，可總結如下：甲骨文寫作“咸戊”，有時省稱作“咸”；清華簡《楚居》寫作“巫戔”；睡虎地秦簡《日書》此前公認的有兩例，寫作“巫減”；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甲篇》（亦稱《式法》或《篆書陰陽五行》）寫作“無鉞”“無戔”；秦詛楚文刻石之《告巫咸文》、王家臺秦簡《歸藏》、岳山秦牘《日書》以及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乙篇》寫作今天的“巫咸”。倘本文的結論可信，則又添兩條新材料，尤其是第一條稱巫咸為巫帝不見於傳世文獻，對於研究古史形成及神話傳說也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附記：本文初稿蒙程少軒先生審閱指正，審稿專家也指出本文存在的一些問題，謹此并志謝忱。

①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今字聲系”條，濟南：齊魯書社，1989，231頁。

② 讀“無鉞”“無戔”為“巫咸”分別是程少軒先生和王輝先生的意見，說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學術討論區帖子《據清華四說馬王堆〈式法〉的“巫咸”》及其下跟帖。又見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73頁。

③ 范祥雍補校：《山海經箋疏補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61頁。

放馬灘秦簡中的標識符號及其功用初探*

蘭州城市學院簡牘研究所 孫占宇

蘭州城市學院信息工程學院 魏 芳

內容提要 放馬灘秦簡中的符號可按其形狀分為六類,其中符號“·”及“■”一般作為劃分欄、篇、章的標識;符號“=”一般作為重文或省寫標識;符號“L”及“—”常施於句中,起停頓作用;符號“|”常施於句末,起結尾作用。從這些符號的實際使用情況來看,“一號多用”及“異號同用”的情況皆比較普遍;標識性符號使用較多,而語氣性符號使用較少。

關鍵詞 放馬灘秦簡 漢語史 標點符號

關於簡帛文獻中的符號問題,王國維先生在其《流沙墜簡》中已有論及。其後,陳槃先生在《漢晉遺簡偶述》等文中也有過精彩論述。他們研究的材料,集中在早期發現的敦煌漢簡及居延漢簡。20世紀70年代以來,更大批量的簡帛材料相繼出土,其內容除各種行政文書外,還有大量文化典籍。隨著這些文獻的陸續刊布,關注其中非文字符號的研究者日益增多,迄今已發表論文近二十篇,基本厘清了先秦兩漢時期簡帛文獻中各種“標點符號”的使用情況及其發展脈絡,為漢語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以李均明、林清源、程鵬萬、張顯成、蔣莉、劉信芳等人的成果最具代表性。^①

* 基金項目: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簡牘日書所見秦漢民衆生活研究”(批准號:12BZS020)及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秦簡牘的綜合整理與研究”(批准號:08JZD0036)之階段性成果。










① 李均明:《簡牘符號考述》,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等編《華學》第2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93頁;蔣莉:《楚秦漢簡標點符號初探》,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林清源:《簡牘帛書標題格式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程鵬萬:《簡牘帛書格式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106-139、167-169頁;張顯成:《簡帛標點符號初探》,《簡帛文獻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8,514頁;劉信芳、王簪:《戰國簡牘帛書標點符號釋例》,《文獻》2012年第2期。

由於放馬灘秦簡的公布時間較晚,尚不見有人對其中符號問題做過系統研究。放馬灘秦簡大致成書於秦統一前後,其時正是始皇帝推行“書同文”政策的關鍵時期,因此這一課題對於漢語標點符號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應當引起學界重視。又,放馬灘秦簡中絕大部分內容屬於“日書”,此類典籍的文本有其自身的獨特性。近年來“日書”出土較多,有些尚在整理之中。因此摸清放馬灘秦簡中各種符號的使用規律,對其他類似文本的整理也會有所助益。故本文不揣淺陋,試圖在全面梳理放馬灘秦簡各種非文字符號類型的基礎上,對其功用作一初步歸納,權作對前賢研究成果的一點補充。不妥之處,敬祈學界不吝賜教。

一 墨丁“·”

此類符號在簡文中十分常見,可大致辨識者有 402 處,皆以濃墨塗寫,形狀略呈圓形,較小,一般占據半個字位,多書於簡首、欄首及句中文字正上方。舉例如下表:

表 1 墨丁“·”形狀

| | | | | | | | | | |
|----|--|--|--|--|--|---|--|--|--|
| 舉例 |  |  |  |  |  |  |  |  |  |
| 簡號 | 甲 1 貳 | 甲 4 貳 | 乙 2 壹 | 乙 118 壹 | 乙 317 貳 | 乙 159 壹 | 乙 204 壹 | 乙 204 貳 | 乙 167 貳 |

其功用較為複雜,以下試做分析:

(一) 作為分欄標識

放馬灘秦簡的抄寫者十分注意簡冊空間的充分利用。其抄寫格局,大體是先在簡冊上部抄寫篇幅較大的內容,再“見縫插針”,於下部空白處抄寫其他內容,形成兩欄或多欄版式。在這種情形下,又在下一欄文字的上端塗以符號“·”,與上一欄內容形成分割。如:

- 男日[子]、卯、寅、巳、酉、戌。· 女日午、未、申、丑、亥、辰。(甲 1 貳)
- 以女日病,以女日瘳,必女日復之。以女日(甲 2 貳)
- 死,以女日葬,必復之。男日亦如是。(甲 3 貳)
- 謂岡(剛)柔(柔)之日。(甲 4 貳)^①

上例是甲種《剛柔日》篇全文,該篇抄寫在甲種《建除》下方,每行文字上端皆有符號“·”,這四個墨丁位置相若,在視覺上形成一條直綫,與上欄文字形成明顯區分。

又如:

- 倉門,是謂富[門],井居西南,囷居西北,廡必南鄉(向),(乙 2 貳)

^① 本文所引簡文皆出自陳偉主編,孫占宇、晏昌貴撰著《秦簡牘合集(肆)》,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限於體例,該書釋文中對部分符號作省略處理,本文據圖版補出。後文不注。

- 毋絕縣肉。絕之，必有經焉。(乙3貳)
- 南門，是謂將軍門，可聚邦、使客。八歲更。辟門，廿(乙4貳)
- 歲更。主必富，使僕□□。大伍門，宜車馬，宗(乙5貳)
- 族、弟兄、婦女吉，十二月更。則光門，其主必昌，(乙6貳)
- 好歌舞(舞)，必施卒(衣)常(裳)，十六歲更。不毆，必爲巫。(乙7貳)

上例是《直室門》篇部分內容，該篇抄寫在乙種《建除》下方，每行文字上端多有符號“·”，作爲兩篇的分界。

需要指出的是，不少塗寫於下欄的符號“·”除了起到分欄的作用外，大多數還兼有分條的功能(詳見後文)。但以上兩例中甲3貳、乙3貳、乙5貳、乙6貳、乙7貳所見“·”皆置於一句中間，明顯不是分條標識。

(二) 作爲開篇標識

1. 篇題標識

放馬灘秦簡中自署篇題的情況較爲少見，有篇題者又多與正文連貫抄寫，如果不仔細觀察，很難發現。檢索全部自署篇題，其前冠以符號“·”的情況較爲常見。如：

- 黃鐘：平旦至日中投中黃鐘，鼠毆，兌(銳)顏、兌(銳)頤、赤黑、免(俛)僂，善病心、腸。(乙206)
- 犬忌：癸未、酉、庚申、戌、己燔園中犬矢(屎)，犬弗尼(昵)。(乙307)
- 邦居軍：丙丁畱(雷)，軍後徙。戊己畱(雷)，軍敬(警)。庚辛畱(雷)，軍前徙，爲雨不徙。壬癸畱(雷)，戰。(乙346)

上例中符號“·”下之“黃鐘”“犬忌”“邦居軍”等文字皆很難與其下內容連讀。但細察這些文字，都是對後文總括性的描述，若將它們視作篇題，則非常合適，其下文意豁然開朗。

2. 開篇標識

放馬灘秦簡中大多數成篇材料并無篇題，但在首簡文字前冠以符號“·”，而其後各簡文字前則無此類符號，標識較爲明顯。如：

- 占疾，投其病日、辰、時，以其所中之辰間 \perp ，中其後爲已間 \perp ，中其前爲未間 \perp 。得其月之剋，恐死。得其(乙338)□，瘡(癰)。得其□，善 \perp 。得其間，病中□□ \perp 。得其建，多餘病 \perp 。得除，恐死 \perp 。得其盈，駕(加)病 \perp 。得其吉，善。得(乙335)其召，病久不……(乙358A)□，乃復病。(乙364B)

上例是《占疾》篇全文，共抄寫在四枚簡上，僅在首簡文字前冠以符號“·”，十分醒目。

又如：

· 角十二，[· 八月]。(乙 167 壹)亢十二。(174 壹)氐十七，· 九月。(乙 168+374 壹)房七。(乙 173 壹)心十^L、十二，· 十月。(乙 169 壹)尾九。(乙 176 壹)箕十。
(乙 175 壹)

上例是《星分度》篇部分內容，此篇講述二十八宿分度及逐月日躔所在星宿，共抄寫在十三枚簡上。全篇僅在星宿名“角”上冠以符號“·”，其他星宿名上皆無此符號，暗示此處乃本篇首句。核之以二十八宿的傳統排序，也是以“角”宿起始，次之以“亢”“氐”等宿。再看下欄內容，也可前後連讀貫通。附帶指出，此篇在各月份上也標以“·”似有強調之意，突出其上各宿乃是該月日躔所在。此種用法僅限於本篇，後文不贅。

(三) 作為章節標識

1. 章節標識

放馬灘秦簡中有些成篇的材料內容較多，抄寫者往往根據其中內在邏輯細分為若干章節，並在每個章節前標以符號“·”，較為醒目，也使得全篇層次井然有序。如：

· 旦至日中投中大呂，牛毆，廣顏，恆(亘)鼻、緣〈喙〉，大目，肩僂，惡，行微=[微微]毆，土，色白黑，善病風痺。(乙 209)

日中至日入投中大呂，冢(兕)牛毆，廣顏，大鼻，大目，裏重，言間=[間間](閑閑)，惡，行僂=[僂僂]，要，白色，善病要(腰)。(乙 210)

日入至晨投中大呂，旄牛毆，免(俛)顏，大頸，長面，其行丘=[丘丘](瞿瞿)毆，蒼皙色，善病頸項。(乙 211)

上例是《黃鐘》篇的部分內容，該篇將一日分為“旦至日中”“日中至日入”及“日入至晨”三個時段，再以各個時段所“投中”的十二律來占卜病祟。抄寫者僅在“旦至日中”時段前施加符號“·”，其餘時段不加，簡文排列次序不言自明。

又如：

· 黃鐘，音毆。貞在黃鐘，天下清明，以視陶陽(唐)。帝(帝)乃誰(作)之，分其短長。比於宮聲，以為音尚。久乃處之，十月再周，復其故所。其祟上君、(乙 260)先□。卜疾人三禺(遇)黃鐘死，卜事君吉。(乙 261)

· 大呂，音毆。貞在大呂，陰陽溥(薄)氣，翼凡三□，居引其心。牝牡相求，徐得其音。後相得毆，說(悅)於黔首心。其祟大(乙 262)街、交原。卜疾人不死，取(娶)婦、嫁女吉。(乙 267)

上例是《貞在黃鐘》篇的部分內容。該篇分為十二節，各以十二律為占。每條占辭都連續抄

寫在兩枚簡上，抄寫者僅在首簡施加符號“·”，接續其下的第二枚簡上則無此符號。這一規律對我們復原其他類似篇目的編連次序有很大的幫助。

2. 分條標識

放馬灘秦簡的內容大體上都屬於“日書”，這類典籍中程式化的表述較多，條理較為明顯。乙種簡的抄寫者習慣於在一些分條（也可以視作“節”）敘述的文句前冠以符號“·”，顯得眉目分明。如：

- 甲亡，盜在西方，一於（字）中食者五口，疵在上，得，男子毆。（乙 55 壹）
- 乙亡，盜青色，三人，其一人在室中，從東方入，行有遺毆，不得，女子毆。（乙 56 壹）
- 丙亡，盜在西方，從西北入，折齒，得，男子毆，得。（乙 57 壹）

上例是乙種《十干占盜》篇部分內容，各條文字上端皆標以符號“·”，富於條理。

又如：

- 甲子旬，辰巳虛，戌亥孤。失六，其虛在東南，孤在西北。若有死，各〔六兇〕（凶），不出一歲。（乙 115 貳）
- 甲戌旬，寅卯虛，申酉孤。失，虛在正東，孤在正西。若有死者，各四兇（凶），不出一月。（乙 116 貳）
- 甲申旬，子丑虛，午未孤。失，虛在正北，孤在〔正〕南。若有死者，各一兇（凶），不出一歲。（乙 117 貳）

上例是《六甲孤虛》篇部分內容，各簡上端皆施加符號“·”，顯得條理清楚。同時，該篇抄寫在《土功（一）》篇下方空白處，這些符號也兼具分欄功能。

（四）作為句讀標識

放馬灘秦簡中的符號“·”用在句中，還具有標識語氣停頓的功能，略如符號“┐”的用法（詳見後文）。如：

- 日分：甲以到戊，· 己以到癸。· 辰分：子以到巳，· 午以到亥。（乙 167 叁）· 時分：旦以到東中，· 西中以到日入。（乙 174 叁）〔· 星分：角以〕到東壁，· 奎以到軫。（乙 168+374 叁）

上例是《日分》篇的部分內容。多見符號“·”，其中位於句中“己”“午”“西中”“奎”等字上的“·”所起作用主要是標識語氣停頓，應在其上斷讀。其他墨丁為分條標識，也有斷句功能，位於簡首的還兼具分欄作用。

又如：

- 凡占黃鐘，一左一右，壹行壹止，一……· 生黃鐘，置一而自十二之，上三益一，下



















三奪一。·占□(乙333)

上例是《占黃鐘》篇的部分內容,其中兩處符號“·”所起的作用也是斷句,兼具劃分段落的作用,經此符號標點後,全文層次更為分明。

二 墨塊“■”

此類符號在簡文中較為多見,可辨識者共49處。其形狀又可細分為I、II兩式,寬度皆與簡寬等齊。I式窄長或近於正方,以濃墨豎向塗寫於竹簡頂端,一般占據一至二個字位。II式寬扁,以濃墨橫向塗寫於竹簡中部,一般占據一個字位。舉例如下表:

表2 墨塊“■”形狀

| | | | | | | | | | |
|-----|---|---|---|---|---|---|---|---|---|
| I式 |  |  |  |  |  |  |  |  |  |
| 簡號 | 甲1壹 | 甲30A | 甲42壹 | 乙1壹 | 乙14壹 | 乙66貳 | 乙293 | 乙104 | 志1 |
| II式 |  |  |  |  |  |  |  |  |  |
| 簡號 | 甲18貳 | 甲16貳 | 甲24貳 | 甲42貳 | 甲73貳 | 乙48貳 | 乙56貳 | 乙73貳 | 乙78貳 |

以上二式,雖形狀有異,但其功用基本一致,試分析如下:

(一)作為分欄標識

如前所述,放馬灘秦簡中一般用符號“·”作為分欄標識,但偶爾也有以“■”分欄的情況,不多見。如:

■開日,逃亡,不得。可以言盜,盜必得。(甲18貳)

上例是甲種《建除》篇中的一條。該篇起先在上欄抄寫,從此條開始轉入下欄抄寫,故在此條上標以“■”,加以提示。這一點與乙種《建除》篇中位於“建日”上作為章節符號的墨塊並不相同(詳見後文)。

(二)作為開篇標識

1.篇題標識

如前所述,放馬灘秦簡中的自署篇題前多冠以符號“·”。但也有冠以符號“■”的情況,不多見。如:

■禹須臾行不得擇日:出邑門,禹步三,鄉(向)北斗,質畫地。視(祝)之曰:“禹有直五橫。今利行=[行,行]毋(無)咎。為禹前除道。”(乙165)(甲66貳-67貳與此同)

上例中符號“■”下之“禹須臾行不得擇日”為篇題，揭示後文所述是一種在無法選擇良辰吉日的情況下出行時所應當採用的一種厭禳術，也屬於“禹須臾”術。

放馬灘秦簡中的自署篇題多與正文連貫抄寫（如上例），但以下兩例篇題各用一枚簡單獨抄寫，其前又冠以符號“■”，較為少見。如：

■禹須臾行日（甲 42 壹）

■禹須臾所以見人日（甲 42 貳）（乙 373 貳與此同）

上例中符號“■”下之文字皆為篇題，其後諸簡所述內容正是如何利用“禹須臾”術選擇出行或晉見貴人的良辰吉日，正與篇題呼應。

2. 開篇標識

放馬灘秦簡成篇材料中僅在篇首文字前冠以符號“■”的情形也較為常見。如：

■宮之音弇，如[牛]處窰中。宮，腸毆，困倉毆。宮音貴，其畜牛，其器弇□，其種（種）重（種），其事□，其事貴，其處安，其味（乙 353）甘，其病中。徵之音下出。如負虎而□。□□□毆。徵音善，其畜虎，其器□，其種（種）華，其事嗇夫，其處整□（乙 352）

■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敢謁御史：大梁人王里□徒曰丹，□今七年，丹刺傷人垣離里中，因自刺毆，□之於市三日，（志 1）葬之垣離南門外。三年，丹而復生。丹所以得復生者，吾犀武舍人。犀武論其舍人尚命者，以丹（志 2）

上例分別是乙種《五音（二）》及《丹》篇的部分內容，首句皆以“■”頂格起始，其下各句前一般不再出現此符號，十分醒目。

另外，放馬灘秦簡成篇材料中又多見在首簡冠以符號“■”，其後各條文字前再冠以符號“·”的情形，層次分明。如：

■春三月甲乙不可伐大榆東方，父母死。|。（乙 129 貳）·夏三月丙丁不可伐大棘南，長男死。（乙 130 貳）·戊己不可伐大桑中央，長女死之。|。（乙 131 貳）

■……年，刑直（德）并在土。刑徒所勝直（德），直（德）徒所不勝刑，五歲而復并於土。（貳）（347）·直（德）之所在主歲。（乙 308 貳）

上例分別是《伐木忌（二）》及《刑德》篇全文，兩篇皆以符號“■”起始，其下條文之前再冠以符號“·”，這些墨丁又兼具分欄功能。

（三）作為章節標識

前文已述以符號“·”作為章節標識的情形。除此之外，放馬灘秦簡成篇材料中以符號“■”作為章節標識的情況也較為多見。如：

■正月，建寅，除卯，盈辰，平巳，定午，摯（執）未，彼（破）申，危酉，成戌，收亥，開

子,閉丑。(乙1壹)

· 二月,建卯,除辰,盈巳,平午,定未,摯(執)申,彼(破)酉,危戌,成亥,收子,開丑,閉寅。(乙2壹)

■建日,良日毆。可爲嗇夫,可以祝祠,可以畜大生(牲),不可入黔首。(乙14壹)










· 除日,逃亡不得,瘡疾死。可以治嗇夫,可以弊(徹)言君子、除臯(罪)。(乙15壹)

上例是乙種《建除》篇部分內容。該篇內容可分爲“建除表”及“占辭”兩章,前者實爲建除神煞的“值日表”,後者所述爲不同神煞所主吉凶宜忌。兩章各以符號“■”起始,其下各條再冠以“·”,層次十分清楚。這種情況,亦見於後文所舉《剛柔日(二)》及《門戶》全文,此處不贅。

三 雙墨點“=”

此類符號在簡文中較爲常見,現可辨識者共97處,符號由兩個墨點(有時作兩短橫)組成,多書於一字右下方,較小。舉例如下表:

表4 雙墨點“=”形狀

| | | | | | | | | | |
|----|---|---|---|---|---|---|---|---|---|
| 舉例 |  |  |  |  |  |  |  |  |  |
| 簡號 | 乙351 | 乙132壹 | 乙217 | 乙255 | 乙235 | 乙250 | 乙327B | 乙299 | 乙210 |

其功用主要有兩種:作爲重文標識或省寫標識,前一種情況較爲普遍。以下試做分析:

(一)作爲重文標識

“=”作爲重文標識,在放馬灘秦簡中有多種用法。除了常見的對單字的重複之外,又見對多字的重複等新情況。

1.重複上文單字

這種情況最爲常見,如:

· 旦至日中投中大(太)族,虎毆,戣(織)色,大口,長要(腰),其行延=延延毆,色赤黑,虛=[虛虛],善病中。(乙212)

· 茅(蕒)賓,□毆,別離、上事毆,外野某毆。貞在茅(蕒)賓,是謂始新,啻(帝)堯乃韋九州。以政下黔首,斬伐冥=[冥冥],殺戮申=[申申]。(乙272)

上例分別是《黃鐘》及《貞在黃鐘》篇部分內容,其中“延”“虛”“冥”“申”等字下的符號“=”皆表示對前一字的重複。此兩篇中疊音詞很多,都用這種方式書寫,無一例外。

又如：

■寡門，不寡濡泥興=[興，興]毋(無)所定，妻不吉，必參(三)寡。(乙1貳)

·入正月一日風=[風，風]道東北，禾黍將。從正東，卒者丈夫。從東南，手臬坐=[坐坐]。從正南，衣之必死……(乙162A+93A)兵，邦君必或死之。從正北，水潦來。(乙313)

上例分別是《直室門》及《候歲》篇部分內容，其中“興”“風”等字下的符號“=”也表示對前字的重複，但兩者之間需要破讀。

2. 重複上文多字

放馬灘秦簡中又見連續出現的多個符號“=”重複多字，以及單個“=”重複多字的現象，若按重複單字的常規方式釋讀，往往文意難通。在這種情形之下，需要做變通處理。如：

占盜：以亡辰爲式，投得其式爲有中，聞得其前五爲得、爲聞，得其後伍(五)爲不=得=[不得，不得]其前後之伍(五)爲復亡。(乙322)

·役居□若有所遠使，千里外顧復歸，不可以=壬=癸=到=□=[以壬癸到□。以壬癸到□]，必死。(乙319)

上例分別是《占盜》及《歸行》等篇中部分內容，其中“不=得=”等字，若機械地釋讀爲“不不得得”則不知所云，若析書作“不得，不得”則文意通暢。“以=壬=癸=到=□=”等字，也應析書作“以壬癸到□。以壬癸到□”。

又如：

……燔(蕃)昌。小者以死，有(又)之少者。女(母)死，取長子=[長子。長子]死，取中子=[中子。中子]死，取少子。(乙108B壹)

以上是《五音日卜死》篇的部分內容。其中兩處“=”，若將其讀作“子子”則文理不通。通讀全句，我們不難發現此兩處“=”實際上是對其前“長子”或“中子”兩字的重複，應按其具體語境分別析書作“長子，長子”及“中子，中子”。

(二) 作爲省寫標識

1. 省去與前句語義重複的特定單字

放馬灘秦簡中多見程式化句式，其中某些字詞在前後文中反復出現。若後文再次出現這一字詞，抄寫者往往僅寫出前字，而省去後字，代之以符號“=”。如：

■凡甲、丙、戊、庚、壬、子、寅、[卯、戌]、巳、酉，是胃(謂)岡(剛)日、陽[日]、牡日毆，女子之吉日毆。(乙113壹)

■凡乙、丁、己、辛、癸、丑、辰、午、未、申、亥，是=[是謂]柔日、陰日、牝日毆，男子之吉日毆。(乙114 壹)

以上是《剛柔日(二)》全文。其中兩句內容相類，結構全同，句式一致。但前句作“是胃(謂)”之處，後句却寫作“是=”。可見，後句中“=”實際上是對前句中重複字“胃(謂)”的省寫。

2. 作為對某一特定單字的習慣性省寫的標識

放馬灘秦簡中還有多處“是=”句，如。

·寅、巳、申、亥、卯、午、酉、子、辰、未、戌、丑，凡是=[是謂]土禁，不可垣。垣一版，貲。三版，耐。成垣，父母死。(乙133 壹)

·卯、丑、寅、午、辰、巳、酉、未、申、子、戌、亥，凡是=[是謂]地司空，不可操土攻(功)，不死必亡。(乙134 壹)

·毋(無)射、大(太)族、茅(蕒)賓之卦曰：是=[是謂]水火之貧=[貧貧]。(乙351)

·林鐘、應(應)鐘、夾鐘之卦曰：是=[是謂]作(乍)居作(乍)行，左右可(何)望。日中爲期，剥此羴羊。(乙254)

上例是《土功(二)》及《自天降令》篇的部分內容。其中“是=”，前人多看作重文符，析書作“是是”，訓爲“此是”。其說雖大致可通，但在放馬灘秦簡的時代，“是”字是否已經演進爲判斷動詞，學界仍有疑問。若從上舉《剛柔日(二)》篇中“是=”用作“是謂”的實例來看，我們將以上四例中“是=”析書作“是謂”，即將“是=”看做“是謂”的習慣性省寫，可能更加妥當。

3. 省去與前字構件相同的特定單字

我們也發現，若簡文中上下兩字具有某個共同的構件，抄寫者有時會承上省去後字，而代之以符號“=”，僅以下二例：

徙門，數實數=[數婁](婁)，并黔首家。(乙18 叁下)

營=[營宮]廿。·正月。(乙172 壹)

前者見於《直室門》篇。其中“數實數=”句，睡虎地秦簡日書《直室門》篇作“數富數虛”，其中“數”可讀作“速”，指財富積累得快，虧空也快。據此，我們將此處“數=”析書作“數婁”。“婁”爲“數”字左部，故抄寫者承上省去。“婁”可讀作“婁”，《爾雅·釋言》：“婁，貧也。”《玉篇·宀部》：“婁，空也。”與“虛”義近。










後者見於《星分度》篇。其中“營=”，我們析書作“營宮”。“宮”爲“營”字下部，故抄寫者承上省去。營宮，二十八宿之一，傳世典籍皆作“營室”，但出土文獻多寫作“營=”，如睡虎

地秦簡日書《星》及《取妻出女》、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及《刑德》、周家臺秦簡《繫行》、阜陽汝陰侯漢墓“二十八宿圓盤”中皆作此形。可見，將“營宮”寫作“營=”，是秦漢時的一種書寫習慣。

四 墨勾“L”

此類符號在簡文中較為常見，可大體辨識者約 76 處，多書於一字右下方，較小。舉例如下表：

表 3 墨勾“L”形狀

| 舉例 |  |  |  |  |  |  |  |  |  |
|----|---|---|---|---|---|---|---|---|---|
| 簡號 | 甲 57 貳 | 乙 37 貳 | 乙 326 | 乙 40B 貳 | 乙 41 貳 | 乙 289B | 乙 304 | 乙 304 | 乙 350 |

其功用較為單一，一般在句中起停頓作用，略如現今標點符號中的頓號、逗號或句號，以下試做分析：

(一) 用在并列的名詞之間

如：

· 黃鐘 L、大呂 L、姑先(洗) L、中呂 L、林鐘皆曰：請謁得，有為成，取(娶)婦嫁女者吉，病者不死，輟(繫)囚者免。(乙 257)

· 大(太)族 L、茅(蕤)賓 L、夷則 L、南呂皆曰：請謁不得，有為不成，取(娶)婦嫁女不吉，疾人死，輟(繫)囚者不免。(乙 258A+371)

· 夾鐘 L、毋(無)射 L、應(應)鐘皆曰：請謁難得，有為難成，取(娶)婦嫁女可毆，疾人危，輟(繫)囚難出。(乙 256)

上例是《十二律吉凶》篇的部分內容，其中在“黃鐘”“大呂”等律名之間施加符號“L”，表示并列關係，其功用略如現今之頓號。

(二) 用在并列的數詞之間

如：

九與八 L、七與六 L、五與四，皆妻夫毆 L。日為夫，晨(辰)為妻，星為子。欲夫妻之和而中數毆，甚衆者盡，少者失。(乙 344)

心十 L、十二，· 十月。(乙 169 壹)……胃十四 L、十三，· 三月。(乙 168 貳)

上例分別是《陰陽鐘》及《星分度》篇的部分內容，其中相連的兩個數字容易混淆，抄寫者在兩者之間施加符號“L”，以作劃分，其功用略如現今之頓號。

(三) 用在句中,表示語氣停頓

如:

· 平旦生女 L, 日出生男 L, 夙食女, 莫食男, 日中女, 日過中男, 日則(側)女, 日下則(側)男, 日未入女, 日入男, 昏(昏)女 L, 夜莫(暮)(乙 142)男 L, 夜未中女 L, 夜中男, 夜過中女, 雞鳴男。(乙 143)

· 春三月東首 L, 夏三月南首 L, 秋三月西首 L, 冬三月北首 L, 皆吉。(乙 303A+304)

上例是乙種《生男女》及《四時首》篇全文, 其中在各句之間施加符號“L”, 表示語氣停頓, 其功用略如現今之逗號。又如:

· 巳, 旦不聽 L。安(晏), 聽 L。晝, 不聽 L。夕, 得後言。(乙 40B 貳)

· 午, 旦不聽 L。安(晏), 百事不聽 L。晝, 許 L。夕, 許。(乙 41 貳)



· 未。旦有美言 L。安(晏), 後見之 L。晝, 得惡言 L。夕, 不聽。(乙 42B 貳)

上例是乙種《吏》篇部分內容, 該篇分“旦”“安(晏)”“晝”“夕”四個時段占測下級官吏求見長官的不同結果。抄寫者在各句之間施加符號“L”, 表示語氣停頓, 其功用略如現今之句號。這種情況, 亦可參看前文所舉《占疾》篇全文。

五 橫墨綫“—”

此類符號在簡文中較為常見, 今可辨識者共 2 處, 形狀為橫向墨綫, 大體占據半個字位。舉例如下表:

表 4 橫墨綫“—”形狀

| | | | | | | | | | |
|----|---|---|--|--|--|--|--|--|--|
| 舉例 |  |  | | | | | | | |
| 簡號 | 乙 77 貳 | 乙 77 貳 | | | | | | | |

此種符號書於句中, 其功用較為單一, 略如現今標點符號中的逗號, 僅見於下例:

· 土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乙 77 貳)

這是《五行》篇最末一句, 抄寫者在語氣停頓之處施以符號“—”, 將前後兩個相同之字隔開, 與符號“L”的功用基本相似。

這一符號在簡帛文獻中非常少見。若按放馬灘秦簡的抄寫習慣, 上下重複之字往往寫作“某=”, 此句應作“土生木=[木, 木]生火=[火, 火]生土”。但此句不但將重複字連續寫

出,而且在它們之間施以符號“一”,除了表示語氣停頓之外,似乎還有特別強調其中兩個重複字不可連讀之意。

六 豎墨綫“|”

此類符號在簡文中較為常見,今可辨識者共 52 處,其形狀為豎向墨綫,長短粗細略如正文中的豎畫,一般占據一個字位。舉例如下表:

表 5 豎墨綫“|”形狀

| | | | | | | | | | |
|----|--------|--------|--------|---------|---------|-------|---------|-------|--------|
| 舉例 | | | | | | | | | |
| 簡號 | 乙 83 貳 | 乙 96 貳 | 乙 96 叁 | 乙 124 壹 | 乙 124 貳 | 乙 318 | 乙 136 壹 | 乙 380 | 乙 48 貳 |

此種符號皆書於句末,其功用較為單一,略如現今標點符號中的句號,以下試做分析:

■凡啓門,以七星、張、翼、亢、奎皆[吉]。門忌(乙 133 貳)乙、辛、戊、五丑|。(乙 132 貳)

■祠門良日:甲申、庚申、壬申|。(乙 135 貳)

■戶忌丁及五丑,凶|。(乙 134 貳)

上例是《門戶》全文,其中句首皆以墨塊起始,句末尾則施以符號“|”,表示一句的終結。這一規律對此篇編連次序的復原具有重要作用。

又如:

夏三月帝(帝)為室,杓(剽)午,殺未,四瀟(廢)壬癸|。(乙 96 壹)

秋三月帝(帝)為室巳,杓(剽)酉,殺,四瀟(廢)甲乙|。(乙 97 壹)

冬三月帝(帝)為室申,杓(剽)子,殺,四瀟(廢)丙丁|。(乙 98 壹)

上例是《帝》篇部分內容,其中文句末尾皆施以符號“|”,表示語氣的終結,層次井然。這種情況,亦可參看前文所舉《伐木忌(二)》全文。

小結

綜上所述,放馬灘秦簡中的六類符號各有其大致固定的作用,使用情況較為複雜。若加以綜合考察,可見如下四個較為顯著的特點:

第一,“一號多用”的情況較為普遍,但其核心功用日趨突出。如符號“·”可分別作為

分欄、開篇、章節、句讀等方面的標識性符號,似乎比較複雜。但實際上,這四種功用的核心是一致的,即根據簡文的具體情況將其劃分為不同層次。最初的層次是依據簡文的抄寫位置劃分出上下欄,其次是依據簡文內容的不同劃分出篇,再次是依據某篇內容的內在邏輯將其劃分為若干章節(條目)乃至句。

第二,“異號同用”的情況亦為多見,但已出現較為明顯的分化。如符號“■”與“·”的基本功用大體上是重合的,但在“■”作為開篇標識或章節標識的情況下,其下作為段落或條目的標識一般都是“·”。說明在這種情況下,“■”是一個較高層級的標識,而“·”所標識的層級較低。又如,符號“┐”“|”“·”及“—”都可以作為語氣停頓的標識,但簡文中使用前兩種符號的情況較多,使用後兩種的情況不多見。此後,符號“·”及“—”作為語氣停頓標識的功用逐漸減失,我們在漢簡中就很難找到此類用例。

第三,標識性符號使用較多,而語氣性符號使用較少。符號“·”及“■”的主要功能是分欄、分篇及分章節,在簡文中使用十分廣泛。符號“=”作為重文或省寫標識,其使用頻率也較高。這三種符號主要是作為某種“標識”使用的。相比之下,表示語氣停頓的符號“┐”“|”及“—”出現的次數就比較少。這一情況在睡虎地秦簡日書及周家臺秦簡日書中也普遍存在。反映出在秦代日書類典籍的抄寫過程中,抄寫者對篇、章、節等基本層次的劃分較為重視,但對於其中語氣停頓等細緻層次的劃分還處於較為初級的階段,“標點”符號的使用遠未達到成熟的地步。

第四,各種符號的施加具有較大隨意性。相比較而言,甲種簡中符號較少,而乙種簡中符號較多。如《吏》篇,甲種簡僅見一處“┐”,但在乙種簡多達二十餘處。又如《建除》《十二支占盜》等篇,甲種簡僅見開篇符號“■”,但在乙種簡中還有章節符號“■”,並在章節下各條前施加符號“·”。乙種簡中雖然較多地使用了各種符號,但隨意性仍然較大。如《衣》篇:“·入月十四日┐、十七日、廿三日”(乙362壹),其中在“十四日”與“十七日”之間施加“┐”,但在其後的“十七日”與“廿三日”之間則缺失。又如《丹》篇:“·丹言:‘祠者必謹騷(掃)除,毋以淘口祠所。’”(志7)其中在“丹言”上施加符號“·”,依例,位於“志4”的另一處“丹言”前也應有此符號,但抄寫者却付諸闕如。

附記:本文刊發前,承蒙匿名評審專家提出寶貴意見,得以修改完善,謹致謝忱!

里耶“取鮫魚”簡與秦統一初期的文化建構^{*}

湘潭大學歷史系 李 斯

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李筆戎

內容提要 “取鮫魚”簡的內容較為獨特，主要反映的行政過程是遷陵縣向其下轄鄉（啓陵鄉）征詢某類特殊水產品，以及啓陵鄉守對此事的回復。這樣一份看起來似乎并不十分緊急的官文書，却通過“郵人”的特殊方式予以傳遞，其原因可能與所“獻”之物是呈獻給皇帝的貢品有關。《里耶秦簡（壹）》中有多枚簡牘內容與地方“獻”物的制度及其實行情況有關，均出於第八層，且存在編號相鄰、文意密切相關的簡例，應非出於偶然。先秦至漢唐的文獻中多見“鮫”與“蛟”互通的文例。史籍所見秦皇漢武“射蛟”故事，不但是古代帝王“射蛟”風習的延續，而且暗含執政合法性宣傳的政治文化象征意義。

關鍵詞 里耶秦簡 鮫魚 秦統一 秦始皇 文化建構

近年公布的里耶秦簡中，有一枚公文簡的內容較為獨特，或可稱為“取鮫魚簡”。與一般官文書不同的是，該簡文主要反映的行政過程是遷陵縣向其下轄鄉（啓陵鄉）征詢某類特殊水產品，以及啓陵鄉守對此事的回復。迄今為止，類似的文書在秦漢簡牘中似尚不多見，因而頗有探討的必要。這條珍貴的秦代行政記錄，不僅反映出當時人們對某些特殊物種與水產品分類的認知程度，而且可能與秦王朝的重大政治事件有密切關係。對其相關問題進行探討，或許將有助於增進秦漢政治文化與秦漢水生物種分布的認識。

^{*} 基金項目：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秦統一及其歷史意義再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准號 14ZDB028）。

一 簡文內容及其所反映的問題

爲方便起見,我們先將此簡文逐錄如下,再作解釋和論述。

卅五年八月丁巳朔己未啓陵鄉守狐敢言之廷下令書曰取鮫魚與

山今廬魚獻之問津吏徒莫智・問智此魚者具署

物外以書言・問之啓陵鄉吏黔首官徒莫智敢言之・戶(正)

曹

八月□□□郵人□以來ノ□發 □手(背)(8-769)^①

簡文分正、背兩面,主要內容都集中於正面。有的字原未釋出,陳偉、何有祖等先生在《里耶秦簡校釋》(下文簡稱《校釋》)中予以補釋,並作了標點和校釋。據此,簡文正面內容整理後標點如下:

卅五年八月丁巳朔己未,啓陵鄉守狐敢言之:廷下令書曰取鮫魚與山今廬(鱸)魚獻之,問津吏、徒莫智(知)。・問智(知)此魚者具署物色,以書言。・問之啓陵鄉吏、黔首、官徒,莫智。敢言之。戶曹。^②

其中“物色”原釋作“物外”,當從《校釋》改釋作“物色”。簡文中的“物色”,可以理解爲“鮫魚與山今廬魚”的具體形狀及其特殊表征。衆所周知,“敢言之”是秦漢行政運作中上行文書的慣用套語。實際上,該簡文應是啓陵鄉守“狐”對“廷下令書”的回復,而“廷下令書”的主要內容應即“取鮫魚與山今廬魚獻之”,但因“問津吏、徒莫智”,故上級官府進一步要求“問智此魚者具署物色”,並以公文形式上報。

簡文背面字迹雖漫漶不清,但依稀可見“八月”“郵人□以來”“狐手”等字樣,由此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這份公文是通過“郵人”這一特殊方式來傳送的。而根據相關律令規定,漢代“郵人”傳遞的一般是比較緊急而重要的官文書。如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行書律》:“令郵人行制書、急書,復,勿令爲它事……書不急,擅以郵行,罰金二兩……書不當以郵行者,爲送告縣道,以次傳行之……諸獄辟書五百里以上,及郡縣官相付受財物當校計者書,皆以郵行。”^③所謂“制書”,《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二十六年群臣議“帝號”之言:“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注引蔡邕曰:“制書,帝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秦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50頁。

② 參見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222頁。

③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45-47頁。

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①《漢書·高后紀》也提到漢惠帝崩，太后“臨朝稱制”，顏師古注：“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②由此可知，漢代“郵人”傳遞的官文書中，又以“制書”最為尊貴，因其來源為“天子之言”。故《二年律令·行書律》特別提出，承擔此類特殊任務的“郵人”，可以享受相應優待。而對於“書不急”却“擅以郵行”的情況，也作出了明確的處罰規定。有學者通過對里耶秦簡相關“郵人”簡文的研究，推測秦代的情況也大概如此，並認為“除一些緊急必須交郵人專辦的文書之外，多數文書是由下級吏員、一般民衆，甚至隸臣妾遞送的。”^③對此，王子今先生也指出：“可見當時的郵傳制度，主要是為傳遞緊急文書和重要信息服務的。”^④從已經公布的里耶秦簡來看，以“郵人”傳遞的文書總數相對較少，可能與這一傳遞方式的特殊用途和重要程度有關。

那麼，這樣一份看起來似乎並不十分緊急的官文書，為何會通過“郵人”的特殊方式予以傳遞？其原因可能與所“獻”之物是呈獻給皇帝的貢品有關。簡文開頭所署“卅五年”，應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其時秦始皇已經完成統一大業，並已使用作為最高統治者專屬稱謂的“皇帝”名號。《里耶秦簡》（壹）有數處關於地方“獻”物的簡文，其呈獻對象應為秦始皇本人。例如，在排序上緊鄰“取鮫魚”簡，編號為8-768的簡文提到“四時獻”：

卅三年六月庚子朔丁未，遷陵守丞有敢言之：守府下四時獻者上
吏缺式曰：放（仿）式上。今牒書應書者一牒上。敢言之。（正）
六月乙巳旦，守府即行。履手。（8-768 背）^⑤

從簡文內容推斷，所謂以“四時獻者上”當為“守府”下達的行政命令，其最終的呈獻對象，當然也不可能僅止於“守府”。先秦時期就已存在以四時獻物供奉君王的制度，如《史記·蘇秦列傳》載蘇秦說楚威王之言：“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⑥由此推知，能够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的，祇可能是平息戰亂、完成統一的新帝王，而這一偉業，也確實在秦始皇執政期間得以實現。簡8-768與簡8-769不僅編號相近，而且文意相關，或許可以為我們理解“四時獻者”與“取鮫魚與山今廬魚獻之”兩者之間的聯繫提供更多綫索。

①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236-237頁。

② 《漢書》卷三《高后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95頁。

③ 參見于振波《里耶秦簡中的“除郵人”簡》，《湖南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④ 參見王子今《郵傳萬里——驛站與郵遞》，長春出版社，2004，39頁。

⑤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秦簡（壹）》，50頁。句讀參照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22頁。

⑥ 《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2260頁。

與地方“獻”物有關的,還有同出於第八層的簡8-1022,明確提到“獻冬瓜乾鯰魚”。^①值得注意的是,另有一處提到“獻鳥”的簡文:

廿八年七月戊戌朔乙巳,啓陵鄉趙敢言之:令令啓陵捕獻鳥,得明渠
雌一。以鳥及書屬尉史文,令輸。文不冑(肯)受,即發鳥送書,削去其名,以
予小史適。適弗敢受。即詈適。已有(又)道船中出操枻(楫)以走趙,集詢謁
詈趙。謁上獄治,當論論敢言之。令史上見其詈趙。(正)
七月乙卯啓陵鄉趙敢言之:恐前書不到,寫上。敢言之。ノ貝手。
七月己未水下八刻,□□以來。ノ敬半。 貝手。(8-1562背)^②

所謂“獻鳥”,可能也有較為悠久的傳統。《禮記·曲禮》:“獻鳥者佛其首,蓄鳥者則弗佛也”。依據注者的解釋,其中“佛”當作“拂”,因鳥喙能傷人,故“獻鳥者”需“拂其首”,“蓄鳥者”則無此必要了。先秦時已存在諸侯向天子“貢獻”鳥獸的制度,且有專人負責管理進貢的鳥獸。例如,《周禮·夏官》有“射鳥氏”,又有“羅氏”,後者具體職掌為:“掌羅烏鳥。蠟,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③此外還有“掌蓄”,其具體職掌為:“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其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④而關於掌管鳥獸之“羅氏”,《禮記·郊特牲》則作“大羅氏”,述其職掌為:“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對於“大羅氏”這一職官稱謂及其具體職掌,孔穎達《禮記正義》解釋說:“謂為大羅者,鄭云‘能以羅捕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者,大羅氏既以羅為名,能張羅得鳥獸,故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也。”“‘草笠而至’者,草笠,以草為笠也。此諸侯所使貢獻鳥獸之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也。”^⑤《周禮》中有關“羅氏”以“歲時貢鳥物”的具體職掌,或與前引簡文以“四時獻者”存在一定聯繫。而細察簡文可知,某些特殊水產與鳥類,應在“四時獻者”範圍之內。

耐人尋味的是,簡文所謂“捕獻鳥”,雖是地方吏員奉上峰之命的行政行為,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却發生了在公文中將直接責任人“削去其名”的特殊情況,其背後的動機與深層原因還值得進一步研究。

此外,《里耶秦簡(壹)》還有一些與“獻”有關的簡文,例如:

下臨沅請定獻枳枸程,程,程 己(8-855)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秦簡(壹)》,58頁。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360頁。

③ [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2448-2449頁。

④ [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2452-2453頁。

⑤ [清]孫希旦撰,王星賢、沈嘯寰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697頁。

錦繒一丈五尺八寸。 卅五年九月丁……內守繞出以爲獻。(8-891+8-933+8-2204)

□縣所獻而不(8-954)

獻泰 遷陵守丞陵□爲爲

爲爲爲(8-1438 背)^①

上述簡文除 8-1438 有較大可能是習字簡,其餘簡的內容應當也與地方“獻”物的制度及其實行情況有關。其中,《校釋》認爲簡 8-933 可與簡 8-891 和簡 8-2204 綴合,則所“獻”之物爲:“錦繒一丈五尺八寸”。^② 從目前公布的《里耶秦簡(壹)》來看,所有關於“獻”的簡牘都出於第八層,且存在編號相鄰、文意密切相關的簡例,恐怕并不僅僅是偶然。

二 “鮫魚”與“蛟龍”

關於簡文中的“鮫魚”,早期文獻中存在一些不同解釋。而對相關內容的考察,又與“取鮫魚”簡的性質及文書具體意圖的判定直接相關。

東漢許慎《說文·魚部》明確指出“鮫”爲“海魚”。《說文解字》:“鮫:海魚,皮可飾刀口,從魚,交聲。”^③段玉裁注:“今所謂沙魚,所謂沙魚皮也。許有魛字,云從沙省,蓋即此魚。”^④段注提到《說文》另收有“魛”字,應與“鮫”同義,即後世通常所說的“沙魚”或“鯊魚”。因其皮質堅韌,可以用於武器裝備的製造。《史記·禮書》:“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⑤除此之外,《史記·禮書》又提到“鮫魚皮”的裝飾功能:“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寢兕持虎,鮫鞶彌龍,所以養威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鮫魚皮可以飾服器,音交。鞶者,當馬掖之革,音呼見反。”《史記索隱》也說:“鮫鞶者,以鮫魚皮飾鞶。鞶,馬腹帶也。”^⑥由“鮫魚皮”可用於天子乘輿的裝飾來看,可能在秦漢時期開始即被視爲較爲珍稀的魚種。據唐代《通典·食貨六》記載,當時臨海郡、永嘉郡、漳浦郡和潮陽郡均有鮫魚皮上貢,有學者據此指出,後世“鮫魚皮”的加工技術在東海和南海領域已較爲成熟。^⑦

古代文獻中也記載了“鮫魚”在藥用等方面的價值。五代韓保升云:“鮫魚皮:‘主蠱氣,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秦簡(壹)》,53、55、56、70 頁。

②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243 頁。

③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13,244 頁下欄。

④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80 頁上欄。

⑤ 《史記》卷二三《禮書》,1164 頁。

⑥ 《史記》卷二三《禮書》,1162-1163 頁。

⑦ 洪緯:《中國古人對鯊魚認識的演變》,《中國農史》2014 年第 4 期。

蠱疰方用之,即裝刀靶魚皮也’《唐本注》:‘出南海,形似鰲,無脚而有尾。’《蜀本圖經》云:‘鮫魚,圓廣尺餘,尾長尺許,惟無足,背皮粗錯。’”^①而後世關於“鮫魚”食用價值的繼續開發,亦見於李時珍《本草綱目》:“有二種,皆不類鰲,南人通謂之沙魚,大而長喙如鋸者曰胡沙,性善而肉美。小而皮粗者曰白沙,肉強而有小毒,彼人皆鹽作修脯,其皮刮治去沙,剪作膾爲食,品美味,食益人,其皮可飾刀靶。”^②《校釋》提到里耶秦簡 8-1705 有“乾鱸魚”,《後漢書·左慈傳》記載了當時被視爲珍饈水產的“松江鱸魚”,^③這兩種“鱸魚”的共同點應當主要在於其食用價值。

由於尚未見到與“取鮫魚”內容相關的簡文,我們尚不能完全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即簡文所謂要求地方“取鮫魚與山今鱸魚獻之”的行政命令,可能包含有考察其食用價值及其他特殊用途的考慮。但細察簡文,有“問津吏、徒莫智(知)”等語。所謂“津吏”,秦漢史籍或稱“津史”,應是負責管理津渡的官員。從出土漢簡資料看,“津關”往往連稱,史籍亦多見。因此,王子今先生認爲“津吏”之職能似與“關吏”同,主要是檢查、控制出入經過津渡的人員,維護津渡通行秩序。^④由此推想,“津吏”因其職責所在,應當對其管轄範圍內的水產物種知識有一定的了解。如果簡文提到的“鮫魚”與“山今鱸魚”均屬一般的食用魚類,似乎很難理解爲何當地“津吏”會對此一無所知,甚至聞所未聞。

關於簡文中的“鮫魚”,《校釋》稱爲“一種大魚”,并引《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方士徐市之言:“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校釋》又引《淮南子·說山》高誘注:“魚二千斤爲鮫。”這確實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秦始皇最後一次“出游天下”時,親自入海射殺“巨魚”的歷史表演。其直接動機,竟是爲了尋求“不死”之“仙藥”。“取鮫魚”簡提到的“卅五年”,應即始皇三十五年。當時已經完成統一大業的秦始皇,其興趣開始轉向求仙與長生。而大約在此時,一批以“富貴”爲主要人生追求的海上“方士”逐漸聚集在始皇身邊,慫恿其尋求“不死之藥”,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費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并海西。^⑤

① [後蜀]韓保升撰,尚志鈞輯復:《蜀本草》,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467 頁。

② [明]李時珍撰,陳貴廷等點校:《本草綱目》,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4,1034 頁。

③ 《後漢書》卷八二《方術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2747 頁。

④ 王子今:《秦漢稱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164-165 頁。

⑤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263 頁。

在“方士”與“博士”的描述中，“大鮫魚”被稱為阻礙求仙活動的海中“惡神”，其中自有神秘主義的觀念影響。但細察上下文，方士徐市等人口中的“常為大鮫魚所苦”，在占夢博士的描述中却變成了“以大魚蛟龍為候”。這似乎在提示我們，“鮫魚”與“蛟龍”之間，是否存在一定聯繫？

《說文》：“蛟，龍屬，無脚曰蛟。從蟲，交聲。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為之長，能率魚而飛。置筍水中，即蛟去。”有《說文》研究者認為“按蛟或作鮫。然鮫者魚名，其字不相代也”。^①但據前引《史記·秦始皇本紀》可知，“鮫”與“蛟”當為一物，或說至少是頗為近似的物種。

在先秦兩漢文獻中，還可以找到不少“鮫”與“蛟”互通的例子。如《後漢書·鄭太傳》提到“孟賁之勇”，李賢注引《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②此處提到“水行不避蛟龍”，在更早的文獻中多作“水行不避蛟龍”。如《莊子·秋水》：“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③而傳世本《說苑》似無此句，但據《說苑佚文輯補》，此處則作“水行不避蛟龍”。^④由此可知，“鮫龍”即是“蛟龍”。

然而，歷代也有學者並不認同此說，並主張“蛟”與“鮫”判然有別。例如《漢書·司馬相如傳》：“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鼃黿。”注引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蜃，甲有文。黿似鼃而大。”師古曰：“張說蛟者，乃是鮫魚，非蛟龍之蛟也。”^⑤似乎在顏師古看來，此處“鮫魚”與“蛟龍”或係兩物。但在《漢書·司馬相如傳》提到“勇期賁育”時，顏師古又說：“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⑥是亦以“鮫龍”為“蛟龍”之一名。相同的例證還見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張守節《史記正義》也作“水行不避蛟龍”。^⑦可見在唐人看來，“鮫”與“蛟”當為一物，且兩字在行文中可互通，已是較為普遍接受的觀點。故唐人著作中也明確提到：“鮫魚，今作蛟”，^⑧可視為漢唐文獻中相關例證的典型代表。

一般來說，“蛟”在傳統文化中留存的多為興風作浪、危害人間的妖物形象。有學者考察蛟的災害形象，指出其危害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殘害人及家畜；其二是興風作浪，引發水災”。^⑨因此，為避免蛟之為害，古人多有“伐蛟”之舉。例如，《呂氏春秋》這樣解釋《禮

① [漢]許慎撰，黃勇譯：《說文解字》（全注全譯版），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1873頁

② 《後漢書》卷七〇《鄭太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2259頁。

③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點校：《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7，146頁。

④ [西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542頁。

⑤ 《漢書》卷五七上《司馬相如傳上》，2538頁。

⑥ 《漢書》卷五七下《司馬相如傳下》，2590頁。

⑦ 《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3054頁。

⑧ [唐]玄應：《一切經音義三種校勘合刊》（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96頁。

⑨ 陳桂權：《“伐蛟”弭災思想的歷史演變及實踐》，《中華文化論壇》2013年第2期。

記·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中的“伐蛟”二字:“蛟育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也。”^①魏晉時期在長江中下游流域廣泛流傳的“周處除三害”故事,也可視為“伐蛟”傳統的延續,事見《晉書·周處傳》: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②

《世說新語·自新》亦載此事。時人以周處與蛟、虎并稱爲“三害”,不僅強調其危害之大,且更彰顯其“自新”之難能可貴。

先秦古籍又可見“射蛟”故事。如《公孫龍子·迹府》:“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③古代帝王的“射蛟”風習,至漢武帝時尚有留存。《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嶷。登灕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④關於此處的“蛟”,顏師古注:“許慎云‘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四脚,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一二斛瓮,能吞人也。”從“蛟”的生活習性與體貌特征來看,可能其原型即來源於在我國長江流域都有較廣泛分布的鱷魚。

由此推想,秦始皇與漢武帝射殺的“巨魚”,實爲興風作浪的水中“惡神”——蛟。所謂“蛟魚”,其實就是“蛟魚”。

三 秦皇漢武“射蛟”故事的文化象征

史籍所見秦皇漢武“射蛟”故事,不但是古代帝王“射蛟”風習的延續,而且暗含執政合法性宣傳的政治文化象征意義。前引漢武帝“射蛟”史事,是其在元封年間舉行封禪儀式的環節之一,這顯然并非出行途中臨時起意,而是有意安排的結果。所謂“封禪”的意義,《漢書·武帝紀》注引孟康說:“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⑤如果仔細考察漢武帝在位期間完

① 許維通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130頁。

② 《晉書》卷五八《周處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1569頁。

③ [戰國]公孫龍撰,譚業謙譯注:《公孫龍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55頁。

④ 《漢書》卷六《武帝紀》,196頁。

⑤ 《漢書》卷六《武帝紀》,191頁。

成的各項事業，可以發現絕大多數都完成於元封年間以前。因此，此时的漢武帝有理由認為自己已經“功成治定”，應當“告成功於天”了。正如田餘慶先生所說：“元封是一個具有特定意義的年號，它是以舉行封禪典禮而得名的”。^①這與秦始皇在完成統一大業後，多次“出游天下”，并在途中“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等一系列行為頗有相似之處。^②

然而，儘管漢武帝在元封年間已經基本完成了歷史賦予他的使命，但也應當看到，元封年間已經出現了較大的社會險象。如《漢書·石慶傳》：“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③因此，漢武帝在元封年間的“射蛟”與“封禪”等一系列政治表演，還不能簡單等同於統治初期的執政合法性宣傳，而更是出於“轉變政策”等現實需要而作出的穩固統治之舉。

王子今先生指出，秦始皇基於大一統初期的帝國文化建構考慮，為其執政合法性宣傳作出過一系列努力。^④如果從所謂“受命”之說來考察秦漢政治文化，或許還可以找到一些例證。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欲求周鼎泗水”之事：“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⑤作為正統皇權象徵意義的“周鼎”，其對於秦始皇的政治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而從秦始皇在巡遊途中求鼎不得，隨即便前往湘江流域的出游路線來看，似乎也存在繼續尋找所謂“受命”證據的可能性。“取鮫魚”簡所留存的秦代行政記錄，可能也與秦始皇的相關政治實踐有一定聯繫。

關於“取鮫魚”簡提到的“山今盧魚”，《校釋》認為“應是鱸魚的一種”，但我們由此仍無法對兩者之間的聯繫進行更為透徹的說明。值得注意的是，秦漢文獻中曾有湘江流域出現“大魚”的記載。賈誼《新書·修政語上》曾提及黃帝“入江內取錄圖”，注引《藝文類聚》卷十一引《河圖挺佐輔》：“黃帝乃祓齋七日，至於翠嫫之川，大鱸魚折溜而至，乃與天老迎之。五色畢具。魚泛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錄圖。”而注釋者以為賈文之“江”即瀉水，“其源在今湖南寧鄉縣，注入湘江。”^⑥緯書中多見黃帝受“大鱸魚”所獻“錄圖”的傳說，自有其神秘主義色彩。而在後世一些文獻中，“大鱸魚”也作“大鱸”或“大魚”。儘管緯書相關記載的年代要稍晚於秦，但也有學者認為，類似的說法可能在秦漢時期或更早就已經出現。如《易圖明辨》卷一：“按《隋志》云‘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歆以《洛

① 田餘慶：《論輪台詔》，其著《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32頁。

②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248頁。

③ 《漢書》卷四六《石慶傳》，2197頁。

④ 王子今：《秦始皇議定“帝號”與執政合法性宣傳》，《人文雜誌》2016年第2期。

⑤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263頁。

⑥ [漢]陸賈撰，閻振益等校注：《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363頁。

書》爲文字，蓋亦本伏生。伏生嘗爲秦博士，習聞古訓，《洛書》即九疇，必三代以來相傳之學，非臆說也。”^①類似的記載可能都有着更早的史料來源。

關於漢武帝“射蛟”的具體地點，可能也與湘江流域的水產分布有關。《漢書·武帝紀》載武帝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嶷”。文穎曰：“案《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也。”韋昭曰：“在南郡。”師古曰：“韋說是也。”九嶷即在今湖南零陵境內。而《武帝紀》又說“登灂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應劭曰：“灂，音若潛。南岳霍山在灂。灂，縣名，屬廬江。”文穎曰：“天柱山在灂縣南，有祠。音岑。”師古曰：“灂，音與潛同。應說是。”關於秦皇漢武“射蛟”處的地望，年代稍晚的《水經注·湘水》又有這樣的說法：“湖中有君山、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之所游處，故曰君山矣。昔秦始皇遭風於此，而問其故博士。曰：湘君出入則多風。秦王乃赭其山。漢武帝亦登之，射蛟於是山”。^②秦皇漢武“射蛟”具體地點及其巡遊路線的一致性，值得相關研究者留意。而“射蛟”等歷史表演與執政合法性宣傳，可能存在較為密切的內在聯繫。

如果再考慮到秦尚“水德”的政治含義，似乎不應忽視所謂“大鱸魚”授命黃帝傳說與“射蛟”記載的政治文化象征意義。

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曾蒙中國人民大學王子今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楊振紅研究員與匿名評審專家提供寶貴意見。此外，中興大學游逸飛博士、湖南大學周海鋒博士、李洪財博士、歐陽博士與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羅小華博士對本文修改亦多有啓示，謹此一并致謝。

① [清]胡渭撰，鄭萬耕點校：《易圖明辨》，北京：中華書局，1985，23頁。

② [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896頁。

里耶秦簡所見券類文書的幾個問題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張 馳

內容提要 里耶秦簡所見券書將“某手”署於文書正面是區別於其他文書最大的格式特征。相同“某手”的券書筆迹並不一致，相同“某手”的券書不一定由同一人書寫。里耶秦簡所見券書可以進一步深化對“參辦券”制度的認識。大部分券書應是縣廷保存的中辦券。券書刻齒位置與券書功能存在對應關係，書手依此規制對中辦券進行謄寫。可能存在兩種中辦券的寫錄方式。

關鍵詞 里耶秦簡 券 參辦券 刻齒

券類文書是里耶秦簡中常見的文書種類。《文物》2015年第3期刊登了張春龍、大川俊隆、初山明等先生撰作的《里耶秦簡刻齒簡研究——兼論嶽麓秦簡〈數〉中的未解讀簡》一文（以下簡稱《刻齒簡研究》）。《刻齒簡研究》對里耶秦簡券類文書的刻齒以及券書相關的若干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並公布了第八層116件券書的形制信息。這些研究成果及新信息為進一步探討里耶秦簡券書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本文擬對里耶券書有關的幾個問題再作探討。

一 券類文書中的“某手”

里耶秦簡中的“某手”一直是學界所關注的問題，關於它的解釋學界大抵有“簽署人”

“抄手”(“書手”)與“經手人”等觀點。^①至於券類文書,《刻齒簡研究》認為“某手”的“某”即出稟文書中出現的官佐某、史某,應負責“校券的書寫與製作”。^②在本節中,我們將就券書“某手”的一些基本特征進行討論。

首先是券書“某手”的格式特征。券書中的“某手”都署於文書的正面,其位置在正文的下方,正文與“某手”間一般無“/”符號區隔。如:

徑詹粟米一石九斗五升六分升五。 卅一年正月甲寅朔丁巳,司空守增、佐得出以食春、小城旦渭等卅七人,積卅七日,日四升六分升一。 I

令史□視平。 得手。 II 8-212+8-426+8-1632 (平坦;左)

粟米五斗。 卅一年五月癸酉,倉是、史感、稟人堂出稟隸妾嬰兒掄。 I

令史尚視平。 感手。 II 8-1540 (平坦;左)^③

券書中“某手”都署於文書的正面這一特征是與所謂的“群往來書”在格式上最大的區別。普通的往來書,以及計簿類和傳食等文書中,與原生文書相關的“某手”一般都寫於簡背左下方;與回覆文相關的“某手”則以“/”加“某手”的格式書於回覆文後。^④如此,券書與“群往來書”格式上的區別還可以為判斷哪些殘簡屬於券類文書提供依據。

券書“某手”的這一位置特征應當和它的製作流程的特殊性相關。左、右券書是一根木材的一體兩面,由於券書的書寫是在券書分離前完成的,券書的背面并未暴露因而無法書

① 李學勤先生以為“某手”即某人簽署,文書中簽寫“某手”的人是具體負責寫抄、收發文書等事的吏員。馬怡先生以為“手”為手迹、經手之意。《里耶秦簡牘校釋》(以下簡稱《校釋》)則以為“手”指“書手”。邢義田先生認為“手”可以理解為“書寫者”,“書寫者意義較寬,可將抄手以外的書寫者都包括在內”。以上觀點分別見於李學勤《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年第1期,139-140頁;馬怡《里耶秦簡選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編委會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4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137頁;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5頁;邢義田《“手、半”、“曰梧曰荆”與“遷陵公”》,簡帛網,2012年5月7日。理解為“經手人”的則有胡平生《讀里耶秦簡札記》,《簡牘學研究》第4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7-20頁;林進忠《里耶秦簡“貨贖文書”的書手探析》,《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28-35頁。

② 張春龍、[日]大川俊隆、[日]初山明:《里耶秦簡刻齒簡研究——兼論嶽麓秦簡〈數〉中的未解讀簡》,《文物》2015年第3期,58頁。

③ 本文釋文除特殊說明外,一般都引自《校釋》。券類文書釋文編號後,本文根據《刻齒簡研究》附表一將其形態、刻齒位置一并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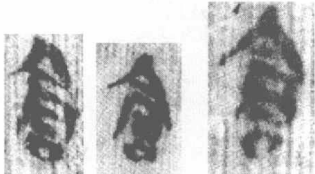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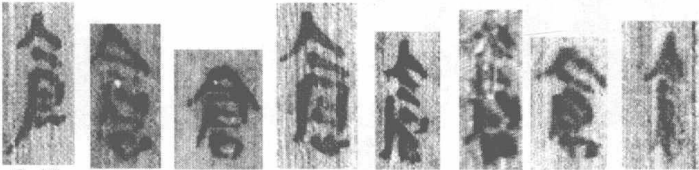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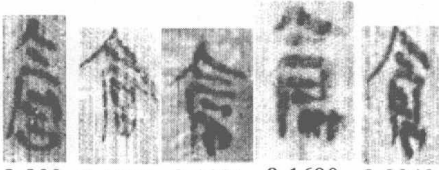
④ 這裏對文書構成的分析使用的是陳偉先生的“原生文書”“次生文書”的概念。原生文書指最初提出問題,引起其他文件的生成的文書層次;次生文書指由原生文書引起,解決問題的文書層次。見陳偉《包山楚司法簡131—139號考析》,《江漢考古》1994年第4期,71頁;《包山竹簡所見楚國的文書制度》,《中華文史論叢》1995年第4期,62頁。多個機構間往來文書的起始正文與簡背左下角“某手”為一人所書的觀點,請參見邢義田《湖南龍山里耶J1(8)157和J1(9)1-12號秦簡的文書構成、筆迹和原檔存放形式》,簡帛網,2005年11月14日,後收入其著《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北京:中華書局,2011。

寫,因此券書的內容(包括“某手”)一般都書寫於券書的暴露面。中辨券爲了保持與左、右券格式的一致,也會將“某手”寫於券書正面,具體過程請見本文第四節。

其次是券書“某手”的筆迹特征。券書筆迹與券書書手問題直接相關。如果“某手”的“某”是券類文書的書手,那麼同署爲“某手”的文書筆迹應當一致。

茲以出稟券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感手”券書爲例進行分析。本文首先以倉字爲例對其筆迹嘗試分析:

表 1 “感手”的“倉”字筆迹分組

| A 組 | B 組 |
|--|--|
|  <p>8-184 8-762 8-1239 8-1540</p>  <p>8-1580 8-1794 8-2245</p> |  <p>8-45 8-211 8-217 8-270 8-448 8-606 8-763 8-766</p>  <p>8-800 8-1063 8-1081 8-1690 8-2249</p> |

資料來源:《里耶秦簡》(壹)

我們可以嘗試區分出 A 組與 B 組兩種筆迹。B 組筆迹內部雖有差別,但其與 A 組筆迹有着更爲顯著的區分。A 組字形主要有兩個特征:① 戶形撇筆 a 較短,不超過下方口形;② 右上的捺筆 b 微呈弧形而下垂;③ 字形整體呈右上-左下傾斜(見圖 1)。① B 組筆迹都在這兩點上與 A 組筆迹有所差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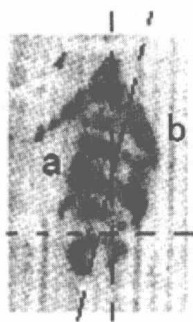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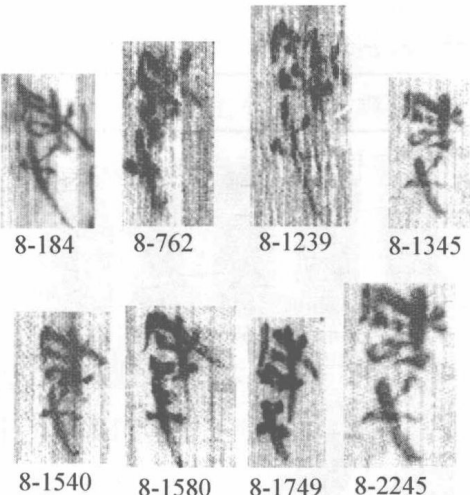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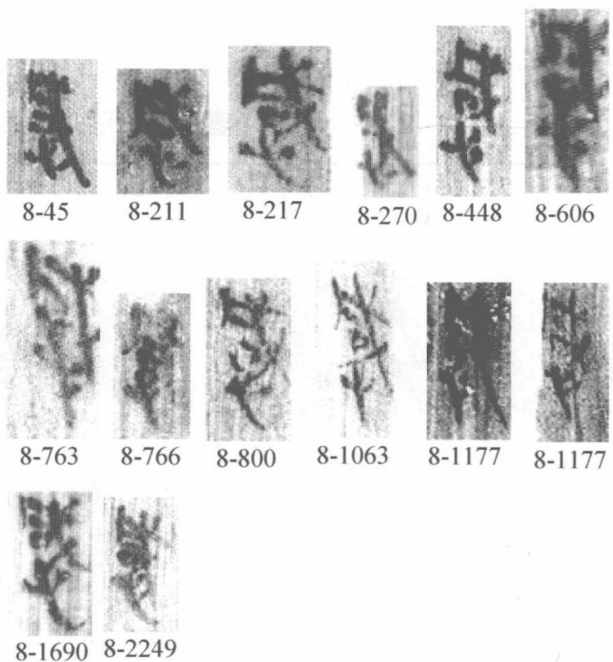


圖 1 A 組倉字字形特征示意圖

① A 組“感”形第二特征由匿名審稿專家指出,謹致謝忱。

“倉”字筆迹的分組也適用於“感”字：

表 2 “感手”的“感”字筆迹分組

| A 組 | B 組 |
|--|---|
|  |  |

資料來源：《里耶秦簡(壹)》

A 組感字筆迹依舊典型,除 8-1794 略特殊外,A 組感字筆迹的主要特征是:①橫筆 a 長於或等長於戈鈎 b;②心形左側一點與右側下方一點作一橫筆 c(見圖 2)。① B 組筆迹或與這兩個特征中的一個有所差異,或完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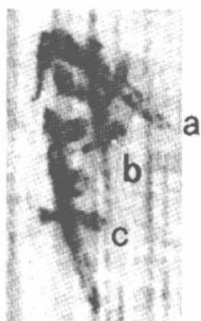


圖 2 A 組感字字形特征示意圖

① A 組“感”形第二特征由謝坤先生指出,謹致謝忱。

可見，同署爲“感手”的 A 組與 B 組券書筆迹存在差異。絕大部分署“感手”的券書上所記錄的出稟時間都在秦始皇三十一年，A 組的具體日期則有十二月甲申（8-1239+8-1334）、十二月戊戌（8-762）、正月戊午（8-1580）、五月乙卯（8-1345+8-2245）、五月癸酉（8-1540）、七月乙丑（8-1794）。A 組券書跨越了八個月份，顯然 A 組字形的這些特征並不是某書手在某特定場合內的短時書寫行爲中產生的，而應當是某書手固定的書寫習慣。除 A 組字形外，三十一年“感手”券書中還存在着大量與 A 組字形有差別的 B 組字形，我們可以據此推測今見里耶秦簡中署爲“感手”的券書可能並不是同一人書寫的。

署爲相同“某手”的券書不一定是同一人書寫的，也就是說券書的書手不一定就是“某手”的“某”。但我們是否就可以判定“某手”僅僅是指“經手人”而與“書寫者”無關呢？恐怕還不可以。《校釋》認爲：“稟食文書中參與出稟的史、佐與某‘手’爲同一人。可見‘手’當指書手。”這一意見應當是正確的。通過本文下節的討論可知，這些由倉上交的出稟券書是中辨券而非右券。我們不能排除在出稟現場製作完成的出稟券確實由“某手”的“某”書寫，而膳錄上交縣廷的中辨券則由他人代寫的可能性。據里耶秦簡可知，遷陵縣下轄各官除官佐外還有史、冗佐、史冗等職守。^①中辨券的膳錄者可能就是這些官佐以外的吏。^②具体情形还有待討論。

綜上，券書將“某手”署於文書正面是區別於其他文書最大的格式特征。相同“某手”的券書筆迹並不一致，相同“某手”的券書不一定由同一人書寫。

二 參辦券

“參辦券”是分爲左、中、右三份的券書。近年出土的秦與漢初律法中有若干條與券書制度有關，其中幾條涉及到了“參辦券”這一制度，現羅列如下：

縣、都官坐效、計以負賞（償）者，已論，嗇夫即以其直（值）錢分負其官長及冗吏，而人與參辦券，以效少內，少內以 80 收責之。其入贏者，亦官與辦券，入之。其責（債）毋敢隄（逾）歲，隄（逾）歲而弗入及不如令者，皆以律論之。金布 81^③（《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金布律》）

① 如簡 8-1555 的“冗佐上造臨漢都里曰援”、8-1275 的“史冗公士旬陽隄陵竭”。

② 今見里耶秦簡券書所署的“某手”，一般都是各官官佐。與尉相關的券書則署尉史之名。由各官吏署名的僅見秦始皇三十一年史感和史逢（8-2239+8-1830+8-1815），綴合見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六）》，簡帛網，2012 年 6 月 4 日。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釋文注釋 39 頁。

《金布律》曰：官府、爲作務市受錢，及受齋、租、質、它稍入錢，皆官爲鈔，謹爲鈔空，嬰（務）毋令錢 1411 能出，以令若丞印封鈔，而人與入錢者參辨券之，輒入錢鈔中，令入錢者見其入。月壹輸 1399 鈔錢及上券中辨其縣廷；月未盡而鈔盈者，輒輸之。不如律，貲一甲。1403（《嶽麓書院藏秦簡》）

官、爲作務市及受租、質錢，皆爲鈔，封以令、丞印，而人與參辨券之，輒入錢鈔中，上中辨其廷。429^①（《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金布律》）

民宅園戶籍、年細籍、田比地籍、田合籍、田租籍，謹副上縣廷 331……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財物，鄉部嗇夫身聽其令，皆參辨券書之，輒上 334 如戶籍。有產者，以券書從事；毋券書，勿聽。335^②（《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戶律》）

以上是今見秦與漢初律法中參辨券制度的相關規定。^③除當事雙方所持券書外，還需另外寫錄一份券書以起到備份、存檔券類文書的功用。^④里耶秦簡中所見若干關於參辨券的文書有助於加深對這一制度的認識。

里耶秦簡 8-1452：

【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己卯，倉守敬敢言之：出西廡稻五十 I □石六斗少半斗輸；案粟二石以稟乘城卒夷陵士五（伍）陽□ II □□□。今上出中辨券廿九。敢言之。

□手。 III 8-1452

□申水十一刻刻下三，令走屈行。 操手。 8-1452 背

又簡 8-500、8-776、8-1201：

卅七年，廷 I 倉曹當計 II 出券□一。 III 8-500

卅年四月盡九月，I 倉曹當計禾 II 稼出入券。 III 已計及縣 IV 相付受 V 廷。 第
甲。 VI 8-776

倉曹 I 廿九年 II 當計出入 III 券甲 IV 筭。 [圖案] V 8-1201

① 嶽麓書院藏秦簡及張家山漢簡《金布律》釋文引自陳偉《關於秦與漢初“入錢鈔中”律的幾個問題》，《考古》2012 年第 8 期，70 頁。

② 彭浩、陳偉、[日]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22 頁。

③ 除以上各條律文外，參辨券亦見於龍崗秦簡“□于禁苑中者，吏與參辨券□”（簡 11）。由於原簡殘斷，本文并未將其羅列於上。

④ 嶽麓書院藏秦簡明確提到中辨券需要上交縣廷，張家山漢簡《戶律》則未明言上交縣廷的是左右券，還是中辨券。睡虎地秦簡《金布律》中中辨券的去向律文并未明述，此類中辨券或與其他中辨券類似而上交縣廷，抑或移交少內，尚需探索。

根據以上文書的內容,可以得到兩點認識。首先由簡 8-1452 可知,倉要上交出券的中辨券給縣廷。這有助於理解為何以遷陵縣廷存檔文書為主的里耶秦簡中會有大量由倉經辦的出稟券,也就是說里耶秦簡中大部分的出稟券書應該都是由縣廷保管的中辨券。除出稟券外,簡 8-1452 簡文也顯示西廡出輸券的中辨券也須上交中辨券於縣廷。

那麼其他類別的出券是否也應該上交中辨券給縣廷呢?

簡 8-890+8-158:

卅年九月庚申,少內守增出錢六千七百廿,環(還)令佐朝、義、佐孟貲各一甲,史犴二甲。I

九月丙辰朔庚申,少內守增敢言之:上出券一。敢言之。/欣手。九月庚申日中時,佐欣行。II 8-890+8-1583 (屋脊;右)

這是一份少內出錢券。根據券書中“欣手”和發文記錄“佐欣行”可知,這本應是一件存檔於少內的右券。^①券書中提到“上出券一”於縣廷,那麼該券書還要上交一份給遷陵縣廷。券書既要保存於少內一份,又要由少內上交一份給縣廷,應上交給縣廷的自然是券書的中辨券。據此還可以推測,與出稟券類似的出食券、出貸券等,都應由相關各官上交中辨券於縣廷。而據簡 8-500“禾稼出入券”、8-1201“當計出入券”可推測,入券也同出券一樣,在分別交付給付受方券書外,各官也應上交中辨券於縣廷。

其次,通過簡 8-1452、8-500、8-776、8-1201 等筭牌可知,中辨券是遷陵縣廷計類文書使用的原始資料。^②

如上文所述,出券應當上交中辨券給縣廷。除出券外,里耶秦簡中還有相當數量的付受券,這類券書是否也應該製作并上交中辨券呢?里耶秦簡中並沒有直接的證據,但簡 6-8 可以為我們的討論提供線索:

□□年四月己未朔丙子,成都受遷□ 6-8 (平坦;右)

據此簡朔日可知,這是一份秦始皇三十五年製作的券書。三十五年四月丙子,遷陵縣某官交付成都某物,簡 6-8 是這一付受活動中的受券文書。這封文書出現在里耶秦簡中,說明這是

① 根據里耶秦簡其他文書的收發記錄可知,收發記錄除個別相報文書和收發錯誤的文書外,都由文書的存檔機構書寫。參見趙炳清《秦代地方行政文書運作形態之考察——以里耶秦簡為中心》,《史學月刊》2015 年第 4 期,13 頁。根據這份文書的屋脊形外觀也可以推測出這是一份右券文書,詳見下節。

② 沈剛先生於此曾有討論,他認為券是計的具體內容或計的編制基礎。沈剛:《〈里耶秦簡〉【壹】中的“課”與“計”——兼談戰國秦漢時期考績制度的流變》,《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1 期,65 頁。

一份遷陵縣廷或遷陵縣某官的存檔文書。但是,既然是遷陵縣廷(或某官)的存檔文書,遷陵縣廷(或某官)自然應當保存這份文書的付券,即內容為“某物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丙子遷陵某官(守)某付成都 某手”的券書。^①而這份文書的受券則應當為成都所保管。因此,這份保存於遷陵縣廷(或某官)的受券應是由遷陵縣某官上交給縣廷的“受中辨券”。但是為何上交的中辨券不謄錄本官保存的付券內容,而將受券內容抄寫其上呢?本文第四節將有討論。

至於遷陵縣廷下轄各官之間的付受券,雖然它們在以遷陵縣廷為主的里耶秦簡中被發現,這些付受券中也存在着同署“某手”而筆迹不同的文書,還有些券書又有明顯的寫錄錯誤,這些現象或許反映了各官間的付受活動也需上交中辨券於縣廷,以便縣廷掌握下轄各官間的物資流動,但是今見里耶秦簡中并未有直接的證據顯示各官也需謄錄中辨券并上交縣廷的規制,本文於此做闕疑處理。^②



綜上,根據近年出土秦與漢初律法可知,參辨券是當時官方常用的一種券書類別。上交中辨券的制度起到了備份、存檔券類文書的功用。里耶秦簡則顯示遷陵縣各官的出入行為及與他縣間的付受行為都應上交中辨券於縣廷。這些券書既是計類文書的原始資料,又可以使縣廷掌握本縣官系統與外界間的物資流動。

三 刻齒位置與券書功能的對應關係

初山明先生曾根據漢簡的自名確定了券類文書的左右券劃分。“左”“右”以刻齒正對觀察者面前為準,左邊的券為左券,右邊的券為右券。如此,左券刻齒在書寫面之右,而右券刻齒在書寫面之左。^③

刻齒位置是否與券書的功能有關,前輩學者根據出土的漢晉簡牘已多有討論,觀點大概如下:①傳世文獻中關於左券與右券的功能表述不同,無法通過傳世文獻確定二者的功能;②西北出土的正背剖分的漢簡其刻齒位置與券書性質應無關聯;③魏晉時代左右剖分的出

① 由本文下節討論可知,付券與受券本是一份木材一體兩面的文書,兩份文書分別由物資的支付方與收受方保管。

② 如 8-898+8-972 與 8-1771 同署為“臂手”的兩份券書筆迹迥異。各官付受券中明顯的寫錄錯誤如簡 8-824+8-1974“半斗。 卅五年八月丁巳朔丙戌,倉茲司空守俱。”,其刻齒位置據圖版在券書右側(注釋在左側),據本文第三節可知,此券書內容本應是“倉茲受司空守俱”,此處遺漏了“受”字。

③ [日]初山明著,胡平生譯:《刻齒簡牘初探——漢簡形態論》,中國社科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著《簡帛研究譯叢》第2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152頁。

入“合同”券書左右功能有別，出物一方持右券，入物一方持左券。^①至於里耶秦簡，《刻齒簡研究》認為如同傳世文獻記載，並沒有發現區分里耶秦簡左右券功能的理由。^②

但是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的一條簡文卻顯示出秦人在法律實踐中對左右券的功能實則有所區分：

可(何)謂“亡券而害”？·亡校券右爲害。 179^③

這條簡文規定“亡券而害”具體指的是丟失校券右券而造成損失。可見在秦法實踐中秦人對左右券的功能是有區分的。

那麼左右券具體的功能區別又是什麼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應當首先找到里耶秦簡中的左右券。里耶秦簡主要以遷陵縣廷的存檔文書爲主，保存的券書自然也以各官上交縣廷的中辨券爲主。^④但如同里耶秦簡中存在着少量遷陵下轄各官的存檔文書一樣，里耶秦簡中也應有少量各官保存的左右券。

《刻齒簡研究》指出了參辨券的製作方法：

“參辨券”的製作方式首先將木材加工成可以切割成三片的、具有足夠厚度的木條，然後將其切割爲正面、中間、反面三片，但下端不切割到底，正面和背面的記錄完成後刻入刻齒，再將剩餘部分切割到底。中間的一片一面削平，謄寫好簡文即可完成。這大概就是“三辨券”的製作方法。^⑤

我們認同這一製作流程。據此，可以對左、中、右三券的形態做出如下推論，從而找出里耶秦簡中的左右券：

①屋脊形的券書一定是左券或右券。

②平坦形的券書有可能是左、中、右三券中的任意一種。

據此，可以用屋脊形券書作爲依據來判定左右券的功能。將屋脊型券類文書刻齒位置及其行爲之間的對應關係對應起來，可得表3：

① 胡平生：《木簡出入取予券書制度考》，《文史》第36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日]初山明著，胡平生譯：《刻齒簡牘初探——漢簡形態論》；胡平生：《木簡券書破別形式述略》，《簡牘學研究》第2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

② 張春龍、[日]大川俊隆、[日]初山明：《里耶秦簡刻齒簡研究——兼論嶽麓秦簡〈數〉中的未解讀簡》，54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釋文注釋39頁。

④ 除極個別例外，里耶秦簡各類券書的受付主體都是遷陵縣下轄各官，縣廷一般不直接參與物資的付受活動。因此遷陵縣廷保管的文書一般都是中辨券。

⑤ 張春龍、[日]大川俊隆、[日]初山明：《里耶秦簡刻齒簡研究——兼論嶽麓秦簡〈數〉中的未解讀簡》，56頁。

表3《里耶秦簡》(壹)屋脊形券書與付受行為對應表

| 簡號 | 位置 | 行為 |
|--------------------|----|----|
| 8-888+8-936+8-2202 | 右 | 受 |
| 8-1783+8-1852 | 右 | 入 |
| 8-561 | 左 | 付 |
| 8-761 | 左 | 出貸 |
| 8-1055+8-1579 | 左 | 出賣 |
| 8-1135 | 左 | 出食 |
| 8-1660+8-1827 | 左 | 出貸 |

資料來源:《刻齒簡研究》

可以看到,屋脊形券類文書的刻齒位置與券書上的付受行為有着明顯的關聯。刻齒在右者(左券)對應的行為是“受”“入”等物資的收受行為;刻齒在左者(右券)對應的是“出”“付”等物資的支付行為。如此,則左、右券實際應當承擔着不同功能:左券應當是物資收受憑證,而右券應當是物資支付憑證。

對於上述推論,還可以用其他券書(第八層其他券書和第六層券書)進行驗證,其對應關係如表4:

表4《里耶秦簡》(壹)平坦形券書與付受行為對應表

| 簡號 | 位置 | 行為 |
|----------------------------|----|----|
| 6-8 | 右 | 受 |
| 8-1352 | 右 | 受 |
| 8-2247 | 右 | 出粟 |
| 6-23 | 左 | 出 |
| 8-1686 | 左 | 出 |
| 8-800 | 左 | 出☐ |
| 8-1239+8-1334 | 左 | 出粟 |
| 8-1540 | 左 | 出粟 |
| 8-1545 | 左 | 出粟 |
| 8-1550 | 左 | 出粟 |
| 8-1551 | 左 | 出粟 |
| 8-1557 | 左 | 出粟 |
| 8-1574+8-1787 | 左 | 出粟 |
| 8-1590+8-1839 ^① | 左 | 出粟 |
| 8-211 | 左 | 出粟 |

^① 姚磊:《里耶秦簡牘綴合札記(二)》,簡帛網,2015年6月7日。

續表

| 簡號 | 位置 | 行爲 |
|-----------------------------------|----|------|
| 8-217 | 左 | 出稟 |
| 8-2246 | 左 | 出稟 |
| 8-2249 | 左 | 出稟 |
| 8-45+8-270 ^① | 左 | 出稟 |
| 8-56 | 左 | 出稟 |
| 8-760 | 左 | 出稟 |
| 8-762 | 左 | 出稟 |
| 8-763 | 左 | 出稟 |
| 8-764 | 左 | 出稟 |
| 簡號 | 位置 | 行爲 |
| 8-766 | 左 | 出稟 |
| 8-821+8-1584 ^② | 左 | 出稟 |
| 8-925+8-2195 | 左 | 出稟 |
| 8-811+8-1572 | 左 | 出購 |
| 8-1549 | 左 | 出買 |
| 8-1002+8-1091 | 左 | 出賣 |
| 8-1162+8-1289+8-1709 ^③ | 左 | 出賣 |
| 8-845 | 左 | 出賣 |
| 8-907+8-923+8-1422 | 左 | 出賣 |
| 8-993 | 左 | 出賣 |
| 8-1115+8-1335 ^④ | 左 | 出食 |
| 8-1576 | 左 | 出食 |
| 8-474+8-2075 | 左 | 出以□ |
| 8-781+8-1102 | 左 | 出貸 |
| 8-1751+8-2207 | 左 | 出以爲獻 |
| 8-891+8-933+8-2204 | 左 | 出以爲獻 |
| 8-843+8-1240 ^⑤ | 左 | 付 |
| 8-1233+8-1512 | 左 | 付 |
| 8-1544 | 左 | 付 |

① 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七則）》，簡帛網，2012年5月1日。

② 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七則）》。

③ 雷海龍：《里耶秦簡試綴五則》，簡帛網，2014年3月15日，後收入武漢大學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9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④ 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四）》，簡帛網，2012年5月21日，後收入武漢大學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9輯。

⑤ 雷海龍：《里耶秦簡試綴五則》。

續表

| 簡號 | 位置 | 行爲 |
|-----|----|----|
| 6-3 | 左 | 受 |

資料來源:《刻齒簡研究》

如上表所示,刻齒位置與行爲的對應關係基本如同之前的推論,左、右僅各有一例與前述推論不合(8-2247、6-3,表中以斜體表示)。這兩份券書的錯誤既有可能是製作、寫錄時發生的,也有可能是在謄抄中辨券的過程中出現的。由於平坦形券書中應有大量的中辨券,因此我們還可以由上表得知,上交縣廷的中辨券也須依左右券的功能劃分在中辨券相應的書寫面進行謄錄。

這一推論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獲得驗證:

首先,前引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的“亡校券右爲害”可據此得到合理的解釋。“校券右”即右券。根據上述推論,右券是物資支付方所持的券書。右券丟失即丟失了物資支付的憑證,顯然會造成更大危害。

其次,里耶秦簡 8-435:

不智(知)器及左券在所未 8-435

該簡文顯示的信息是某“器”與“左券”一同丟失。我們知道,在物資支付後,物資應在收受方手中。所以,這裏丟失“器”的主體應該就是收受方,左券就是收受方所持的憑證。

再次,鄔文玲先生曾指出簡 8-96、8-447、8-889 幾支關於“繭六兩”的券書應該與繭的征收有關。“繭六兩”正與簡 8-518 提到每户當出的戶賦相當,因此鄔文玲先生推斷這種刻齒在右的券書應當是“少內留存的收受憑證”。^①根據前述推論,鄔文玲先生推斷這些券書是收受憑證應當是正確的,但這些券書是否是由少內存檔的左券尚不能確定。

綜上,刻齒位置與券書性質密切相關。右券(刻齒在左的券書)是物資的支付方所持的憑證,其對應的付受行爲是“付”“出”;左券(刻齒在右的券書)是物資收受方所持的憑證,其對應的付受行爲是“受”“入”。上交縣廷的中辨券在謄錄時也須遵守這一規制。

魏晉時期左右剖分的出入錢糧物品的券書,一般以“出”字冠右券,“入”字冠左券。胡平生先生曾論述“大約在漢代以後,出物執右券,入物執左券,這一制度才確定下來”。^②今據里耶秦簡可知,這種左右券功能的劃分在秦時可能已然成爲官方的定制。至於西北漢簡中爲何出現了這種對應關係的混亂,還有待討論。

^① 鄔文玲:《里耶秦簡所見“戶賦”及相關問題瑣議》,武漢大學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8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17-219 頁。

^② 胡平生:《木簡出入取予券書制度考》,153 頁。

四 中辨券的寫錄

《刻齒簡研究》一文指出了校券的製作流程,根據本文上節的討論,還可以進一步深化對券書製作流程的認識。

根據上節刻齒位置與券書性質關係的推論,可知不同的刻齒位置對應不同功能的券書。因此,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推導出在同一付受活動中,付受雙方所持憑證的內容應是相對的,而不是相同的。即支付方所持的憑證上書寫的付受行為是“出”“付”,而收受方所持的憑證則書寫的是“入”“受”。如此,才能保持刻齒位置與券書性質的對應關係,如果雙方所持的券書內容相同則必然導致上述對應關係的混亂。

這種正背剖分、內容相對的券書也見於漢簡。如初山明先生曾指出敦煌漢簡 1601、1709 兩份券書應是一對。^①兩份券書一份是布袍賣券,一份是布袍買券,內容相對。胡平生先生又舉出居延漢簡 8.5 和敦煌漢簡中的一枚未完成的券書兩個實例,以說明漢簡中正背剖分是常見的券書破別方式。^②而這兩例也是正背分別寫着“出”“入”二字。可見,漢代依舊沿用里耶秦簡這種正背剖分、內容相對的券書規制。

那麼中辨券又是如何製作寫錄的呢?根據里耶秦簡的現存資料,中辨券的寫錄方式應該有兩種。

第一種是在參辨券中的左券(或右券)與另外兩券分離後,直接對中辨券的暴露面修治并在其上書寫。書寫的內容則應與保留的右券(或左券)內容成相對關係。然後再將中辨券與右券(或左券)分離。如前揭簡 6-8:

□□年四月己未朔丙子,成都受遷□6-8 (平坦;右)

這是一份由遷陵縣廷保留的中辨券。如前文所述,遷陵縣某官應保留此份文書的付券,但是其上交遷陵縣廷的中辨券內容却是受券。為何其上交的中辨券不按照本機構保留的付券謄錄?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書寫者在中辨券未與右券分離時,根據背面付券的內容,或根據已分離的受券內容,直接在中辨券的暴露面上書寫或抄錄與付券相對的內容。示意圖如圖 3。

第二種方式是在三券各自分離後,由其中一方根據己方保留的券書,在中辨券相應的書寫面上謄錄相同的內容。這樣的製作方式多見於官方與個人間的付受活動中,如出稟、出食、出貸等等;以及前揭少內征收繭時少內應上交的中辨券也應如此製作。這些付受活動都在官方與個人間展開,上交的中辨券內容自然須以官方為主體。因此這些需上交的中辨券內容應與各官保存的券書內容相同。示意圖如圖 4。

① [日]初山明著,胡平生譯:《刻齒簡牘初探——漢簡形態論》,166 頁。

② 胡平生:《木簡券書破別形式述略》,54-55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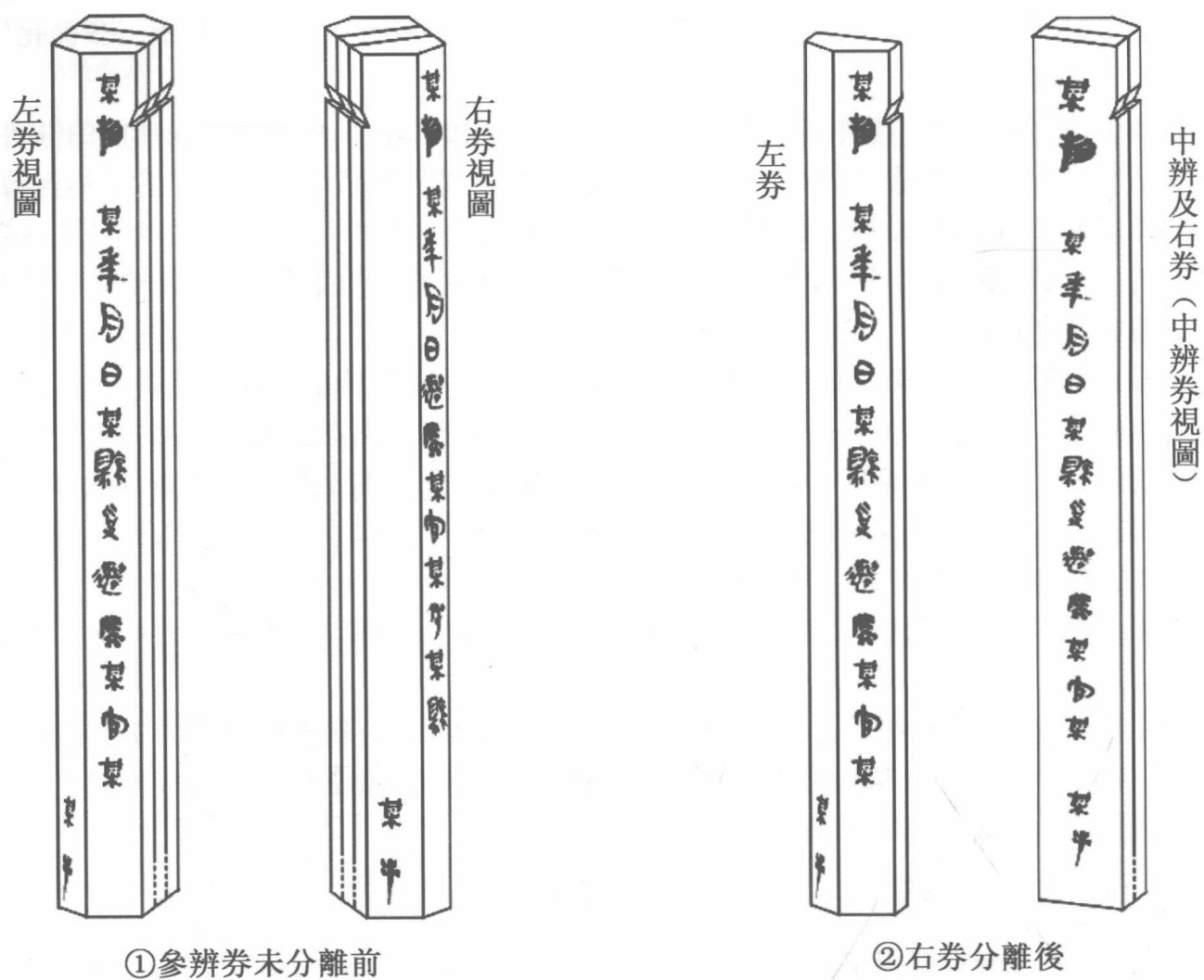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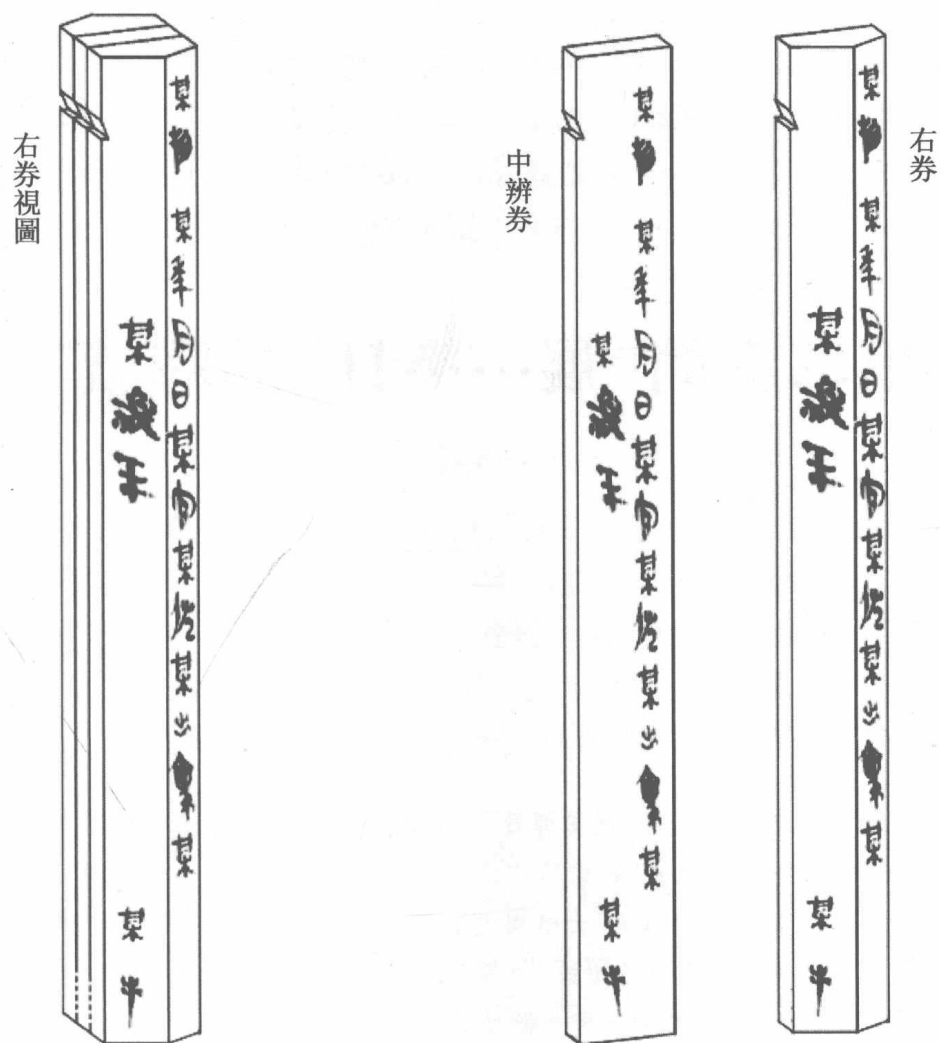


圖3 參辨券製作方式一示意圖



①參辦券未分離前

②參辦券各自分離後

圖4 參辦券製作方式二示意圖

附記：本文承碩士導師陳偉老師審閱指正。魯家亮老師、姚磊師兄、謝坤師兄亦提出很多寶貴意見。投稿後又蒙匿名審稿專家指正，受益良多，謹致謝忱！惟文中疏誤，由本人負責。

里耶秦簡“展……日”的釋讀*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文學院 伊 強

內容提要 里耶秦簡中有“展約日”“展簿留日”一類的文句,嶽麓書院秦簡中也有“展其日”的話。綜合來看,這幾例“展”字都是“推遲、延後”的意思,“展……日”相當於現在的寬泛說法“延期”。秦漢律令對文書傳遞的時間有嚴格的要求,但“簿留”大概與之有別,雖有不少關於簿籍上呈時間的規定或要求,但却未檢得有關於簿籍留遲該如何處理的直接證據。“簿”常以人或錢物數量值為主項,多是由下級單位編寫呈報給上級的,從情理上說上呈日期有所延遲大概是難以避免的。

關鍵詞 里耶秦簡 展約日 展簿留日 延期

里耶秦簡中有如下一枚文書牘:

(1)廿八年七月戊戌朔癸卯,尉守竊敢【言】之:洞庭尉遣巫居賁公卒安成徐署遷陵。今徐以壬寅事,謁令倉賁食,移尉以展約日。敢言之。A

七月癸卯,遷陵守丞臚之告倉主,以律令從事。/逐守。即徐□入□。B(里耶秦簡 8-1563)

癸卯,胸忍宜利錡以來。/敞半。齎手。C(里耶秦簡 8-1563 背)^①

該文書從內容及用語看可分為三部分,開頭至“敢言之”即 A 是“尉守竊”的發文,B 是遷陵

* 本文寫作得到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出土秦漢簡帛用字及書寫習慣研究”(項目批准號:13YJCZH229)的支持。

①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361 頁。本文所引里耶秦簡釋文注釋皆出自該書,不另注。

縣的批文，C 則是收文及抄寫的記錄。但具體文意仍有些不易解釋清楚的地方。先來看頗為關鍵的“展”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注釋說：“展，記錄，校錄。《周禮·夏官·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鄭玄注：‘展，謂錄視其牲體數。’《儀禮·聘禮》：‘史讀書展幣。’鄭玄注：‘展，猶校錄也。’”并解釋“約日”為“疑指署遷陵的日期”。作為此書撰著者之一的何有祖先生後來又解釋說：“‘展約日’似指‘展約’之日，即校錄‘約’的日期。”^①“展約”則見於如下簡：

(2) 吏貲當展約□(里耶秦簡 8-2037)

十五分日二四斗者六錢。I

二斗九十分日五十一。II(里耶秦簡 8-498+8-2037 背)^②

從圖版看，8-2037“約”下尚有可容一字的空白，而這一空白遠遠大於“吏貲當展約”的字間距。再者，何有祖先生已將 8-2037 背面與 8-498 綴合，但《里耶秦簡（壹）》并未刊布 8-498 另一面的照片，也就是可與“吏貲當展約”綴合連讀一面的照片，可能這一面并無文字，故而未收錄其照片。這樣的話，“吏貲當展約”之下空白就更大，因此，(2)的“展約”之後當無補一“日”字的可能。由於簡文信息有限，“展約”具體該如何理解尚不清楚。需要說明的是，此簡形制特別，簡首塗黑，當是標題簡。

“約日”，當即約定的日期之意，古書有與之意義接近的“約期”，如《逸周書·武寤》：“約期於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後漢書·馮異傳》：“與賊約期會戰。”^③祇是在傳世文獻裏，“約日”的用例都比較晚，如《宋書·何尚之傳》：“望眷有積，約日無誤。”^④《宋史·宗室傳·信王棒傳》：“願委臣總大事，與諸砦鄉兵，約日大舉，決見成功。”^⑤又《李綱傳》：“上深以為然，約日舉事。”^⑥至於(1)的“約日”具體所指為何，需根據前後文提供的信息來分析。平曉婧、蔡萬進二位先生已指出(1)是一件“令倉貲食的官文書”，^⑦但無清晰論說。從前後文看，與理解“約日”可能直接相關的信息，一是“巫居貲公卒安成徐署遷陵”，《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注釋說：“居貸，疑與居貲贖債類似。”黃浩波先生則指出，“貸”可能是債務之一種。^⑧張伯元先生則認為：“‘貲(貸)’還并不一定限於貸款、放債，也可以放貸其他物資，

① 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七）》。

② 兩簡的綴合，見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七）》，簡帛網，2012 年 6 月 25 日。

③ 《後漢書》卷一七，646 頁。

④ 《宋書》卷六六，1736 頁。

⑤ 《宋史》卷二六五，8728 頁。

⑥ 《宋史》卷三五八，11244 頁。

⑦ 平曉婧、蔡萬進：《里耶秦簡所見秦的出糧方式》，《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4 期。

⑧ 黃浩波：《〈里耶秦簡（壹）〉所見廩食記錄》，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11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24 頁。

如糧食、衣物等。”^①這句話大意是說,“徐”因為“居貸”的關係而署遷陵。其次是“謁令倉貸食”一句,與之相關,在里耶秦簡中有不少“出貨”的記錄,^②如以下兩例:

(3) □□出貨居貸士五(伍)巫南就路五月乙亥以盡辛巳七日食。

□ 缺手。(里耶秦簡 8-1014)

(4) □已朔朔日,啓陵鄉守狐出貨適戍□□(里耶秦簡 8-1029)

以上兩簡,當是官方的“出貨”記錄。“謁令倉貸食”的“貸食”當與這類記錄有關聯。聯繫“今徐以壬寅事,謁令倉貸食”的文意看,“約日”更似與“居貸”有關,祇是簡文“壬寅事”具體所指無從考索而已。與之可參照的,在西北漢代簡牘中有一類“責券簿”,^③如以下內容較為完整的例子:

(5) 七月十日郭卒張中功賞買皂布章單(禪)衣一領,直三百五十,三堆史張君長所,錢約至十二月盡畢已,旁人臨桐史解子房知券□□(居延漢簡 262.29)^④

(6) 元康二年十一月丙申朔壬寅,居延臨仁里耐長卿賞買上黨潞縣直里常壽字長孫青復綺一兩,直五百五十,約至春錢畢已,姚子方□(居延新簡 EPT57:72)^⑤

(7) 元平元年七月庚子,禽(擒)寇卒馮時買囊絡六枚楊卿所,約至八月十日與時小麥七石六斗,過月十五日以日斗計,蓋卿任。(敦煌漢簡 1449A)^⑥

以上三簡中的“約某時”都是償還債務的日期。因此,簡文中的“約日”可能是償還債務的日期,即“徐”償還“貸”的日期。

言歸正傳,再來看“展約日”的解釋問題。從詞語結構上說,何有祖先生所說的“‘展約日’似指‘展約’之日,即校錄‘約’的日期”,不够確切,從語法上看當是一個動賓結構,同下文的“展簿留日”。在里耶秦簡中有與(1)、(2)辭例結構一致的“展簿留日”,共兩例,如下:

(8) 應(應)令及書所問且弗應(應),弗應(應)而云當坐之狀何如?其謹按(案)致,更上奏央(決)展簿(簿)留日,^⑦毋騰却它(里耶秦簡 8-1564)

(9) 爲奏,傳所以論之律令,言展簿(簿)留日。·令(里耶秦簡 8-869+8-1617)^⑧

① 張伯元:《嶽麓秦簡(三)字詞考釋三則》,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14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50頁。

② 詳參平曉婧、蔡萬進《里耶秦簡所見秦的出糧方式》。

③ 詳參李天虹《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140-142頁。

④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436頁。

⑤ 馬怡、張榮強主編:《居延新簡釋校(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539頁。

⑥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釋文247頁。

⑦ “央”,《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原釋作“史”,今從陳偉師改釋,見陳偉《里耶秦簡中的“央”》,簡帛網,2003年9月26日。

⑧ 兩簡的綴合,見何有祖《里耶秦簡牘綴合(六則)》,簡帛網,2012年12月24日。

里耶秦簡中也有“簿留日”的用例：

(10) 馬以傳食入券及留不行日，移索(索)，索(索)集報參川都水簿(簿)留日(里耶秦簡 14-638) ①

因此，“展簿留日”當是動賓結構，即“展/簿留日”。里耶秦簡中又有“留簿”或“簿留”的用例：

(11)…… I

丞主移【真】□Ⅱ

告主。/緩手。□Ⅲ

言勿留簿(簿)□Ⅳ(里耶秦簡 8-611)

(12)□□封簿(簿)留二封□(里耶秦簡 8-1129)

(13)□留簿(簿)牒上，敢言之。□(里耶秦簡 8-551)

(11)的“留簿”前有否定副詞“勿”，因此不能將其理解為一個句法成分，也就是不能將其看作一個名詞性詞語。(12)(13)兩例由於簡文殘缺比較厲害，一時難以作語法分析。因此(11)-(13)中的“簿留”“留簿”，對於“展簿留日”的理解難以有直接的幫助。

上文所討論的“展約日”“展簿留日”結構一致，且都是“展……日”的意思，因此其中的“展”字詞義當一致。(1) 注釋所舉《周禮》“展而受之”的“展”應該是“展示、陳列”的意思。而《儀禮》“史讀書展幣”的“展”，鄭玄注所云“校錄”則含有“校”“錄”兩層意思。如將秦簡中的“展約日”之“展”理解為“校錄”，從前後文看也不太通順。嶽麓書院秦簡中恰有一例相同用法的“展”字，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上文所論里耶簡中的“展”字。

(14)【諸】給日及諸從事縣官、作縣官及當戍故徼而老病居縣、作妬入春，篤貧不能自食皆食縣官而益展其日以當食，如居貲責(債)。(《嶽麓書院藏秦簡(肆)》簡 292-293)

《嶽麓書院藏秦簡(肆)》注釋說：“益展，同義複詞，延長也。” ② 上文討論的“展……日”與此例“益展其日”辭例一致，也當是延長之意。《方言》卷十七：“展，信也。”錢繹箋疏：“信，伸，古字通用。此信字兼屈伸、誠信二義……是展又為屈伸之伸也。”《漢書·酷吏傳·王溫舒》：“令冬月益展一月，卒吾事矣。”顏師古注：“展，伸也。”“展約日”大概就是“延期”之意。從情理上說，期限就執行方來說，難免有推遲、延後的情況，自有相應的應對之法，所以(1)的 B 部

① 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新見里耶秦簡牘資料選校(三)》，簡帛網，2015 年 8 月 7 日。

②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225 頁。

分,即遷陵縣的批文中說“以律令從事”。與“展約日”的意義相近且結構一致的詞語,古書中還有“展期”“展日”,祇是所檢索到的書證皆是宋代及以後的用例,時代過晚,此不贅引。在秦漢時代的文獻裏,與“展期”“展日”意思相近的,有“延期”:

《漢書·王莽傳》:“予前在大麓,至於攝假,深惟漢氏三七之阨,赤德氣盡,思索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還有“假期”一詞:

(15) 南山鄉言民馬忠自言

不能趣會假期書 八月廿八日發(CWJ1③:325-1-63)^①

(16) 兼左部賊捕掾馮言逐補殺

人賊黃康未能得假期解書 十二月廿八日開(CWJ1③:261-8)

(17) 恐力未盡,且皆復假期(CWJ1③:291)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注釋(17)云:“假期,假延時日。晉陸雲《請吾王引師友文學觀書問道啓》:‘孔子假期玩年,至於韋編三絕。’簡文指原來辦案期限已到,此時又予延期。”這三例“假期”的例子,(15)(16)是對“假期”的彙報說明,祇是具體原因尚不得而知。由此看來,出於各種原因,有時候“延期”是難以避免的,祇是要做出相應的彙報說明。與此相關,秦簡中對文書的傳遞都有明確的時間規定,如:

(18) 行傳書、受書,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輒相報毀(也)。書有亡者,亟告官。隸臣妾老弱及不可誠仁者勿令。書廷辟有曰報,宜到不來者,追之。行書。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184-185)^②

對文書的滯留、拖延一般都要做出解釋,如下面的例子:

(19) 卅一年七月辛亥朔甲子,司空守□敢言之:今以初爲縣卒癘死及傳檄書案致,毋應(應)此人名者。上真書。書癸亥到,甲子起,留一日。案致問治而留。敢言之。
(里耶秦簡 8-648)

章手。(里耶秦簡 8-648 背)

(20) 書廿八年四月庚辰到,壬午起,留二日,謾求□(里耶秦簡 8-944+8-1646)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199頁。本文所引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釋文及相關解釋皆出自該書,不另注。

^② 陳偉主編,彭浩、劉樂賢等撰著:《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壹)》,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134頁。本文所引睡虎地秦簡釋文皆出自該書,不另注。簡文中“誠仁”的解釋,可參歐陽《嶽麓秦簡〈亡律〉“亡不仁邑里、官者”條探析》,楊振紅、鄔文玲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六(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20)簡文有缺,文書的性質尚難以判斷。《急就篇》卷四:“乏興猥逮訶謔求”,顏師古注:“謔,隱語也。謂偵伺官府利害,有所追求也。”^①《說文·𠂔部》:“𠂔,營求也。从𠂔,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𠂔求,得之傅巖。巖,穴也。”上文已云對執行方來說,期限難免有推後、延遲的情況,並且這樣的情況似并非不允許,如(19)即是對“留一日”的相關解釋。以上討論的是文書傳遞的情況,但“簿留”大概不能簡單與之等同。秦漢時期“簿”與“籍”的區別,一般來說“簿”常以人或錢物數量值為主項,“籍”大多以人或物自身為主項;且二者多是由下級單位編寫呈報給上級的。^②在傳世文獻及出土秦漢簡牘中,有不少簿籍類文書上呈時間的規定或要求。黃浩波先生曾就里耶秦簡中的“作徒簿”與“徒計”的形成總結說:

里耶秦簡牘所見,凡是使用刑徒勞作的部門,包括刑徒的管理部門在內,每日均製作“日作徒簿”,而且呈報縣廷,縣廷以筭按月分部門存放;縣廷會在當月月月底對各部門所呈報的作徒簿進行清點查驗,若有缺漏,便會下文追繳。每月晦日,各部門要將當月每日的“日作徒簿”及由每日“日作徒簿”彙編而成的“月作徒簿”(或曰“月作徒簿最”)上呈縣廷,縣廷以筭按年度分別保存各部門的“月作徒簿最”,再根據各部門之間相互對應的記錄,對月作徒簿進行核校。年末,各部門在月作徒簿或日作徒簿的基礎之上再編制部門的“徒計”,呈送倉和司空。“徒計”上呈縣廷,乃至縣廷上呈郡之後,仍可能有對“計”文書的核驗。^③

黃先生僅是就“作徒簿”“徒計”做的總結,而從秦漢簡牘資料及古書記載看,簿籍上呈時間的問題可能要複雜得多,如以下簡文:

(21)縣上食者籍及它費大(太)倉,與計偕。都官以計時餽食者籍。(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簡 37)

(22)都官歲上出器求補者數,上會九月內史。(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簡 187)

(23)卅二年三月丁丑朔朔日,遷陵丞昌敢言之:令曰上葆繕牛車簿(簿),恒會四月朔日泰(太)守府。·問之遷陵毋當令者,敢言之。(里耶秦簡 8-62)

(24)卅三年二月壬寅朔朔日,遷陵守丞都敢言之:令曰恒以朔日上所買徒隸數。·問之,毋當令者,敢言之。(里耶秦簡 8-154)

① [漢]史游撰:《急就篇》,長沙:嶽麓書社,1989,312 頁。

② 詳參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247 頁。

③ 黃浩波:《里耶秦簡牘所見“計”文書及相關問題研究》,楊振紅、鄒文玲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六(春夏卷)》,119 頁。

(25)縣、道已報(墾)田,上其數二千石官,以戶數嬰之,毋出五月望。(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243)^①

以上是出土文獻中幾條有關簿籍上呈時間的材料,在古書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如:

《續漢書·百官志三》“宗正”本注:“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又“大司農”本注:“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

《續漢書·百官志五》“州郡”本注“(縣、邑、道)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李賢注引胡廣:“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上其計簿。”

由於簿籍具體名稱與內容性質的複雜性,以及所呈達的政府機構層級不同,對上呈時間的要求也有差別,(23)、(24)要求的日期是朔日,(25)是望日,(21)與上引《續漢書·百官志》的例子則主要跟歲時上計有關。以上雖舉了出土文獻及古書中有不少與簿籍上呈時間的一些律令或文書材料,但却未檢得對簿籍類文書留遲情況該如何處理或懲罰的直接文字資料。

綜上而言,里耶秦簡中的“展……日”的“展”當是推遲、延後之義。“展簿留日”應該是對簿籍的上呈日期有所延遲,而這種延遲從情理上講是難以避免的。秦漢簡牘及古書中有不少與簿籍上呈時間的規定或要求相關的資料,但對“簿留”及相關的延遲問題,該如何處理,如(1)所云“以律令從事”,到底是什麼樣的律令或是其他相關規定,目前尚未檢得這方面的直接資料,祇能闕疑不論。

附記:本文稿成後,承匿名審稿專家指出疏失之處并提出寶貴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42頁。

嶽麓秦簡《猩、敞知盜分贓案》與楚墓早期盜掘

荊州博物館 蔣魯敬

內容提要 《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中《猩、敞知盜分贓案》簡文內容涉及古墓盜掘問題,本文結合典籍記載、出土秦漢簡牘資料以及楚故都紀南城周邊大中型楚墓考古發現,認為大中型楚墓的早期盜掘可能類似於殷墟王陵早期被盜毀,“早期盜掘者不僅要攫取墓中隨葬的寶器,而且是帶着充滿敵意的報復心理將包括尸骸在內的墓室所有毀壞殆盡”。秦在拔郢後,可能也效仿周人毀滅殷商大墓,在對楚“焚宗廟”“燒先王墓”的同時,或伴隨有盜掘墓冢的行為發生。

關鍵詞 嶽麓秦簡 紀南城 楚墓 早期盜掘

《猩、敞知盜分贓案》是《嶽麓書院藏秦簡(叁)》的第三篇奏讞類文書,簡文內容主要記述“上造敞、士伍猩知人盜塚,分贓,贓過六百六十錢,敞當耐鬼薪,猩黥城旦”,後來適逢“戊午赦,江陵守感、丞暨、史同論赦猩、敞為庶人”之事。簡文涉及古墓盜掘問題,本文結合典籍記載、出土秦漢簡牘資料以及楚墓考古發現,嘗試對楚故都紀南城周邊大中型楚墓的早期盜掘問題作初步研究。

一 簡文《猩、敞知盜分贓案》中盜掘墓冢的記載

為討論方便,先將《猩、敞知盜分贓案》簡文內容移錄於下:

廿三年四月,江陵丞文敢讞之:廿二年九月庚子,令下,劾:錄江陵獄:上造敞、士伍【44】猩知人盜塚,分贓,得。敞當耐鬼薪,猩黥城旦。逕戊午赦,為庶人。鞠【45】審,

讞。【46】●今視故獄：廿一年五月丁未，獄史宰詣士伍去疾、號曰：載銅。●去疾、號曰：號乘輶【47】之醴陽，與去疾買銅錫冗募樂一男子所，載欲賣。得。它如宰。【48】●執一男子。男子士伍，定名狴。【49】●狴曰：□□□□樂，爲傭，取銅草中。得。它如號等。【50】●孱陵獄史民詣士伍達。與狴同獄，將從狴。●達曰：亡，與狴等獵漁。不利，負債。【51】冗募上造祿等從達等漁，謂達：祿等亡居夷道界中，有廬舍，欲驅從祿。達【52】等從祿。狴獨居舍爲養，達與僕徒蒔等謀塚。不告狴，塚已徹，分器，乃告【53】狴。蒔等不分狴，達獨分狴。它如狴。●狴曰：達等塚，不與狴謀。分器，蒔等不分【54】狴，達獨私分狴。狴爲樂等傭，取銅草中。它如達及前。●醴陽丞悝曰：冗募上造敞【55】……塚者錫。到舍，達已分錫。達謂敞：已到前，不得錫。今塚中尚有器，器已出，賣敞所。蒔【56】告達，請與敞出餘器，分敞。達曰：發塚一歲矣！[今]徹，敞乃來，不可與敞。達等相將之水旁，【57】有頃，來告敞曰：與敞。敞來後，前者爲二面，敞爲一面。敞曰：諾。皆行，到塚，得錫。敞買及受分。覺，【58】亡。得。它如達等。●達言如敞。[問]：達等塚，不與狴、敞謀，得衣器告；狴、敞受分，贓過六百六十錢。【59】它如辭。●鞠之：達等塚，不與狴、敞謀，得衣器告；狴、敞受分，贓過六百六十錢。得。狴當黥【60】城旦，敞耐鬼薪，逯戊午赦。審。江陵守感、丞暨、史同論赦狴、敞爲庶人。達等令別論。敢讞之。^①【61】

爲便於理解簡文，根據整理者注釋和語譯，^②對簡文所記案件大致情形梳理如下：

冗募上造祿等隨士伍達、狴打獵捕魚，不順利，負債。祿驅使達、狴等逃亡藏在夷道境內。士伍達與僕人蒔等一起謀劃盜墓，未告知狴，狴獨自一人留在屋裏做飯。蒔等挖通墓塚，分完贓物後，祇有達私自分給狴。上造敞也在蒔等分完贓物後趕來，由於墓內還有器物，經達等商議，按照敞擔當一面，先來的（達、蒔等人）擔當兩面的分贓原則，由蒔與敞一起拿出墓內餘下的器物。秦王政二十一年五月丁未，士伍狴作爲冗募樂的傭工在醴陽把盜墓分贓所獲銅賣給士伍號和弃疾。號和弃疾因非法運銅被捕。隨之，盜墓事件敗露。通過審理，達等盜墓沒有與士伍狴、上造敞商量，但是狴、敞二人因分贓超過六百六十錢，狴應處以黥刑并貶爲城旦，敞處以耐刑并貶爲鬼薪，趕上戊午赦，免狴、敞爲庶人。

簡 44“塚”，整理者注，挖墓。^③

簡 57“發塚一歲矣”，大概與《二年律令·盜律》中“盜發塚”相關。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盜律》簡 65-66：

① 釋文參看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119-124 頁。

② 參看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125-128 頁、287-289 頁。

③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125 頁。

群盜及亡從群盜，毆折人肢，肤體，及令跛蹇，若縛守、將人而強盜之，及投書、懸人書，恐獨人以求錢財，盜殺傷人，盜發冢，略賣人若已略未賣，矯相以爲吏、自以爲吏以盜，皆磔。

整理小組注：盜發冢，盜墓。^①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簡 28“何謂‘盜塚’？王室祠。葬其具，是謂‘塚’”。“盜塚”是指盜挖葬在地下的王室祭祀用品的犯罪行爲。^②可見，秦漢時不僅有盜掘墓葬的行爲，盜掘祭祀用品也時有發生。

據睡虎地秦簡記載，挖洞行盜的方式不僅存在於盜掘墓冢，還被應用到了入室行竊。《封診式·穴盜》簡 74“人已穴房內，徹內中”，簡 76“其所以塚者類旁鑿”。穴盜，整理者注，挖洞行竊。“其所以塚者類旁鑿”指洞是用挖掘類工具從旁鑿出來的。^③

簡 53“狸獨居舍爲養”，“狸”爲“達與僕徒蒔等”專司炊事。待“冢已徹，分器，乃告狸”，據簡 57 在“發冢一歲矣，今徹”即盜掘長達一年的時間裏，狸都不知“達與僕徒蒔等”盜墓冢之事。對於沒有直接參與“盜塚”的狸，“蒔等不分狸，達獨私分狸”。在墓冢盜掘“已徹”後到來的敞祇能“前者爲二面，敞爲一面”。^④這些簡文內容大致反映了盜墓的私密性與分贓問題。

簡文中有四個地名，即江陵（簡 44）、醴陽（簡 48）、孱陵（簡 51）和夷道（簡 52）。其中醴陽不見於《漢書·地理志》，其餘三個地名均見於《漢書·地理志》。江陵、夷道屬南郡，孱陵屬武陵郡。夷道，治今湖北枝城市西。孱陵，據里耶秦簡 J11652 離江陵縣百一十里，治今湖北公安縣西南。^⑤據簡文記載，達與僕徒蒔等在夷道盜墓，大概在醴陽完成盜墓所得銅錫的買賣交易。松柏漢墓 M1 出土 35 號木牘，^⑥記載南郡屬縣排列順序是“先沿南郡外圍邊界一周，由西向東：巫、秭歸、夷道、夷陵、醴陽、孱陵……最後以中心的江陵結尾”，^⑦可知，西漢初期夷道、夷陵均在江陵以西的區域。

嶽麓秦簡《狸、敞知盜分贓案》折射了秦時江陵（今荊州）地區的盜墓之事，後世的玩賞之風大概也助長了此區域的盜墓行爲。如《梁書·劉之遴傳》記載：“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百十種。”^⑧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8 頁。

② 參看方勇、侯娜《秦漢簡札記四則》，《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9 年第 4 期；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壹）上》，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207 頁。

③ 參看方勇、侯娜《秦漢簡札記四則》；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壹）上》，207、312 頁。

④ 簡文“二面、一面”與五年琕生簋（《集成》4292）“公宕其三，汝則宕其二；公宕其二，汝則宕其一”，五年琕生尊（《文物》2007 年第 8 期）“余宕其三，汝宕其二”相似，數字大概都是表示分配的比例。參看寶雞市考古研究所、扶風縣博物館《陝西扶風五郡西村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文物》2007 年第 8 期；李學勤《琕生諸器銘文聯讀研究》，《文物》2007 年第 8 期。

⑤ 參看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125-127 頁。

⑥ 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紀南松柏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 年第 4 期。

⑦ 劉瑞：《武帝早期的南郡政區》，《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 1 輯，2009，33 頁。

⑧ 《梁書》卷四〇，573 頁。

二 考古發現紀南城周邊大中型楚墓早期盜掘舉例

荊州是楚國強盛時期的都城所在地,以面積達 16 平方公里的楚故都紀南城遺址為中心,分布着八嶺山、紀山、馬山、川店、天星觀等楚國貴族墓葬群,以及熊家冢、馮家冢、平頭冢、周家冢等特大型楚國王公貴族墓地。^① 隨着大中型楚墓發掘數量的增多,發現早期被盜的現象也較普遍。

1978 年發掘的湖北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西距紀南城約 30 公里,是一座有封土、有墓道的長方形豎穴土坑木槨墓。墓道位於墓室之南。坑口南北殘長 30.4、東西殘寬 33.2 米(原坑口長 41.2、寬 37.2 米),坑壁設 15 級生土臺階,坑口至坑底深 12.2 米。葬具一槨三棺,槨分七室。根據出土竹簡內容記載墓主為邸陽君番勳。在墓口平面、封土青灰泥堆積底部,露出規整的盜洞口,形狀橢圓。盜洞底部(槨蓋板以上)盜墓者用六層圓木壘砌四方形井架寬 1.34、長 1.5 米。洞內填土為青灰泥(垮塌的封土,雨水長期淤積而成),含竹木等雜物較多,並出土了一批鐵質盜墓工具和陶器,槨蓋板上的盜洞為長方形,長 1.5、寬 1.2 米(圖一)。盜洞出土的各類鐵器形制較早,陶鬲為秦式陶鬲,因此推測該墓為秦人所盜,被盜時間大約在戰國晚期至秦。^②

1986—1987 年,為配合荊沙鐵路建設,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在南距楚故都紀南城約 16 公里的荊門市十里鋪鎮王場村的崗地上發掘包山 M1 和 M2,也均有盜洞。M1 封土堆東北部(距封土堆東部底邊 5.6 米、北部底邊 4.6 米)有一盜洞(圖二),順着墓道與墓坑交界處而下,打穿東室槨蓋板、分板,將東室和南室東部隨葬遺物盜擾。^③

包山 M2 有封土,東向墓道,長方形土坑,有十四級臺階。坑口東西長 34.4、南北寬 31.9、坑深 12.45 米。葬具為二槨三棺,槨分五室。根據竹簡內容記載,墓主為左尹邵斡。在封土堆西北部(距墓坑西邊 7.4 米處)耕土層下有一盜洞(圖三),順北壁臺階而下,至第七級臺階處,往東南呈斜坡狀轉移,在槨東室蓋板之上 1.5 米消失。盜洞全部崩塌。推測盜洞沒有下掘成功的原因,可能與槨內有機物腐爛後產生的甲烷氣體有關。^④

2000 年 2 月,發掘的天星觀 M2 發現有兩個盜洞。墓坑中部的一個為早期盜洞,平面近圓形,直徑 1.6 米,盜洞直通內槨室和棺室。^⑤

2014 年發掘的荊州望山橋一號楚墓,被盜嚴重,發現兩處早期盜洞。一處位於墓坑中部

① 參看王明欽《荊州地區楚墓出土玉器概論》,荊州博物館編著《荊州楚玉》,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9 頁。

②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 年第 1 期。

③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8 頁。

④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45 頁。

⑤ 湖北省荊州博物館:《荊州天星觀二號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4 頁。

偏東,垂直向下;另一處從墓道上方斜向下,在頭廂處兩盜洞匯合進入槨室(圖四)。發現的盜墓工具有鐵銬、鐵斧、陶汲水罐等,盜掘年代為秦漢時期。^①

通過對紀南城周邊大中型楚墓考古發現的早期盜洞的觀察,可知盜洞大多是直達東室(頭廂),盜掘位置與盜掘方法的一致性似乎暗示了此類盜掘行為的時代特征,尤其是研究者對盜洞殘存的盜墓工具及遺物的分析,推測其被盜年代大約在秦漢之際。此外,2009—2010年發掘的荊門嚴倉墓群穰子冢(M1),發現有三個盜洞打穿了槨蓋板,墓內隨葬品多被盜。^②三個盜洞中不知是否有屬於早期的盜洞。

三 早期盜墓研究

《晉書·束皙傳》:“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此次盜墓事件因為涉及竹簡,竹簡內容包含《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成為簡牘研究史的一個重要事件,^③也成為了古代較著名的盜墓事例。

近年來,隨着對殷墟西北岡大墓上所謂“早期盜掘坑(或稱古代盜坑)”發生年代研究的深入,關於殷墟王陵早期被盜毀的年代、原因及背景等問題取得了長足進展。^④以西北岡王陵區為中心的殷墟帶墓道大墓早在西周早期就被周人洗劫一空。周人大肆盜掘殷商大墓的行為很可能與周公東征平定武庚叛亂的史實有關。表面上看來是對武庚叛亂的懲罰,更深的目的則是要“以絕殷祀”。^⑤

天星觀 M1 內棺蓋被推置一側,骨骼無存(可能被盜墓者拖至南室,在南室盜洞底部發現一個人頭骨),棺內僅存幾顆殘牙和幾根頭髮,^⑥大概是對楚人尸骨毀滅性打擊的一個表現。這種現象可能與殷墟王陵早期被盜毀有相同之目的,“早期盜掘者不僅要攫取墓中隨葬的寶器,而且是帶着充滿敵意的報復心理將包括尸骸在內的墓室所有毀壞殆盡”。^⑦

《史記·楚世家》:“(楚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⑧

《戰國策·中山策》:“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人入楚,拔鄢、郢,焚其

① 賈漢清:《湖北荊州楚墓的重大發現——望山橋墓地一號墓》,《中國文物報》2015年2月27日第8版。

② 宋有志:《湖北荊門嚴倉墓群 M1 發掘情況》,《江漢考古》2010年第1期。

③ 參看林劍鳴《簡牘概述》,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4頁。

④ 井中偉:《殷墟王陵區早期盜掘坑的發生年代與背景》,《考古》2010年第2期。何毓靈:《殷墟王陵早期被盜年代研究》,《考古》2014年第6期。

⑤ 井中偉:《殷墟王陵區早期盜掘坑的發生年代與背景》,87-8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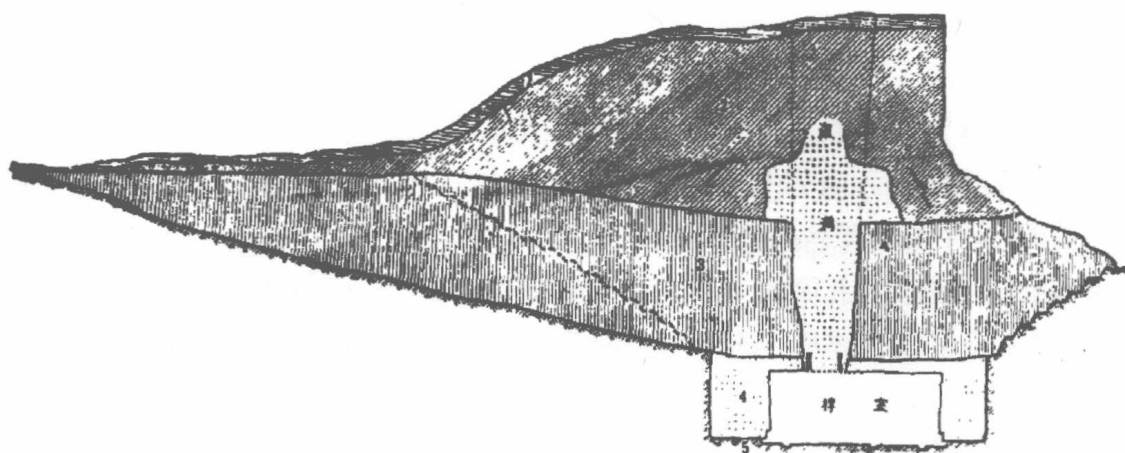
⑥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80頁。

⑦ 井中偉:《殷墟王陵區早期盜掘坑的發生年代與背景》,83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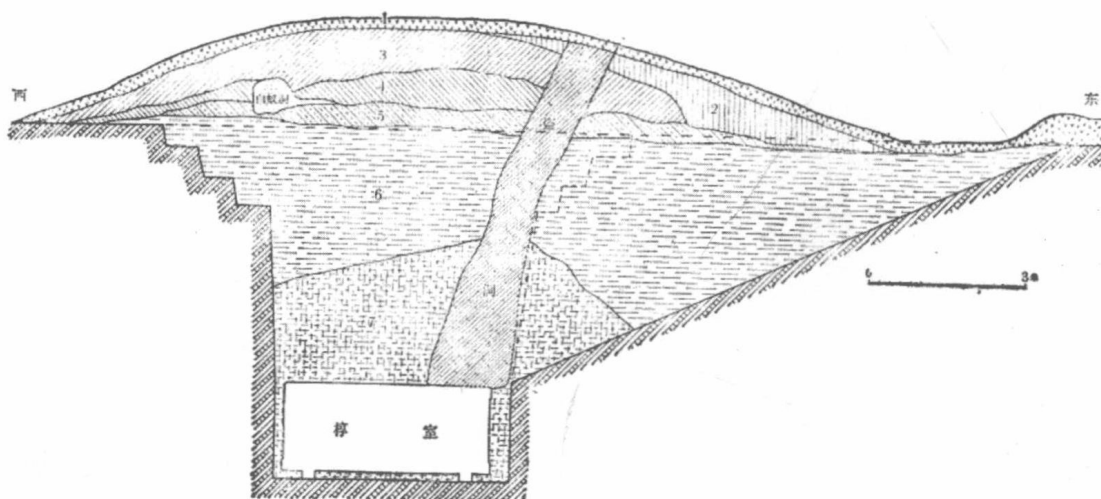
⑧ 《史記》卷四〇,1735頁。

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①

雖然學術界對夷陵是否為楚王陵還有不同的認識,但燒先王之墓,以辱沒“先人”應是事實。^② 根據《史記》《戰國策》的記載,秦在拔郢後,可能也效仿周人毀滅殷商大墓,在“焚宗廟”“燒先王墓”的同時,或伴隨有盜掘墓冢的行為發生。從上文所引松柏漢墓 M1 出土木牘所載夷陵位於江陵以西,也與《史記·楚世家》“東北保於陳城”、《戰國策·中山策》“東徙而不敢西向”所記秦從西面攻楚相合。楚郢都紀南城以西的先王墓夷陵在遭遇秦火後,位於紀南城近郊的楚貴族墓大概也在劫難逃,這正與考古發掘所獲知的紀南城周邊大中型楚墓早期盜洞的時代被推定為秦漢之際相符。



圖一:天星觀 M1 墓坑剖面圖^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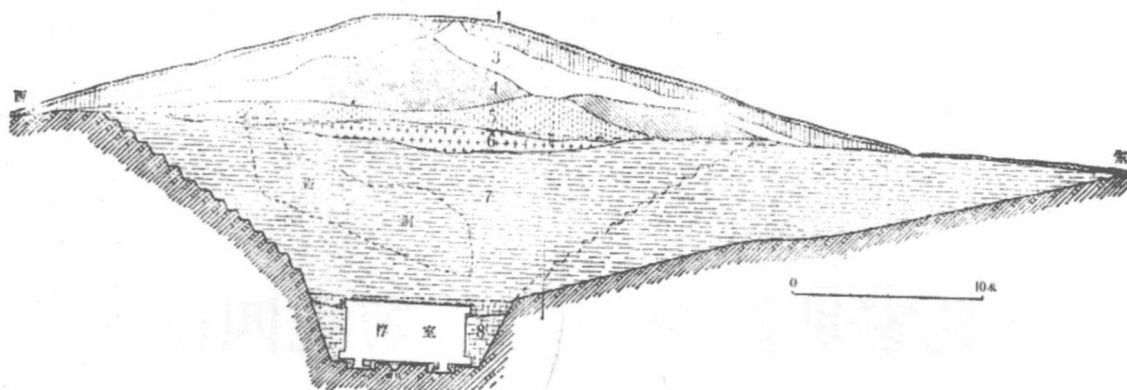
圖二:包山 M1 縱剖面圖^④

① [東漢]高誘注:《戰國策》,上海:世界書局,1937,306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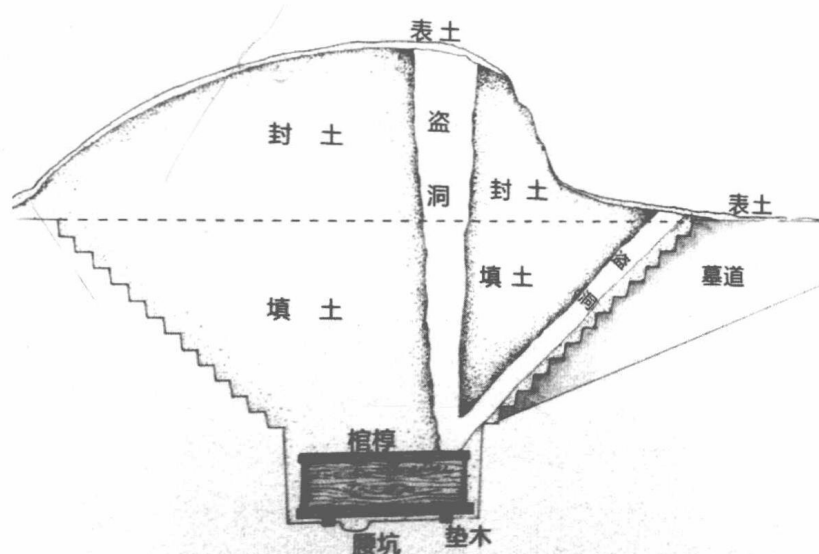
② 何毓灵:《殷墟王陵早期被盜年代研究》,98 頁。

③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

④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10 頁圖四。



圖三：包山 M2 縱剖面圖^①



圖四：望山橋 M1 盜洞示意圖^②

①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46 頁圖二九。

② 荊州博物館：《楚越吳神奇碰撞的新探索——望山橋考古特展》展覽圖版，2015。

孔家坡漢簡《日書》短札四則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鄔可晶

內容提要 孔家坡漢簡《日書·盜日》、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盜者》中的“剛履”，當讀為“剛戾”；一般釋讀為“剛復(復)”是缺乏根據的。《司歲》篇中南方帝名之字，似當釋為“叡”，讀為“赤”或“赫”都有可能。跟孔家坡漢簡《日書·死咎》中的“畜產”對應，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十二支占死咎》中的“生子不牴”，當時人也許已把它理解為指牲畜所生幼子體不完具。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婦人必宜疾”的“宜疾(嫉)”，與孔家坡漢簡《日書·直室門》中的“媯”字相當，前者的“宜”可能表示“怨”“違”之意。

關鍵詞 孔家坡漢簡 睡虎地秦簡 放馬灘秦簡 《日書》

湖北隨州孔家坡發掘的西漢前期(景帝時)8號墓所出竹簡中，有《日書》抄本。經過學者們的不斷探索，《日書》釋讀的不少問題已得到很好的解決。本文打算再提出幾條簡短的意見，供大家參考。

孔家坡漢簡《日書》的抄寫年代，據研究，當不晚於漢高祖十二年(前195)。^①由於實用書籍具有傳承性強的特點，在時代跟孔家坡漢簡《日書》相近的睡虎地、放馬灘等秦墓所出《日書》中，可以看到不少彼此相同或類似的內容。討論睡虎地、放馬灘秦簡《日書》的有關文義時，應該充分利用孔家坡漢簡《日書》的線索。本文也將涉及這方面的內容。

^① 陳炫燁：《孔家坡漢簡日書研究》(修訂本)，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指導教師：張永堂、劉增貴教授)，2008，265-269頁。

爲了節省篇幅，以下分別稱孔家坡漢簡、睡虎地秦簡、放馬灘秦簡爲“孔簡”“睡簡”“放簡”。



孔簡《盜日》篇“戌，老火也”條有如下之語：

盜者赤色，短頸，其爲人也剛履。（簡 377）^①

睡簡《日書》甲種《盜者》篇，亦有“戌，老羊也”條，相應之文作：

盜者赤色，其爲人也剛履，疵在頰。（簡 79 背）^②

劉樂賢先生讀睡簡的“剛履”爲“剛復”，“剛復”即“剛愎”。^③ 李學勤先生疑“履”爲“愎”字之誤。^④ 孔簡整理者也在“剛履”之“履”後，括注“愎”。^⑤ 此說實不可從。

“履”“愎/復”聲韻皆異，無由相通。《說文·八下·履部》分析“履”字“从尸、从彳、从夊，舟象履形”。從古文字看，所謂“舟象履形”者，實是象人形的“頁”（秦漢文字“頁”的頭部或訛作“凶”形）。所謂“从彳”者，是本象人所踐履的“履”形變爲“舟”形後，移至“頁”旁之左，逐漸簡化而成的。如上引孔簡的“履”作，左下爲“舟”還比較明顯（“舟”與“尸”有共用筆畫）；睡簡那一例“履”作，所从亦非“彳”。所謂“从尸”者，則是在“履”上加注的聲符“眉”的訛變。^⑥ 所以就字形來說，隸變後的“履”中雖含有“復”，但“履”與“復”本來是毫無關係的。如果認爲兩種《日書》的“履”字都是“復”的誤寫，不但字形并不相近，而且未免太過湊巧了些。

我們認爲簡文的“剛履”當讀爲“剛戾”。上古音“履”屬來母脂部，“戾”屬來母質部，二者聲母相同，韻部陰入對轉（雖然中古“履”爲開口三等字，“戾”爲開口四等字，但與“履”屢通的“禮”，^⑦中古也是開口四等字）。《周易》井卦“九五”爻辭“井冽寒泉食”，馬王堆帛書本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02、175 頁。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圖版 109 頁、釋文注釋 220 頁。

③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272 頁。參見王志平《簡帛叢札二則》，《簡帛研究》第 3 輯，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132-133 頁。

④ 李學勤：《〈日書〉盜者章研究》，收入其著《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155 頁。

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175 頁。

⑥ 裘錫圭：《西周銅器銘文中的“履”》《應侯視工簋補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27-32、142 頁。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682 頁。

⑦ 參見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544 頁。

“冽”作“戾”;《春秋·隱公二年》“紀裂繻來逆女”,《公羊》《穀梁》“裂繻”并作“履綸”,^①是“履”“戾”間接相通之例。《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方士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同書《伍子胥列傳》載伍奢評價其二子伍尚、伍員“尚爲人仁……員爲人剛戾忍詢……”,皆言“爲人剛戾”,與《日書》“其爲人也剛履(戾)”文例極似。“剛戾”不但有剛愎自用的意思,而且“戾”字突出其人暴戾、酷虐,更符合盜者爲人的特性。

銀雀山漢簡“論政論兵之類”《五名五共》所謂“兵有五名”,與“一曰威強,二曰軒驕”對舉者,有“三曰剛至”(簡 1164),整理者疑“至”當讀爲“恠”。^②其說可信。《廣雅·釋詁三》“恠……很也”,王念孫《疏證》:“言很戾也。”《玉篇·心部》:“恠,惡性也。”較晚的古書裏又有“剛鷲”一詞,與“剛恠”音義皆近。麤羌鐘有“武侄寺力”之語(《集成》00157—00161),曾伯璣瑚有“元武孔觚”之語(《集成》04631、04632),攻敵王光劍銘自稱“允至”(《集成》11666),前人多讀“侄”“觚”“至”爲“鷲”。^③其實讀爲剛恠之“恠”似亦無不可。“恠”“鷲”與“戾”音亦不遠,“剛戾”“剛恠”“剛鷲”,應是關係十分密切的同族詞。

二

孔簡整理者所定《司歲》篇中,申朔、酉朔、戌朔三條有關於東、南、西以及中央帝的記載。現錄整理者所作釋文如下:

【中】朔,奄(閼)戊(茂)司歲,有年,中央,黃帝(帝)。(簡 435 壹)

【酉朔】……□□,東方昊,南方叔倍。(簡 436 壹)

【戌朔】……兵西方崑王內。(簡 437)^④

從內容看,這部分簡文與“司歲”並無明顯聯繫,有些學者認爲不當歸於《司歲》篇。^⑤

上引第一條簡文,自“朔”至“央”字僅存右半,原釋文外加“□”,此已略去。劉樂賢先生指出,整理者的釋文有一些問題,如第二條“倍”實是“帝(帝)”字;第三條“王”當釋“玉”,“崑玉”讀爲“顓頊”,“內”爲“白”之誤釋。劉先生又懷疑第二條“東方昊”“可能是‘東方大昊’之脫”。^⑥所說皆正確可從。

①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537、544 頁。

②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26、153 頁。

③ 參見李家浩《攻敵王光劍銘考釋》,《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57 頁。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181 頁。

⑤ 參見王強《孔家坡漢墓簡牘校釋》,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吳振武教授),2014,154 頁。

⑥ 劉樂賢:《孔家坡漢簡〈日書〉“司歲”篇初探》,收入其著《戰國秦漢簡帛叢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09—110 頁。

第二條“南方叔啻(帝)”的“叔”，劉樂賢先生根據同批簡其他“叔”的寫法與此不類，指出并非“叔”字，“應當釋為何字，尚待進一步研究”。^① 按此字原作如下之形：



跟出土漢初文字資料中的“𡗗”字比較一下，可知亦當釋“𡗗”：



(睡虎地 M77 漢墓所出《葬律》，《江漢考古》2008 年第 4 期彩版一四)



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192 行)



“𡗗”字本从“容”，但上舉二例省去“步”中橫畫，變為从“容”。《說文·二上·口部》以為“古文合”的“容”，前人指出即同書《十一下·谷部》所收“濬”之正篆“容”，情況與此相同。^② 孔簡的這個“𡗗”，“丿”下比上舉二例多了一短橫，似應看作“步”之譌寫；^③ 也可能所加短橫僅是贅畫(受漢代“敬”“叔”等字左上作“丿”的影響)，其字仍从“容”。

劉樂賢先生說“簡文的‘南方口啻(帝)’，可能是指‘南方炎帝’或‘南方赤帝’”。^④ 上引《葬律》和《戰國縱橫家書》二例“𡗗”，皆用為溝壑之“壑”(“壑”从“𡗗”聲)。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經”文中，“赫赫在上”之“赫”寫作“壑”(28/197 行)，“說”文則寫作“赤”(107/276、108/277 行)。^⑤ “南方𡗗帝”讀為“南方赤帝”，指炎帝而言，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不過，相鄰的簡 438 亥朔條有“赤奮”之“赤”字；《日書》的《主歲》篇所載關於五色帝的内容，簡 429 貳“丙丁朔”條已有“赤啻(帝)”。“𡗗帝”能否也讀為“赤帝”，尚須研究。

又疑“𡗗帝”當讀為“赫帝”(《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所收《節》，簡 37、40 的“淋”字，整理者已指出即“壑”之異體^⑥)。《說文·十下·赤部》：“赫，火赤兒。”《詩·邶風·簡兮》“赫如渥赭”，毛傳：“赫，赤貌。”^⑦ 炎帝既稱“赤帝”，自然也可以稱為“赫帝”。

① 劉樂賢：《孔家坡漢簡〈日書〉“司歲”篇初探》，110 頁。又可參見陳炫燁《孔家坡漢簡日書研究》(修訂本)，308 頁；王強《孔家坡漢墓簡牘校釋》，155 頁。

② 參見拙文《說金文“𡗗”及相關之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 5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19 頁注⑥。

③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周馴》簡 198“壑”作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99 頁)，如“谷”上的橫畫與右邊的豎筆相連，其上橫畫與右豎斷開(現在其“步”旁上部的寫法大概受到“𡗗”的類化)，就很容易變成孔簡“𡗗”的樣子。同篇簡 70“壑”作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上冊，56 頁。此“壑”字所从“又”變為“大”，不知“大”有没有可能實是“升”)，其所从“容”，除去上端作“丿”而不作“丿”外(上舉睡虎地漢簡《葬律》的“𡗗”即从“丿”)，“步”旁的寫法已與孔簡“𡗗”一致。

④ 劉樂賢：《孔家坡漢簡〈日書〉“司歲”篇初探》，收入其著《戰國秦漢簡帛叢考》，110 頁。

⑤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104、107 頁；第 4 冊，59、83、84 頁。

⑥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43 頁。

⑦ 馬端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145 頁。

在緯書中,炎帝另有“赤熛怒”的稱號,《春秋緯》之三《春秋文耀鉤》:“太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①“赤熛怒”之“赤”,當承其赤帝之號而來,故炎帝又可稱“熛怒”,《史記·天官書》“氣以處熒惑”句《索隱》引《春秋文耀鉤》:“赤帝熛怒之神,爲熒惑,位在南方,禮失則罰出。”^②炎帝所以有“熛怒”之號,古人以爲其火性主怒。《玉燭寶典》卷四(《古逸叢書》影印日本鈔卷子本)引《詩含神務(霧)》:“其南赤帝坐,神名熛怒。”宋均曰:“熛怒者,取火性蜚揚成怒以自名也。”^③《周禮·春官·大師》“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賈公彥疏解釋鄭注所引《兵書》“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句說:“南方火,火主熛怒,故將急數怒。”^④此所言無關炎帝,但也把“熛怒”與“南方火”聯繫在一起。“赫”古有“怒”“盛怒之兒”義(字後亦作“嚇”)。^⑤炎帝有“叡(赫)帝”的別稱,也可能與緯書所見其“熛怒”之號有關。

《莊子·馬蹄》“夫赫胥氏之時”,成玄英疏:“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⑥(《路史·前紀七》“赫蘇氏”條言“赫蘇氏,是爲赫胥……又以爲即炎帝,妄矣”。)前人已據《肱篋》篇赫胥氏、神農氏并見,斥成說爲非。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容成氏》1號簡所記上古帝王名中,既有“荅(赫)疋(胥)是(氏)”,又有“訢(神)戎(農)是(氏)”,^⑦亦可爲證。成玄英之流所以誤把赫胥氏當作炎帝,不知是否由於歷史上炎帝曾有過“赫帝”之號的緣故。

三

孔簡整理者所擬定的《死咎》篇,其內容與睡簡《日書》甲種《十二支占死咎》頗近,“兩者當有淵源”。^⑧《死咎》篇有如下一條:

申死,其咎在二室,畜產。(簡308)^⑨

整理者注:“畜產,指幼畜。”^⑩陳炫燁先生指出整理者的說法“不確”,他引《史記·韓長孺列

① 《禮記·郊特牲》《左傳·桓公五年》正義等引。[清]趙在翰:《七緯》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451頁。

② [清]趙在翰:《七緯》下冊,452頁。

③ 參見[清]趙在翰《七緯》上冊,255頁按語。

④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周禮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721頁。

⑤ 宗福邦等:《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2200頁。

⑥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341頁。

⑦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圖版93頁、釋文考釋250頁。

⑧ 陳炫燁:《孔家坡漢簡日書研究》(修訂本),181-182頁。睡簡此篇本無篇題,此暫取有的研究者所擬。

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95、167頁。

⑩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168頁。

傳》“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謂“畜產指飼養的禽畜”。^①

孔簡《日書》數見“畜產”，如《建除》稱“收日”，“可以入人、馬牛、畜產、禾稼”（簡 22）；《辰》稱“秀日”，“利見人及入畜產”（簡 31）；同篇“陰日”，“利以……見人、畜產”（簡 44）等。其他秦漢簡中亦多有，不具引。古書裏的“畜產”，又見於《墨子·號令》：“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保）其老弱、粟米、畜產。”^②還有單說“產”的，如《左傳·僖公十五年》“古者大事，必乘其產”。可畜養、存活、繁殖的禽獸，即為“畜產”，其得名與“畜生”同例。^③後來就為此種意思的“產”造了一個本字“𡩇”。《說文·二上·牛部》“𡩇，畜牲也”（大徐本牲譌作牲，此據徐鍇《繫傳》改）；“畜生”的“生”後作“牲”，情況亦同。孔簡整理者根據“孔家坡簡多處將馬牛和畜產并列”的現象，認為“畜產并不包括牛馬”。^④這是有道理的。不過，在不與“馬牛”對舉時，“畜產”應該可以包括牛馬而言，相當於古人所謂“六畜”。孔簡《日書·建除》簡 15 “盈日”“可以……入六畜”，睡簡《日書》甲種《秦除》簡 16 正貳則作“盈日……可以產”，或謂“產”上脫一“入”字。^⑤“產”即“畜產”，可證“畜產”與“六畜”同意。

順便提一下，出土秦漢文字資料中“產”的意思跟“生”差不多，有些用法（如表“存活”“生鮮”等義）似為傳世典籍所罕見。有鑒於此，有人認為這些“產”實際上代表的是語言裏“生”這個詞。已有學者指出這種懷疑是没有必要的。^⑥上舉孔簡《日書》的《辰》篇中，既有“畜產”，又有“畜生”，如簡 38-39 “不可以取（娶）妻、嫁女、出入畜生”，簡 46 “不可見人、取（娶）妻、嫁女、出入人、畜生”；《離日》篇稱“離日不可取（娶）妻、嫁女及入人、畜生、貨”（簡 143 叁-144 叁）；《臨日》篇稱凡逢“臨日”，“不可……畜生，凡百事皆凶”（簡 109），這裏的“畜生”似當指“入畜生”。《星官》篇稱“三月胃”“不可食六畜生”（簡 66），“五月東井……以死，必五人；殺產，必五產”（簡 70）。殺五產之“產”應即畜產之“產”。總之，孔簡《日書》“畜產”“畜生”并見，也對“產”用為“生”的看法不利。

睡簡《日書》甲種《十二支占死咎》，與孔簡《死咎》“申死”條相應者為：

申，石也。其咎在二室，生子不𡩇。（簡 91 背壹）^⑦

① 陳炫燁：《孔家坡漢簡日書研究》（修訂本），180 頁。

② [清]孫詒讓：《墨子問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613 頁。

③ 參見趙岩《簡帛文獻詞語歷時演變專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104-107 頁。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130 頁。

⑤ 施謝捷：《簡帛文字考釋札記》，《簡帛研究》第 3 輯，173 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130 頁。

⑥ 參見張顯成《簡帛所見“產”有“生、活、鮮”義——淺談詞義的感染》，收入其著《簡帛文獻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8，85-88 頁。

⑦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圖版 110 頁、釋文注釋 221 頁。

整理者在“牲”後括注“全”，加注說“生子不全，亦見《法律答問》”。^①按《法律答問》有“其子新生而有怪物其身及不全而殺之，勿罪”“今生子，子身全毆（也），毋（無）怪物”等語（簡 69），整理者謂“不全”指新生兒“有先天畸形”“肢體不全”。^②所以各家多把“生子不牲（全）”理解為“生孩子，孩子身體有殘缺”。^③單獨地看，這種解釋當然很有道理；但跟孔簡此條的“畜產”却無法統一。

比較睡簡《十二支占死咎》和孔簡《死咎》可以知道，後者行文往往較前者簡略，有時甚至省去主要動詞不說，導致文義曖昧不明。例如：睡簡的“戌，就也”條，說“其咎在室，馬牛豕也，日中死，兇（凶）”（簡 93 背壹）；孔簡“戌死”條僅說“其咎在室，六畜”，讀過睡簡的那條簡文，方知當指六畜“日中死”一類事。^④孔簡“未死”條云“其咎在里，寡夫若寡婦”（簡 307），文雖較繁，但不如睡簡作“其室寡”（簡 90 背壹），義更顯豁。孔簡此條的“畜產”之咎，按例當與睡簡所說“生子不牲”有關。

古代“子”可指動物所生之幼子，如《論語·雍也》：“犁牛之子，騂且角。”^⑤例多不煩舉。如果把“生子不牲”與“畜產”對應起來考慮，這裏的“生子”似指牲畜生幼子。不過，從《日書》語言通例看，單言“生子”，幾乎都指人生子。所以我們認為，此條在最初應該也是說人生孩子的，但孔簡（也許還可以包括睡簡）此篇的寫定者以及當時使用“日書”的有些人，很可能已有意無意地把它誤解成了“畜產生子”。祭祀所用之“牲”，一般認為指毛色純一者。但是，《周禮·地官·牧人》“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鄭玄謂“牲，體完具”。偽古文《尚書·微子》“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偽孔傳：“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⑥大概當時確實有“體完曰牲”的用法，所以鄭注、偽孔傳纔會對牲牲之“牲”作出這樣的解釋。指牲畜肢體齊全的“牲”，應該是由完全之“全”分化出來的一個專字。睡簡“生子不牲”的“牲”，正是指牲畜“體完具”的例證，無需破讀為一般的“全”。

可以注意的是，睡簡中指人體貌不全的“全”，除了上舉《法律答問》之外，還見於《日書》甲種《盜者》“面有黑焉，不全於身”（簡 71 背）、“其身不全”（簡 75 背）、“其面不全”（簡 80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注釋 221、222 頁。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注釋 109-110 頁。參見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463 頁。按“有怪物其身及不全”猶言“有怪物其身、不全其身”，“不全”也是針對“其身”說的，下云“子身全”可證。大概為了避免句子成分太長，故將“及不全”挪到“其身”之後。

③ 吳小強：《秦簡日書集釋》，長沙：嶽麓書社，2000，154 頁。

④ 孔簡“亥死”條亦云“其咎在室，六畜”（簡 311）。據睡簡“亥”條言“死必三人，其咎在三室”（簡 94 背壹），可知孔簡此條係誤抄了“戌死”條的內容。

⑤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85 頁。

⑥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178 頁。

背)等,無一例外均用“全”。^①《十二支占死咎》“生子不𡗗”用“𡗗”而不用“全”,似即暗示了此條所說生子肢體不全之事,實指“畜產”而非人。^②

四

孔簡《日書》中的《直室門》篇,又見於放簡《日書》乙種,不少學者作過研究。我們要討論的是關於“屈門”的一條。現將二本相關文句錄出:

屈門:必昌以富。婦女媯族人婦女,是胃(謂)鬼責門。三歲弗更,必爲巫。(孔簡 281 貳)^③

屈門:其主必昌富,婦人必宜疾,是=(是謂)鬼夾之{之}門。三歲更。(放簡乙 8 貳—乙 9+13 貳)^④

上引放簡“夾”,陳昭容先生指出當是“束”字之譌,“責”从“束”聲,“鬼夾(束)之門”可讀爲“鬼責之門”,與孔簡的“鬼責門”是一回事。^⑤其說甚是。

孔簡“婦女媯族人婦女”的“媯”,整理者引《廣韻·遇韻》“媯,媯妬也。女子妬男子”,訓爲“嫉妒”。^⑥放簡“婦人必宜疾”的“宜疾”,其義與“媯”相當。“疾”有“怨”義(《管子·君臣上》:“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尹知章注:“疾,怨也。”《左傳·昭公十三年》:“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又有“妬”義(《戰國策·秦策五》“文信侯出走”章“其爲人疾賢妬功臣”。後寫作“嫉”),“嫉妒”與“怨恨”,義本相因,在這裏當然取“妬”義爲妥。

“婦人必宜疾”與“其主必昌富”處於對文位置,“昌”與“富”、“宜”與“疾”,皆義近連用。劉增貴先生在其所寫定的此篇釋文裏,爲“宜”字括注“媯”,^⑦也是由於看到了這一點。不過

① 簡 71 背、75 背、80 背之“全”,原寫作“金”。放簡《日書》甲、乙種《盜者》篇均作“撿”(見簡 38、74)。孔簡《日書·盜日》,與“不全於身”相當者作“不金於中”(簡 369)。所以有學者質疑過去“不全”之釋(以上所說,據王強《孔家坡漢墓簡牘校釋》,136 頁)。不過,秦漢文字中“全”“金”二字有混譌之例(參見劉玉環《秦漢簡帛詁字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2,69 頁)。究竟釋“全”抑“金”,主要得看文義能否講通。上述諸例改釋爲“金”後,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詞來通讀簡文。而孔簡《盜日》篇 373 號簡上“其身不全”的“全”,却明白無疑是寫作“全”的。所以結合文義來看,上述“金”字還是視爲“全”之誤書較妥(秦漢文字“全”“金”混,本來就以“全”譌作“金”爲常)。馬王堆漢墓所出帛書《老子》甲本,現存的兩個“全”字,全都錯寫成了“金”(見 136、138 行);上舉睡簡、放簡、孔簡的“全”多誤作“金”,并不奇怪。

② 也有可能是睡簡此篇所從出的底本或睡簡的抄寫者,偶爾用“𡗗”爲“全”。使用或傳抄日書的人,遂按字面意思,把人生子不全誤讀爲畜產生子不𡗗了。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93、165 頁。

④ 孫占宇:《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3,15-16、104 頁。

⑤ 劉增貴:《放馬灘秦簡〈日書·直室門〉及門戶宜忌簡試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6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3-54 頁引。

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166 頁。

⑦ 劉增貴:《放馬灘秦簡〈日書·直室門〉及門戶宜忌簡試釋》,44、45 頁。

“宜”“媯”韻部遠隔,顯然不能相通。

我們曾在《說上博簡〈容成氏〉“民乃宜怨”的“宜”及古書中的相關字詞》一文中,通過文義和辭例比勘,推測《上博(二)·容成氏》簡36“民乃宜怨,虐疾始生”、《墨子·備城門》“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河北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劉脩墓所出竹簡本《論語》簡530“今之□也忿誼(今本作‘戾’)”之“宜”“誼”,有“怨”“違”一類意思;《管子·九變》與《墨子·備城門》同源之文中的“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之“德”,《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荀子·哀公》中與《孔子家語·五儀解》“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有同源或承襲關係的“躬行忠信其〈而〉心不置”“言忠信而心不德”之“置”“德”,可能都是“宜”的誤字,這些“宜”也當訓“怨”“違”。^①“宜”所以有此義的理據,現在尚不清楚,但西漢後期(約漢宣帝五鳳三年)下葬之墓所出《論語》抄本,仍在使用這個詞,說明戰國秦漢時人對此種“宜/誼”字大概不會感到陌生。《管子》《大戴禮記》《荀子》等書的“宜”譌作“惠”或“置”之本,排擠掉正確的本子,流傳下來,應該是“宜”的這種用法已不復通行之後發生的事情。

放簡“婦人必宜疾”的“宜”似即“民乃宜怨”“忿誼”之“宜”“誼”。“其主必昌富”之“昌”指地位顯盛,“富”指資產富庶;此句“宜”指怨恨,“疾”指嫉妒,從文例看也是合適的。《荀子·不苟》:“小人……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②《管子·版法解》謂君子“惡不忠而怨妬”。“妬嫉怨誹”“怨妬”猶此所言“宜疾”。

孔簡“高門”條,云“宜豕,五歲弗更,其主爲巫,有夭”(簡298壹)。^③此條放簡作“宜豕,五歲更。弗更,必爲巫,有宜央(殃)”(乙簡91下叁)。^④“有宜殃”與“有夭”相當。“宜殃”如非誤抄,疑指適當、相稱之災殃(古訓“宜”爲“當”“稱”),這個“宜”似與“婦人必宜疾”之“宜”無關。

2015年11月15日寫畢

附識:王强先生賜告,湖北隨州周家寨8號漢墓所出《日書》,其內容與孔簡《日書》相近,也出現了本文第二則所論“叡帝”,值得關注。又,本文曾於2015年12月5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主辦的“‘文字·文本·文明’出土文獻研究青年論壇”上宣讀,蒙單育辰先生點評指正。謹向王、單二位致謝。

①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12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58-68頁。

②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40頁。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94、165頁。

④ 孫占宇:《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17、103、107頁。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遣冊校讀札記四則*

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范常喜

內容提要 本文就《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所刊三號墓遣冊的釋讀、書寫分類提出四則校訂意見：第一，三號墓遣冊中的“遷蓋”不當讀作“僂蓋”，應照本字解之，即遷徙移動之蓋；第二，三號墓簽牌“柴一筭”即枇杷一筭，與出土實物相對應；第三，簡6和簡7部分字迹與前後簡文有異，當為校讀者補寫；第四，結合字迹和內容兩個方面，22—25號簡當改歸入兵器一類。

關鍵詞 馬王堆漢墓 遣冊 簡帛文字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①刊布了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全部簡帛材料，整理者做了精到的注釋與考校，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我們集中對其中所收的三號墓遣冊做了研讀，研讀後發現尚有個別問題可稍作補充，故草此小文，略作補苴。

一 遷蓋

《三號墓竹簡遣冊》7：“偶(偶)人二人，其一人操僂(遷)蓋，一人操矛。”

《三號墓竹簡遣冊》8：“遷蓋一。”

整理者注：“二、三號墓報告：‘遷’與‘僂’通。鄭曙斌(2005)：從同墓隨葬的《車馬儀仗圖》和T形帛畫墓主人及侍從操遷蓋緊承其後的形象來看，遷蓋是墓主人所用之物，偶人操

* 項目來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出土文獻中上古漢語方言語料匯考”(15BYY111)。

①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

遷蓋與矛可能是模仿墓主人生前生活狀態而出現的。今按：‘僊’即下簡8之‘遷’，‘遷’、‘僊’相通之例，見《天下至道談》：‘將欲治之，必害其言，踵(踵)以玉閉，可以壹遷(僊)。”然‘僊蓋’似未見於其他文獻，此處存疑。”^①

按：三號墓出土T形帛畫中有出行場面，墓主人身後隨侍二人，其中一人持蓋，一人操矛，這一情景正與7號簡所記契合。此外，同墓所出《車馬儀仗圖》中也有侍者持蓋圖像，而且所持之蓋與T形帛畫中的相同。具體如圖1、圖2所示。^②由此看來，整理者所引鄭曙斌先生的觀點可從，簡文中的“遷蓋”當與帛畫中所繪侍者執持之圓形傘蓋相類似。



圖1:T形帛畫出行場面中侍者持遷蓋部分及摹本



圖2:《車馬儀仗圖》出行場面中侍者持遷蓋摹本

研究者將“遷蓋”釋作“僊蓋”，主要是因為將圖1所示T形帛畫中所繪出行場面視作了墓主人安步升天的畫面。^③其實僅據該部分圖像來看，也并不能確定是墓主人“升天”的出行。^④圖2所附《車馬儀仗圖》所繪內容則可以明確僅為一般的出行場面，^⑤其中侍者所持遷蓋定不會與升仙有關，自然不宜將其視作“僊蓋”。

我們認為，“遷”可如字解之，即遷徙、移動之義。《爾雅·釋詁下》：“遷，徙也。”《廣雅·釋詁》：“遷，移也。”《禮記·曲禮》：“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鄭玄注：“諸物當前，跪而遷移之。”《風俗通·正失·王陽能鑄黃金》：“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為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此外，包山楚簡遺冊259—264號簡所記皆為外出攜帶之物，包括服裝、卧具、梳妝具、几杖、扇子、燈具、武器等，^⑥簡文起首將這些

①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六冊，《三號墓竹簡遺冊》（鄭曙斌、蔣文撰稿），228頁。

②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06頁、110頁，彩版二一·2、彩版二六。

③ 陳松長：《馬王堆三號漢墓車馬儀仗圖帛畫試說》，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博物館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91，86頁。

④ 關於該部分圖像的詳細描述，參見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106頁。

⑤ 關於該部分圖像的詳細描述，參見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110頁。

⑥ 參見林澐《讀包山楚簡札記七則》，《林澐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19頁。

物品記作“相徙之器所以行”。馬王堆三號漢墓帛畫所繪出行場面中，侍從所持“傘蓋”應該也屬於“相徙之器”，遺冊中記作“遷蓋”概因於此。^①此外，漢代將在行動中持以照明的燈具稱作“行燈”，亦可與“遷蓋”之命名合觀。^②

另有研究者將此處的“遷蓋”直接讀作“繖蓋”，^③因缺乏直接相通假的例證，故并不可信。此外還有研究者認為，簡7中的“偶(偶)人二人”即二、三號墓墓道中的跽坐木俑，^④亦不足取。馬王堆二、三號墓墓道兩側都有壁龕，并各置頭插鹿角的跽坐偶人一個，發掘報告對二號墓的這一情況描述到：“東邊偶人高109厘米，左手平伸，右手略彎曲，并持八方形的木質武器一柄，可能為矛，通長54厘米，長10、斷徑面2.1厘米。矛身作八方形，前小後大”；“西邊偶人通高105厘米，右手平伸，左手似握一物，拳孔向上”。發掘報告還據此推測，這種“偶人”可能即三號墓遺冊簡7所記“偶(偶)人二人”。^⑤我們認為，這一推測并不合理。這兩件偶人頭插鹿角，形體碩大，置於墓道兩側，顯然是起鎮守墓室的作用。相似的偶人還見於湖南長沙望城坡西漢漁陽墓，據介紹，墓道中有一對偶人“跽坐於竹薦之上，兩臂平伸作攔阻狀。”^⑥亦可證此處的偶人是起鎮守墓室之用。^⑦因此偶人手中所持之物當為守禦所用的武器之類，不可能是儀仗所用的傘蓋。而且偶人周圍亦未見任何傘骨架的痕迹，亦可以說明偶人手中所持之物當非傘蓋。^⑧

此外，在馬王堆三號墓中還出土了六枚小結木牘，其中42號木牘云：“右方男子明童，凡六百七十六人。其十五人吏，九人宦者，二人偶人，四人擊鼓、鐃、鐸，百九十六人從，三百人卒，百五十人奴。”本牘文中所提到的“二人偶人”，顯然指的即簡7所記的“偶(偶)人二人”。而從牘文開頭可知，牘文中的“二人偶人”屬於“右方男子明童，凡六百七十六人”。其中的“明童”在戰國楚遺冊簡中又記作“亡童”或“嬰僮”，均是指墓中所出土的小型葬俑，^⑨而非置於墓道中起守墓作用的大俑人。由此看來，簡7中的“偶(偶)人二人”當是指墓室棺槨中的小型葬俑，不能與墓道中出土的大型跽坐守墓俑相牽合。

① 由於其他傘蓋或置車上，或置室內，都相對固定，因此也不排除“遷蓋”是因可持之四處移動而得名的可能。

②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352頁。

③ 尹遜：《“遷蓋”小考》，簡帛網，2006年7月19日。

④ 傅舉有：《考古資料中所見的漢代奴婢》，《湖南考古輯刊》第4輯，長沙：嶽麓書社，1987，137-147頁。

⑤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9頁。

⑥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簡牘博物館：《湖南長沙望城坡西漢漁陽墓發掘簡報》，《文物》2010年第4期。

⑦ 關於此處偶人用途的討論可參見邱東聯《長沙西漢“漁陽”王后墓“偶人”及相關問題》，湖南省博物館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152-155頁；鄭曙斌《楚墓帛畫、鎮墓獸的魂魄觀念》，《江漢考古》1996年第1期；劉斌《漢代“偶人”及相關問題初探》，《南京博物院集刊》12，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240-243頁。

⑧ 鄭曙斌先生也指出：“如果說偶人是指守墓俑則不必操遷蓋。”參見鄭曙斌《馬王堆三號漢墓遺策之“明童”問題研究》，《考古與文物》2005年第1期。

⑨ 參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望山楚簡》，北京：中華書局，1995，127頁；鄭曙斌《馬王堆三號漢墓遺策之“明童”問題研究》，《考古與文物》2005年第1期；李明曉《試談戰國、西漢遺策中的“亡童”與“明童”》，簡帛網，2010年2月19日。

二 柴一筍

《三號墓竹簡遣冊》162/181:“柴(枇)一筍。”

整理者注:“二、三號墓報告:即枇杷。但隨葬物中未見枇杷。”^①

按:實際上三號墓有殘留枇杷的竹筍出土。二、三號墓報告在介紹三號墓出土竹筍簽牌時云:“枇梨筍(西49)長7.2、寬4.5、厚0.17厘米。出土時在西42筍附近。簡一八一‘柴一筍’、簡一八二‘梨一筍’當即指此(圖九五,8;圖版九〇,1)。”^②具體如圖3所示。從該簽牌黑白照片來看,“枇”“梨”之間有一墨釘句讀,當是說明本筍中裝有“枇”“梨”兩種物品。該筍物品出土後經過檢驗,其中所殘留的正是枇杷和梨核。^③由此可知,簡文“柴(枇)一筍”所記“枇杷”即西42號“枇梨筍”中所盛“枇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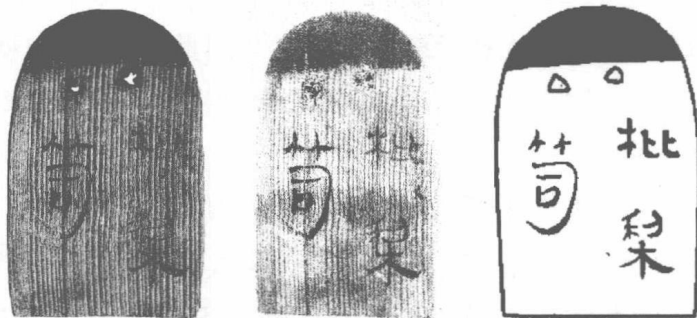


圖3:枇梨筍(西49)簽牌照片與摹本

三 關於6、7號簡的字迹問題

《三號墓竹簡遣冊》5:“宦者九人,其四人服羊車。”

《三號墓竹簡遣冊》6:“羊車,宦者四人服。”

《三號墓竹簡遣冊》7:“偶(偶)人二人,其一人操僮(遷)蓋,一人操矛。”

《三號墓竹簡遣冊》8:“遷蓋一。”

整理者將6、7兩簡排在“男子明童”俑類,但簡6與簡5“宦者九人,其四人服羊車”所記內容有重合之處,而且字迹有別。伊強先生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並認為:“大概簡5強調的

①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六冊,《三號墓竹簡遣冊》(鄭曙斌、蔣文撰稿),243頁。

②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195-196頁,圖版九〇·1。

③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202頁。

是‘宦者’，簡6強調的是‘羊車’。因此，這兩簡的編排，一仍《三號漢墓》之舊。”^①值得注意的是，簡7前段“偶(偶)人二人”與後段“其一人操轡(遷)蓋，一人操矛”字迹也明顯不同。前段與簡5、簡8同，後段與簡6同，如圖4所示。^②經過比對可知，簡6和簡7後段字迹與21號小結簡相同，具體如表1所示。據此可知，簡6和簡7後段文字皆為負責撰寫小結簡的人所為。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奇怪的字迹雜糅現象，估計是因為寫小結簡的人同時負責遺冊的校對，當校到簡5的時候發現該簡所記“宦者九人，其四人服羊車”，祇突出了“宦者”而漏記了“羊車”，遂補寫了簡6“羊車，宦者四人服。”當校對到簡7時發現祇寫了“偶(偶)人二人”，對照實物後發現原記錄不够詳細，因此在其後又補寫了“其一人操轡(遷)蓋，一人操矛”的內容。由此可見，將6、7兩簡與5、8兩簡編在一起當無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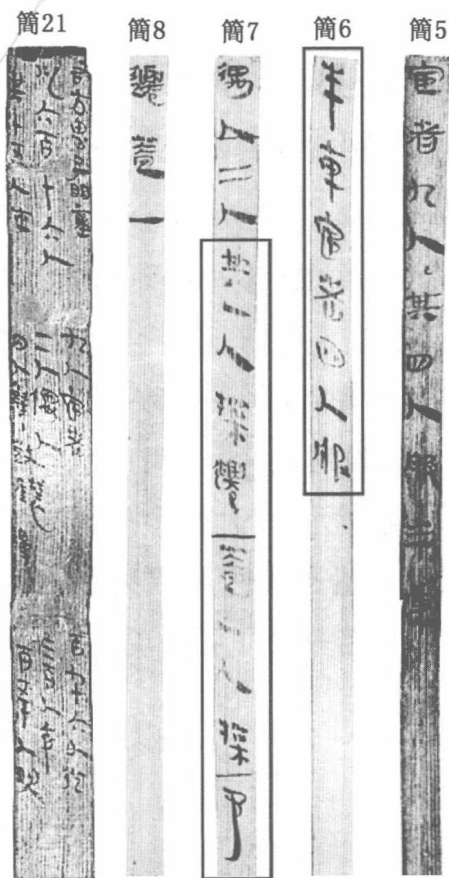


















圖4:簡5—8及簡21字迹對比

表1 簡6、簡7後段與簡21相同字筆迹對照表

① 伊強:《談〈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遺策釋文和注釋中存在的問題》,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54頁,指導教師:李家浩教授。

②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二冊,258、259頁。

| | 其 | 宜 | 者 | 四 | 人 | 人 | 人 | 一/二 |
|-------------|---|---|---|--|---|---|---|---|
| 簡 6、簡 7(後半) |  |  |  |  |  |  |  |  |
| 21 號小結簡 |  |  |  |  |  |  |  |  |

四 關於遣冊 22—25 號簡的歸類問題

《三號墓竹簡遣冊》22:“大鼓一,卑(鼙)二。”

《三號墓竹簡遣冊》23:“鼓者二人。”

《三號墓竹簡遣冊》24:“屯(鎛)于鏡鐸各一。”

《三號墓竹簡遣冊》25:“擊屯(鎛)于鏡鐸各一人。”

《集成》整理者將以上四簡與“馬豎”“美人”等俑類簡歸在一起,但從字迹來看,此四簡與前後簡文均不同,如圖 5 所示。^① 另從 21 號小結簡的統計數字來看,也存在前後物品數量不一致的現象,具體如表 2 所示。從表 2 可知,若不含簡 22—25 中的人數,21 號小結簡中所記“四人击鼓、鏡、鐸”,則正好與簡 9、簡 10 所記人數一致。伊强先生也已指出這一點,但因未能找到合適的歸處,故仍將此四簡附列在“男子明童”俑類之末。^② 我們認為,這四支簡當歸入兵器一類。因為從內容來看,簡文所記“大鼓”“卑(鼙)”“屯(鎛)于”“鏡”“鐸”皆為軍用樂器,理應歸入兵器之列。三號墓遣冊專門記載兵器的內容主要集中在 231—241 十枚簡,如圖 6 所示。^③ 將之與簡 22—25 相對照即可發現,二者字迹也相同。由此可知,記載軍樂器的這四支簡應改歸到兵器一類。

①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二冊,259—260 頁。

② 伊强:《談〈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遣策釋文和注釋中存在的問題》,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54 頁,指導教師:李家浩教授。

③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二冊,278—279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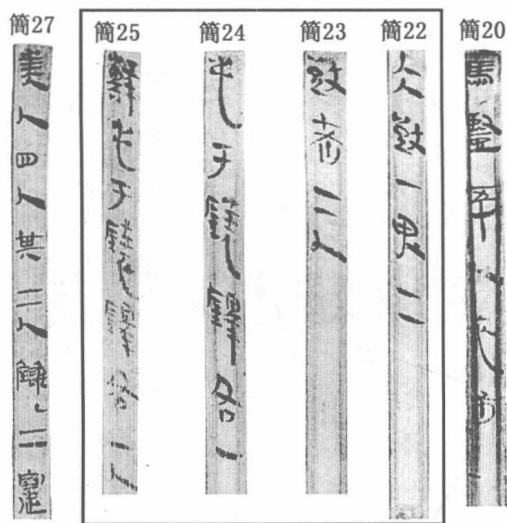


圖 5: 簡 22—25 與前後簡文字迹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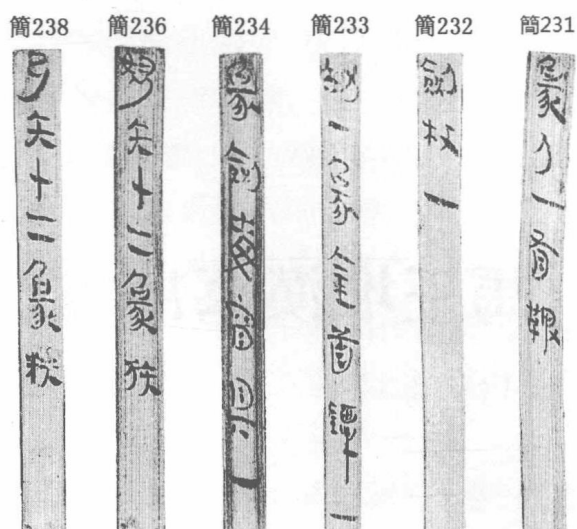


圖 6: 231—238 號兵器簡字迹

表 2 簡 9—10 與簡 22—25 同 21 號小結簡相應內容對照表

| | | |
|---------------------------------------|----------------------|---|
| 簡 9: 建鼓一, 羽旌飭(飾), 卑(輦)二; 鼓者二人, 操抱(抱)。 | 簡 22: 大鼓一, 卑(輦)二。 | 簡 21: 右方男子明童, 凡六百七十六人。其十五人吏, 九人宦者, 二人偶人, 四人擊鼓、鏡、鐸, 百九十六人從, 三百人卒, 百五十人奴。 |
| | 簡 23: 鼓者二人。 | |
| 簡 10: 鏡、鐸各一, 擊者二人。 | 簡 24: 屯(鐸)于、鏡、鐸各一。 | |
| | 簡 25: 擊屯(鐸)于、鏡、鐸各一人。 | |

附記: 本文原為“《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修訂國際研討會”(2015 年 6 月 27—28 日·復旦大學)論文中的四則札記,會上蒙諸位先生賜正,在此謹致謝忱。本文初稿曾蒙陳偉武師審閱,在此一并深謝。

馬王堆漢墓帛書《天文氣象雜占》零識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文學院 洪德榮

內容提要 《馬王堆漢墓帛書》中的《天文氣象雜占》涉及古代陰陽家占驗天象雲氣的記錄,其中亦有屬於兵陰陽的思想,本文舉出五則考釋,認為“戰方者勝”圖像指“以銳擊方陣”;“寇至,從署來,不出三月”圖像為“敵寇從險要之處來”;“不出五日,大雨”的圖像應為龍形,見龍形之雲氣則有大雨;“出軍,先者欲講,應(應)之。合,且講;不合,講”意為觀察月暈的變化再做出是否講合的決定;“亡地。北宮;亡地。任氏”指同樣占例但北宮與任氏所出圖像不同的例子。

關鍵詞 兵陰陽 望軍氣 天文氣象雜占

引言

1974年初,《天文氣象雜占》出土於湖南長沙馬王堆,然而專門整理馬王堆相關文獻的《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叁)(肆)輯,因故并未收入《天文氣象雜占》,與其有關的圖版及研究論文散見於多種期刊及書籍中。^①迄今最完整的整理成果為《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壹輯中收錄的圖版及同書第肆輯中收錄的釋文注釋。^②《天文氣象雜占》出土時碎裂成多片,經整理小組復原為寬約150厘米,高48厘米的橫幅。

① 帛畫及釋文最早刊載於《西漢帛書〈天文氣象雜占〉釋文》,《中國文物》1979年第1期,26-29頁。基本的情况介紹參顧鐵符《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雜占〉內容簡述》,《文物》1978年第2期,1-4、98-99頁;研究的概況可參王樹金《馬王堆漢墓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研究三十年》,《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4輯,2007,31-41頁。

② 參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壹)》,北京:中華書局,2014,202-209頁;同《集成》第肆輯,245-288頁。

從形式上看，帛書可分為前後兩部分，前一部分圖文並茂，占帛書絕大部分的篇幅。此部分從上到下分為六列，每列從右往左分為若干行；每條先出圖像，次以名稱、解釋及占文；每列多者有五十幾條，少者殘存二十幾條，全幅約保留占文三百條。後一部分有文而無圖，墨筆書寫，居於帛書後半幅末尾。此部分自上而下分為四列，第一列殘存占文約十二條；第二列存約十條；第三列存約十八條；第四列存約二十七條，合計約六十七條。

董珊認為有圖無文的部分最後有“此書不在其圖下者，各已從其等矣”是對這部分轉抄體例做個說明，古人將簡本古書編次或轉抄為帛本時，有時會就某些體例作出交代。編者或抄手似乎是將這兩部分當作一書看待的，它們可能是同一書的上、下兩篇。而以內容看，《天文氣象雜占》是一部根據雲、氣、暈、虹和月、星、彗星等占驗吉凶的古書。^①

至於帛書抄寫的年代，顧鐵符、劉樂賢都指出帛書開篇的十四國雲將“楚雲”列在第一位，其中有占文提到吳楚柏舉之戰，口氣類楚人，很可能出於戰國時楚人之手。帛書字體雖為隸書，但篆書的意味還相當濃厚。書中稱“邦”“邦君”，不避漢高祖劉邦之諱，可見其抄寫年代至遲不晚於西漢初期的幾年。^②

根據《天文氣象雜占》抄寫的內容，有部分圖像和占文與古代兵學中的“兵陰陽”有密切關係，“兵陰陽”是《漢書·藝文志》對兵學四種分類中的一類，其定義為：“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雖然就目前所見的傳世與出土文獻資料，要理解其定義並不困難，但研究上較大的困難是相關文獻的大量散佚，《漢書·藝文志·兵書略》中《小序》言“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其中著錄的圖書共有：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農兵法一篇。

黃帝十六篇。圖三卷。

封胡五篇。黃帝臣，依托也。

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黃帝臣，依托也。

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托也。

鳩冶子一篇。圖一卷。

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托。

①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壹）》，245頁。董珊的意見參《談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的形成》，收入其著《簡帛文獻考釋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27頁。

② 見顧鐵符《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雜占〉內容簡述》，《文物》1978年第2期，1-2頁；又收入湖南省博物館編《馬王堆漢墓研究文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94-197頁；後又收入其著《夕陽芻稿》，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197-198頁。劉樂賢《馬王堆天文書考釋》，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17-22頁。

地典六篇。

孟子一篇。

東父三十一篇。

師曠八篇。晉平公臣。

萇弘十五篇。周史。

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統計上述的圖書著錄,《小序》的家數無誤,但總計篇數應為二百二十七篇,《小序》統計多二十二篇;圖總計為十卷無誤。然而上述圖書幾乎都已亡佚,僅有《地典》六篇見於《銀雀山漢墓竹簡》。^①

上述的十六家圖書又能分為幾個類型,1.托太一之名:《太壹兵法》一篇、《天一兵法》三十五篇;2.托名古帝王及黃帝臣:《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圖三卷)、《封胡》五篇、《風后》十三篇(圖二卷)、《力牧》十五篇、《鬼容區》三篇(圖一卷)、《地典》六篇;3.托名歷史人物:《師曠》八篇、《萇弘》十五篇;4.與望氣有關:《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5.以物質避兵之術:《辟兵威勝方》七十篇;6.為托名但其人不詳:《鳩冶子》一篇(圖一卷)、《孟子》一篇、《東父》三十一篇。

綜上所論,值得注意的是“望氣”一類,如上述的《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今已亡佚不傳,別成子其人不詳,據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十七 薛》“別成”條言:“別成氏,《漢書·藝文志》有《別成子望軍氣》六篇,今詳別成乃著書人也。”^②王先謙、姚振宗也認為“別成子”之“別”為姓。^③《隋書·經籍志》兵家有《別成子雜匈奴占》一卷。在傳世文獻中,與望氣有關的記載並不少見,而出土文獻也有豐富的記載,但要特別說明的是所謂的“雲氣”跟“軍氣”看似接近但仍有區別,對雲氣的占驗可能包括吉凶,但不一定和軍事有關,而軍氣則專指以雲氣或氣流占驗與行軍作戰有關的成敗吉凶。而本文所討論的《天文氣象雜占》則主要指對雲氣的占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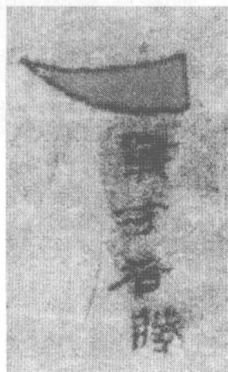
以下吸收前輩學人的研究成果,對《天文氣象雜占》中還能再論的部分摘錄五則考釋。

① 關於《地典》六篇的內容與疏證筆者另有專文論之。

② [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卷三九,收入《百部叢書集成》第五二部第十五函(守山閣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4頁。

③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034頁;[清]姚振宗撰,項永琴整理:《漢書藝文志條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364頁。

一 戰方者勝(第一列,26)



顧鐵符注云：“方，方位。此言戰得方者勝，原脫一得字。”劉樂賢認為：“方者勝，可能是‘得方者勝’之脫。‘得方者勝’於下文多見，可參看。”又於“□出，小邦有兵，得方者勝”條下云：“方，指雲氣所在的方位。‘得方者勝’也可以讀為‘得柄者勝’。得方（柄）者勝，指柄所在的一方將獲勝。但古人是否認為雲氣有柄，無從斷定。”^①顧鐵符與劉樂賢都認為應將本句讀為“戰，方者勝”，而“方”上脫漏“得”字，劉樂賢又認為可將“方”讀為“柄”。

謹按：在討論本文句前，首先來看帛書中提到“得方者勝”的例子：^②

□出，小邦有兵。得方者勝。（第一列，48）

云（雲）如此，戰，得方者勝。（第二列，3）

云（雲）如此，戰，得方者勝。（第二列，5）

云（雲）在幕前，得方者勝，講。（第二列，6）

由上引的例子可以發現，在“得方者勝”前都會有一句敘述語，指雲氣的圖形，由此看來“得方者勝”之“方”應指方位為是，若如劉樂賢說將“方”讀為“柄”，在文獻中無從斷定是否指星辰的柄，也難確認在雲氣中是否也有此名稱。若說本句有脫字，對照其他相似的文例確有其理，但從本句和其他條文的句子行文有比較大的差異，以及上舉各條文句所對應的雲氣並無相仿之處來看，除了有文字脫漏的可能之外，或許還有不同的解釋空間。

對於“戰方者勝”的釋讀，筆者認為本句若無誤脫，或可直接讀作“戰方者勝”，“方”指陣法中的“方陣”，方陣為陣法中常用的陣式，《銀雀山漢墓竹簡》中的《十陣》與《十問》都提到了關於方陣的布陣與應對之法，如《十陣》言：

枋（方）陳（陣）者，所以剗也。一五三二

① 顧鐵符：《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雜占〉》，收入其著《夕陽芻稿》，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214頁；劉樂賢：《馬王堆天文書考釋》，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104、107頁。

② 下文所標注的帛書中文句編號及文字隸定，概以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天文氣象雜占》，245-288頁為準。其中引用此書的意見簡稱為“復旦《集成》整理小組”。

原整理者也指出《說文·首部》：“𦓐，截也。”或體作𦓐。《廣雅·釋詁一》：“𦓐、𦓐，斷也。”《周書·大明武》：“方陣并功(攻)，云何能御？”此處簡文云：“方陣者，所以𦓐也”，都說明方陣是主攻的。^①又另一段簡文：

枋(方)陳(陣)之法，必𦓐(薄)中厚方，居陳(陣)在後。中之𦓐(薄)也，將以吳也。
重□其□，將以𦓐也。居陳(陣)在後，所以□_{一五三五}……

於此說明了方陣具有的特性，大抵而言其特點在“必𦓐(薄)中厚方，居陳(陣)在後”，原整理者也指出薄中厚旁，謂中間人少，旁邊人多。《武經總要》前集卷八《裴子法》云：“方陣正而厚。”又云：“方陣行重而厚。佚居者衆，用力者寡。”^②至於《十問》也提到如何對付方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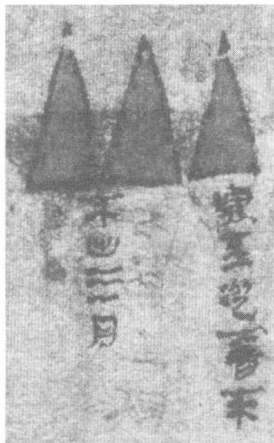
交和而舍，適(敵)富我貧，適(敵)衆我少，適(敵)強我弱，其來有方，𦓐(擊)之奈何？曰：𦓐(擊)此者，或陳(陣)而支之，規而離_{一五五九}之，合而詳(佯)北，殺將其後，勿令知之。此𦓐(擊)方之道也。_{一五六〇}

簡文中敘述的作戰情況是敵強我弱，敵方并采取方陣對戰的情況應如何面對。

總而言之，應對方陣要針對其特點，因方陣四方的士卒人數較多，以作為攻擊的主力，且方陣行動較為厚重，將帥居陣之後指揮以行進作戰，我軍自後方襲擊敵方，殺其將帥，而不被敵方發覺。

《天文氣象雜占》全篇載錄的內容多是與軍事有關的占驗之辭與雲氣圖像，因此若此條占驗的雲氣表示在古陣法中常見且主攻的方陣，自有其可能。且雲氣之形一端為銳角，^③也象徵以銳擊方陣，故見此雲可勝。

二 寇至，從蓍來，不出三月(第一列, 27)



①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90 頁。

②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貳)，191 頁。

③ 劉樂賢云所繪圖像含義不明，可能是植物狀雲氣。參其著《馬王堆天文書考釋》，105 頁。

顧鐵符注云：“著，疑讀爲閹。《爾雅·釋宮》‘閹謂之臺。’《說文》‘闔閹，城曲重門也。’《晉書·天文志》‘南夷氣如閹台。’（或謂‘著’即奢，‘寇至從奢來’，意思是周敬王十四年吳侵楚，是楚平王殺伍奢所引起的。與第四列第十六條‘一歲吳人襲郢’是一回事。）”^①

謹按：顧鐵符言“著”可讀“閹”，即臺或城曲重門，都指場地；或說“著”指伍子胥。此兩說就本條文意與雲氣圖像而言，似無法應對。“從奢來”就文意言應釋爲“由（自）奢而來”，“從”爲介詞，“奢”則爲某個地點。若以顧鐵符說，“臺”應是高而平，可供眺望四方的建築物，雲氣圖像與臺或城曲重門也不相類。

筆者認爲“著”爲從“者”得聲之字，“者”章母魚部，或可通讀爲“阻”，阻從“且”得聲，清母魚部，與“者”聲近韻同。“阻”意爲險要之地，如《說文·阜部》：“阻，險也。”此外也有“障礙”之意，故帛書此句“從奢來”即“從阻來”，意指敵寇從險要之處來。其文句之上所繪製的雲氣似三座山峰，以示險阻之意。

三 不出五日，大雨（第一列，34）



劉樂賢云：“此條所繪的圖像可能是船。《開元占經》卷九十二‘天鏡占’說：‘黑雲氣如浮船，雨。’所載或與帛書此條相類。”^②

謹按：在帛書中還有另一條也指“大雨”的材料（第一列，17），其圖像作：

① 顧鐵符：《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雜占〉》，收入其著《夕陽芻稿》，214 頁。

② 劉樂賢：《馬王堆天文書考釋》，106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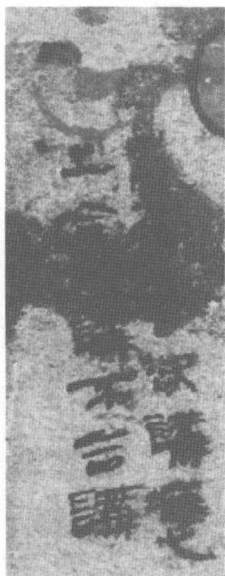
劉樂賢云：“此條所繪圖像爲魚。占文是說，若雲氣如魚，則將有大雨。以魚狀雲氣爲大雨之兆，在傳世文獻中多有記載。”^①筆者認爲此條所繪確實爲魚，劉樂賢也引用《開元占經》卷九四《風雲氣》、《太平御覽》卷八引黃子發《相雨書》、《武備志》卷一六一“氣之風雨”都有雲氣如雨則有大雨的說法。

筆者認爲本條“不出五日，大雨”所繪圖像的右側有類似獸足的模樣，圖像應非船形，而可能是類似龍的生物，龍在文獻記載中具有呼風喚雨的能力，如《開元占經》卷九四《風雲氣》：“日上下有黑雲氣，如蛟龍者，必有風雨”。《武備志》卷一六一“氣之風雨”：“雲如龍形，其國大水，人流亡。”《乙巳占·吉凶氣象占》：“有雲狀如龍行，國大水流亡。”^②在占驗雲氣的理論中，龍除了象征有大雨，也象征帝王之氣，《開元占經》卷九四《帝王氣》：“敵上氣如龍馬，雜色鬱鬱冲天者，帝王之氣，不可擊；若在吾軍，必得天助。”又象征猛將之氣，如《開元占經》卷九七《猛將氣》：“凡氣，如龍如虎，或如火煙之形，或如火光之狀，或如山林，或如塵埃，頭尖而卑，或氣黑如門上樓，皆猛將氣也。”對於相似的占驗結果而有不同的理解，大概是隨着情境與占家的不同，而出現不同的解釋。

① 劉樂賢：《馬王堆天文書考釋》，103頁。

② [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951頁；[明]茅元儀：《武備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兵家類》，96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9a頁，總169頁。[唐]李淳風：《乙巳占·吉凶氣象占》，收入嚴一萍主編《百部叢書集成》（十萬卷樓叢書）第76函，26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16b頁。

四 出軍,先者欲講,應(應)之。合,且講;不合,講(第一列,45)



此條顧鐵符句讀為“出軍,先者欲講,應之。合且講,不合講。”又注云:“講,《說文》‘和解也’。此言和解不鬪。”劉樂賢句讀為“出軍,先者欲講,應之。合,且講;不合,講。”并疏證云:“此條可能是根據月暈的合與不合占測用兵吉凶。”復旦《集成》整理小組采用劉樂賢的句讀,認為其疏證可備一說。^①

謹按:顧鐵符將“講”依《說文》釋為“和解”,甚確。《戰國策·秦策四》有:“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講”有商議、和解之意。而劉樂賢認為“此條可能是根據月暈的合與不合占測用兵吉凶”,可從。但在本句的句讀上,還有再論的空間,此條所述的是在出軍之前,觀察月暈的情況,決定是否與敵方講和。因此筆者認為此條的句讀可作:

出軍先者:欲講,應(應)之。合,且講;不合,講。

在出軍作戰之時,優先要做的是觀察月暈,“先者”有優先、先行之意,如《禮記·大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說苑·君道》:“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因而在此條中,“先者”指的是出軍前先做的行動。“欲講,應(應)之”即若要與敵方講和的話,需跟月暈之象相互對應,“合,且講;不合,講”句的意思應是若與月暈之像合,則對我方較有利,因此可暫時與敵方議和,“且”有暫時之意,《史記》卷六六《伍子胥傳》:“民勞,未可,且待之。”而若不

^① 顧鐵符:《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雜占〉》,收入其著《夕陽芻稿》,214頁;劉樂賢:《馬王堆天文書考釋》,107頁;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天文氣象雜占》,251頁。

合於月暈之象,則對我方不利,因此與敵方講和,停止戰事。

五 亡地。北宮。(第3列,13) 亡地。任氏(第3列,14)



劉樂賢疏證云:“以上兩條圖像不易辨識,是否與月亮有關,亦無從斷定。”復旦《集成》整理小組云:“此條圖像完整,但不知象何物”,“此圖像左上有殘損,不知象何物。”^①

謹按:此兩條圖像確實如上引所言,所指為何不易理解,帛書自第三列起都是關於月亮天象的占驗,但此兩圖與其他占驗月亮且皆有弦月的圖像差異甚大,反較近似雲氣,“第3列,13”似雲氣從地面上升,同占文的“第3列,14”圖像左側殘損較多,不詳為何物,但其殘畫仍無月亮之形。若此為雲氣,傳世文獻中有數則與圖像相關的記載,如《乙巳占·軍敗氣象占》:“赤氣如火光從天來,流下入軍,軍亂將死。”《武備志·氣之戰陣》:“赤氣屈盤停住者,其下有兵流血。”^②近似“第3列,13”的圖像。

至於此兩條為何抄錄在占驗月亮的類別之中,筆者認為除書手誤抄,也可能為了集中抄寫“北宮”與“任氏”所出圖像不同,但有同樣占例的例子,故抄錄於此。從考察“北宮”和“任氏”有同樣占驗之語但圖像不同的例子,可知先秦的占驗之術中不同家派發展出相異的占驗結論,也顯示了當時對占家不同占驗結果的重視與記錄。

^① 劉樂賢:《馬王堆天文書考釋》,118頁;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天文氣象雜占》,260頁。

^② [唐]李淳風:《乙巳占·吉凶氣象占》,收入嚴一萍主編:《百部叢書集成》(十萬卷樓叢書)第76函,26冊,6b頁。; [明]茅元儀:《武備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兵家類》,965冊,9a頁,總172頁。

結語

《天文氣象雜占》為記錄我國古代陰陽家學與占卜技術的重要材料，雖然對雲氣占驗的記載在傳世文獻中並不罕見，但透過對出土文獻的考察，更可探究此一理論技術的流傳歷史與內容。帛書中圖像和文字相互結合的表現方式，需要在理解圖像與釋讀文字間取得契合，始能較為完整地理解占驗的意義，本文即以此為基礎，對“戰方者勝”、“寇至，從著來，不出三月”、“不出五日，大雨”、“出軍，先者欲講，應（應）之。合，且講；不合，講”、“亡地。北宮；亡地。任氏”等五則條文進行討論，可窺知占驗雲氣跟軍事思想間有着密切的關係，在觀察環境的經驗法則上，雲氣的變化反映天氣，也具有一定的科學基礎，但被運用在解釋軍事行動的吉凶禍福上，則成為具有神秘色彩的占驗之學，可歸屬於兵陰陽的一部分，值得考察《天文氣象雜占》的學者們重視。

附記：拙文從草成至定稿的過程中得到本師許學仁先生及劉釗、徐在國、陳偉武、董珊、郭永秉諸位先生的指點與鼓勵，匿名審查人的意見讓拙文更加充實完整，於此特申謝忱。文中可能的不足與失誤概由本人自負文責。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編聯小議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韓厚明

內容提要 依據竹簡出土位置及相關釋文,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具律》《賜律》《興律》一些簡文的歸屬需作調整:《具律》簡 100 應屬於《亡律》;《賜律》簡 282-285、簡 286-290 應屬於《金布律》;《金布律》律文內容屬於官府出納範疇;《興律》簡 396-397 應歸入《二年律令》不見篇題的《囚律》。

關鍵詞 《二年律令》 編聯 《具律》 《亡律》 《囚律》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竹卷由於在墓葬中受到擠壓,斷為兩部分,此外竹簡還有不同程度的移動和殘損情況,這給整理者的編聯工作造成了較大困難,自 2001 年 11 月《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後,學者對《二年律令》的編聯已經開展不少研究工作,取得了豐富的成果,^①但某些竹簡的編聯與歸屬仍然存在可探討的空間,本文擬在諸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竹簡出土位置與釋文,對一些簡文的歸屬問題提出新的見解。

① 關於《二年律令》編聯研究主要有以下論文:楊建:《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簡釋》,丁四新主編《楚地出土簡帛文獻思想研究(一)》,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316-341 頁;李均明:《〈二年律令·具律〉中應分出〈囚律〉條款》,《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3 期;陳偉:《張家山漢簡〈津關令〉涉馬諸令研究》,《考古學報》2003 年第 1 期;李力:《關於〈二年律令〉簡 93-98 之歸屬問題的補充意見》,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 6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11-116 頁;彭浩:《談〈二年律令〉中幾種律的分類與編連》,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出土文獻研究》第 6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1-69 頁;張建國:《張家山漢簡〈具律〉121 簡排序辨正——兼析相關各條律文》,《法學研究》2004 年第 6 期;張家山漢簡研讀班:《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校讀記》,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177-195 頁;王偉:《張家山漢簡編聯初探》,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1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53-367 頁;陳劍:《讀秦漢簡札記三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 4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58-380 頁。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簡 100 上部殘損，整理小組原將其歸入《具律》，張家山漢簡研讀班將其抽出歸入《囚律》，王偉和彭浩仍歸入《具律》，但彭浩表示有疑問。^① 簡 100 釋文如下：

□□□□□，以其罪論之。完城旦舂罪，黥之。鬼薪白粲罪，黥以爲城旦舂。其自出者，死罪，黥爲城旦舂；它罪，完爲城旦舂。【100】

簡 100 爲單條律文，前後無明確簡文與之銜接，竹簡上部殘斷，比照現存釋文長度，上部所缺約 5 字左右，整理者將其歸入《具律》並沒有確鑿的證據，簡 100 位置也與《具律》竹簡有些距離。^② 彭浩先生據簡 122-124 認爲此簡內容是“其以亡爲罪當完城旦舂、鬼薪白粲的處罰規定”，^③簡 122-124 釋文如下：

有罪當完爲城旦舂、鬼薪(薪)白粲以上而亡，以其罪命之；耐隸臣妾罪以下，論令出會之。其以亡爲罪，當完城旦舂、鬼薪(薪)白粲以上不得者，亦以其罪論命之。【122-124】

這種理解存在矛盾，如果罪犯因逃亡而犯罪，被判處完城旦舂、鬼薪白粲，又怎麼會被加重處罰而施加“黥城旦舂”之刑呢？因爲逃亡本身就是他的罪刑，又因逃亡而加重判罰不符合邏輯。從內容看殘缺部分當與“有罪當完爲城旦舂、鬼薪(薪)白粲以上而亡”有關，簡 100 是說犯有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罪刑的人逃亡，將被加重處罰：完城旦舂、鬼薪白粲罪，施加黥刑；自首者，^④犯有死罪的，黥爲城旦舂，其他罪刑，判處完城旦舂。簡 100 所缺字數不足容納其所缺的內容，因此簡 100 前仍當有簡文。

有理由認爲簡 100 不當屬於《具律》而應屬於《亡律》。首先，從竹簡位置上看，據《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書後所附《竹簡出土位置示意圖》，^⑤簡 100 在 C 區由上至下第五層，明確屬於《具律》的竹簡如簡 82-92、119、120、122-124、《具律》篇題簡 125 都位於《二年

① 參見前引諸家論文。

② 整理者列出的《具律》內容包含不少《囚律》簡文，詳見前引李均明、彭浩、張家山漢簡研讀班、王偉論文。

③ 彭浩：《談二年律令中“鬼薪白粲”加罪的兩條律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 2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35 頁。

④ 簡文“自出”即“自首”之意，也見於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把其段(假)以亡，得及自出，當爲盜不當？”整理者譯爲“自首”。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中華書局，1990，124 頁。

⑤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附錄二，322 頁。

律令》竹卷 C 區第 2 層上部及右下部,^①簡 100 與《具律》其他竹簡層位和間隔都較遠。

其次,雖然簡 100 與《具律》簡 122-124 內容相似,但二者實際律文目的不同,簡 100 是對“有罪當完爲城旦舂、鬼薪(薪)白粲以上而亡”這些逃亡者的加重處罰規定及自出的減免措施,簡 122-124 是對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與隸臣妾罪以下不同等級刑徒逃亡者的罪名確定原則,并無實際處罰內容,而有關對逃亡者處罰的簡文,都在《亡律》之中,如《亡律》以下簡文:

吏民亡,盈卒歲,耐;不盈卒歲,鰥(繫)城旦舂;公士、公士妻以上作官府,皆償亡日。其自出鰥(也),笞五十。【157】

上述簡文是對吏民及有爵者逃亡的處罰規定,將逃亡罪分爲“盈卒歲”“不盈卒歲”兩種程度,還提及逃亡者自出的減刑規定,與簡 100 的內容邏輯是一致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年律令》簡文中涉及到“自出”的,基本都在《亡律》之中,所謂“自出”即相對於逃亡而言。^②如簡 164-165:

城旦舂亡,黥,復城旦舂。鬼薪白[粲亡,黥爲城旦舂。]^③【164】

隸臣妾、收人亡,盈卒歲,鰥(繫)城旦舂六歲;不盈卒歲,鰥(繫)三歲。自出鰥(也),笞百。其去鰥(繫)三歲亡,鰥(繫)六歲;去鰥(繫)六歲亡,完爲城旦舂。【165】

諸亡自出,減之;毋名者,皆減其罪一等。【166】

除了上面的簡文,《亡律》簡 157、159、167 都是關於“自出”的內容。簡 100 當與上引簡文有關。簡 100 與簡 164 律文內容有聯繫,簡 164 是對城旦舂和鬼薪白粲這類刑徒逃亡的處罰,簡 100 則是對因判有城旦舂和鬼薪白粲以上罪刑而逃亡的處罰,兩簡律文具有互補關係,而簡 100 涉及的罪刑更重,同時還包含自首者的減免情況。從簡 165 看,《亡律》也有按罪犯不同程度加重處罰的規定,與簡 100 相似,這也說明并非所有加減刑罰的律文都與《具律》有關。

其三,《嶽麓書院藏秦簡(肆)》收錄了秦代《亡律》竹簡一百餘枚,有一支簡文與《二年律

① 相關簡文歸屬可參考張家山漢簡研讀班《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校讀記》,《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183 頁;彭浩《談〈二年律令〉中幾種律的分類與編連》,《出土文獻研究》第 6 輯,65 頁;王偉《張家山漢簡編聯初探》,《簡帛》第 1 輯,361 頁。

② 魯家亮:《張家山漢簡〈具律〉中所見影響“減刑”的幾個因素》,《社會科學》2008 年第 3 期;宋國華、王芳:《秦漢“自出”非“自告”說》,《南都學壇》2012 年第 4 期;萬榮:《秦漢簡牘“自告”、“自出”再辨析——兼論“自詣”、“自首”》,《江漢論壇》2013 年第 8 期,75-81 頁。

③ 簡 164 爲兩簡綴合而成,整理者原釋文爲:“城旦舂亡,黥,復城旦舂。鬼薪白粲也,皆笞百。”彭浩認爲此簡連接不當,據簡 120、122-124 其釋文當補爲“城旦舂亡,黥,復城旦舂。鬼薪白[粲亡,黥爲城旦舂。]”彭浩所補釋文可從。見彭浩《談〈二年律令〉中“鬼薪白粲”加罪的兩條律文》,《簡帛》第 2 輯,433-440 頁。

令·亡律》簡 100 十分相似,釋文如下:^①

佐弋之罪,命而得,以其罪罪之。自出毆(也),黥爲城旦舂。它罪,命而得,黥爲城旦舂,其有大辟罪【51】罪之。自出毆(也),完爲城旦舂。【52】

比較嶽麓書院藏秦簡《亡律》簡 51-52 與簡 100 便可發現,兩組簡文雖然內容有所不同,但對逃亡者的處罰原則是相近的,簡 51-52 “以其罪罪之”“大辟”就是簡 100 “以其罪論之”“死罪”,因此可判定簡 100 這類內容是屬於《亡律》的。

最後,從竹簡出土位置上看,《亡律》雖然分布散亂,已經失去原簡順序,但據《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書後所附《竹簡出土位置示意圖》可知,^②《亡律》大體在《二年律令》C、F 區上部,有不少簡如簡 166、167、168、170、172 都位於 C 區上 4-5 層,與簡 100 層數相近,因此簡 100 應該屬於《亡律》,據簡 100 所處位置,其編聯位置應在簡 164-166 附近。

二

《二年律令·賜律》整理者給出的簡文從 282-304 號,雖然整體簡文順序已不連貫,但不同區域簡文可以連讀,整理者的釋文順序與竹簡順序不符。^③ 簡 282-285 處於 C 區內側,與其他《賜律》簡文位置明顯不同,釋文如下:

賜衣者六丈四尺、緣五尺、絮三斤,襦二丈二尺、緣丈、絮二斤,袴(袴)二丈一尺、絮一斤半,衾五丈二尺、緣二丈六尺、絮十一斤。五大夫以上【282】錦表,公乘以上繆表,皆帛裏;司寇以下布表、裏。二月盡八月賜衣、襦,勿予裏、絮。二千石吏不起病者,賜衣襦、棺及官衣常(裳)。【283】郡尉,賜衣、棺及官常(裳)。千石至六百石吏死官者,居縣賜棺及官衣。五百石以下至丞、尉死官者,居縣賜棺。【284】

官衣一,用繆六丈四尺,帛裏,毋絮;常(裳)一,用繆二丈。【285】

王偉先生認爲以上簡文或可析出。^④ 按王偉先生說是,祇是未指出當歸屬何律,實際上有理由認爲以上簡文當歸屬《金布律》。簡 282-290 處於 C 區中心位置,《金布律》C 區簡文與之相近,而位於 C 區的其他《賜律》竹簡則處於 C 區中心之外,與簡 282-290 有不小的間隔。其次《金布律》是官府出納金錢布帛等財物的規定,如簡 418-420 釋文如下:

①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55-56 頁。

②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附錄二,322 頁。

③ 詳見王偉《張家山漢簡編聯初探》,《簡帛》第 1 輯,365 頁。

④ 王偉:《張家山漢簡編聯初探》,《簡帛》第 1 輯,365 頁。

諸冗作縣官及徒隸,大男,冬稟布袍表裏七丈,絡絮四斤,袴(袴)二丈、絮二斤;大女及使小男,冬袍五丈六尺、絮三斤,袴(袴)丈八尺,絮【418】二斤;未使小男及使小女,冬袍二丈八尺,絮一斤半斤;未使小女,冬袍二丈,絮一斤。夏皆稟禪,各半其丈數而勿稟袴(袴)。夏以四月盡六月,冬【419】以九月盡十一月稟之。布皆八稷、七稷。以裘、皮袴(袴)當袍、袴(袴),可。【420】

通過對比我們便可發現,兩組簡文內容相似,都與官府授予衣物有關。簡 418-420 是關於為官府勞作的人與刑徒的廩衣規定,簡 282-284 是對被賜衣者及有爵者的賜衣標準。兩組竹簡位置也相近,簡 418-420 中的簡 420 處於簡 282-284 上方,據其位置可將簡 282-285 置於簡 418-420 之後。此外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金布律》簡 90-93 也包含廩授衣物的規定,內容與以上兩組簡文大體相似。《金布律》之“布”就是官府出納的“布帛”之意,官府廩賜衣物,當是“布帛”出納最大的一部分。簡 282-284 後半部分還提及賜官吏中“不起病者”衣物與棺槨,這些內容在漢代屬《金布令》,《漢書·高帝紀》:“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槨,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顏師古注引如淳曰:“《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為槨,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由以上分析可知簡 282-284 應屬於《金布律》。

《二年律令·賜律》除簡 282-285 外,其他竹簡按其所處位置順序可分為以下幾組:簡 286-290 位於 F 區中心之上;簡 297-301、291-295 位於 C 區中心外側,^①呈右環形;簡 302-304 位於 F 區中心之下。各部分釋文按其順序排列如下:

簡 286-290:

吏各循行其部中,有疾病、勾^②者收食,寒者段(假)衣,傳詣其縣。【286】

□室毋以相鄉(饗)者,賜米二石、一豚、酒一石。【287】

一室二殯在堂,縣官給一棺;三殯在當(堂),給二棺。【288】

賜棺享(禭)而欲受齋者,卿以上予棺錢級千、享(禭)級六百;五大夫以下棺錢級六百、享(禭)級三百;毋爵者棺錢三百。【289】

諸當賜,官毋其物者,以平賈(價)予錢。【290】

簡 297-301、291-295:

賜吏酒食,衛(率)秩百石而肉十二斤、酒一斗;斗食令史肉十斤,佐史八斤,酒各一斗。【297】

二千石吏食粢(粢)、粢、糲(糲)各一盛,醯、醬各二升,芥(芥)一升。【298】

① 簡 296 殘損,具體位置不清,其釋文“御史比六百石,相□”與簡 291-295 有關。

② 原不識,郭永秉釋“勾”,郭永秉:《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和〈奏讞書〉釋文校讀記》,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編《語言研究集刊》第 6 輯,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263-264 頁。

千石吏至六百石，食二盛，醯、醬各一升。【299】

五百石以下，食一盛，醬半升。【300】

食一盛用米九升。【301】

賜不爲吏及宦皇帝者，關內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291】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裹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毋爵者，飯一斗、肉五斤、酒大半斗、醬少半升。【292】司寇、徒隸，飯一斗，肉三斤，酒少半斗，鹽廿分升一。【293】

吏官庠（卑）而爵高，以宦皇帝者爵比賜之。【294】

賜公主比二千石。【295】

簡 302-304：

賜吏六百石以上以上尊，五百石以下以下尊，毋爵以和酒。【302】

賜酒者勿予食。【303】

■賜律【304】

首先看簡 297-301、291-295 與簡 302-304 這兩部分，官府所賞賜之物都是酒食，賞賜的對象主要分爲官吏和非官吏，非官吏包括有爵者和無爵者兩種，簡文內容相對規整，層次分明。而簡 286-290 內容則包括官府對貧困者的賑濟如簡 286-287，還包括官府賜予棺槨及錢財，賜予棺槨的內容還與上文提及的簡 282-285 有關。值得注意的是簡 289、290 提及官府沒有賞賜之物時可以賜錢，受賜棺槨之人也可以直接賜錢，這樣簡 286-290 的內容實際就是官府出納錢物，而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金布律》與《二年律令·金布律》都與官府出納錢財物有關，簡 286-290 的內容正與之相合。因此簡 286-290 也應歸入《金布律》。這部分竹簡位置上也與《金布律》相近，《金布律》簡 436-439 正處於簡 286-290 附近。

這樣看來《二年律令·賜律》的主要內容如同王偉先生所說，僅限於賜酒、食之事。^①《賜律》的主要內容賞賜酒食，可以理解爲政府的恩賜，且這些酒食是不可以被折換爲錢的，而《金布律》涉及的賜衣物與棺槨之事屬於官府出納範疇，這也許就是《賜律》與《金布律》的最大區別。

三

《二年律令·興律》是關於征發百姓徭役、戍守及守衛烽燧的規定。但簡 396-397 與《興

① 王偉：《張家山漢簡編聯初探》，《簡帛》第 1 輯，365 頁。

律》內容不相符,釋文如下:

縣道官所治死罪及過失、戲而殺人,獄已具,毋庸論,上獄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毋害都吏復案,問(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396】丞謹掾,當論,乃告縣道官以從事。徹侯邑上在所郡守。【397】

從上面的釋文可以看出,簡 396-397 與治獄之事有關,不應歸入《興律》,整理小組認為當屬於《具律》,^①但在出版釋文修訂本時刪除此注釋。^② 張家山漢簡研讀班認為:“《晉書·刑法志》述魏定《新律》前的法律體系時云‘是時承用秦漢舊律……《興律》有上獄之文’,可與該律文互證,故不當入《具律》。”^③諸家對此似無異議。

按張家山漢簡研讀班所引《晉書·刑法志》省略的一段文句如下:

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為篇,結事為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采入。^④

從《晉書·刑法志》的敘述中可知,之所以造成“《興律》有上獄之文”當為後世增損律文所致,而《二年律令》為漢初法律,其條目歸屬不應該出現魏晉時律文雜糅的情況。目前出土秦漢簡牘也未見到《興律》包含有“上獄”的內容,沈家本《歷代刑法考·漢律摭遺》在《興律》條目“上獄”條云:“‘上獄’疑為罪人在獄之法,無事可徵,姑列此二事於此。”^⑤可見哪些屬於《興律》的“上獄”律文,目前并不清楚。此外《歷代刑法考·漢律摭遺》在漢《興律》“考事報讞”條目下所列之事,多與遣使覆案、發卒抓捕有關,沈家本云:“尋常考事不得在《興律》,此必遣使赴郡國考事。”^⑥但這些內容都與簡 396-397 不類。

相反,與簡 396-397 內容相關的簡文都歸屬《囚律》,如《二年律令·囚律》有類似的規定:

气(乞)鞠者各辭在所縣道,縣道官令、長、丞謹聽,書其气(乞)鞠,上獄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都吏所覆治,廷【116】及郡各移旁近郡,御史、丞相所覆治移

①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186頁。

②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62頁。

③ 張家山漢簡研讀班:《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校讀記》,《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191頁。

④ 《晉書》卷三〇《刑法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923頁。

⑤ [清]沈家本撰,鄧經元、駢宇騫點校:《歷代刑法考·漢律摭遺》,北京:中華書局,1985,1589頁。

⑥ [清]沈家本撰,鄧經元、駢宇騫點校:《歷代刑法考·漢律摭遺》,1590頁。

廷。【117】^①

西北漢簡也見告劾鞠獄之事上報二千石：

□獄屬所二千石 126·31^②

囚律：告劾毋輕重，皆關屬所二千石官。 EPT10·2A^③

又如《漢書·刑法志》高祖七年詔：

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④

《晉書·刑法志》云：“囚律有繫囚、鞠獄、斷獄之法。”沈家本《歷代刑法考·漢律摭遺》所列漢代《囚律》“斷獄”條目下收有“二千石受其獄”，^⑤沈家本認為“二千石受其獄者，謂郡守受在下之爰書也”。^⑥現據出土漢簡律文，特別是《居延新簡》EPT10·2A 明確表明，漢律中“告劾”之事上奏二千石官的內容應屬於《囚律》，因此比“告劾”更嚴重的死罪、殺人等情況上奏二千石官的內容也當屬《囚律》。

最後，從竹簡出土位置上，簡 396-397 與《囚律》的簡 116-117 也相近。因此將簡 396-397 歸入《囚律》並無任何障礙。

① 整理者原歸屬《具律》，實應為《囚律》簡文，參見張家山漢簡研讀班《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校讀記》，《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184 頁；王偉《張家山漢簡編聯初探》，《簡帛》第 1 輯，361 頁；彭浩《談〈二年律令〉中幾種律的分類與編連》，《出土文獻研究》第 6 輯，65 頁。

②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第 6 冊，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51 頁。

③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第 9 冊，129 頁。

④ 《漢書》卷二三《刑法志》，北京：中華書局，1964，1106 頁。

⑤ [清]沈家本撰，鄧經元、駢宇騫點校：《歷代刑法考·漢律摭遺》，1496-1497 頁。

⑥ 這部分內容承蒙匿名審稿專家提供建議，在此謹對審稿專家表示誠摯的謝意。

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釋地五則*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馬孟龍

內容提要 本文對北京大學藏秦代水陸里程簡冊所見五個地名進行考釋。指出陽新鄉、陽平鄉為新野縣所轄的兩個鄉,而非陽縣所轄之新鄉、平鄉;櫟陵即《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樂成侯國,約在今河南省唐河縣大河屯鎮境內;楡渠與西漢輝渠侯國有關,約在今河南省魯山縣熊背鄉境內;簡文“輸民”應為“輸氏”之誤釋;女陽與漢代周承休侯國存在承繼關係,約在今河南省汝州市紙坊鄉境內。

關鍵詞 北大秦簡 水路里程簡冊 秦漢政區 侯國

近年出土的秦漢簡牘文獻中,有一類稱作“道里簿”的文書十分特殊。這種文書的基本內容為交通沿綫地點間的里程記錄,載錄的地點以亭燧、傳置、縣邑為主。^① 由於記載了聚落之間的相對里程,“道里簿”對於秦漢交通地理以及秦漢城邑定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目前,學界利用此類文書已取得豐碩研究成果,其中不乏精彩的研究範例。^②

2010年,北京大學獲贈一批秦代簡牘。據介紹,這批簡牘包括一類記錄江漢地區水陸交

* 本文為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二年律令·秩律》與漢初政區地理”(ZWH3154002A)以及2014年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專項資金項目“漢代歷史地圖集”階段性成果。

① 李天虹:《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168頁;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341頁。

② 以往在額濟納河流域漢代烽燧遺址、甘肅省敦煌懸泉置遺址、湖南省龍山縣里耶遺址都曾發現過此類文書。相關研究可參閱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地理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郝樹聲《敦煌懸泉里簡地理考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郝樹聲《敦煌懸泉里簡地理考述(續)》,《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初師賓《漢簡長安至河西的驛道》,《簡帛研究二〇〇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88-115頁;張春龍、龍京沙《里耶秦簡三枚地名里程木牘略析》,《簡帛》第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65-274頁。

通路綫和里程的文書，整理者暫定名為“道里書”。^①顯然，北京大學入藏的“道里書”也屬於簡牘文獻中的“道里簿”範疇。2013年，辛德勇先生先後發表《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的性質和擬名問題》、《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初步研究》（以下簡稱《初步研究》），公布了部分“道里書”的竹簡釋文。^②就簡文內容來看，北京大學藏水陸里程簡冊（以下簡稱“里程簡冊”）主要記錄了以江陵為中心的南郡、南陽郡道路里程，涉及的地名包括秦代南郡、南陽郡、三川郡的縣邑、鄉里、津關、亭郵，地名信息極為豐富，是研究秦漢南郡、南陽郡政區地理和交通路綫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初步研究》已利用這批資料闡發了荆楚地理和秦漢政區地理相關問題，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研究成績。

筆者在閱讀里程簡冊時，發現其中某些地名可以與傳世文獻對讀。結合傳世文獻和簡牘文獻的相關記載，可以進一步闡發這批簡牘文書所蘊含的學術價值，也可附帶解決一些秦漢政區地理問題。現不揣淺陋，對里程簡冊涉及的五個地名進行討論，以求教於學界同仁。

一 陽新鄉

在目前所見里程簡冊簡文中，有一支簡涉及“陽新鄉”。該簡內容為“西陵水道到陽新鄉百卅八里”（04-075）^③，記載了從西陵縣經由水路行至陽新鄉共計一百四十八里的里程信息。里程簡冊多處提到由西陵出發經由水路北上其他地點的里程。《初步研究》已經指出，里程簡冊提到的“西陵水道到某地”主要是指從西陵出發，溯比水（今唐河）而上的水路交通。根據里程推算，陽新鄉應在西陵東北的比水沿岸，約在今湖北省襄陽縣朱集鎮境內。^④

《初步研究》將這支簡中的“陽新鄉”理解為陽縣之新鄉，這種解讀方式可能存在問題。^⑤據《初步研究》考訂，秦代的陽縣約在今河南省方城縣南，而簡文提到的陽新鄉位於今湖北省襄陽縣北，兩地相距十分遙遠，跨越了今天社旗、唐河兩縣（參見圖一）。陽縣轄域如此遼闊，

①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概述》，《文物》2012年第6期。

② 兩文分別刊載於《簡帛》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7-28頁；《出土文獻》第4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176-278頁。兩文俱收入作者文集《石室賸言》，北京：中華書局，2014。

③ 以下引用里程簡冊簡文編號及釋文，俱出自《初步研究》，不再一一注明。

④ 里程簡冊簡04-231記載：“涓口到西陵十二里”。涓口即涓水（今白河）與漢水的交匯處，故陽新鄉在涓口上游一百六十里，約在今湖北省襄陽縣朱集鎮。

⑤ 同樣的解讀亦見作者《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與戰國以迄秦末的陽暨陽城問題》，《北京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後收入作者文集《舊史輿地文編》，上海：中西書局，2015。

令人難以想像。^① 在里程簡冊記載的陽新鄉北部不遠,即是漢代新都侯國遺址。^② 漢代新都侯國原是新野縣鄉聚。《漢書·王莽傳》曰:“永始元年,封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③《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新野縣自注:“有東鄉,故新都”。可見新都侯國設置之前、廢除之後都在新野縣境內。新野縣戰國時期便已設置,^④而新近公布的嶽麓書院藏秦簡也出現了新野縣。^⑤ 秦漢時代的縣域轄境較爲穩定,因此今河南省新野縣王莊鎮唐河沿岸應當隸屬秦代新野縣管轄,故陽縣不可能跨越新野、胡陽二縣去管轄比水下游的陽新鄉。

就陽新鄉所處方位而言,其在秦代應隸屬於新野縣。我們在史籍中能找到一條稍晚的證據。西漢建平四年(前3年),哀帝分封鄭業爲陽新侯。(《漢書·哀帝紀》《漢書·外戚傳》記爲“陽信侯”,古書新、信二字通用)《漢書·外戚恩澤侯表》“陽信侯鄭業”條下注“新野”。^⑥根據《漢書》“侯表”下注縣名體例,陽新侯國地處漢代新野縣境內。^⑦ 漢武帝以後,多以鄉聚分封侯國,鄭業受封之侯國,前身當即新野縣陽新鄉。漢代的陽新鄉明確隸屬新野縣管轄,秦代的陽新鄉也應隸屬於新野縣。

里程簡冊中的陽新鄉乃是新野縣轄鄉,並非陽縣之新鄉,《初步研究》的理解方式並不準確。同樣,在里程簡冊中還載錄有“西陵水道新鄉百五十一里”(04-076)。^⑧ 因《初步研究》將“陽新鄉”解讀爲“陽縣之新鄉”,所以認爲簡04-076中的“新鄉”就是簡04-075中的“陽新鄉”,並結合兩支簡連續排列的現象,推測簡04-076是對簡04-075的修正。這種說法存在一定缺陷。如果簡04-075所記里程有誤,抄手應將錯誤信息削去或勾掉,而不應不做任何處理,又補抄正確信息。而現已知陽新鄉不同於新鄉,則《初步研究》的推論失去了依據。這兩支簡連續排列,應是指從西陵溯比水而上,一百四十八里爲陽新鄉,一百五十一里爲新鄉。《初步研究》稱:“從西陵到‘陽新鄉’或‘新鄉’兩地的里至十分接近,僅僅相差三里,且又都是同樣行走水路,這又實在不大可能會是兩個不同的地點”。《初步研究》的說法過於絕對。實際上,常有聚落夾河相對的現象,如夾漢水而立的襄陽與樊城、夾長江而立的武昌與

① 《初步研究》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於是說:“秦陽縣轄境是沿比水亦即今唐河谷地向西南方向大幅度延展……愈可見陽縣之南北地域,相當遼闊。”見《石室賸言》,182頁。

②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河南分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224頁。

③ 《漢書》卷九九,北京:中華書局,1962,4040頁。

④ 后曉榮:《秦代政區地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274-275頁。

⑤ 嶽麓書院藏秦簡《爲獄等狀四種》載錄的秦王政二十二年發生的“學爲僞書案”多次提及新野縣。見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65-69頁。

⑥ 《漢書》卷一八,713頁。

⑦ 參見拙著《西漢侯國地理》上編第一章第一節《〈漢表〉下注縣名體例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3-42頁。

⑧ 結合水陸里程簡冊簡文格式,此簡釋文應爲“西陵水道到新鄉百五十一里”。整理者釋文或遺漏“到”字。此處承蒙林志鵬先生提示。

漢陽，所以相距僅三里的陽新鄉與新鄉應當是分立於比水兩岸的兩個鄉級聚落。^① 從比水沿岸的陽新鄉、都鄉（西漢新都侯國）皆隸屬新野縣來看，兩鄉之間的新鄉也應隸屬新野縣管轄。

建平三年（前4），哀帝封丞相王嘉為新甫侯，封戶一千六十八，與陽新侯封戶一千相當。《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新甫侯王嘉”條下亦注“新野”，^②則此新甫當同為新野縣屬鄉。此新野縣新甫鄉或與里程簡冊記錄的新野縣新鄉有關。

里程簡冊還記錄有“西陵水道到陽平鄉五十九里”（04-199）。《初步研究》同樣將此“陽平鄉”理解為陽縣之平鄉。現已知陽平鄉上游九十里的陽新鄉隸屬新野縣，則陽平鄉肯定也與陽縣無關。根據其里程，陽平鄉約在今湖北省襄陽縣雙溝鎮，在秦代應隸屬附近的鄧縣或西陵縣管轄（參見圖一）。

二 櫟陵

里程簡冊還有一條與比水航路相關的記載為“比口到櫟陵四百卅一里”（04-208）。簡文中的比口即比水與涓水（今唐河與白河）的交匯處，以此為起點溯比水四百餘里，相當於今唐河縣大河屯鎮境內。

《初步研究》注意到，《水經注》記載有一條叫作“灤（灤）水”的比水支流^③，並已指出櫟陵即位於灤水沿岸。至於“灤水”究竟是今天的哪一條河流，《初步研究》並未指明。由於櫟陵的定位與灤水緊密相關，因此有必要對灤水作一考訂。先來看《水經·比水注》的記載：

比水又西，澳水注之。水北出茈丘山，東流，屈而南轉，又南入於比水。按《山海經》云：“澳水又北入視”，不注比水。余按呂忱《字林》及《難字》《爾雅》并言灤水在比陽，脈其川流所會，診其水土津注，宜是灤水，音藥。^④

灤水發源於茈丘山，亦即歷代地志所載之慈丘山，乃今河南省泌陽縣官莊鄉北之大寨子山，又稱三山。^⑤ 清代地志均將發源於慈丘山的梁河北定為灤水。《大清一統志》曰：“澳水，

① 此處承蒙凌文超兄提示，謹志感謝。

② 《漢書》卷一八，712頁。

③ 《水經注》記作“灤”水。兩漢魏晉南北朝，常為文字添加“艸”頭（參見辛德勇《北齊〈大安樂寺碑〉與長生久視之命名習慣》，收入作者文集《石室賸言》，302-325頁），故此水亦可寫作“灤”水。

④ [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卷二九，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2479-2480頁。原文標點有誤，引文已作修改。

⑤ [清]倪明進修，栗郢纂：《泌陽縣志》卷二，清道光八年刻本。

在泌陽縣西北,俗名涼河。”^①《泌陽縣志》曰:“灤水,源出虎頭山,《水經》謂之澳水……今訛爲涼河。”^②楊守敬編繪《水經注圖》亦根據清代地志把灤水標注在梁河。^③不過,清代地志的說法并不準確。《水經注》記載灤水源出慈丘山後,“東流,屈而南轉,又南入於比水”,而今天的梁河河道呈西南流向,并無東流的趨勢。另外,《水經注》明確記載,比水先與蔡水交匯,再與灤水匯合。《水經·比水注》曰:“蔡水南出磐石山,故亦曰磐石川,西北流注於比。”^④磐石山,即今天泌陽縣陳莊鄉盤古山,發源於此山的蔡水,即今天的甜水河,又名田市河。^⑤甜水河在今泌陽縣賒灣鎮匯入比水,位於梁河交匯口的下游,這一河流交匯形勢,與《水經注》的記載不符(參見圖一)。

筆者注意到,在梁河之西還有一條洪河,同樣發源於慈丘山。此洪河在源出慈丘山後,河道呈東南流向,隨後又轉爲西南流向。這一形勢與《水經注》灤水“東流,屈而南轉”的描述正相吻合。洪河在流出泌陽縣後,在今唐河縣大河屯鎮匯入比水,其交匯口位於蔡水下游,也與《水經注》所述灤水、蔡水方位相同,而里程簡冊記錄的櫟陵正在大河屯鎮附近,所以今天的洪河才應當是古灤水^⑥,櫟陵應在今唐河縣大河屯鎮境內的比水北岸。

《漢書·地理志》(以下簡稱《漢志》)南陽郡轄有樂成侯國。關於西漢樂成侯國所在,顧祖禹引舊地志認爲即河南省鄧州南三十里的樂鄉城。^⑦顧祖禹的看法影響極大,《清一統志》即據此將漢代樂成侯國定於鄧州南,《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文物地圖集》把西漢樂成標繪在鄧縣西南顯然受上述記載影響(參見圖一)。^⑧不過,若仔細分析漢代樂成侯國方位,顧祖禹所引舊志的說法并不能成立。

① 《清一統志》卷二一〇《河南統部·南陽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5冊,314頁上。

② [清]倪明進修,栗郢纂:《泌陽縣志》卷二。又卷首輿圖將今梁河標繪爲灤水。

③ [清]楊守敬:《水經注圖》,北京:中華書局,2009,353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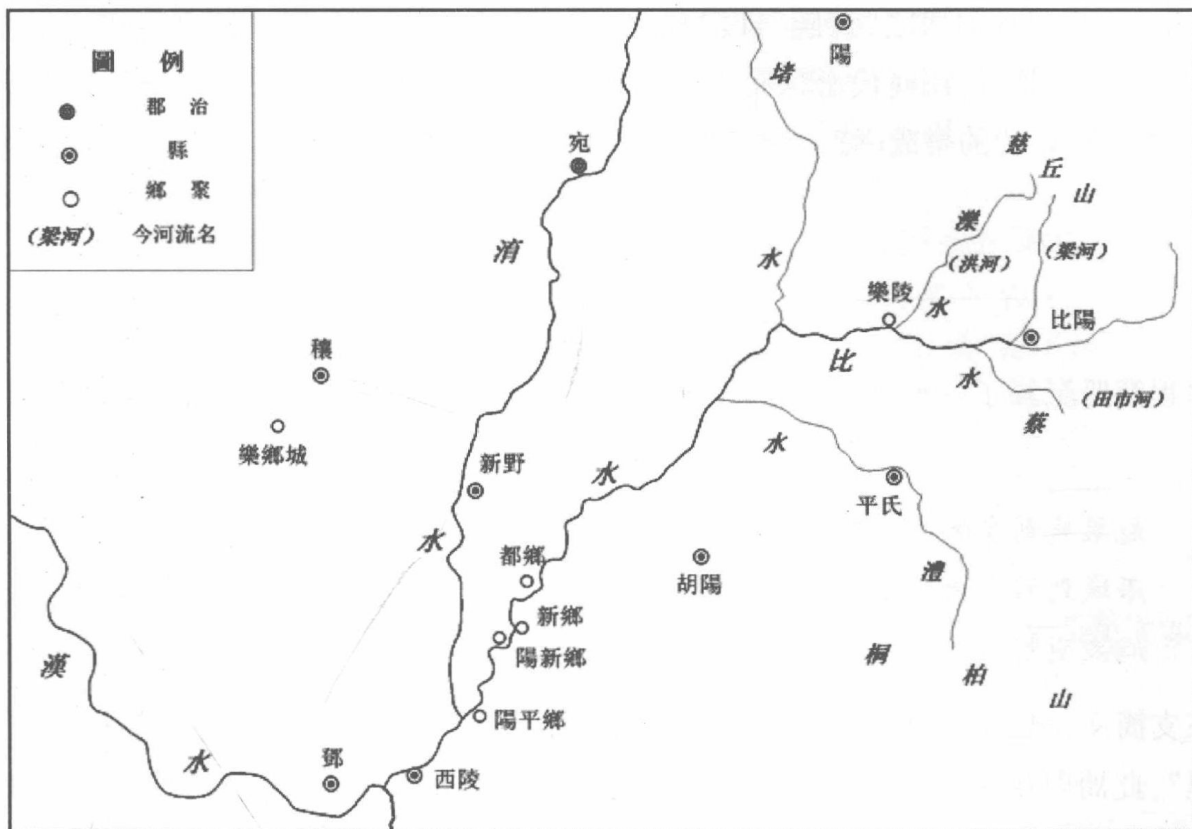
④ [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卷二九,2479頁。

⑤ [清]倪明進修,栗郢纂:《泌陽縣志》卷二;《清一統志》卷二一〇《河南統部·南陽府》,第5冊,314頁上。

⑥ 魯西奇先生已經指出《水經·比水注》記載的澳水應即今天的洪河,但未作論證。見《城牆內外:古代漢水流域城市形態與空間結構》,北京:中華書局,2011,101頁。

⑦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五一《南陽府·鄧州》,北京:中華書局,2005,2417頁。

⑧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22頁;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河南分冊》,230頁。



圖一 秦代比水流域聚落分布示意圖

《漢志》載錄的南陽郡樂成侯國為許延壽封國。《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樂成敬侯許延壽”欄下注“平氏”，^①根據《漢書》“侯表”下注縣名體例，樂成侯國地處平氏縣境內。漢代平氏縣即今天河南省桐柏縣平氏鎮，^②距離鄧縣西南的樂鄉城十分遙遠（參見圖一），所以鄧縣之樂鄉城絕不可能是漢代的樂成侯國。對於《漢表》透露的樂成侯國方位信息，鄭威已有注意，他結合《水經注》灤水的記載，提出漢代樂成侯國應位於灤水附近。^③筆者對此非常贊同。不過鄭威在對灤水定位時，出現了偏差，將其認定為比水以南，發源於桐柏山的某條河流，因而把漢代樂成侯國定位在今河南省泌陽縣、桐柏縣之間。前面已經提到，《水經注》記載灤水發源於慈丘山，南流注入比水，所以灤水絕不可能位於比水之南，而應當是比水以北的洪河。漢代的樂成侯國應定位於今洪河一帶。

里程簡冊對“櫟陵”方位的描述，可以說進一步驗證了筆者的看法。里程簡冊中的“櫟陵”正位於唐河縣大河屯鎮一帶，不僅證實了古灤水即今洪河，同時也為樂成侯國的定位提供了依據。秦漢時代的地名，常常在地名專名後，附加“陵”“陽”“成”“原”等後綴。而古書

① 《漢書》卷一八，700 頁。

②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河南分冊》，233 頁。

③ 鄭威：《楚國封君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80-83 頁。

樂、櫟相通,^①故里程簡冊之“櫟陵”即漢代之“樂成”,位於今唐河縣大河屯鎮比水之北。此地與漢代平氏縣相近,在漢代應隸屬平氏縣管轄,完全符合《侯表》樂成爲平氏縣鄉聚的記載。由此逆推,秦代的樂成(陵)也應隸屬平氏縣管轄。

三 戛渠

里程簡冊記錄了一個叫作“戛渠”的地名。目前公布的簡冊簡文中,共有三支簡涉及戛渠:

戛渠庾到魯陽卅一里(04-056)

石城到戛渠庾卅五里(04-062)

戛渠庾到陽新城庾百四里(04-063)

以上三支簡文,記錄的是戛渠庾到不同地點的陸路里程。此外,簡 04-061 記載有“雒到石城十七里”,此簡與 04-062、04-063 編號相連,記錄了由雒經由石城、戛渠庾到陽新城庾的完整里程。戛渠庾中的“庾”字,《初步研究》已經指出即“倉”之意,則戛渠庾即設在戛渠之倉。04-061 簡提到的雒,即秦代之雒縣。04-056 簡中的魯陽,即秦代魯陽縣。雒縣與魯陽縣南北相鄰,戛渠地處兩縣之間。戛渠距離雒縣六十二里,距離魯陽四十一里,就里程來看,戛渠極有可能是隸屬魯陽縣的鄉聚。

西漢武帝時期,曾兩次分封輝渠侯國。元狩二年,武帝封功臣匈奴人僕朋爲輝渠侯,次年又封匈奴降王應卮爲輝渠侯。《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在兩個輝渠侯下皆注“魯陽”,^②根據《漢書》“侯表”下注縣名體例,輝渠應爲魯陽縣之鄉聚。筆者以爲,《漢書》中的輝渠侯國應當與里程簡冊中的戛渠有關。上古音“戛”爲群母幽部,“輝”爲曉母微部(或歸文部)^③。群、曉二母同屬牙喉音,發音部位相近。從諸家所擬上古音系來看,幽與微、文二部似乎聲音遠隔,但劉釗先生結合清代乾嘉以來關於幽覺與微物文相通的研究成果,指出“不論是傳世典籍和出土資料,都充分證明了上古漢語中幽覺與微物文之間相當常見的音轉現象。”^④戛從“九”聲,龍宇純先生曾注意到從“九”之字(幽部)與微部字相通的例子。如

① 如秦代櫟陽虎符即將“櫟陽”寫作“樂陽”。見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34冊,編號“1917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49頁。

② 《漢書》卷一七,648頁。

③ 學界多把輝字歸入微部,但郭錫良認爲从“軍”的字《詩經》時代應在文部。參見《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0,227頁注1。

④ 劉釗:《古璽格言璽考釋一則》,收入氏著《書馨集: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64頁。

《禮記·明堂位》“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史記·殷本紀》及《周本紀》“鬼侯”并作“九侯”；又如“杙”字，《說文》以爲“簋”之古文，“鬼”“簋”均微部字。此外，“𣎵”“𣎵”二字俱从“九”聲，《廣韻》同見“巨鳩切”（鳩在上古爲幽部）、“渠迫切”（迫爲微部），亦可說明从“九”之字往往有微部之音讀^①，故𣎵與輝亦存在相通的可能。

根據里程簡冊所載𣎵渠與魯陽、雒陽的相對里程，其地約在今河南省魯山縣熊背鄉境內（參見圖二），此地恰好存在黃崗寺漢代聚落遺址，遺址面積達 7000 平方米，符合漢代鄉一級聚落的規模，^②或與𣎵渠鄉有關。里程簡冊不僅驗證了《漢表》“輝渠侯”條下注“魯陽”之可信，同時也爲漢代輝渠侯國的定位提供了可貴的文獻依據。

四 輸民(輸氏)

里程簡冊記載了一條出南陽郡抵達雒陽的交通幹綫。由三支簡構成，相關簡文如下：

魯陽到女陽百一十里(04-067)

女陽到輸民八十九里(04-068)

輸民到雒陽百一十里(04-069)

《初步研究》提到“輸民”不見於傳世文獻記載，根據簡文載錄里程，可大致推定輸民在今汝州臨汝鎮一帶。^③其實簡文中的“輸民”并非不見於傳世文獻，此地即《漢書·地理志》潁川郡綸氏縣。今試論證如下：

《漢志》潁川郡之綸氏縣，《續漢書·郡國志》記爲“輪氏”。《後漢書》某些篇章亦將此縣記作“輪氏”。《張玄傳》載：“（玄）強起至輪氏，道病終。”^④《陳寔傳》：“郡中士大夫送（寔）至輪氏傳舍”。^⑤不過《後漢書》也有將此縣書作“綸氏”的情況，似乎當時的寫法并不固定。但是洛陽南郊東漢刑徒墓磚“P3M10：下 9A”載有“無任潁川輪氏司寇張孫元初六年二月四日死”。^⑥另外《水經注》載臨睢縣立有東漢《豫州從事皇毓碑》，樹碑者有“二千石丞輪氏夏文則”。^⑦東漢刑徒墓磚銘文及漢碑碑文表明，“輪氏”才是當時通行的寫法。對照《漢志》，似乎此縣西漢書作綸氏，東漢改書作輪氏。^⑧不過，筆者在梳理《漢志》縣名書寫形式時，發現今

① 龍宇純：《上古音芻議》，收入《中上古漢語音韻論文集》，臺北：五四書店，2002，439 頁。

② 國家文物局主編：《河南省文物地圖集》，文物單位簡介第 91 頁。

③ 辛德勇：《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初步研究》，收入《石室牘言》，195 頁。

④ 《後漢書》卷三六，北京：中華書局，1965，1244 頁。

⑤ 《後漢書》卷六二，2065 頁。

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漢魏洛陽故城南郊東漢刑徒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附圖三一。

⑦ [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卷二四，2018 頁。

⑧ 清人王懋竑即持此觀點。見《讀書記疑》卷六，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本《漢志》有將文字“車”旁訛誤為“糸”旁的現象。漢簡草書“車”旁、“糸”旁寫法較為接近,^①在傳抄時,極易抄混。例如《漢志》清河郡有繚縣,而傳世文獻、出土文獻都表明,繚縣在西漢的通行書寫方式為“轅”,今本《漢志》的“繚”字,或為“轅”字之訛誤,或為“轅”字之通假。^②因此,《漢志》“綸氏”有可能是後人誤抄所致,也有可能是後人僅為注音而換用了“綸”字,並非西漢的通行寫法,當時的通行寫法應與東漢一樣,同為“輪氏”。

再來看里程簡冊中的“輪民”。古書“俞”“侖”二字在字形上非常接近,“侖”字極易訛誤為“俞”。《戰國策·齊策四》“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章有“請以市論”的文字。^③而《風俗通義》載此事則寫作“請以市論”。^④就文意而言,“以市論”更佳,《國策》“論”應是“論”訛誤。而在釋讀出土簡牘文字時,也容易將“侖”誤釋為“俞”。孔家坡漢簡《日書》曾記載古史人物“綸”,劉樂賢先生認為不能排除為“綸”字誤釋的可能。^⑤這裏再舉兩個誤將漢簡文字“輪”釋為“輪”的實例。居延漢簡 72·53 有“輪一具□□視□杙軸完”的字樣。^⑥就文字內容來看,該簡應屬於“折傷牛車出入簿”的一段,為檢視牛車損壞狀況的記錄。^⑦相類似的文字可以參考居延新簡 EPT51·251“南陽葉車父武后。第十七車。輪一具……杙軸完”的記錄^⑧。這類簿錄中,檢視車輪、車軸完好與否,是非常重要的項目。顯然簡 72·53 中的“輪”是“輪”字的誤釋。仔細核對圖版,該簡輪字雖然右半部略殘,但仍能辨識,^⑨前人的釋讀顯然存在錯誤。又肩水金關漢簡 73EJT2:18 釋文作“□□者省擇其十人作牛車輪工遣詣天水郡□”,核對圖版,整理者顯然把“輪”誤釋為“輪”。^⑩綜合以上例證,里程簡冊輪民中的“輪”應是“輪”字的誤釋。

至於輪民中的“民”字,我們也有理由相信為“氏”字的誤釋。古書民、氏二字的寫法極為相近,常常混用。而將“氏”寫作“民”形,是秦文字的一個特點。如睡虎地秦簡中的“氏”皆寫作“民”,“昏”皆寫作“昏”。^⑪秦代刑徒墓瓦文中的“楊氏”寫作“楊民”。^⑫秦文字的這種寫法,在漢代仍有保留。漢代簡牘、石刻文字常能見到寫作“民”形的氏字。相關文字例

① 陸錫興:《漢代簡牘草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268-269 頁。

② 參見拙文《居延漢簡地名校釋六則》,《文史》2013 年第四輯。

③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卷一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606 頁。

④ 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81,330 頁。此例證承蒙任攀告知。

⑤ 劉樂賢:《釋孔家坡漢簡〈日書〉中的幾個古史傳說人物》,《中國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

⑥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127 頁。

⑦ 李天虹:《居延漢簡簿籍分類研究》,154 頁。

⑧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95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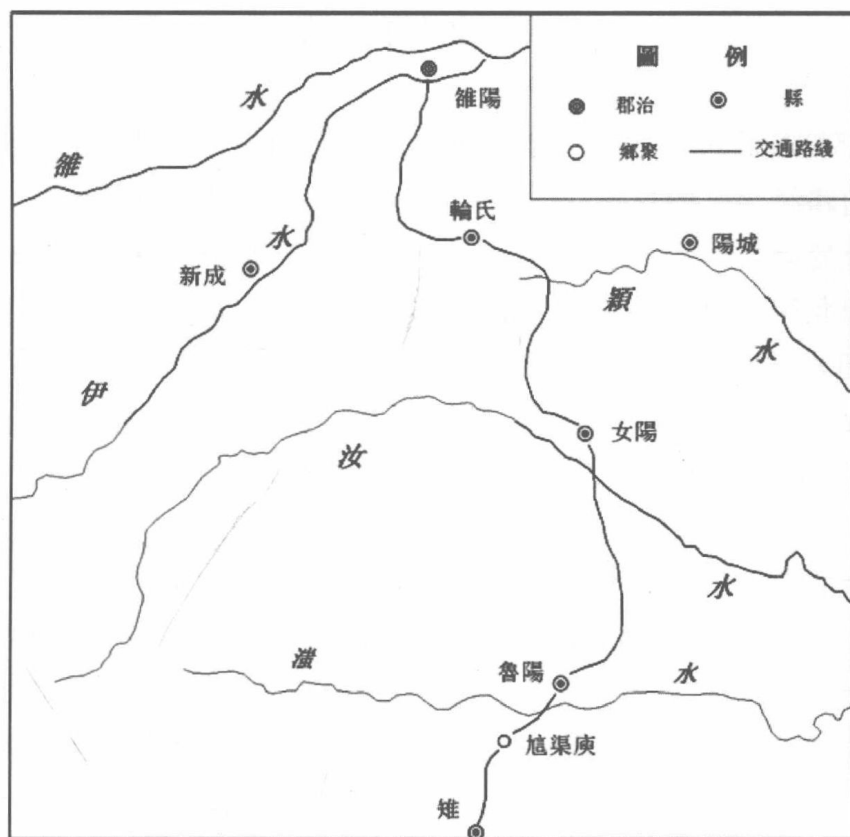
⑨ 勞榘主編:《居延漢簡·圖版之部》,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185 頁。

⑩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肩水金關漢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1。釋文見下冊第 22 頁,圖版見上冊第 41 頁,中冊第 41 頁。

⑪ 梁春勝:《楷書部件演變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12,106 頁。

⑫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潼縣文物工作隊編:《秦陵徭役刑徒墓》,西安:陝西旅游出版社,1992,35 頁。

證,梁春勝先生舉出很多,這裏就不重複列舉了。



圖二 秦代南陽郡至三川郡交通路線示意圖

那麼秦代有没有可能把地名“輪氏”寫作“輪氏”呢?筆者認為不存在這種可能性。因為該地名從“俞”的寫法在戰國時期便十分穩定。在戰國時期韓國的銀器、印章和兵器上都出現過地名“俞氏”。^①而在韓國陶文及錢幣上,還出現過從俞從邑的字形。^②該地名在漢代以後的文獻也從未出現從“俞”的寫法。結合以上考述,我們有理由相信里程簡冊中的“輪民”是“輪氏”的誤釋。秦代里程簡冊“輪氏”的寫法,表明由秦至東漢該縣都書寫為“輪氏”,今本《漢志》“綸氏”并非漢代通用的寫法,這對於校訂《漢志》文字訛誤,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關於漢代輪氏縣的地理方位,歷代地志均有明確記載,約在今河南省登封市潁陽鎮(參見圖二)。^③潁陽鎮至漢魏洛陽城遺址的道路距離約為 50 公里,相當於秦代 120 里,與里程簡冊記錄的里程信息基本吻合。

① 后曉榮:《戰國政區地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42 頁。又 1949 年前長沙出土韓國銀器以及某私人收藏韓國兵器也見有地名“俞氏”。這兩件例證承蒙董珊先生提示,謹致感謝。

② 施謝捷:《古璽匯考》,安徽大學中文系 2006 年博士學位論文,133 頁。

③ 《大清一統志》卷二〇六《河南統部·河南府》“潁陽故城”條,第 5 冊,248 頁上;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19-20 頁。

五 女(汝)陽

《漢志》汝南郡轄有汝陽縣，古書“女”“汝”二字通用，故“女陽”即“汝陽”。不過，就里程簡冊載錄的交通路線和里程來看，簡文中的女陽並非漢代汝南郡之汝陽，《初步研究》對此已有詳盡討論。至於簡文“女陽”方位，《初步研究》根據簡冊里程信息，大致推定在今河南省郊縣境內的汝河北岸。現在明確里程簡冊載錄的“輸民”即“輸氏”後，可以對里程簡冊之“女陽”方位做出更為精確的判斷。

里程簡冊載錄女陽距輸氏八十九里，距離魯陽一百一十里。秦漢輸氏故城在今登封市潁陽鎮，秦漢魯陽故城在今魯山縣縣城南關。^①以秦漢輸氏故城、魯陽故城為基點，可以推算出里程簡冊載錄的女陽約在今河南省汝州市紙坊鄉境內的汝水北岸（參見圖二）。

在今汝州市紙坊鄉康街村存有一片漢代遺址，據傳為漢代周承休侯國遺址。^②《漢書·元帝紀》《漢書·外戚恩澤侯表》載初元五年，元帝更封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③此為周承休侯國建置之始。就該侯國名號來看，“周承休”顯然是嘉號，而非地名。^④至於周承休侯國建置之前，其所在鄉聚的名稱不詳。周承休侯國於東漢省并。北魏時期，又在其故地設置汝原縣，至隋代更名為承休縣。^⑤北魏設置的汝原縣，很有可能就是周承休侯國設置前的古名。秦漢時代，常在專有地名後附加陵、陽、城、原等通名。如《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載武帝元朔四年封山侯國，《漢書·王子侯表》作“山原”。^⑥《漢書·王子侯表》所載武帝元朔二年封臨衆侯國，即《漢志》琅邪郡臨原侯國。^⑦故“汝原”可與“汝陽”相通。里程簡冊所載錄之女(汝)陽，應當是西漢周承休侯國的前身。

附記：本文曾宣讀於2015年吉林大學“出土文獻與學術新知”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得到董珊、凌文超二位先生指正。另外文章寫作過程中，得到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的程少軒、張傳官、任攀，歷史系林志鵬等先生的幫助，僅記於此，以表謝忱！

① 國家文物局主編：《河南省文物地圖集》，89頁。

② 國家文物局主編：《河南省文物地圖集》，83頁，文物單位簡介74頁。

③ 《漢書》卷九，285頁；《漢書》卷一八，698頁。

④ 如元鼎元年，武帝東巡獲鼎，有司贊曰：“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見《漢書》卷二五《郊祀志》，1225頁。

⑤ 《魏書·地形志》汝北郡有南汝原縣。《隋書·地理志》襄城郡承休縣注曰：“舊曰汝原，置汝北郡。後改曰汝陰郡。後周郡廢。大業初，改縣曰承休，置襄城郡。”

⑥ 《史記》卷二一，北京：中華書局，1959，1102頁；《漢書》卷一五，465頁。

⑦ 《漢書》卷一五，440頁；《漢書》卷二八，1586頁。

北大漢簡《六博》補論(三則)*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謝 坤

內容提要 北大漢簡《六博》是一篇與尹灣漢簡《博局占》頗為相似的占卜文獻。通過相關對讀、梳理,本文認為:第29號簡“行者疾,日夜不留”中的“疾日夜”應連讀,指行者日夜兼程、疾速行進,該句當斷讀為“行者疾日夜,不留。”第39號簡“難與言,不合同”當斷讀為“難與,言不合同”,分別指“難以相處”和“言語不合”。第24、25、26號簡所記為《日書》類文獻中常見的“入官”“衣吉”“衣忌”題材,其在內容、語言表述、簡背劃痕等方面均與《六博》篇有所不合,或非《六博》篇的內容。

關鍵詞 北大漢簡 《六博》 《博局占》 對讀

新近公布的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第五輯中收錄有《六博》一篇,其內容為一幅“博局圖”及相關占驗結果。整理者指出其可與尹灣漢墓《博局占》等材料對讀,很有啟發性。本文嘗試提出一點不同的看法,請方家指正。

北大漢簡《六博》第29號簡釋文作:^①

* 本文寫作得到武漢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2015112010201)的資助。

①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著:《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10頁。下引圖版及釋文皆出自此書,不另注。

(以問行者:)在楬,行者疾,日夜不留。

尹灣《博局占》“問行者”對應處作“在楬疾日夜不留”,李學勤先生指出該簡是“占問旅行者的命運”,^①當可信。在釋文斷讀方面,學者多讀作“在楬,疾,日夜不留”。^②《六博》29號簡亦在“疾”處斷讀,當是受了《博局占》的影響。

實際上,典籍中“疾”常與“日夜”共同出現,二者或可連讀,“疾日夜”可指“日夜兼程、疾速行進”。“疾”又常寫作“亟”,二者均有“迅速”義。《爾雅·釋詁》:“亟,疾也。”邢昺疏曰:“皆謂急疾也。”《左傳》隱公十一年有“乃亟去之”,陸德明《釋文》曰:“亟,急也”。是故,“疾日夜”又作“亟日夜”,如:

洞庭段(假)守繹追遷陵亟,日夜上勿留。《里耶秦簡》8-1523^③

其亟日夜掄(輸)趣,至白(甘)泉之置。《趙正書》4-5^④

上引例證中“亟日夜”用以修飾具體行為,分別指疾速上報“追書”和傳輸始皇帝的“鑾駕”,兩件事均十分緊急,需要日夜兼程、迅速傳輸。與之稍異,《六博》和《博局占》“占行者”中“亟日夜”之後無具體行為。究其原因,或許是由於在此占驗中,所問內容無疑是關於“行路”的,因此在記錄占驗結果時將行為動詞省略,以避繁複。

又,北大漢簡《六博》21號簡云“在楬者,夜行,不留”,與29號簡內容相似。其中“夜行”與“疾日夜”皆屬時間範疇,而需要“疾日夜”處置之事要更緊急,其行路時間也更緊迫。“不留”,為秦漢習語,指“行者”在行進途中不被滯留。秦漢時期“行者”因客觀原因被留滯的現象時有發生,如里耶秦簡記有“雨留”的情況(如5-1),嶽麓秦簡還有“波留”(《廿七年質日》42肆)、“主吏留難”(《為吏治官及黔首》67)的記載。^⑤至於《六博》中所記的“不留”,當是預測“行者”行進順利、不被滯留。

綜上,“疾日夜”可能是秦漢時期指稱時間的固定表述。如所論不誤,那麼《六博》29號簡當斷讀為“在楬,行者疾日夜,不留。”相應地,尹灣《博局占》“占行者”記載也應調整為“在

① 李學勤:《〈博局占〉與規矩紋》,《文物》1997年第1期。

② 劉樂賢:《簡帛數術文獻探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117頁。劉苓先生將其譯為“行動快,日夜不停留”,見劉苓《漢代〈博局占〉木牘解析》,《上海集郵》2004年第7期。

③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348頁。網友鄭公渡讀為:“洞庭段(假)守繹追遷陵亟日夜上,勿留”。“抱小”《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一)》文後跟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15年11月18日。

④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著:《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89頁。該簡中“掄”“白”字的釋寫以及斷讀仍存在分歧,不過“亟日夜”連讀當無問題。相關討論,可參“抱小”《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一)》文後跟帖。

⑤ 郭濤先生指出,“波留”可讀為“陂留”,表因故阻礙而滯留縣內之義,或與河堤修築事宜有關。見郭濤《嶽麓秦簡〈二十七年質日〉“波留”或非地名》,簡帛網,2011年12月30日。“主吏留難”,整理者認為“留難”表“無端滯留,故意刁難”之義。參見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139頁。

楬,疾日夜,不留”。相應驗辭可理解為:“(占問結果)在楬,行者日夜兼程、疾速行進,且不被滯留。”

二

尹灣漢簡《博局占》中有一則占辭云:^①

· 占取婦嫁女,高,婦當家,難與。

其中“難與”一詞,頗費解。學者對該詞的理解存在不同意見,如劉樂賢先生懷疑“與”為“興”字之誤。^②

新公布的北大漢簡《六博》篇中也有相似記載,其釋文作:

· 問取(娶)婦,在高,婦長家,難與言,不合同。39

將二者對比可知,《博局占》中的“難與”當即《六博》中“難與”。并且,典籍中“與”和“與”常通用(其例甚多,不贅舉),亦可為證。^③“與”有親近義,《管子·霸言》:“諸侯之所與也”,尹知章注曰“與,親也”。又,《論語·微子》:“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邢昺疏曰“與,謂相親與”。《博局占》中的“難與”即預測婦人難以親近,這恰和《六博》記載一致。

“合同”,常指兩物相合,沒有矛盾。如《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瑯琊刻石云:“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又,唐代羅隱《兩同書》記云:“貧賤者,行不合道,言不合同,則去之楚、越,若脫敝屣,奈何同之?”

如此,則《六博》第39號簡或當斷讀為:

· 問取(娶)婦,在高,婦長家,難與,言不合同。39

該驗辭可理解為“(占問結果)在高,婦人當家,且其不易親近,與人言語不合。”

三

· 入官吉日:子善,丑七遷,寅吉,固……24

· 衣吉日:甲子、乙丑、巳、酉,辛丑,己酉。丁丑,婦人。丁巳,安身。癸酉,多衣。

①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編著:《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21頁。

② 劉樂賢:《尹灣漢墓出土數術文獻初探》,《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178,179頁。

③ 高亨:《古文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846頁。

以丑財(裁)衣,以酉衣之,必大吉。·【圖案】·春夏。25

·衣忌:入月十七日不可以財(裁)衣,六月己未不可以衣新衣,必死水中。急行,不得須良日,東行。·【圖案】·秋冬。26

對於 24、25、26 號簡的歸屬,整理者曾指出,“三支簡爲入官及衣的擇日宜忌,不以博局爲占,但據簡背劃痕似應置於此,其後或有缺簡。春夏、秋冬二圖,與周家臺秦簡‘戎磨日’相似”。

整理者對三支簡性質的判斷應可信,但是三支簡是否應該編入《六博》,可能還有討論的餘地。孫沛陽先生曾提出,簡背劃線可以幫助解決一些竹簡編聯問題,但是簡背劃線對於簡序編排并無決定性作用。^① 這一結論對於《六博》大概也是適用的。

如果將第 24、25、26 號簡歸入《六博》,則有幾處疑點:





首先,三支簡所記內容爲“入官”“衣吉日”“衣忌”,這是《日書》類文獻中常見的題材。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种)中有相似記載:^②

(1)入官良日:子丑入官,吉,必七徙。寅入官,吉。戌入官,吉。157-160 陆

(2)衣良日:丁丑,丁巳、丁未、丁亥、辛未、辛巳、辛丑、己丑、乙酉、己巳、辛巳、癸巳、辛丑、癸酉。丁丑材(裁)衣,媚人。入十月十日日乙酉、十一月丁酉材(裁)衣,終身衣絲。113-114

(3)衣忌:癸亥、戌申、己未、壬申、丁亥、癸酉,寅、申、亥,戌、巳、癸、甲,己卯、辛卯、癸卯,丁、戌、己、申。六月己未,不可以製(製)衣,必死。115 背

其次,《六博》第 25、26 號簡中出現的圖像,與周家臺秦簡《日書》中的“戎磨日”圖較爲相似(如下表),此皆與《六博》內容不類。

| | | | |
|---|---|---|---|
|  |  |  |  |
| 《六博》25 | 《六博》26 | 《戎磨日》131 ^③ | 《戎磨日》261 ^④ |

① 孫沛陽:《簡冊背劃線初探》,《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4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58頁。

②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壹)》,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430、493頁。

③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叁)》,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203頁。

④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叁)》,241頁。

再者,三支簡均不見於尹灣《博局占》。我們知道,尹灣漢簡《博局占》與《六博》在占圖和占驗記錄上頗為相似,然而覆核兩批材料,《六博》中出現的“問取婦”“問行者”“問繫及會論者”“問病者”“問亡人”記錄在《博局占》中均有對應辭例,而唯獨 24、25、26 號簡的內容不見於《博局占》,令人懷疑。

除此之外,24-26 號簡的敘述風格與《六博》中的其他占問表達也存在差異。《六博》中五個“占問”均為“問某事+在某博道+占驗結果”的格式,而簡 24-26 則為“占某事+干支+占驗結果”,與之顯然不同。并且《六博》中提到的九個“博道”等信息,與其并無關係,故而比較可疑。

綜上,結合前文對第 24、25、26 號簡的判斷,頗疑三者并非《六博》的內容。又,根據北大漢簡公布的信息,其中有一批數量頗豐的《日書》,^①且另有一篇與此不同的“六博”,^②或與此有關。如果我們的推測不誤,那麼三支簡恐要從《六博》中單獨析出。

如要將三支簡析出,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說明:整理者將其歸入《六博》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是“簡背劃痕”,因此要對整理者懷疑的“簡背劃痕”問題作出合理解釋。為方便討論,先將原整理的《六博》簡背劃痕圖形轉載如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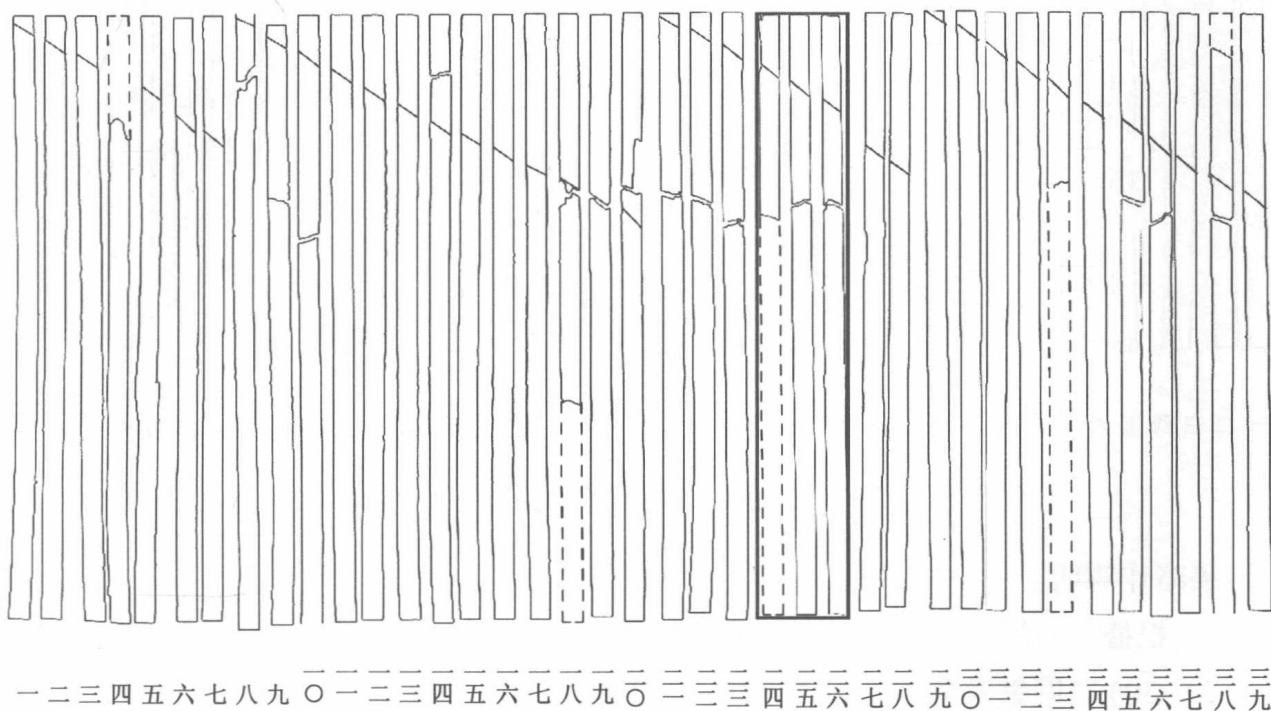


圖 1:簡背劃痕(整理本)

首先,可以看到,第 24、25、26 號簡背劃痕雖然能與第 21-23 號簡背劃痕較好地聯結,但

①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概說》,《文物》2011 年第 6 期。

② 陳侃理:《北大漢簡數術類〈六博〉〈荊決〉等篇略述》,《文物》2011 年第 6 期。

與第 27-28 號簡劃痕却并不能完全吻合。^① 因此整理者將三支簡補入《六博》中,似亦未能完滿地解決簡背劃痕的問題。

其次,順着前文的思路,試將三支簡剔除,并嘗試重新調整簡序。尹灣漢墓《博局占》順序為“六博圖+占取婦嫁女+問行者+問繫者+問病者+問亡者”,這或許能為《六博》的復原提供相關參考。觀察《六博》的整篇布局和内容,其大致順序應當也是“六博圖+占問記錄”的格式。由於“六博圖”(1-20 號簡)簡正、背的信息比較充分,整理者的復原是可信的。那麼,復原的關鍵則是幾個占問記錄的順序問題了。結合占辭、背劃綫等信息,《六博》篇的順序大致復原如下(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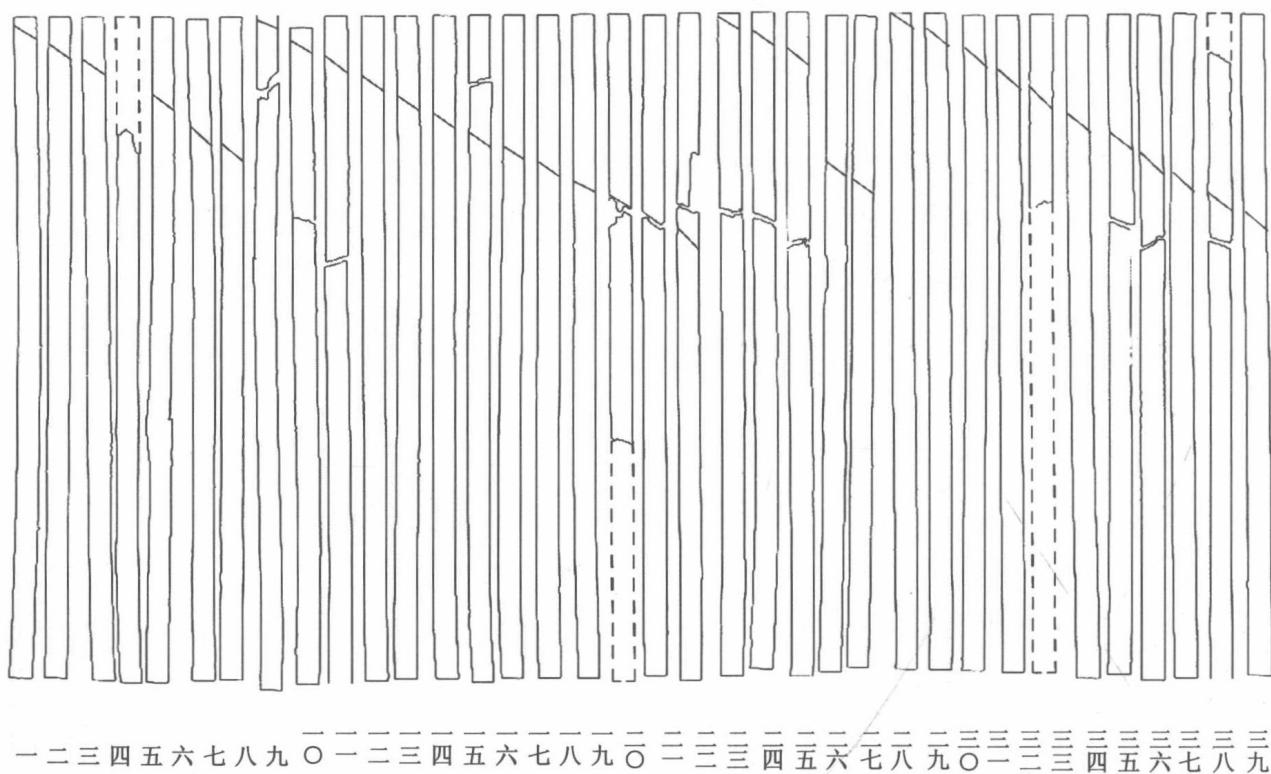


圖 2: 簡背劃痕(調整本)

這裏略作說明:

第一,根據《六博》篇占問内容的不同,可將其分為五個小組,即“問娶婦”(37-39)、“問行者”(27-30)、“問繫及會論者”(31-33)、“問病者”(34-36)、“問亡人”(21-23)。在編聯時,則主要考慮五個小組之間的關係。

第二,尹灣《博局占》中“問行者”“問繫者”“問病者”三者先後連屬,觀察《六博》的相應内容及簡背劃綫可知“問行者”(27-30)、“問繫及會論者”(31-33)、“問病者”(34-36)亦可

^① 整理者推測,第 26 號簡與第 27 號簡之間仍可能存在脫簡。

先後排列。

第三,北大漢簡《六博》第20號簡“提到卜問的前提條件”,且這一記錄不見於尹灣漢簡《博局占》:

· 知行若亡日,以案之博道。不知,以初來問日占之。20

根據“行若亡”的記載,可推測其下面的占問很可能是“占行”或“占亡”。再結合簡背劃綫的信息,可知20號簡後應接21-23號簡。

第四,尹灣《博局占》中的“占取婦嫁女”處於第一欄,而“問取婦”在《六博》則置於最後一欄,也即《六博》中“問亡人”和“問取婦”的順序剛好和尹灣“博局占”順序相反。

綜上,復原後《六博》的簡序應調整為:(1-23)+(27-30)+(31-39)。這樣的復原方案,似乎還存在一個問題,即“問亡人”(21-23)與“問行者”(27-28)的簡背劃痕並不能完全對應,兩組簡之間似乎仍有缺簡。不過根據已公布的北大漢簡材料來看,兩支簡可以連讀但簡背却並不連貫的現象比較常見,比如《老子》第66、67號簡,《周訓》第93-94號簡和110-111號簡之間,均存在空缺。朱鳳瀚先生推測,這有“先編後寫的可能性,可能是簡寫錯被抽掉了”。^①至於其原因是否如此,尚需進一步研究。

附記:本文寫作蒙陳偉老師、劉國勝老師、何有祖老師、高一致兄以及匿名審稿專家提供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① 劉力源:《北大漢簡反映了漢初大量搜書的成果》,文匯網,2015年12月18日。

敦煌馬圈灣出土藥方簡補釋

——爲紀念謝桂華先生而作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劉樂賢

內容提要 敦煌馬圈灣漢簡中至少有四支藥方簡,即第505號、第563號(正、背面)、第564號,及第1177+1060號。這幾支簡上殘存的藥名,雖經學者多方考證,但尚有一些需要再作討論的地方。本文主要對其中“蜀署”(第563號簡)、“厚付”(第563號簡)、“白元”(第564號簡)等藥名的釋讀,作了新的討論。

關鍵詞 敦煌漢簡 馬圈灣漢簡 藥方 藥名

在西北漢代屯戍遺址出土的簡牘中,偶爾也可以見到一些當時人抄錄過的藥方簡。這些藥方簡的內容和價值,早已引起簡牘學者和醫學史專家重視,相繼有耿鑑庭《漢簡里的醫藥疾病資料》^①、張顯成《簡帛藥名研究》^②、高大倫《居延漢簡中所見疾病和疾病文書考述》^③、謝桂華《西北邊塞散見醫藥簡牘與敦煌醫藥寫本之比較》^④、馬繼興《出土亡佚古醫籍研究》^⑤、劉金華《邊地漢簡散見醫方拾遺》^⑥、楊輝文《甘肅河西出土醫藥簡牘整理與研究》^⑦、周

① 耿鑑庭:《漢簡里的醫藥疾病資料》,《江西中醫藥》1957年第4期,59-62頁。

② 張顯成:《簡帛藥名研究》,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446頁。

③ 高大倫:《居延漢簡中所見疾病和疾病文書考述》,《簡牘學研究》第2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117-125頁。

④ 謝桂華:《西北邊塞散見醫藥簡牘與敦煌醫藥寫本之比較》,《漢晉簡牘論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262-285頁。

⑤ 馬繼興:《出土亡佚古醫籍研究》,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1-14頁。

⑥ 劉金華:《邊地漢簡散見醫方拾遺》,簡帛網2005年11月11日。

⑦ 楊輝文:《甘肅河西出土醫藥簡牘整理與研究》,西北師範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

祖亮、方懿林《簡帛醫藥文獻校釋》^①等論著，對之作過介紹或討論。其中，謝桂華先生的《西北邊塞散見醫藥簡牘與敦煌醫藥寫本之比較》一文，對這些藥方簡的討論最為全面和細緻，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謝桂華先生此文，是他 2000 年在訪問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時撰寫的。文章由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羅維前(Vivienne Lo)博士譯為英語，先於 2000 年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上宣讀，隨後收入此次會議的論文集中^②。其中文稿，也已收入近年出版的謝桂華先生文集《漢晉簡牘論叢》之中。^③

在謝桂華先生撰寫和修改這篇論文時，我正好和他一起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訪問，因而對這篇文章的寫作背景和修改過程比較清楚。現在回想起來甚為可惜的是，當時我對漢簡的研究還不感興趣，加之忙於核對英國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中的數術文獻，竟然未曾利用朝夕相處的難得機會，就藥方簡的釋讀向謝桂華先生仔細請教。時隔數年之後，我才開始對漢簡的釋讀發生興趣，對其中涉及藥方的部分尤為關注。近年在研讀漢簡特別是藥方簡的過程中，又曾多次重溫謝桂華先生的這篇大作，獲益良多。最近因閱讀《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④刊發的新照片，對其中藥方簡的認定和考釋有些不同意見，於是草成這篇小文，在深切懷念謝桂華先生的同時，也試圖為馬圈灣藥方簡的研究做一點拾遺補缺的工作。

上述各家論著對馬圈灣漢簡中到底有多少支藥方簡這一基本問題，看法不盡一致。多數學者在介紹馬圈灣漢簡中的藥方簡時，祇列出了第 563 號(正、背面)、第 564 號及第 1177 號三支殘簡。但是，馬繼興先生在介紹馬圈灣漢簡中的藥方簡時，除提到這三支殘簡以外，還列出了第 574 號及第 1060 號兩支殘簡^⑤。周祖亮、方懿林在介紹馬圈灣漢簡中的藥方簡時，除提到第 563 號(正、背面)、第 564 號及第 1177 號三支殘簡以外，又多列出了第 505 號一支殘簡^⑥。馬繼興、周祖亮等先生增加的第 574 號、第 1060 號、第 505 號等三支殘簡到底是不是藥方簡，這裏應當先做討論。

第 1060 號是一支殘簡，現存“白草各一分，皆治”等字。“白草”的“白”字，以前由於照片不够清晰，曾有學者懷疑為“甘”之誤釋^⑦。今據《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刊發的清晰照片

① 周祖亮、方懿林：《簡帛醫藥文獻校釋》，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444-463 頁。

② Xie Guihua, “Han Bamboo and Wooden Medical Records Discovered in Military Sites from the North Western Frontier Regions”, translated by Vivienne Lo, in Vivienne Lo and Christopher Cullen eds., *Medieval Chinese Medicine: The Dunhuang Medical Manuscrip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Series), 2005, pp.78-106.

③ 謝桂華：《西北邊塞散見醫藥簡牘與敦煌醫藥寫本之比較》，《漢晉簡牘論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262-285 頁。

④ 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3。

⑤ 馬繼興：《出土佚古醫籍研究》，12-14 頁。

⑥ 周祖亮、方懿林：《簡帛醫藥文獻校釋》，452 頁。

⑦ 馬繼興：《出土佚古醫籍研究》，14 頁。

可知,釋“白”準確無誤。“白草”是“白薺”或“白英”的別名,^①“冶”指搗碎藥物,^②此簡所載確為某一藥方的殘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簡的形制、字迹與上面提到過的第 1177 號一致。在新近出版的《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中,張德芳先生已經將它與第 1177 號拼合。^③從斷口及內容等方面看,這一拼合可信。馬繼興先生以前將第 1060 號看作藥方殘簡,現在看來無疑是正確的。

第 574 號也是一支殘簡,祇存簡的右上部分。該簡現存“黍米一石”四字,每字都祇存其右邊一半的字迹。關於這四個字的含義,馬繼興先生曾作過解釋:“黍米為《名醫別錄》米穀部的中品藥。此處的劑量為‘一石’。當係作為藥效用途,但非具體醫方。”^④今按:“黍米”雖然具有藥用價值,但“黍米”或“黍”是漢代常見的糧食,僅從漢簡的記載就可以知道,“黍米”在當時主要是當作食物而不是藥物使用。如馬圈灣漢簡第 246 號,其第一欄有“酒三斛”“黍米二斛”“白粳米二斛”“牛肉百斤”等內容,第二欄存“醬二斗”“醢三斗”等內容。^⑤馬圈灣漢簡第 364 號,在“候吏所貸黍稷米計”的標題之下,列有“王子嚴取黍粟五升直一斗”“誅虜張卿稷米三升黍米二升為社”“張俘君稷米三升黍米二升為社”等內容。^⑥居延漢簡 10.39 號,載有“對祠具:雞一,黍米一斗,稷米一斗,酒二斗,鹽少半升”等內容。^⑦從上下文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簡文提到的“黍米”都是指糧食而非藥物。馬圈灣漢簡第 574 號“黍米一石”的“黍米”,由於缺失了後面的文字,其具體所指一時不易完全確定。但按一般情況推測,此處“黍米”指糧食的可能性更大。馬繼興先生在沒有舉出別的證據的情況下,單憑“黍米一石”四字就斷定該簡的“黍米”是指藥物,根據並不充足。為謹慎起見,暫時不宜將該簡歸入藥方簡或醫藥簡。

第 505 號簡殘損嚴重,現祇存左右兩行殘文。其殘存文字,《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釋作“大如母[指]”和“[口]物皆又且”,^⑧《簡帛醫藥文獻校釋》釋作“大如母(拇)指”和“八物,皆父(叟)[且](咀)”。從《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刊發的新照片看,《簡帛醫藥文獻校釋》的釋文可從。“父且”一詞,亦見於馬王堆漢墓帛書《雜療方》、武威漢代醫簡及居延新簡中的藥方殘

① 參看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640 頁。

② 參看李學勤《冶字的一種古義》,《綴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95-197 頁。

③ 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159、339 頁。

④ 馬繼興:《出土亡佚古醫籍研究》,14 頁。

⑤ 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222 頁。

⑥ 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242 頁。

⑦ 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壹)》,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39 頁。

⑧ 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263 頁。

簡^①。研究者已經指出“父且”就是常見於古代醫書的“咬咀”，並對“父且”或“咬咀”的本義及演變作過討論。^②而在武威漢代醫簡提到“父且”的藥方當中，至少有三條的敘述方式與我們正在討論的這一行殘文甚為相近，現摘出來供大家比較：

治伏梁裏濃在胃腸之外方：大黃、黃芩、芍藥各一兩，消石二兩，桂一尺，桑卑肖十四枚，蟪虫三枚，凡七物，皆父且，漬以淳酒五升，卒時煮之三（第 46-47 號^③）。

治久咳逆上氣湯方：茈菀七束，門冬一升，款東一升，橐吾一升，石膏半升，白□一□，桂一尺，密半升，棗卅枚，半夏十枚，凡十物，皆父且（第 80 號甲^④）。

百病膏藥方：蜀椒四升，弓窮一升，白茝一升，付子卅果，凡四物，父且，漬以淳醢三升……（第 89 號甲^⑤）

該簡右邊一行殘存的“大如母指”四字，也是一種常見於古代藥方的表述。如周家臺秦簡第 372 號：“已鼠方：取大白礬，大如母（拇）指，置晉斧（釜）中，涂而燔之，毋下九日，冶之，以。”^⑥《外臺秘要方》卷二八“中蛊毒方二十一首”之“《小品》療蠱方”下有：“又方：土瓜根，大如拇指，長三寸，切，以酒半升，漬一宿，一服當吐下。《古今錄驗》同。”^⑦

總之，馬圈灣第 505 號簡殘存的兩行文字明顯與藥方有關，儘管現在在該簡上面已經找不到任何藥名，但并不妨礙我們將該簡歸入藥方簡中。

經過上面的討論已經清楚，馬圈灣漢簡中的藥方簡至少有第 505 號、第 563 號（正、背面）、第 564 號及第 1177+1060 號等四支殘簡。其中第 505 號簡因殘損嚴重，原來的藥名現已完全缺失。其餘三簡雖然也有不同程度的殘損，但其中尚有部分藥名幸存。上引諸家論著，以及一些專門考釋馬圈灣漢簡的著作，如劉飛飛《〈敦煌漢簡〉（1-1217）選釋》^⑧、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⑨、白軍鵬《“敦煌漢簡”整理與研究》^⑩等，對這些藥名已經作過不少考證，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有待繼續討論的問題。下面，試依次對這幾支簡上殘存的藥名略

① 馬王堆漢墓帛書《雜療方》、武威漢代醫簡中的材料及研究情況，可參看李建民《“咬咀”箋證——兼論古代“嘗藥”禮俗》，《簡帛研究彙刊》第 1 輯，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簡帛學文教基金會籌備處，2003，557-566 頁；何茂活《〈武威漢代醫簡〉“父且”考辨》，《中醫文獻雜誌》2004 年第 4 期，21-22 頁。居延新簡中的材料，見 E.P.S4.T2:65 號。

② 李建民：《“父且”箋證——兼論古代“嘗藥”禮俗》，《簡帛研究彙刊》第 1 輯，557-566 頁；何茂活：《〈武威漢代醫簡〉“父且”考辨》，《中醫文獻雜誌》2004 年第 4 期，21-22 頁。

③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圖版 4 頁，摹本釋文注釋 7 頁。

④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圖版 7 頁，摹本釋文注釋 12 頁。

⑤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圖版 10 頁，摹本釋文注釋 18 頁。

⑥ 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135 頁。

⑦ 高文柱校注：《〈外臺秘要方〉校注》，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977 頁。

⑧ 劉飛飛：《〈敦煌漢簡〉（1-1217）選釋》，西南大學 2010 年碩士學位論文，67-69、109-110 頁。

⑨ 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522-526、639-640 頁。

⑩ 白軍鵬：《“敦煌漢簡”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 2014 年博士學位論文，370、451 頁。

作討論。

第 563 號簡,左右兩邊各有殘損,其正、背兩面都寫有文字。正面自上而下有七欄文字,內容都是藥名及其用量:

第一欄現祇能看清楚一行文字,為“當歸”兩字。“當歸”是常見藥名,這裏不必解釋。據下面幾欄推測,在“當歸”的右邊至少還應當有一行文字。

第二欄現存兩行文字,左邊一行為“半夏”兩字,右邊一行也有兩字,因祇存少量筆迹,現已無法辨識。“半夏”是常見藥名,這裏不必解釋。

第三欄現存兩行文字,左邊一行為“黃芩”兩字,右邊一行也有兩字,因祇存少量筆迹,現已無法辨識。“黃芩”也是常見藥名,這裏不必解釋。

第四欄現存兩行文字,右邊一行為“𧄸”,左邊一行為“蜀署”。馬繼興先生說:“此方中的‘𧄸’,是一種昆蟲類藥。在《神農本草經》中有木𧄸及蜚𧄸二種,均列為中品,此處不知指哪一種。”^①今按:武威漢代醫簡第 51 號載有藥名“𧄸頭”^②,或與此處的“𧄸”有關。但是,“𧄸頭”的具體所指同樣也不易考定^③,故“𧄸”的確切含義尚待進一步研究。“蜀署”的“署”,馬繼興先生說:“原作‘膠’。《敦煌漢簡》釋為‘署’,非。”他進而將其讀作“蜀椒”^④。今按:“蜀”後一字明顯是“署”,不是“膠”,以前釋作“蜀署”的意見可從。但是,“蜀署”作為藥名不見於古書,其具體所指仍有待研究。劉金華先生說:“《五十二病方·痢》有‘蜀叔’之名,與‘蜀署’音頗相近,或者係一物。”^⑤今按:《五十二病方》的“蜀叔”,學者以為即“巴叔(菽)”,是“巴豆”的異名^⑥。“叔(菽)”“署”古音并不太近,“蜀署”即“蜀叔(菽)”之說尚待進一步論證。劉飛飛先生認為“蜀署”可讀為“蜀預”,“蜀預”又名“署與”“山芋”“土薯”“薯藥”,今稱“山藥”^⑦。今按:劉飛飛先生所謂今稱“山藥”的藥是“薯蕷”,而不是“蜀預”。劉飛飛先生所說的“蜀預”,其名似不見於古書,他說“蜀預”又名“署與”,却未舉出書證,其說恐不可信。儘管如此,他將簡文的“蜀署”與“薯蕷”相聯繫,却是一種值得重視的意見。“薯蕷”,古書或作“諸蕷”,也作“諸薯”。《本草綱目》卷二七“薯蕷”條引吳普曰:“薯蕷一名諸薯,一名修脆。齊、魯名山芋,鄭、越名土薯,秦、楚名玉延。”^⑧古代“蜀”字與“諸”“薯”等字的讀音相去不遠,“諸薯”或可寫作“蜀署(薯)”。另外一種可能是,簡文的“蜀署”是指產自蜀

① 馬繼興:《出土佚古醫籍研究》,13 頁。

②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摹本釋文注釋 8 頁。

③ 參看王輝:《〈武威漢代醫簡〉疑難詞求義》,收入其著《高山鼓乘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271-273 頁;彭達池《武威漢代醫簡札記三則》,《中醫文獻雜誌》2012 年第 1 期,21-23 頁。

④ 馬繼興:《出土佚古醫籍研究》,13 頁。

⑤ 劉金華:《邊地漢簡散見醫方拾遺》,簡帛網 2005 年 11 月 11 日。

⑥ 趙有臣:《〈五十二病方〉中幾種藥物的考釋》,《中華醫史雜誌》1985 年第 2 期。

⑦ 劉飛飛:《〈敦煌漢簡〉(1-1217)選釋》,68 頁。

⑧ 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1676 頁。

地之“署(薯)”。《本草綱目》卷二七“薯蕷”條引蘇頌曰：“江、閩人單呼爲藟，亦曰山藟。”^①知“蜀署”或可單稱爲“藟”。據此推測，簡文也可能是將“蜀署”單稱爲“署(薯)”，然後在其前面加上一個表示產地的“蜀”字，因而寫作“蜀署(薯)”。

第五欄現存兩行文字，《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分別釋作“六□”與“存付”。前此諸家釋文，與此完全一致。今按：所謂“六□”處字迹殘損嚴重，所釋是否準確，尚不容易斷定。“存付”作爲藥名，古書未見記載，釋文或有不確之處。從照片看，“付”字辨識準確，但其前面一字的寫法與“存”並不完全一致。漢簡中的“存”字，其“子”的左上角多寫作“ナ”形，這個“ナ”形祇有兩筆^②。而此字“子”的左上角，却明顯寫作三筆。這三筆實爲“尸”，祇是稍有變化而已。漢簡中的“厚”字有時就寫作“𠂔”形，即左上一“尸”加右下一“子”。如武威漢代醫簡第83號甲“厚朴”的“厚”^③，金關漢簡73EJT4:108A“前日厚賜宣”的“厚”^④，居延漢簡495·4B“甚厚”的“厚”^⑤，敦煌漢簡2278A“甚厚”的“厚”^⑥，都寫作這樣的“𠂔”形。所以，這個以前被釋爲“存”的字，應當改釋爲“厚”。“厚付”作爲藥名也見於居延新簡E.P.T56:228所載藥方當中^⑦，劉金華先生認爲即《五十二病》記載的“厚柎”，“實則是武威簡中所記‘厚朴’”^⑧。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的“厚柎”見於“□闌(爛)者方”標題之下，其原文是：“闌(爛)者，爵(嚼)藥米，足(捉)取汁而煎，令類膠，即治厚柎和傅。”(317/307^⑨)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在注釋“厚柎”時說：“厚柎，應即厚樸，見《神農本草經》，但無治火傷的記載。”^⑩張顯成先生進一步解釋說：“柎，幫母、侯部；樸，滂母、屋部。二字聲同唇音，韻陰入對轉，故相通。所以，‘厚柎’即‘厚樸’。”^⑪尚志鈞先生則認爲“厚柎”的“柎”指草木子房，“厚柎”可以解釋爲肥厚的草木子房^⑫，他後來又說“厚柎”是指厚朴的乾燥幼果^⑬。新發現的老官山漢墓醫簡中也有“厚柎”，整理者也讀爲“厚朴”，如第109號簡載：“八 治風。石脂七分，蜀椒五分，方(防)風、細辛各四分，厚柎(朴)五分，陳朱(茱)臽(莢)一分，圭十分，薑六分，皆治

① 李時珍：《本草綱目》，1676頁。

② 參看[日]佐野光一《木簡字典》，東京：雄山閣，1985，207頁。

③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圖版8頁，摹本釋文注釋14頁。

④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肩水金關漢簡(壹)》中冊，上海：中西書局，2011，91頁。

⑤ 勞榦：《居延漢簡圖版之部》，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375頁。

⑥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圖版壹柒零。

⑦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北京：中華書局，1994，上冊，141頁，下冊，305頁。

⑧ 劉金華：《邊地漢簡散見醫方拾遺》，簡帛網2005年11月11日。

⑨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271頁。

⑩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釋文注釋60頁。

⑪ 張顯成：《簡帛藥名研究》，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249頁。

⑫ 尚志鈞：《〈五十二病方〉藥物厚柎、朴、白付考釋》，《中藥材》1987年第2期，49-50頁。

⑬ 尚志鈞：《〈五十二病方〉厚柎的再討論》，《山東中醫雜誌》1994年第4期，174頁。

合。”^①今按：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有从“付”得聲之字與从“卜”或从“𣎵”得聲之字通假的例證^②，讀“厚付”或“厚柎”為“厚朴”的意見應可成立。“厚朴”是常見藥名，這裏不必多作解釋。

第六欄，也存兩行文字。右邊是“白櫝帶二□”一行五字。“白櫝帶”，或釋作“白櫝葉”^③。從照片看，釋為“白櫝帶”可信。但“白櫝帶”藥名古書未見，其具體所指尚待考證。“二”後一字，或釋為“枚”^④，或釋作“把”^⑤。根據殘存字迹并參照文例分析，似以釋“枚”為優。該欄左邊，還有“□□□入各半斤”等字。

第七欄現存兩行文字，分別為“薑一半”和“水銀二斤”。“薑”與“水銀”作為藥名都很常見，這裏不必詳論。從照片看，“薑一半”的右邊似尚有少量筆迹，可能還寫有另一藥名。

該簡的背面有三欄文字，記載的也是藥名及其用量：

第一欄，《敦煌漢簡》釋作“良母脂取善者一兩”^⑥，謝桂華先生認為其中的“良母脂”或應改釋為“長□治”^⑦，《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將此欄釋作“良□治□取善者一兩”^⑧。因字迹不甚清晰，此欄文字的釋讀目前尚不能完全確定。

第二欄，現存兩行文字，自右至左分別為“□□十分”和“李石十分”。右邊一行的藥名因祇存少量筆迹，現已無法辨認。左邊一行的“李石”，張顯成先生已懷疑其為“李實”^⑨。馬繼興先生也認為是“李實”，并解釋說：“‘李實’的‘實’字原作‘石’，也屬通假。《神農本草經》無此藥，但在《名藥別錄》果部中品‘李仁（人）’條的副品項下列出‘（李）實’的藥名。”^⑩劉金華先生說：“安徽阜陽簡《萬物》W035號簡記‘理石、朱臬可以損勞也。’此‘理石’應即是‘李石’。”^⑪劉飛飛先生說：“李石：當為‘絡石’。‘李’為來紐之部字，‘絡’為來紐鐸部字，兩字同紐，韻部對轉相通。絡石，又稱白花藤、石龍藤、石礞，為常綠攀援木質藤本植物，可供觀賞，莖葉可入藥。《本草綱目》卷三：‘絡石，養胃氣，土邪於水，小便白濁，同人參、伏苓、龍骨末服。’”^⑫今按：古代“李”“理”二字常相通假，例不煩舉，劉金華先生讀“李石”為“理石”的

① 和中浚等：《老官山漢墓〈六十病方〉與馬王堆〈五十二病方〉比較研究》，《中醫藥文化》2015年第4期，22-34頁。

②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365頁“朴與拊”條。白于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147頁“付與撲”條，149頁“符與撲”條。

③ 周祖亮、方懿林：《簡帛醫藥文獻校釋》，453頁。

④ 初師賓主編：《中國簡牘集成》第3冊，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72頁。

⑤ 周祖亮、方懿林：《簡帛醫藥文獻校釋》，453頁。

⑥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漢簡》，241頁。

⑦ 謝桂華：《西北邊塞散見醫藥簡牘與敦煌醫藥寫本之比較》，《漢晉簡牘論叢》，279頁。

⑧ 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523頁。

⑨ 張顯成：《簡帛藥名研究》，71頁。

⑩ 馬繼興：《出土亡佚古醫籍研究》，13頁。

⑪ 劉金華：《邊地漢簡散見醫方拾遺》，簡帛網2005年11月11日。

⑫ 劉飛飛：《〈敦煌漢簡〉（1-1217）選釋》，69頁。

意見可信。

第三欄現存兩行文字，自右至左分別為“白礬石十分”和“人參十分取善者”。右邊一行的“白礬石”，或釋作“白礬石”^①。從《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刊發的照片看，明顯是“白礬石”而非“白礬石”。左邊一行的“人參”也是常見藥名，這裏不必再作討論。

順便指出，此簡正背兩面的內容雖然都為藥方，但現在尚不能確定這兩面記載的是同一個藥方，也可能是正背面各記一個藥方。

第 564 號也有殘損，祇存“府元二斤，地榆根”數字。“地榆根”是常見藥名，以往論著也已有考證。但“府元”却不見於古書，以往論著也未做解釋，需要研究。從照片看，所謂“府”字的寫法與漢簡中常見的“府”並不一致，頗疑此字當改釋為“白”。“白元”之名不見於古書，但馬王堆漢墓帛書《養生方》中有“白朮”，其文曰：“【一曰】：取白朮本，陰乾而治之，以馬醬和，□丸，大如指【端，□□□□□□】空（孔）中，張且大。”（111/110^②）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注釋說：“《爾雅·釋木》：‘朮，魚毒。’《說文》作芫。《神農本草經》作芫花。《吳普本草》謂芫花之花‘有紫、赤、白者’。白朮本當即白朮花的根。”^③據此，第 564 號簡的“白元”似應讀作“白朮”或“白芫”，指白芫花。

第 1177+1060 號，以往因為照片上的字迹頗不清楚，各家釋文多不準確。《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刊出了新的照片，並將簡文釋作“分攝水取桔梗梔榆芍藥各二分海藻黃芩白草各一分皆治”。其中某些藥名較為怪异，釋文或需再加斟酌。如其中的“梔榆”，也可能要改釋為“蜀椒”。由於該簡的照片仍然不够清晰，這裏就不詳細討論了。

附記：本文撰寫時蒙鄔文玲研究員提供修改意見，謹此致謝。

① 張顯成：《簡帛藥名研究》，466 頁。

②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 6 冊，52 頁。

③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釋文注釋 109-110 頁。


河西漢簡所見“堦”字釋讀商兌*

河西學院文學院 何茂活

內容提要 勞幹《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始用“堦”字,此後多家釋讀均有沿用,但或亦改釋為“堦”。裘錫圭先生支持前者。今據相關簡文字形、字理及文例等的排比分析,認為原釋“堦”者均應釋“堦”。河西漢簡中多有“塢”“堦”對舉之例,傳世文獻中亦多見“塢候(堦)”及“候(堦)塢”之語,二者可以互證。“堦”指烽火墩臺,其上或有望樓,字本作“候(候、候)”,亦作“堦”;“塢”則指防禦用的小堡。近出《肩水金關漢簡》(壹至叁卷),整理者未用“堦”而用“堦”字,應當看作正確的選擇。

關鍵詞 居延漢簡 肩水金關漢簡 堦 堦 塢

一 漢簡釋文所見“堦”字及諸家釋讀分歧

河西漢簡釋文中所見之“堦”字,始見於勞幹先生所著《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如“堦隧長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24.1A)、“二堦隧長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24.1B)。^①後在《居延漢簡甲編》《居延漢簡考釋之部》《居延漢簡甲乙編》《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及第四燧》《額濟納漢簡》以及新近出版的《居延新簡釋校》和

* 本文為國家社科規劃基金西部項目“河西漢簡文字形義考論”(13XYY010)的部分成果。承蒙《簡帛研究》匿名審稿專家提出參閱金發根、吳初驤先生相關論述等意見,謹此致謝。

① 勞幹:《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463頁。

《居延漢簡》(第壹至貳卷)中均有沿用。^① 由於該字不見於傳世文獻,學界對此頗多疑惑,具體使用和解釋上也有較大分歧,因此有必要作一番考察和辨析。

陳夢家先生在《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一文中,依據勞幹先生的釋文及居延漢簡甲編、乙編的釋讀情況,對居延地區的烽燧系統作了梳理,其中甲渠候官下有三堦燧和二堦燧。^② 此二燧名列出了所在簡牘的編號。具體為:

三堦燧 3.4, 24.1, 46.29, 71.39, 72.5, 73.15, 142.16, 143.9, 168.18, 178.25, 194.14, 210.16, 231.90, 乙附 46; (三堦卒) 190.1

二堦燧 24.1^③

根據這一整理,我們查檢了《甲乙編》《合校》《集成》及臺北版《居延漢簡》(第壹、貳卷),結果除以下幾個特殊情況外,其他均釋為“堦”:

(一)臺北版《居延漢簡》中,71.39 簡因失照而不收;因該書現僅出版第壹、貳卷,收錄至 210.33,故 231.90 及乙附 46 簡的釋讀情況暫不可知;

(二)142.16 簡《甲乙編》《合校》釋為“堦”,《集成》《居延漢簡(貳)》釋為“蓬”;210.16 簡因圖版字迹潦草難辨,四書均缺釋。

由此可見,陳夢家先生所整理出的這十多個例子,在先後多家的釋讀中,基本都釋為“堦”,沒有太大的分歧。

除見於“三堦燧長”這樣的詞語之外,“堦”字還出現在其他場合,但各家釋讀分歧較大。裘錫圭先生在《漢簡零拾》之十三“堦”一節,列舉了居延漢簡中 4 處“塢”“堦”對舉的例子,即:142.30、89.21、52.17+82.15、264.32。現依上述順序,將這些例子在釋讀上的分歧臚列如下:

(1)142.30(裘文引述與《合校》同)

《考釋》:堦上深目少八……塢上深目少四

《甲編》《甲乙編》:塢上深目少八……塢上深目少四

《合校》:堦上深目少八……塢上深目少四

①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下簡稱“甲編”;勞幹:《居延漢簡考釋之部》,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0,下簡稱“考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下簡稱“甲乙編”;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下簡稱“合校”;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下簡稱“新簡”;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中國簡牘集成》,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下簡稱“集成”。馬怡、張榮強:《居延新簡釋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下簡稱“釋校”;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壹)》,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貳)》,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

② 陳夢家:《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收入其著《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87 頁。

③ “二”實為“三”之誤釋。詳參《合校》及《居延漢簡(壹)》等。

《集成》:塢上深目少八……塢上深目少四

(2)89.21(裘文引述與《合校》同)

《考釋》《甲乙編》:塢上轉射二所……塢上轉射一所……

《合校》《集成》《居延漢簡(壹)》:塢上轉射二所……塢上轉射一所……

(3)52.17+82.15(裘文引述與《合校》同)

《考釋》:一塢上望火頭三不見所望負三算……塢上望火頭二不見所望負二算

《甲乙編》:塢上望火頭三不見所望負三算……塢上望火頭二不見所望負二算

《合校》《集成》《居延漢簡(壹)》:塢上望火頭三不見所望負三算……塢上望火頭二不見所望負二算^①

(4)264.32(裘文誤作214.32,引述文字與《合校》略同,但末句“塢”作“塢”)

《考釋》:塢上樽櫨少一……塢上大表一古惡……塢上不騷除不馬矢塗

《甲編》:塢上樽櫨少二……塢上大表一古惡……塢上不騷除不馬矢塗

《甲乙編》《集成》:塢上樽櫨少二……塢上大表一古惡……塢上不騷除不馬矢塗

《合校》:塢上樽櫨少二……塢上大表一古惡……塢上不騷除不馬矢塗

針對上述各例中“塢”“塢”對舉的情況,裘先生認為:

居延簡裏大多數“塢”字的右旁都與“候”字截然有別,勞氏(幹)有時把“塢”釋作“塢”是缺乏根據的。

“塢”應該改釋為“塢”。“塢”就是譙樓的“譙”,古書中也寫作“樵”。《漢書·趙充國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顏注:“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所謂烽臺,一般是版築的或用塹壘成的土臺,當時上面一定還有供瞭望的樓,所以稱之為“譙”。簡文把這個字寫成從“土”,大概是着眼於“塢”以土臺為基礎的緣故。

破城子新出的“塞上烽火品約”,既提到塢也提到塢。甘肅省居延考古隊簡冊整理小組的釋文把這兩個字都釋作“塢”(《考古》1979年4期360頁)。徐蘋芳同志《居延、敦煌發現的“塞上蓬火品約”》一文則把這兩個字都釋作“塢”(《考古》1979年5期445頁),恐怕都不妥當。可惜發表的圖版太模糊,對於“塢”“塢”二字無法一一加以分辨。^②

裘先生從“塢”“塢”二者常常對舉的角度,證明了二者之不同,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對“塢”字字形的認定和意義的解讀,似乎不够確當。根據對原釋“塢”字的簡文的考察及分析,我們認為此字還是以釋“塢”為妥。

^① 《集成》注:“塢,即塢,烽火臺。”見《中國簡牘集成》第5冊,148頁。

^② 裘錫圭:《漢簡零拾》,收入其著《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594-595頁。

二 從“侯、候、堠、緱”等字看“堠”之構形及其訛混


爲了說明“堠”的字形特點及演變軌迹，有必要對其構形原理及與其相關的“侯”“候”“堠”“緱”等字進行一些綜合的考察。

堠，也作“堠”，是“候（候、候）”的後起區別字。此字不見於《說文》，但見於《玉篇》等字書。《玉篇·土部》：“堠，牌堠，五里一堠。”^①《正字通·土部》：“堠，封土爲臺，以記里也。十里雙堠，五里隻堠。韓愈有《路旁堠》詩。《六書故》作堠，通作候。”^②《字彙·土部》：“堠，封堠，里堡。五里一堠。又，斥堠，斥，度也；堠，望也，以望烽火也。”^③《欽定音韻述微·宥韻》：“堠，路旁記里土堡也，古作候。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青泥封記，此封堠所自起。一說黃帝巡幸天下，道路皆有記里堆，爲堠所始。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長，故曰亭堠。十里雙堠，五里隻堠。《後魏志》堠官謂之白鷺，取延頸遠望也。”^④字又作“堠”。《集韻·候韻》：“堠，記里堡。”^⑤可見“堠（堠）”是由“候（候）”孳乳分化而來的，取義仍在候望。關於二者的同源關係，可參劉鈞杰《同源字典補》，茲不贅引。^⑥居延漢簡中的以下二例正好可以證明二者的同源分化關係：


(1) 第卅六隧長宋登……堠樓不垂塗堠(214.5)


(2) 第廿九隧長王禹……候樓不堠(214.8)^⑦

上二例從辭例上足可證明“候”“堠”同源，祇可惜例(1)圖版不甚清晰。

“候（候、候）”及“堠（堠）”其右俱從“侯（侯）”。侯，小篆作，隸變爲“侯”，具體寫法或有差異，如：

 (孫子 85)

 (孔鮒碑)

 (武威醫簡 85 甲)

 (相馬經 28 下)

 (流沙簡·屯戍 12)^⑧

這些字形中，最後一例特別值得注意，其中的“矢”字寫作，較一般的寫法多了一橫畫。

① [梁]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1987，8 頁。

② [明]張自烈：《正字通》，見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庫》第 3 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224 頁。

③ [明]梅膺祚：《字彙》，見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庫》第 5 冊，334 頁。


④ [清]梁國治：《欽定音韻述微》，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1099 頁。


⑤ 趙振鐸校：《集韻校本》，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1274 頁。《漢語大字典》失收“堠”字。

⑥ 劉鈞杰：《同源字典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27 頁。


⑦ 《甲乙編》《合校》釋文均如此。陳夢家引作“堠櫓不堪”，見《漢簡綴述》，155 頁。


⑧ 此五字形轉引自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343 頁。


“矢”字的這種寫法在居延漢簡中可以找到依據,如居延甲 1991 即作。其他各例中,“矢”的上部多作“土”形,其下之“八”與之或斷或連,左點過短而右點過長過平,便與“灬”的草寫相似。試看居延漢簡、居延新簡及金關簡中的以下例證:


郡國調列侯兵(5.3+10.1+13.8+126.12)^①


諸侯(126.41)


諸侯(157.24A)


侯禹(72.26)

侯詵(114.18)


譚侯君(502.11)









隧長侯偃(EPT56.107)

侯賜(73EJT7:10)

侯壽(73EJT9:28)

國子侯麥計(73EJT15:17)

諸侯(73EJT30:202)

以上最後三例,比其他各例多一橫畫,與上文所論字相似。尤其是“侯壽”一例,其下兩點近似“灬”的草寫,因此酷似“焦”字,但參考其他各例,可知釋“侯”是完全正確的。居延簡 512.16 原釋“匚里焦熹”,“焦”實作,當釋為“侯”。《漢語大字典》以此為“焦”的漢隸字形,其實不妥。居延新簡 EPF22:271“隧長侯雲”,“侯”作 (右稍殘),文物本釋為“焦”;中華本及《釋校》改訂為“侯”,^②甚是。EPT68.108“侯雲”之“侯”作,可以為證。另有兩處“隧長侯永”,字作 (EPF22:189)、 (EPF22:192),各本均釋作“焦”,也應以釋“侯”為是。此外,金關漢簡釋文中有兩處“焦賢”,“焦”字圖版作 (73EJT23:622)、 (73EJT24:411)。此二字形近,但後者比前者多一橫畫,且其下為規整的“灬”底。如果孤立地看,後者釋“焦”亦可,但聯繫前者,並參考上述討論,我們認為均應視為“侯”的訛寫。其訛變軌迹大體可用下圖表示:

 —  —  — 
 — 

由此可見,“侯”訛混為“焦”,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右下“矢”字之“八”寫得近似“灬”。關於這一訛寫的成因,我們試作三種推論:

一是在漢字隸變過程中,兩點、三點、四點底常有相混,草寫尤為明顯,有的甚至寫成一

① 為證明此字確屬“侯”字,特在圖版後給出所在詞句。

② 馬怡、張榮強:《居延新簡釋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780 頁。“文物本”指《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中華本”指《居延新簡——甲渠候官》,北京:中華書局,1994。

點或一橫。如以下所舉“漢”“鳴”“馬”“馮”“廣”各例：

漢(華山廟碑)

漢(尹宙碑)

漢(居延甲 359B)

鳴(居延 193.2)

鳴(武威醫簡 3)

馬(居延 32.12A)

馬(居延 206.10)

馮(居延 502.14A)

馮(居延 113.1)

廣(居延 212.32)

廣(居延 128.1)

廣(居延 113.1)

二是因為烽堠與“火”關係密切，這一寫法也許受了“煖”“燙”等字的影響。

三是“堠”“塢”常常對舉，意義相關，“堠”之右下作“灬”也許是受“塢”的影響。

現在再來看以“侯”為聲旁的“候(候候)”“緱(緱)”“鍤(鍤)”等字的字形。先看“候”字：

候，也作“候”“候”，小篆字形為𠂔。《說文·人部》：“候，伺望也。从人，侯聲。”隸變作如下之形：

候(天文雜占末·下)

候(居延甲 712)

候(魏曹真碑)^①

居延漢簡、居延新簡、金關簡及額濟納漢簡中的例證如：

候甲渠候史(居延 3.19)

候長(EPF22.355)

候東部候長(73EJT29:123)

候長(73EJT30:48)

候東部候長(73EJT29:115A)

候長(99ES16ST1:2)

以上諸例中，右邊之橫畫，寫作兩筆、三筆、四筆者均有之，右下之“八”字，或亦近似“灬”的草寫，寫法與“候”一脈相承。

再看“鍤”及“緱”字：

鍤銅鍤(居延甲 513)

鍤銅鍤(居延甲 1137)

鍤銅鍤(73EJT4:153)

鍤銅鍤(73EJT21:61)










緱氏(73EJT11:31B)

緱氏(73EJT31:38)

這些字的寫法同樣體現了“候”“候”的特點。通過這些分析，可以看出，“候(候)”的草寫與

^① 此三字形轉引自《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562 頁。






“焦”相近,以此爲聲旁的“候、堠、鍬、緱”等字,其右旁同樣也會寫作與“焦”相似之形。

那麼兩漢時期“焦”字寫法究竟如何,與“侯(侯)”有無明顯區分呢?考察簡帛書法中的這兩個字,發現二者雖然形近易混,但還是略有差別。馬王堆帛書中有多處“焦”字,分別作、、、。^①此四字中,除第三例左側下垂之畫稍有左曲之勢以外,其他均垂直向下,甚或向內收合。查考漢隸中其他從“隹”之字,字形也大體如此。與之相比,“侯(侯)”字左邊的相應筆畫則大多明顯左曲,呈撇形。推溯到小篆字形來看,“侯”作,而“焦”作,其相應筆畫的特點正與上述分析一致。以此作爲區別特征,可以看出,上文所述誤釋爲“焦”的、等字,無疑應是“侯”字。下節所論原釋爲“堠”的等字,右旁相應筆畫也大多爲撇,故應認定爲“堠”。

三 原釋“堠”者及原釋“堠”者字形比證

現在回頭來看以往釋“堠”及釋“堠”之例在語境及字形上的聯繫。

原釋“堠”者大多圖版不清,祇有個別幾例較爲清晰。現將其圖版字形、出處及各家釋讀情況對比如下:

| 字形 | 簡牘編號 | 所在語句 | 甲編 | 甲乙編 | 合校 | 集成 | 居延漢簡 (壹、貳) | 說明 |
|---|----------------------|-------------------|----|-----|----|----|---------------|---|
|  | 居延 72.5 | 三~隧長 ^② | | 堠 | 堠 | 堠 | 堠 | 勞榦釋“堠” |
|  | 居延 428.6 | 舉~上一莖火 | | 堠 | 堠 | 堠 | 未詳 | 陸錫興釋“堠” ^③ ; 陳夢家引作“堠” ^④ |
|  | 居延 3.4 | 三~隧長徐宗 | | 堠 | 堠 | 堠 | 堠 | |
|  | 居延 24.1A (甲 181A) | 三~隧長…… 徐宗 | 堠 | 堠 | 堠 | 堠 | 堠 | |
|  | 同上 B | 同上 | 塢 | 堠 | 堠 | 堠 | 堠 | |








① 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406-407頁。


② 因在釋讀上存在歧異,茲以“~”號代替待確釋之字。

③ 陸錫興:《漢代簡牘草字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256頁。

④ 見《漢簡綴述》,159頁。

續表

| 字形 | 簡牘編號 | 所在語句 | 甲編 | 甲乙編 | 合校 | 集成 | 居延漢簡 (壹、貳) | 說明 |
|---|-----------------------|------------------|----|-----|----|----------------|---------------|-----------------------|
|  | 居延 143.9 (甲 812) | 三~隧長宋解 | 塢 | 堦 | 堦 | 堦 | 堦 | |
|  | 居延 168.18 (甲 974) | 三~隧長良 | 堦 | 堦 | 堦 | 堦 | 堦 | 勞幹釋“堦” |
|  | 居延 262.29 (甲 1373) | 三~史張君長 | 堦 | 堦 | 堦 | 堦 | 未詳 | 陸錫興釋“堦” |
|  | 居延 264.32 (甲 1383) | ~上樽櫛少二 | 堦 | 堦 | 塢 | 堦 | 未詳 | |
|  | 居延 332.5 (甲 1705) | ~上表再通 | 塢 | 塢 | 塢 | 塢 | 未詳 | 陸錫興釋“堦” |
|  | 居延 332.13 (甲 128) | 夜食時~上苴 火一通 | 堦 | 堦 | 堦 | 堦 | 未詳 | |
|  | 居延 482.7 | 北尺竟燧舉~ 上離合〔苴〕 | | 堦 | 堦 | 堦 ^① | 未詳 | 陳夢家引作“堦” ^② |

以上諸例中,第1例顯係“堦(堦)”字無疑;第2例,右下粗看像同向的兩點,細辨實為四小點;第3例右下索性成了四點。,由此三字足見似“堦”之字的形成過程。正是這後一種寫法,使學者們將此字釋作了“堦”。

為了便於相互比證,我們在上表中摘錄了這些字形所在的語句。通過對比可以發現,這些字形大多處在“三~隧長”這一結構中。既然第1例可以確定為“堦”,那麼至少第3-8也可以確定為“堦”。那麼“三堦隧”到底是什麼意思,為什麼在居延地區出土漢簡中祇見三堦隧而未見一堦、二堦、四堦等隧?我們的推測是,三堦之“三”表示基數而非序數,三堦隧所在地當有三座烽堦并峙。此類名稱在今河西地區仍有遺存,如山丹縣境內有雙墩子、八個墩、半截墩,等等。

居延新簡的釋讀,情況較為簡單。以下二例《新簡》《集成》《釋校》均釋為“堦”:

 三堦隧長石隆(EPT6.37)

 三堦(EPT9.20)

① 見《中國簡牘集成》第8冊,77頁。本簡釋文下注:“堦上離合,即堦上離合苴火。堦,指烽火臺。離合苴火,漢代傳遞軍情的烽火信號一種。”

② 見《漢簡綴述》,159頁。

以下諸例均釋作“堠”：



舉堠上二蕉(EPT68.84)



舉堠上二蕉(EPT68.96)



堠上苴火(EPT68.102)



三堠(EPF22.655)

釋讀分歧較大的是《塞上烽火品約》中所見的 7 個“堠”字。因圖版不清,此處姑選 2 例:



舉堠上離合苴火(EPF16.1)



堠上一苴火(EPF16.5)

此 7 字或釋作“塢”,^①或釋作“堠”,^②《新簡》除第一例(EPF16.1)釋“塢”外,其他釋“堠”,《集成》《校釋》均釋“堠”。《漢語大字典》“堠”字條下以“堠”為唯一的古文字字形,注明出處為“居延塞上烽火品約簡”。裘錫圭先生則認為釋“堠”未妥。

通過字形及所在語句的聯繫對比可以看出,上面釋作“塢”的兩例其實也都是“堠”字。第 1 例雖然右旁幾乎完全成了“焦”字,但是結合上文的論證,尤其是根據所在“三~隧長”這一語境,我們認為祇能看作“堠”的訛寫。

2005 年出版的《額濟納漢簡》中亦有釋“塢”之例,如:“□□□□□上塢望寇舉蕉如品約□”(2000ES9S:24)、“□□[塢土]”(2000ES14SF1:8)。從圖版看,“塢”實亦“堠”字,惜字迹不清,難以截圖。後出《額濟納漢簡校本》中,釋文基本同此,祇是“蕉”字作“蕉”。^③

在金關漢簡的釋讀中,我們注意到,釋讀者祇用“堠”而未用“塢”字。目前所見之《肩水金關漢簡》第壹至叁卷皆如此。^④如習字簡 73EJT7:144,連續寫有三個字:堠、堠、堠,整理者均釋為“堠”;再如 10:127 堠(右上殘斷),23:447 堠、堠二字,26:123 堠(右側字迹不清),30:261 堠、堠二字等,均釋作“堠”。可見,過去有可能釋讀為“塢”的字,金關簡的整理者一律釋作“堠”。我們認為這樣處理是正確的,這應當代表了整理者在這個問題上的慎重思考和抉擇。

四 以傳世文獻解證“堠”的詞義及“堠”“塢”之別

① 甘肅省居延考古隊簡冊整理小組:《“塞上烽火品約”釋文》,《考古》1979 年第 4 期,360 頁。

② 徐蘋芳:《居延、敦煌發現的〈塞上蓬火品約〉——兼釋漢代的蓬火制度》,《考古》1979 年第 5 期,445-454 頁。

③ 孫家洲主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97-99 頁。

④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肩水金關漢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1;甘肅省簡牘博物館等:《肩水金關漢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2;甘肅省簡牘博物館等:《肩水金關漢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3。

裘錫圭先生在《漢簡零拾》中支持釋“塢”之說，其中重點舉證了河西漢簡中所見的“塢”“塢”對舉的情況。而我們在查檢相關資料時則發現，在傳世典籍中，多有“候(堠)”“塢(隄)”連言之例。這應當可以作為“塢”當釋“堠”的一個旁證。先看以下諸例：

(1)(馬)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後漢書·馬援傳》)

(2)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後漢書·西羌傳》)

(3)於是詔竇融悉還金城客民三千餘戶，(馬)援為置長吏，繕治城郭，起塢候，勸耕田，郡皆樂業，羌虜悉降。(《後漢紀·光武帝紀》)

(4)(王)霸乃築塢候，起亭鄣，自代郡至平城三百餘里。(《後漢紀·光武帝紀》)

上述語句在後世史籍中亦多有承襲，祇是“塢候”多作“塢堠”。如第(1)例，在《史傳三編·名臣傳五·馬援》《格物通·屯田上》《玉海·宮室》等中均作“塢堠”；第(2)例在《山西通志·關隘八》《通典·邊防五》《文獻通考·四裔考十》等中亦作“塢堠”。

據檢索，後世典籍中還有其他一些使用“塢堠”一詞的例子，如：

(1)塢堠墩臺，處處修整，器械衣甲，亦甚鮮明。(《榕村集》卷三一，李光地《報到家日期札子》)

(2)若其按秦漢舊迹，因長城之塹，稍築塢堠，以殊內外，斥境千里……(《元憲集》卷三四《曹公墓志銘》)

(3)深惟積穀重農，第一要務，故亟將屯田事宜，議擬題請，其次則繕城郭，起塢堠，謹烽燧，良不容緩。(《甘肅通志》卷四五，楊博《修築緊要城堡以弭外患疏》)

“塢候(堠)”或亦作“候(堠)塢”，如：

(1)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後漢書·西羌傳》)^①

(2)明年秋，漢又築馮翊北界堠塢五百所。(《通典·邊防五》)

由上述例證中“塢候”“塢堠”及“候塢”“堠塢”等詞的使用情況，可以看出“堠”“塢”并舉，由來已久。漢簡中二者對舉的情況正可與之互證。

那麼“堠”“塢”二者到底形制如何，又有何聯繫和區別呢？關於這個問題，前賢已有探討。勞榦先生在《居延漢簡考證·塢堡》中對“塢”與烽臺的關係作了較為詳細的考證，認為

^① 《後漢書》卷八七《西羌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2890頁。或引作“候隄”，如[清]張玉書、陳廷敬等編纂《御定佩文韻府》卷三七之八，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1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692頁。

塢是依傍烽臺而修築的防禦建築；烽臺往往居於塢之一角，或居其中央（該書有圖，茲不贅引）。^① 金發根先生曾撰文探析塢堡的起源及漢代塢堡的形制等，認為塢亦即堡，即《禮記》“遇負杖入保者息”“四鄙入保”之“保”。鄭玄注“保，縣邑小城”“小城曰保”，可證其實。“塢堡在兩漢的邊塞也是主要的防禦及瞭望工事，有獨立的，也有附在亭燧或障的外面的”。文中引述并贊同勞貞一（榦）、賀昌群等先生對塢堡形制的分析。賀昌群認為：“塞上亭塢所在，必築防禦工事，圍以城垣，謂之塢壁。大者為障為塞，小者為塢。”^②

陳夢家先生在《漢代烽燧制度》一文中也探討了“塢”及“候”“候城”“候樓”“候櫓（堠櫓）”等詞語的意義及關係。其主要觀點是：“亭臺之下有塢，分為內塢、外塢”；“候者即《漢書·武帝紀》注‘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即此障也’。候城或障大於塢而同類。”關於“候樓”以及“候櫓（堠櫓）”，陳夢家先生作了較為詳細的解釋：

漢烽臺上有兩個附屬建築，一為臺上的方屋，一是臺旁跳出之櫓，《釋名》所謂露上無屋者。《漢書·劉屈氂傳》師古注云“一說櫓，望敵之樓也”，《文選》卷八《上林賦》“泰山為櫓”注云“櫓，望樓”，《廣韻·姥部》曰“櫓，城上守望樓”。漢簡稱之為候樓或候櫓……堠櫓即候櫓。《後漢書·袁紹傳》注云“候櫓者，露上無覆屋也”，櫓之作櫓，猶舟櫓之或作舫……候櫓亦即候樓，《墨子·備城門篇》曰“三十步置坐候樓，樓出於堠四尺，廣三尺，廣四尺（兩廣，一當作長），板周三面，密傅之，覆蓋其上”。^③

吳初驤先生曾對“亭”“候”“塢”的形制作了探討。其主要觀點是：“烽燧的土築高臺，包括頂部之望樓在內的整個建築物，稱亭”；“望樓，在敦煌、居延漢簡中，稱作‘候’、‘候樓’、‘堠’等”；“望樓的形制，據河西上百座漢代烽燧遺址的調查資料，其平面均作方形，外徑與土築烽臺上部等齊，四壁多以土壑砌築，高約 1.5 米，牆頂平砌，無雉堞或瞭望孔等設施。一面開門，與上下望樓的土築臺階或脚窩相連。上露無屋頂，或有一半露的遮陽草篷。”關於“堠”字，吳初驤先生認為“有些‘塢’字確為‘堠’字，‘堠’即候樓亦無疑”。但是他認為“堠上深目少八”中的“堠”字應釋為“塢”，因為望樓並不設“深目”。深目設於“塢”上之女牆。“敦煌、居延的漢代烽燧，多築在塢內一隅。塢內除烽燧外，尚有居室數間”；“漢代烽燧四周的塢牆上，均築有女牆，女牆內嵌有轉射、深目等”。^④

上述諸位前賢的討論，為進一步了解“塢”“堠”之別提供了極好的條件。在此基礎上，

① 勞榦：《居延漢簡考證》，見《居延漢簡考釋之部》，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0，43 頁。

② 金發根：《塢堡溯源及兩漢的塢堡》，見《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7 本（上册），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201-220 頁。

③ 陳夢家：《漢代烽燧制度》，收入其著《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154-155 頁。

④ 吳初驤：《漢代烽火制度探索》，見甘肅省文物考古隊、甘肅省博物館《漢簡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252-253 頁。

結合傳世文獻及故訓材料，再作進一步整理。

塢，又稱塢壁、塢堡、營塢、壘壁等，為防禦用的小型城堡。字本亦作“隄”。《說文·自部》：“隄，小障也。一曰庫城也。”《後漢書·馬援傳》：“繕城郭，起塢候。”李賢注引晉呂忱《字林》曰：“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隄’。”又《董卓傳》：“（董卓）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李賢注：“塢舊基高一丈，周迴一里一百步。”又《西羌傳》：“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

與“塢”的城堡之形不同，“堦”則祇是烽墩。它或與塢組合在一起，或者獨立修築，總之是高於塢壁的烽火墩臺，既可候望警戒，又便舉燃布烽。“堦”字本作“候”，也稱“烽候”“烽堦”。試看如下諸例：

(1) 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為邊最。（《後漢書·崔寔傳》）

(2) 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三國志·魏志·張既傳》）

(3) 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東觀漢記·郭伋傳》）

(4) 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於碣石，縣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堦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晉書·唐彬傳》）

(5) 請於金綫島西北望海塢築城堡，設烽堦，嚴兵以待。（《明史·劉榮傳》）

烽堦，也稱亭候、亭堦。如：

(1) 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脩烽火。（《後漢書·杜茂傳》）

(2) 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晉書·賀循傳》）

(3) 東夷暫驚，應時平殄；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堦靜謐。比為患者，唯苦二蕃。（《舊唐書·崔融傳》）

(4) 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堦，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新五代史·羅紹威傳》）

以上諸例足以證明，“堦”即烽堦，意義與“亭”“燧”基本相同，實即烽火墩臺。因為堦有瞭望功能，因此其上或設有望樓，稱為“候樓”“候櫓（堦櫓）”等。《通典·兵五》：“却敵上建堦樓，以版跳出為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河江為陸，泰山為櫓。”郭璞注：“櫓，望樓。”本文第一部分所引居延簡 264.32“堦上樽櫓少二”，“櫓”亦即“櫓”。

正因如此,居延簡中提到堠上和塢上均有“深目”(142.30)、“轉射”(89.21)、“望火頭”(52.17+82.15)等守禦器,這也就不難理解了。吳初驤先生認為望樓不設深目,恐怕未盡符合事實。

綜合上述情況,可以得到這樣的認識,“堠”是烽火墩臺,其上或有望樓;“塢”則是防禦用的小型城堡。二者往往組合營建,堠大多居於塢之一隅。

五 結語

總括以上討論,本文的意見是:在河西漢簡中,過去釋為“堠”的字,實皆為“堠(堠)”字。概括而言,理由有四:

其一,就字形的傳承存世情況而論,“堠”字不見於傳世文獻,字書、韻書中亦未收錄;而“堠”則相沿久遠,廣有所見。

其二,從字源、詞源角度而論,“堠(堠)”為斥候之“候(候、倏)”的換旁區別字,形義關係十分清晰;而釋為“堠”字則缺乏理據上的支持。

其三,從文字異寫及其成因而論,似“堠”之形乃因“堠(堠)”字筆畫增繁、部件訛混所致。

其四,河西簡牘出土以來,釋讀者對此多有分歧,但先修未密,後出轉精,新近出版的《肩水金關漢簡》,釋文捨“堠”而取“堠”,足可采信。《中國簡牘集成》《居延新簡釋校》等也有一定程度的改訂,可資參考。如《集成》在居延簡 52.17+82.15“堠上望火頭二不見所望負二算”下注解說“堠,即堠,烽火臺”,明釋其義而暗解其形,或者說是由於釋讀者左右為難,不得已采取了一種折中的辦法。臺北版《居延漢簡》(第壹至貳卷)在相關簡文的釋讀上悉從舊說,似乎顯得有些謹慎和保守。未知其後諸卷情況如何。

回頭再看裘錫圭先生的解說,裘先生說:“勞氏有時把‘堠’釋作‘堠’是缺乏根據的”;“破城子新出的‘塞上烽火品約’,既提到塢也提到堠。甘肅省居延考古隊簡冊整理小組的釋文把這兩個字都釋作‘塢’,徐蘋芳同志《居延、敦煌發現的‘塞上烽火品約’》一文則把這兩個字都釋作‘堠’,恐怕都不妥當。”裘先生的意見表達得非常分寸,這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也正是因為其中暗示出尚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所以本文斗膽提出上述看法。假如能够算作勞幹先生釋“堠”為“堠”的“根據”,從而得到裘先生及學界同好的首肯,那就十分榮幸了。

《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札記(十則)*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姚 磊

內容提要 本文通過與其他文獻對讀以及核查圖版,綴合了《肩水金關漢簡(肆)》中如下十組散簡: 73EJT37:1414+1044+369、73EJT37:1416+1177、73EJT37:1450+1402、73EJT37:832+811、73EJT37:866+580、73EJT37:1238+1323、73EJT37:393+1290、73EJT37:651+716+727、73EJT37:675+688、73EJT37:1425+1347+1142,并對相關詞句進行了解讀。

關鍵詞 肩水金關漢簡 綴合 釋讀

73EJT37:1414 號簡釋文作:^①

𠂔得宜產里大夫王多牛年廿二

此簡“廿”下數字殘,無法核實簡文是否為數字“二”。73EJT37:1044 號簡釋文作:

二長七尺二寸黑色牛車一兩 以□

此簡上部數字殘,同 73EJT37:1414 號簡一樣,亦無法確定簡文是否為“二”。我們把

*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批准號:2015112010201。

① 本文圖版、釋文來源: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肩水金關漢簡(肆)》,上海:中西書局,2015;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3;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2;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1。不另注。

73EJT37:1414 與 73EJT37:1044 號簡拼合後,其圖作:



兩簡茬口密合,各殘存的一筆正好連接起來,可復原“三”字。形制、字迹一致,紋路、茬口吻合,書寫均呈右傾斜。

73EJT37:369 號簡釋文作:

元康三年五月中出

此簡上部殘缺,字體傾斜,書寫風格與 73EJT37:1044 號簡一致,疑可綴合。兩簡拼合後,其圖作:



兩簡茬口密合,紋路相聯,可復原“元”字。

經測量,三簡圖版寬度一致,均是 0.9cm。由此,三簡當可互綴,釋文斷讀作:

轅得宜產里大夫王多牛,年廿三,長七尺二寸黑色,牛車一兩,以元康三年五月中出。

73EJT37:1414+1044+369

這種簡文格式,是常見的“出入名籍”。肩水金關漢簡中也比較常見,例如:

- (1) 河南郡緱氏武平里程宗年七尺二寸黑色 牛二車一兩 73EJT4:52
- (2) 河內溫董里公乘李福年廿六長七尺二寸黑色 軺車一乘馬一匹 劍一 73EJT9:82
- (3) 河南穀成長陽里大夫師逢年卅長七尺二寸黑色牛車兩鋤楯各一 卩 73EJT25:5
- (4) 河南郡平縣陽河上里公乘左相年廿三長七尺二寸黑色 劍一枚 卩 73EJT10:104

此類“出入名籍”,記載出行人的個人信息(如爵位、籍貫、姓名、年齡、身高)以及攜帶物品或隨行車馬等,詳實而具體,能起到稽查的作用。此外,73EJT37:1414 號簡的出行人是“宜產里王多牛”,73EJT6:39 號簡有“成漢里男子孫多牛”。核查知,“宜產里”與“成漢里”均屬於張

掖郡鱣得縣。^①此類人名的命名方式或與此地的文化有關。劉釗先生曾列舉古文字資料中有“封多牛”,表示富有。^②此處亦可從,代表着對富足、美好生活的一種追求。

肩水金關漢簡中的“出入名籍”多是“某月某日出/入”“某月出/入”“某日出/入”的構成模式,而“某年某月某日出/入”的模式相對較少,比如:

- | | |
|-----------------------------------|--------------|
| (1) 河南郡緱氏縣東昌里大夫杜葆年卅五 以九月出 | 73EJT37:64 |
| (2) 河南郡滎陽西都里公乘陰讓年十六長七尺二寸黑 以九月出 | 73EJT37:78 |
| (3) 鱣得平利里公乘趙婢年卅六長七尺四寸黑色……十二月戊寅出 | 73EJT37:79 |
| (4) 萬歲里公乘籍中年卅八 爲姑臧尉徐嚴葆與嚴俱之官 正月庚午入 | 73EJT6:52 |
| (5) 弩一矢五十 牛車一兩已入 丙午入 | 73EJT9:219 |
| (6) 日勒萬歲里華莫如年廿三長七尺 神爵二年七月中出 | 73EJT37:1003 |

由於“出入名籍”提供年號的較少,使簡牘斷代比較困難。此三簡綴合後可見“元康三年”這一明確紀年,爲簡牘斷代提供了很好的依據。

二

73EJT37:1416 號簡釋文作:

八月庚午匡師丞義移過所河津門亭勿

此簡“勿”字殘,簡面有四條紋路,非常清晰。73EJT37:1177 號簡釋文作:

毋苛留如律令/掾廣令史彭

此簡簡面亦有四條清晰的紋路,首字殘缺,不能核定爲“毋”字。我們把 73EJT37:1416 與 73EJT37:1177 號簡拼合後,其圖作:



① 黃浩波:《〈肩水金關漢簡(壹)〉所見郡國縣邑鄉里》,簡帛網,2011年12月1日;黃浩波:《〈肩水金關漢簡(貳)〉所見郡國縣邑鄉里》,簡帛網,2013年9月18日;黃浩波:《〈肩水金關漢簡(叁)〉所見郡國縣邑鄉里》,簡帛網,2014年7月22日。

② 劉釗:《古文字中的人名資料》,《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9年第1期。

兩簡形制、字迹相近,色澤相符,紋路相合,茬口吻合。綴合後可復原“勿”字。經測量,圖版寬度一致,均是 1.0cm。由此,兩簡當可綴合,釋文斷讀作:

八月庚午,匡師丞義移過所河津門亭,勿苛留,如律令/掾廣令史彭

73EJT37:1416+1177

“勿苛留”,簡文又有“毋苛留”“勿何留”“毋留”“毋河留止”“毋苛留止”“毋留止”等相似表述,皆應作“放行”理解。^① 如:

(1) 六月己亥屋蘭守丞聖光移過所肩水金關居延毋苛留如律令/掾賢守令史友

73EJT37:521

(2) 十二月雒陽丞大移過所縣邑勿何留如律令掾禹令史樂

73EJT24:266A

(3) 日前謁移過所縣邑侯國津關續食給法所當得毋留如律令敢言之

73EJT30:16

(4) 毋河留止如律令敢言之

73EJT30:203

(5) 六月甲辰居延丞延年移過所縣道河津關毋苛留止如律令/掾延年佐長世

73EJT37:519A

(6) 五月己丑長安令世守左丞德移過所縣邑毋留止如律令 守令史充

73EJT27:13

“匡師”地名,屬河南郡。又見於 73EJT21:21 號簡,簡文曰:

河南匡師西信里蘇解怒 車一兩爲鑾得騎士利成里田安國鄴載肩水倉麥小石冊五石
輸居延 弓一矢□二劍一

73EJT21:21

《漢書·地理志》作“偃師”。^② “匡師丞”在其他簡牘中亦有出現,比如敦煌懸泉漢簡,簡文曰:^③

永始四年九月辛丑朔乙卯,匡師丞慶移過所,遣盧亭長唐輔爲郡輸

從者如律令。六月丙辰東。

II T0113②:48

此外,居延漢簡中亦有“匡師丞印”可參看。^④

① 中國簡牘集成編委會:《中國簡牘集成》第8冊,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111頁。

② 《漢書》卷二八,北京:中華書局,1962,1555頁。

③ 張俊民:《敦煌懸泉漢簡所見的“亭”》,《南都學壇》2010年第1期。

④ 黃豔萍:《居延漢簡中的官印初探》,《寧夏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

三

73EJT37:1450 號簡釋文作：

元延二年三月壬戌朔丁丑居延卅井候譚移過縣道河津
市上書具𨔵得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尉史忠

此簡“津”字殘。73EJT37:1402 號簡釋文作：

津關遣掾孫萬爲官

此簡亦是“津”字殘。我們把 73EJT37:1450 與 73EJT37:1402 號簡拼合後，其圖作：



兩簡色澤、紋路相符，字迹、字間距一致，茬口吻合。綴合後，可復原“津”字。經測量，圖版寬度一致，均是 1.8cm。

由此，兩簡當可綴合，釋文斷讀作：

元延二年三月壬戌朔丁丑，居延卅井候譚移過縣道河津關，遣掾孫萬爲官市上書具
𨔵得，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尉史忠。 73EJT37:1450+1402

綴合後文意通順，肩水金關漢簡以及居延漢簡中亦有相似辭例可爲佐證，如：

- | | |
|---|------------------------|
| (1) □世丞充謂過所縣道河津關遣書佐李鳳德 | 73EJT23:621 |
| (2) 移過所縣道河津關遣都田守嗇夫陳惲以詔書行水酒 | 73EJT24:9A |
| (3) 令城倉長譚丞順移過所縣道河津關遣 | 73EJT24:127 |
| (4) 地節三年正月戊午朔己卯將兵護民田官居延都尉章居延右尉可置行丞事謂過 所縣道河津關遣從史畢歸取衣用 | 73EJT24:269A |
| (5) 常樂爲官市藥長 | 73EJT26:126 |
| (6) 調爲官市栝器長□□□□輶車一乘 | 73EJT32:20 |
| (7) 元康三年十一月中爲官市上書具長安 | 《合校》456.2 ^① |

此外，簡文中的“爲官市”意指爲“爲官府(相當於現在所說的公家)購買”，與之相對的

①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568 頁。

則是“爲家私市”。^①

四

73EJT37:832 號簡釋文作：

□□移鱗……

此簡簡面存在刮削，下部殘斷。73EJT37:811 號簡釋文作：

……一兩

此簡簡面亦存在刮削的現象，上部殘斷。我們把 73EJT37:832 與 73EJT37:811 號簡拼合後，其圖作：



兩簡色澤相符，茬口吻合。經測量，圖版寬度一致，均是 1.2cm。由此，兩簡當可綴合，釋文斷讀作：

□□移鱗……一兩

73EJT37:832+811

從兩簡形制以及斷裂面看，應是刮削後被廢棄折斷。此簡對研究肩水金關漢簡斷裂原因具有一定的啓發意義。

五

73EJT37:866 號簡釋文作：

戍卒淮陽國寧平宜春里□

此簡無紋路，“里”字下殘斷，簡文缺爵位等信息。73EJT37:580 號簡釋文作：

大夫宋善年廿長七尺二寸黑色马

此簡亦無紋路，上部殘斷，簡文缺地理等信息。我們把 73EJT37:866 與 73EJT37:580 號簡拼

^① 承蒙匿名審稿人指出，可從。

合後,其圖作:



兩簡色澤相符,字迹、字間距一致,茬口吻合。綴合後,可復原“大”字。經測量,圖版寬度一致,均是 1.1cm。

由此,兩簡當可綴合,釋文斷讀作:

戍卒淮陽國寧平宜春里大夫宋善,年廿,長七尺二寸黑色,马

73EJT37:866+580

六

73EJT37:1238 號簡釋文作:

子男鯨得步利里

此簡有紋路,下部殘斷,簡的中央位置書寫文字,缺少人名等信息。73EJT37:1323 號簡釋文作:

□張林年十三黑色 長五尺七寸

此簡亦有紋路,上部殘斷,缺少籍貫等信息。我們把 73EJT37:1238 與 73EJT37:1323 號簡拼合後,其圖作:



兩簡色澤、紋路相符,字迹、字間距一致,茬口吻合。綴合後,可復原“里”字。經測量,圖版寬度一致,均是 1.4cm。

由此,兩簡當可綴合,釋文斷讀作:

子男鯨得步利里張林,年十三,黑色,長五尺七寸

73EJT37:1238+1323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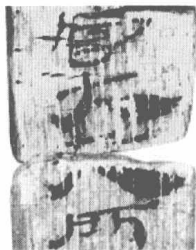
73EJT37:393 號簡釋文作：

從者居延雜里官大夫

此簡有紋路，簡面有殘裂的細縫，字迹偏大，缺人名等信息。73EJT37:1290 號簡釋文作：

夫所勳年廿六 四 長六尺

此簡亦有紋路，上殘斷，缺爵位等信息。我們把 73EJT37:393 與 73EJT37:1290 號簡拼合後，其圖作：



兩簡色澤、紋路相符，書寫風格相同，字迹、字間距一致，茬口吻合。綴合後，可復原“夫”字。經測量，圖版茬口寬度一致，均是 1.1cm。

由此，兩簡當可綴合，釋文斷讀作：

從者居延雜里官大夫所勳，年廿六，長六尺……，四……

73EJT37:393+1290

肩水金關漢簡中亦有很多關於“從者”的相似辭例，作：

(1) 從者安樂里大夫薛市年廿九 長七尺五寸黑色

73EJT37:1326

(2) 從者玉門臨泉里程不識年卅五 軺車三乘 用馬六匹 閏月辛卯北出 73EJT37:53

(3) 從者安樂里薛市年廿九 長七尺五寸黑色

73EJT37:1326

侯宗輝先生曾對肩水金關漢簡中的“從者”做過研究，認為：“‘從者’是漢代社會中普遍存在且數量不菲的一種群體身份的稱謂。從漢簡記載可知，‘從者’是吏士等私人所雇傭的隨從”。^① 可從。

八

73EJT37:651 號簡釋文作：

^① 侯宗輝：《肩水金關漢簡所見“從者”探析》，《敦煌研究》2014 年第 2 期。

建平二年六月丙辰朔 A

麟得塞尉印 B

73EJT37:727 號簡釋文作：

候長趙審寧歸屋蘭名縣爵里年姓如牒書到出入如 A

候史丹發 B

顏世鉉先生綴合了 73EJT37:651 與 73EJT37:727 號簡,^①釋文作：

建平二年六月丙辰朔

候長趙審寧歸屋蘭名縣爵里年姓如牒書到出入如 A

麟得塞尉印 候史丹發 B

顏先生的綴合是可信的,但簡仍不完整,還有進一步綴合的可能。73EJT37:716 號簡釋文作：

甲戌廣地麟得守塞尉博兼行候事移肩水金關 A

.....

君前 守令史忠 B

此簡字形、形制以及書寫風格都同 73EJT37:727 號簡一致,我們把 73EJT37:716 與 73EJT37:727 號簡拼合後,其圖作：



兩簡色澤相符,書寫風格相同,茬口吻合。綴合後,可復原“候”“史”“丹”“發”等諸字。

由此,三簡當可綴合,釋文斷讀作：

建平二年六月丙辰朔甲戌,廣地麟得守塞尉博兼行候事移肩水金關

候長趙審寧歸屋蘭,名縣爵里年姓如牒書到出入如 A

麟得塞尉印,候史丹發,君前,守令史忠 B

73EJT37:651+716+727

九

73EJT37:675 號簡釋文作：

① 顏世鉉：《〈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第 10 組》，簡帛網，2016 年 1 月 16 日。

· 循客張掖和平里孫立字君功年卅四五短壯□

此簡字體規整,無紋路,下部殘斷。73EJT37:688 號簡釋文作:

□細身小頭方面小髭少須身端直初亡時黑幘

此簡亦字體規整,無紋路,形制上與 73EJT37:675 號簡較為一致。我們把 73EJT37:675 與 73EJT37:688 號簡拼合後,其圖作:



兩簡色澤相符,書寫風格相同,茬口吻合。經測量,圖版寬度一致,均是 1.2cm。由此,兩簡當可綴合。此外,“壯”下兩字不清晰,從字形和文意來看,或可釋作“黑色”。^①

綜上,釋文斷讀作:

· 循客張掖和平里孫立,字君功,年卅四、五,短壯黑色細身小頭方面小髭少須身端直,初亡時黑幘

73EJT37:675+688

簡文是對逃亡者進行追逃,故詳細敘述其體貌年齡等信息。

十

73EJT37:1425 號簡釋文作:

橐他却適隧長孟

73EJT37:1347 號簡釋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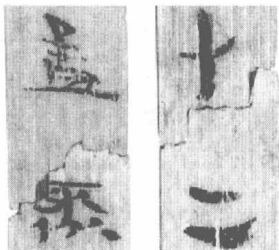
聚子男奉等十

73EJT37:1142 號簡釋文作:

二人牛車廿三兩

三簡有共同的特征,如紋路相似、字與字之間的間距較大等。我們把 73EJT37:1425、73EJT37:1347 與 73EJT37:1142 號簡拼合後,其圖作:

^① 承蒙匿名審稿人指出,可從。



三簡色澤、紋路相符,字迹、字間距一致,茬口吻合。經測量,圖版寬度一致,均是 1.0cm。

由此,三簡當可綴合,釋文斷讀作:

橐佗却適隧長孟聚、子男奉等十二人,牛車廿三兩 73EJT37:1425+1347+1142

肩水金關漢簡中亦有相似辭例,作:

橐佗却適隧長孟聚妻忿年五十八歲黑色 男孫武 牛車一兩 十二月壬午出 十二月

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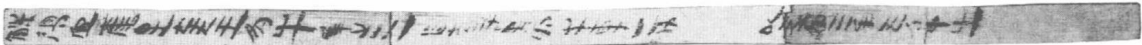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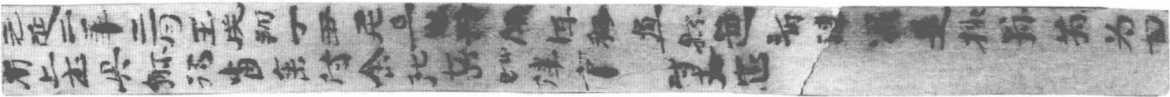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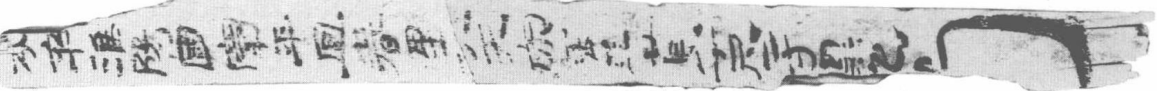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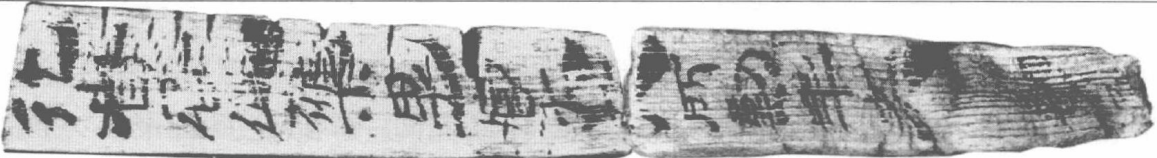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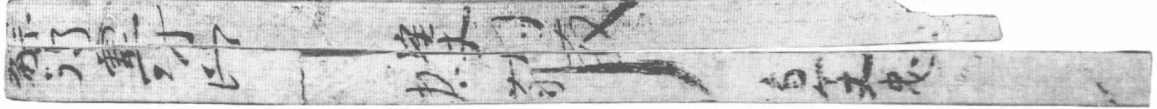


73EJT37:81

聚、聚相通,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聚與聚音義皆同……聚之爲言聚……聚一作聚。”^① 73EJT37:81 號簡中的“孟聚”和 73EJT37:1425+1347+1142 號簡的“孟聚”當爲同一人。結合兩簡,我們可復原其家庭關係,戶主孟聚(孟聚),妻忿,子孟奉,孫孟武。

附記:本文寫作得到何有祖老師、謝坤兄、雷海龍兄的幫助,甘肅省簡牘博物館的馬智全先生核對了原簡,謹致謝忱。

^①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53 頁。

附綴合諸簡全圖：

| | |
|---|--|
| 一 |  |
| 二 |  |
| 三 |  |
| 四 |  |
| 五 |  |
| 六 |  |
| 七 |  |
| 八 |  |
| 九 |  |
| 十 |  |

尹灣漢簡《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 所見“薰毒”試析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呂 壯

內容提要 尹灣漢墓出土的《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木牘完整記錄了西漢中晚期某武庫的武器裝備情況，其中有“薰毒八斗”。“薰毒”為何物，史籍缺載。有學者從音韻方面分析，認為“薰毒”即“薰陸”，為西方所產香料，可作藥用，進而認定“薰毒”為軍備用藥。從傳世文獻及出土資料來看，尚不能明確薰陸在西漢中晚期是否已傳入我國，而且薰陸作為藥物單獨置於武庫殊難解釋。結合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及張家山漢簡所見“薰毒”“董毒”等材料，或可判定“薰毒”應為利用有毒植物加工製作而成的毒藥，通過薰蒸的方式或可將毒性施加在箭簇等兵器之上。“薰毒”在當時管控較嚴，因此纔會出現儲存於武庫的情況。另外，戰國至秦漢時期，薰毒產生的毒煙或許也應用於守城。

關鍵詞 尹灣漢簡 薰毒 薰毒 薰陸

尹灣6號漢墓出土一方題為《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的木牘，正面6欄，背面5欄，每欄23—26行不等，所記分乘輿兵、車器和庫兵、車器兩大類，逐項記錄了所藏兵、車器的名稱及數量，兩部分末尾都有兵車器種類和器物的統計數字，最後還有總的統計數字，兵、車器共240種23268487件。^①由於它是“迄今所見有關漢代武庫器物最完備的統計報告，指標項目甚多，數列明確，對我們深入瞭解漢代武器裝備的情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②因此，學界對此也比較關注，出現了一大批成果，包括武庫性質和制度的研究、對

①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編：《尹灣漢墓簡牘》“前言”，北京：中華書局，1997。

② 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86頁。

《武庫集簿》中一些名物的訓釋、對漢代兵種構成的研究等。^① 然而,就個別名物的訓釋而言,尚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本文結合新出五一廣場簡牘相關資料,試對《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所見“薰毒”進行解釋,分析此物在戰爭中的應用,以期推進秦漢軍事史和科技史研究。

一 “薰毒”非“薰陸”

《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所記“薰毒八斗”,位於木牘背面第4欄靠右位置。關於“薰毒”的釋文,滕昭宗先生直接寫作“薰毒”。^② 張顯成先生認為“毒”省寫一橫,在簡帛中很常見,“毒”即是“毒”的省筆字。^③ 的確,在漢代簡帛及碑刻中,常見“毒”寫作“毒”的情況,茲列舉幾例,如下表:

| | |
|-------------|------------------------|
| 馬王堆漢墓帛書 | 毒 毒 ^④ |
| 張家山漢簡 | 毒 毒 毒 毒 毒 ^⑤ |
| 銀雀山漢簡 | 毒 ^⑥ |
| 武威醫簡 | 毒 毒 ^⑦ |
| 武威漢簡 | 毒 ^⑧ |
| 東漢摩崖石刻《石門頌》 | 毒 毒 ^⑨ |

從上表可知,兩漢時期“毒”字寫作“毒”字很常見,薰毒即薰毒。

有關“薰毒”的訓釋,目前有兩種觀點。張顯成先生從音韻學角度分析,認為“毒,定母、

① 研究《武庫集簿》重要論文有: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李成珪:《前漢長安武庫收藏目錄之發現——關於尹灣簡牘〈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之探討》,《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具體研究綜述可參看郝建平《尹灣漢墓簡牘研究綜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5年第1期;奚林強《〈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研究綜述》,《黑龍江史志》2014年第19期。

② 滕昭宗:《尹灣漢墓簡牘概述》,《文物》1996年第8期。

③ 張顯成:《尹灣漢墓簡牘校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71頁。

④ 陳松長:《馬王堆簡帛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4頁。

⑤ 張守中:《張家山漢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9頁。

⑥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摹本60頁。

⑦ [日]佐野光一編:《木簡字典》,東京:雄山閣,1985,434頁。

⑧ [日]佐野光一編:《木簡字典》,434頁。

⑨ [日]佐野光一編:《木簡字典》,434頁。

覺部；陸，來母、覺部，二者韻相同，聲同為舌頭音，故‘毒’通‘陸’”，因此將“薰毒”釋作“薰陸”，亦即乳香，認為是一種藥物，也可作香料，作藥物時，可止痛長肉、調氣活血、治跌打損傷，進而認為“上引《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所記該藥物為軍中藏藥，顯然是戰備藥物”。^①在筆者看來，“薰毒”可寫作“薰毒”，而“毒”與“陸”通，因而存在“薰陸”被寫作“薰毒”的可能。但如果認定“薰毒”即“薰陸”，證據仍然不足。

首先，從時間上來看，尚不能確定原產於地中海、紅海地區的薰陸在西漢中晚期是否已傳入我國。《北堂書鈔》卷一三五引西晉初年傅玄《樂府》云：“粉加甲煎，名香熏陸，艾納回光。”^②西晉晚期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狀》稱：“薰陸香，出大秦，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於沙中，盛夏樹膠流出沙上，方采之。”^③《名醫別錄》由南朝梁陶弘景彙集前人成果整理成書，書中薰陸香簡稱薰陸，如“沉香”條：“薰陸香、雞舌香、藿香、詹糖香、楓香并微溫。悉治風水毒腫，去惡氣。薰陸、詹糖去伏屍。”^④由此可知，熏陸、薰陸、薰陸香均是一物，最早見於西晉文獻。《三國志·魏志·烏丸傳·贊》裴注引《西域舊圖》提到大秦產薰陸等十二種香。^⑤孫機先生曾推測《西域舊圖》“提到的狄提、迷迷、兜納、白附子、薰陸、郁金、芸膠等西方香料，其中有的在東漢時應已傳入我國。”^⑥但這尚需要考古實物證明。^⑦

甘肅敦煌曾出土西漢武、昭時期的紙文書3件，在文書正面分別隸書“付子”“薰力”“細辛”等字。整理者根據紙的形狀和折疊痕迹，認為是包藥用紙，而正面所書即藥名。^⑧張顯成先生根據音韻判斷，薰力即薰陸，由西域商人傳入。^⑨可是僅僅從音韻上推斷，沒有實例證明“力”和“陸”通假，并不能令人信服。南越王墓曾出土一種西方香料，僅26克，考古人員認為此物因“被視為珍品，而放入墓中”。^⑩可以想見，產自更為遙遠的地中海地區的薰陸，應當極

① 張顯成：《尹灣漢簡“薰毒”及懸泉遺址紙文書“薰力”考釋》，收入其著《簡帛文獻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8，15頁。

②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南北朝詩（上）》，北京：中華書局，1983，567頁。逯欽立先生在詩後加按語稱：“三句有訛誤。”

③ [晉]嵇含撰，張宗子輯注：《嵇含文輯注》，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92年，26頁。也有研究認為，今本《南方草木狀》並非西晉嵇含所著，而是後人根據類書和其他文獻編造的，其時代當為南宋時。而“薰陸香”則是全抄劉宋初年徐衷《南方草木狀》一書（繆啓愉：《〈南方草木狀〉的諸偽迹》，《中國農史》1984年第3期）。

④ [南朝梁]陶弘景集，尚志鈞輯校：《名醫別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64頁。

⑤ 《三國志》卷三〇《烏丸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865頁。

⑥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360頁。

⑦ 西漢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的一個漆盒內曾發現樹脂狀藥物，重約26克，外形與泉州後渚宋船內發現的乳香類似。考古人員稱“雖然所含主要成分已經分解，但不排除它確實是乳香”（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346頁）。然而，唐末以後的薰陸與乳香已經是植物來源不同的兩味藥了（參見金素安等：《〈海藥本草〉中的薰陸香和乳頭香》，《江西中醫藥》2013年第5期）。

⑧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0年第5期。

⑨ 張顯成：《尹灣漢簡“薰毒”及懸泉遺址紙文書“薰力”考釋》，15頁。

⑩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上）》，346頁。

為珍貴，自然不會作為藥品應用於戰爭。

總之，傳世資料以及目前所見出土資料，並不能證明薰陸在西漢時期即傳入我國內地或東部沿海地區。

其次，無法解釋薰陸作為藥用時，為何單獨存於武庫中。薰陸最早作為藥用記載於葛洪《肘後備急方》，書中記載“卒毒腫起急痛方”“五香連翹湯”“甘家松脂膏”以及“地黄膏”等四個處方用到薰陸。^① 軍備藥品應當是方便戰場使用，多以丸散膏藥為主，例如“居延吏卒之常見病，多用針、灸或丸藥、膏藥之類治療”。^② 如果武庫中的“薰毒”即是薰陸，屬於軍備藥品，那麼武庫中應當還存有其他藥材，然而《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中並未見到其他可與薰陸配合使用的藥材。再者，即使薰陸可單獨使用，武庫中僅藏此一種藥材，也無法提出合理解釋。

因此，從上述兩點可以判斷，將“薰毒”釋作“薰陸”雖然在音韻上說得通，但從薰陸傳入中國的時間，以及薰陸作為軍備用藥的可能性來看，仍然缺乏有力的證據。李均明先生則提出了另一種觀點，認為：“薰毒，疑指熏煙的原料藁艾之類。集簿見薰毒8斗，以容量計，當為原料之類，非器物。”^③ 李均明先生從“薰”字字義來解釋“薰毒”，為我們的進一步討論提供了新的方向。《說文》中“熏”“熏”同在“艸部”，“熏，火煙上出也。從中，從黑。”“薰，香草也，從艸，熏聲。”^④ 《急就篇》顏注曰：“薰者，燒取其煙以為香也。”^⑤ 所以，“薰”可與“熏”通。《說文》釋“毒”曰：“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從中，毒聲”。^⑥ 由此看來，“薰毒”應該與有毒植物有關，且燃燒之後所產生的煙霧具有一定毒性。然而，武庫中的薰毒具體是何種形態，以及如何使用，僅憑尹灣漢簡，難以判斷。值得慶幸的是，新近出版的《長沙五一廣場簡牘選釋》為我們進一步推斷“薰毒”的性質提供了新的材料。

二 五一廣場簡所見“薰毒”釋讀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近期公布了一批新的簡牘材料，其中 CWJ1③：263—17號竹簡記載有“薰毒”二字。現將原簡文移寫如下：

月時米粟候誦皆受不雇直受所監臧并二千二百凡臧三萬三千七百案斗俠薰毒射傷

① [東晉]葛洪著，王均寧點校：《肘後備急方》，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134、140、148頁。

② 徐元邦：《居延漢簡中所記吏卒病傷述略》，《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9年第12期。

③ 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118頁。

④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2、25頁。

⑤ [漢]史游：《急就篇》，長沙：嶽麓書社，1989，187頁。

⑥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22頁。

人對殺人亡後爲不知何人所殺何人賊殺人亡輒與平法掾^①

《選釋》整理之後的釋文及斷句爲：“月時米、粟、候、誦皆受，不雇直，受所監臧（贓）并二千二百，凡臧（贓）三萬三千七百。案：斗、俠、薰、毒射傷人。對殺人，亡。後爲不知何人所殺，何人賊殺人，亡。輒與平法掾。”整理者認爲：“候、誦，及下文斗、俠、薰、毒、對，皆人名。”^②關於斗、俠、薰、毒是否爲人名，筆者有不同意見。“俠”，可通“挾”。司馬貞《史記索隱》釋“游俠”之“俠”時稱：“俠，挾也，持也。”^③漢簡中也有“挾”寫作“俠”的文例，如銀雀山漢簡《尉繚子》載“凡俠（挾）議（義）【□□□□】□起；產私結怨，貴以不得已”。^④如果上述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俠”亦作“挾”的話，那麼可以試對釋文後半句進行新的斷句，即“案：斗俠（挾）薰毒射傷人。對殺人，亡。後爲不知何人所殺，何人賊殺人，亡。輒與平法掾。”^⑤這裏的“挾”同“夾”，本意是用胳膊夾住。此處“薰毒”應當連讀，即《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中所記載的“薰毒”，這樣斷句或許更有道理。

薰毒即薰毒，薰毒不能直接射傷人，當是使用經過薰毒加工的箭矢射傷人。張家山漢簡中有相關記載，私人不能隨意攜帶使用莖毒或糴製作的毒矢，“有挾毒矢若謹（莖）毒、糴，及和爲謹（莖）毒者，皆弃市。或命糴爲齷毒。詔所令縣官爲挾之，不用此律。軍吏緣邊縣道，得和爲毒，毒矢謹臧（藏）。節迫外蠻夷盜，以假之，事已輒收臧（藏）。匿及弗歸，盈五日，以律論。”^⑥根據整理小組的解釋，“莖”解釋爲有毒植物名，所引《國語·晉語》注稱“莖”爲烏頭；“糴”，整理小組認爲應作蕉，引《廣雅》和王念孫《廣雅疏證》，認爲“蕉”即附子。^⑦附子、烏頭位列《神農本草經》下品藥的前兩位，“有大毒”。而烏頭，“其汁，煎之名射罔，殺禽獸。”輯注者稱“射罔”是用烏頭煎汁作爲塗在毒箭上的原料，輯注者并引陶弘景的注稱，“以八月采烏頭，搗笮莖，取汁，日煎爲射罔。獵人以敷箭，射禽獸。中人亦死”。^⑧從簡文可以看出，莖毒、糴等是由烏頭、附子等植物製成，并被塗抹在箭簇上製成毒矢，而官府對這種毒矢管理亦十分嚴格。結合張家山漢簡的情況，《選釋》中所見“薰毒”也應是指經由有毒植物加工製作而成的毒藥，并可以某種方式（薰蒸）將毒性施加在箭簇之上。

其實，給兵器施毒，戰國末年就已有之。例如荆軻刺秦王所用的匕首，就淬有劇毒。《史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111頁。

②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224頁。

③ 《史記》，附錄第一《史記集解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1頁。

④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釋文81頁。

⑤ 本簡釋讀得到莊小霞博士幫助，特此致謝。

⑥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0頁。

⑦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第10頁。

⑧ 馬繼興主編：《神農本草經輯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332、333頁。

記·刺客列傳》載：“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①東漢時期，給箭簇施毒後用於傷人，開始常見起來。東漢明帝時期，匈奴圍攻金蒲城，“（耿）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②《後漢書》中也有周邊少數民族用施毒箭簇射人的記載，如《東夷傳》稱挹婁“青石爲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③《後漢書·西域傳·西夜傳》：“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傅箭鏃，所中即死。”^④《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載關羽曾爲流矢所中，後來左臂一直疼痛，診治醫生稱：“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⑤流矢既然有毒，說明這場戰爭中大量的箭矢都是帶有毒性的。因此，可以斷定，給兵器施毒在戰國末年就已經出現，且至晚在東漢末年的戰爭中就已經較大規模地使用毒箭簇。

然而，薰毒是如何施加在箭簇之上的呢？例如上引材料所見的烏頭和白草，都需要煎汁塗抹在箭簇上，其他幾處則未見具體的施毒方式。根據“薰”字文意，或許是通過燃燒產生的毒煙給兵器施毒。《史記·刺客列傳》：“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⑥《漢書·賈誼傳》則稱：“豫讓黥面吞炭。”鄭玄認爲“黥，漆面以易貌”，即利用大漆對皮膚的傷害來改異容貌。顏師古則曰：“黥，熏也，以毒藥熏之。”^⑦雖然不知道豫讓使用的是植物亦或礦物毒藥，但至少已經說明，毒煙能夠對皮膚產生極大傷害，而時人對此也已經有所認識了。

春秋戰國時期，古人對藥物毒性以及植物燃燒所產生氣體的認識也達到了很高水準，在戰爭中已經開始利用有毒藥物。《公羊傳》何休注稱，莊公十七年（前677年）占領遂地的齊國軍隊，就被“遂人共以藥投其所飲食水中，多殺之”。^⑧《左傳》襄公十四年也記載，諸侯之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⑨可見春秋時期古人就已經利用在水源中投放有毒物質的方式來取得戰爭的勝利了。在彙集秦漢時期衆多醫學家藥物學經驗成果、成書於東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中，就將藥物的毒性分爲微毒、有毒、大毒等，也說明漢代對藥材毒性的掌握已經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準。^⑩宋代兵書《武經總要》“毒藥煙球”配方中的有毒植物草

① 《史記》卷八六《刺客列傳》，2533頁。

② 《後漢書》卷一九《耿恭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720頁。

③ 《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傳》，2812頁。

④ 《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2917頁。

⑤ 《三國志》卷三六《關羽傳》，941頁。

⑥ 《史記》卷八六《刺客列傳》，2520頁。

⑦ 《漢書》卷四八《賈誼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2256頁。

⑧ 李學勤主編：《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55頁。

⑨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1009頁。

⑩ 馬繼興主編：《神農本草經輯注》，330頁。

烏頭和狼毒，在《神農本草經》中都有記載。而對植物燃燒之後氣味的認識，在秦漢時期也達到一個高峰，當時熏香種類衆多，熏爐製作技藝也十分先進。^①

綜上所述，在對植物毒性的認識方面，漢代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因此利用熏蒸方式給箭簇施毒的情況極有可能存在。而根據上文所引張家山漢簡的記載，官府對毒藥的管控很嚴，對毒箭矢的管控更加嚴格，因此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釋文“斗俠(挾)薰毒射傷人”是一種觸犯法律的行為。前引張家山漢簡簡文中還提到“軍吏緣邊縣道，得和爲毒，毒矢謹臧(藏)。節追外蠻夷盜，以假之，事已輒收臧(藏)。匿及弗歸，盈五日，以律論。”^②軍人在特定情況下可以使用葷毒或糴製作的毒矢，用畢必須“收藏”，如果隱匿或者不歸還，都會受到處罰。由此可知，政府對這類物品管理嚴格，而適合收藏保管這類特殊兵器的地方很可能就是武庫，這也可以進一步幫助我們理解“薰毒”為何會出現在《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中。因此，《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所載“薰毒八斗”，可用於給兵器施毒。但根據薰毒的特性，不排除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利用薰毒產生的毒氣、毒煙防禦敵人攻城。

三 有關武庫“薰毒”在戰鬥中使用的另一種推測

《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所載薰毒僅有8斗，如果是用於給兵器施毒，與武庫中龐大的軍械儲備相比，分量實在很少。筆者認為，此武庫所藏薰毒，或許僅僅應用於少數參與重要戰事的兵器。此外，結合戰國至秦漢時期的實際情況，也存在將薰毒產生的毒煙應用於守城的可能性。

有研究稱：“中國古代在作戰中，很早就借助煙霧來掩護軍事行動。攻守雙方都有應用，使用的煙霧劑，有燃燒物體的煙塵，也有粉塵。”^③最早記載戰爭中使用煙塵的是《墨子》，《備突》《備穴》篇都講到了在守城中利用濃煙阻擋敵人進攻。例如《備突》篇載：“城百步一突門……門旁爲橐，充竈狀柴艾，寇既入，下輪而塞之，鼓橐而熏之。”^④《備穴》篇多次提到利用艾草產生的煙霧熏敵，如：“令陶者爲瓦竇……置康若炭其中，勿滿，炭、康長互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爲竈，令如窯，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橐。穴且遇，以頡皋衝之，疾鼓橐熏之。”^⑤此外，《備穴》篇還提到了敵方使用此方法時如何應對，“盆持醢，客即熏，

①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358頁。

②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10頁。

③ 陸敬嚴：《中國古代兵器》，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6，240頁。

④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北京：中華書局，1958，52頁。

⑤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56頁。

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以盆盛醢置穴中，大盆毋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醢上及以汙目。”^①《後漢書·楊琰傳》載東漢靈帝時期零陵太守楊琰在鎮壓農民起義時，“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②從而取得勝利。可見，利用煙塵作戰在我國有着悠久的歷史。

雖然毒藥與煙霧結合用於戰爭的用例，目前所見最早記載於宋代兵書《武經總要》。不過，早在春秋時期，毒氣已經應用於防盜墓等。《酉陽雜俎·屍窆》：“貝丘縣東北有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鵝，鵝回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③俞樾《茶香室四鈔》卷二有“高柴墓”條稱：“元吾衍《閒居錄》云：陳州古墓，俗云高柴墓，為馮馬兒所發。初得石刻，曰‘逢馬而破’，遂發之不疑。毒煙飛箭，皆隨機輪而出，因斷其機，得金鑄禽鳥及玉甲片若龍鱗狀，其他異物不可數記。厚葬如此，恐非高柴，當是陳君塚耳。”^④此外，《史記·齊太公世家》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稱：“齊桓公墓在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崗，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繒彩、軍器不可勝數。”^⑤王子今先生認為墓中置水銀池，用水銀揮發的氣體毒殺盜墓者，是一種充分利用各種手段反盜墓的典型史例。^⑥

除了上引《後漢書·楊琰傳》在野戰中利用石灰外，尚未見到秦漢野戰使用毒煙的情況。使用毒煙霧受氣象條件的限制，必須站在上風向，然後纔能點燃毒煙，利用風力吹向敵方。但是，風又很容易把煙霧吹散，因此需要大量的毒霧才行，而武庫中的薰毒分量較少，產生的煙霧想必有限。在不能利用天氣條件的情況下，就要有鼓風車、拍囊等器械，利用機械將煙霧吹嚮敵方。而《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中并未發現這些器械的記載，其用於野戰的可能性就很小。因此，燃燒之後能夠產生有毒煙霧的“薰毒”，在秦漢時期被用作守備之器，防禦敵人用地道攻城，也不無可能。

關於薰毒的具體使用方法，或許是置於其他燃料上熏燒。漢代的香料根據燃燒方法的不同，分為兩種，如本身為草本植物的茅草等，可直接燃燒；而龍腦、蘇合等樹脂類香料，則需要置於其他燃料上熏燒。^⑦後一種香料遠比第一種耐用。如果將薰毒置於其他燃料燃物上熏燒，然後使氣體擴散，這種方法用量比較節約，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武庫中的薰毒分量不

①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73 頁。

② 《後漢書》卷三八，1288 頁。

③ [唐]段成式撰，方南生點校：《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三，北京：中華書局，1981，124 頁。

④ [清]俞樾撰，貞凡等點校：《茶香室叢鈔》，北京：中華書局，1995，1497 頁。

⑤ 《史記》卷三二《齊太公世家》，1495 頁。

⑥ 王子今：《中國盜墓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348 頁。

⑦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360 頁。

多。另外，假如薰毒是用來給兵器施毒的話，或許也是採用這種方式。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中的“薰毒”從音韻角度分析可釋作“薰陸”，但如果說是後世所見香料“薰陸”，則需要更多的資料證明薰陸這種產自西方的香料在西漢中晚期就已經大量傳入我國。如果從藥用角度解釋薰毒即薰陸，似乎也行不通，因為《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祇見此一種疑似藥材，且從醫學史上來看，薰陸應用於醫療最早見於東晉時期成書的中醫著作。結合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及張家山漢簡所見“薰毒”“堇毒”等材料，我們或許可以判定“薰毒”應為有毒植物經過加工製作而成的毒藥，可以通過薰蒸的方式將毒性施加在箭簇等兵器上。“薰毒”在當時管控較嚴，因此纔會出現儲存於武庫的情況。另外，結合戰國至秦漢時期的實際情況，薰毒產生的毒煙，或許也應用於守城。

走馬樓三國吳簡吳昌長朱表盜米案初探*

長沙簡牘博物館 孫東波 楊芬

內容提要 本文利用簡牘揭剝位置示意圖對《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柒》“吳昌長朱表盜米”卷宗進行初步整理與分析,並認為吳簡中的湏口倉地望應當在湏水與漢水的交匯處,屬江夏郡;案卷提及的“諸葛府君”很可能是時任丹陽太守的諸葛恪。

關鍵詞 走馬樓吳簡 朱表盜米案 湏口 諸葛府君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柒》(以下簡稱《竹簡柒》)有一份與吳昌長朱表盜割官米有關的簡冊。^① 該簡冊有對應的簡牘揭剝位置示意圖,內容相對完整。綜合運用揭剝圖、簡文內容、文書格式、書寫風格、編痕等信息,對相應簡冊作出有意義的編排整理,能夠解決一些單純依賴簡文難以搞清楚的問題,這種方法已為不少學者所應用。^② 本文試圖參考簡冊對應的揭剝圖,運用以上方法,對“吳昌長朱表盜米案”卷宗進行初步整理與分析,並就簡文涉及的重要問題進行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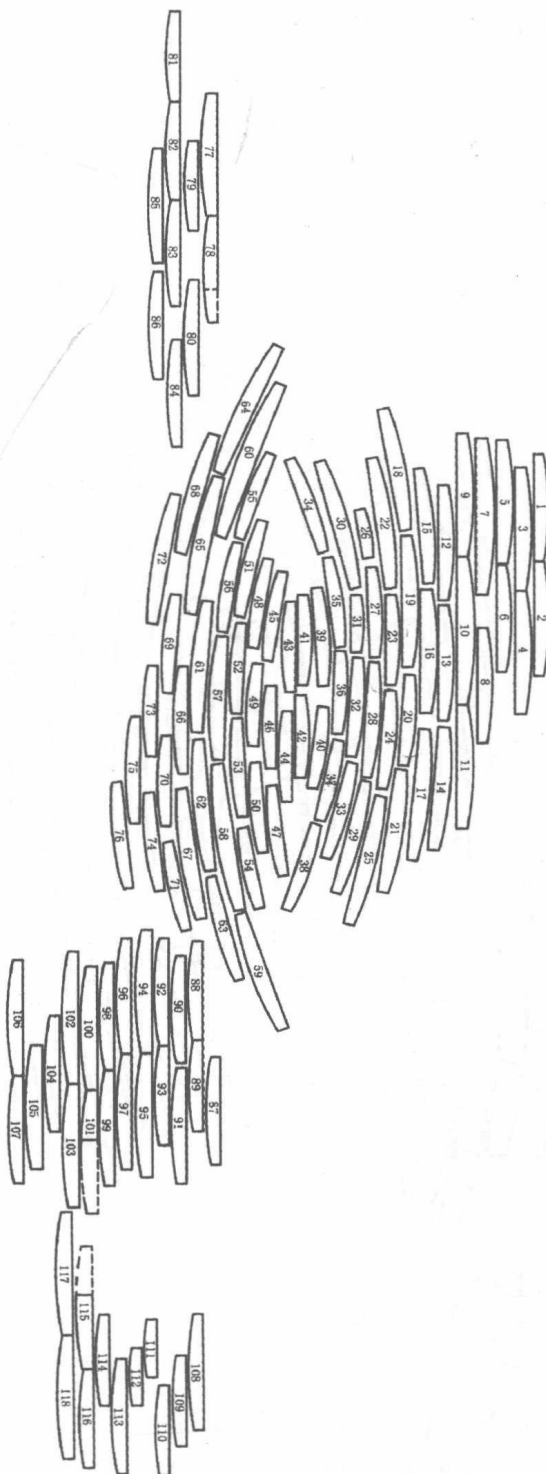
* 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走馬樓吳簡與孫吳縣政研究”(13AZS009)資助。

① 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故宮研究院古文獻研究所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柒)》,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② 侯旭東與凌文超兩位學者利用揭剝圖做了不少冊書復原方面的研究。如侯旭東《長沙走馬樓吳簡〈竹簡〉〔貳〕“吏民人名年紀口食簿”復原的初步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1期,66-79頁;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采集簿書整理與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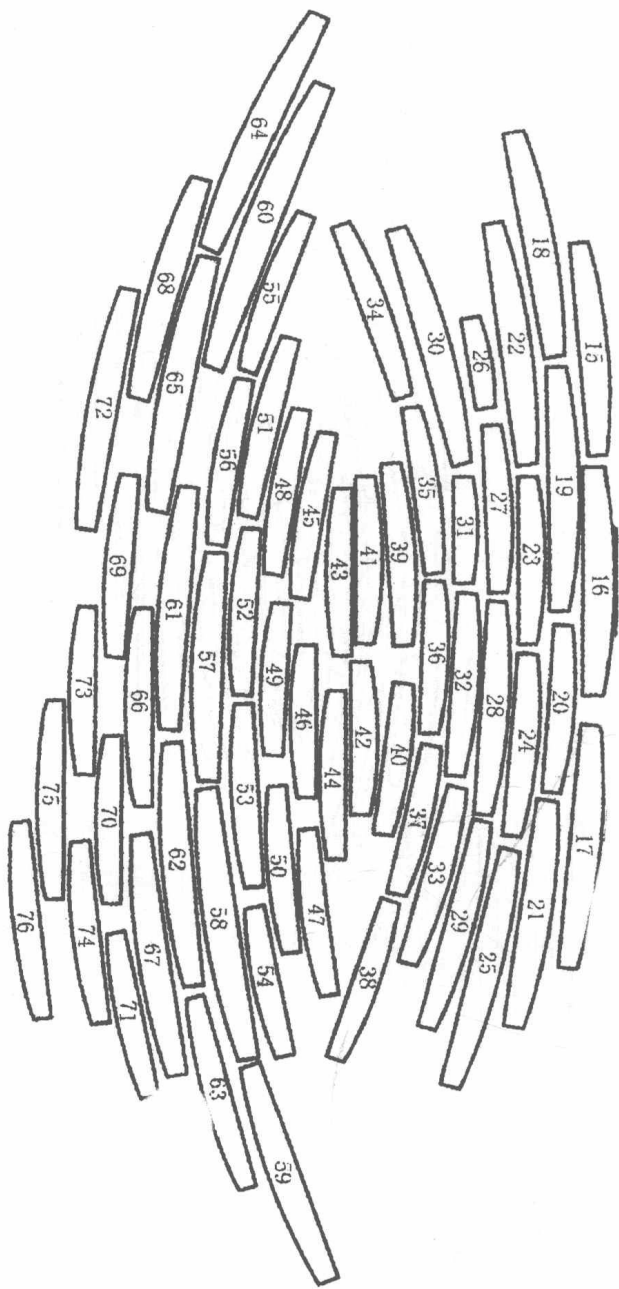
一 “吳昌長朱表盜米案”的初步整理

《竹簡柒》附錄一簡牘揭剝位置示意圖三十三即“朱表盜米案”簡冊相對應的揭剝圖，如下：



簡牘揭剝位置示意圖三十三

這幅揭剥圖直觀來看,可分成三個部分:核心部分簡牘和散落兩側的簡牘。從簡文內容來看,揭剥圖中的簡牘大體也可分為三個部分:1—16、80—118 號主要是“戶品出錢”簡(正反面均有文字);17—79 號(簡文編號柒·4082—柒·4144),大致內容為“朱表盜米案”文書簡。下面,我們暫時排除散落一旁的 77—79 號簡,結合簡冊的收卷方式、簡牘形制、書寫字迹、簡文內容以及簡牘相對位置關係,對揭剥圖核心部分的 17—76 號簡進行考察,初步整理朱表盜米案卷宗。



核心部分簡牘揭剥位置示意圖

以上揭剝圖中，簡牘有字面用直線表示，無字面用弧面表示。我們以有字面相對的簡層作為起始層，將揭剝圖分為上、下部分。上部分劃分為1—8層，下部分劃分為-1—-11層。從揭剝圖可看出，現存的案卷上下層排列較為規整，依然還能呈現簡冊收卷的基本形態。簡層分布較為均勻，有字面相對的簡冊中心的上層有兩枚簡，下層也正好相同，亦為兩枚簡。從第二層開始，存簡逐層增多，大致保留了簡冊收卷的基本形態。

確定了“朱表盜米案”卷宗在揭剝圖中現存簡牘的大致範圍之後，接下來，我們需要結合簡牘在揭剝圖中的位置及簡牘內容剔除闌入簡。

位於揭剝圖4.5層的第31、26號簡，簡寬明顯窄於其他簡牘，其釋文分別是：

右初家口食五人 筭四 訾 五 十 (柒·4091/26)

妻池年五十一筭一 子男□年十九筭一 (柒·4096/31)

應當是闖入的戶籍簡。

位於揭剥圖-7、-8、-9、-10 層的第 4134/69、4135/70、4136/71、4137/72、4138/73、4139/74、4140/75、4141/76 號簡，其釋文如下：

丞□收□□令語租民但入本領米不復收就(?)米書詣倉田曹 (柒・4134/69)

從□□□□□□□□縣吏區稠鹽買米七斛…… (柒・4135/70)

□□□鹽買米六斛 郡 張 陞 閣 (柒·4136/71)

中鄉大男 ☐☐ 故戶下品出錢四千四百侯相 嘉禾六年正月十二日都鄉典田掾蔡

忠白 (柒・4137/72 正)

入錢畢民自送牒還縣不得持還鄉典田吏及帥（柒·4137/72 背）

死罪死罪 敢言之 (柒・4138/73)

書前言監運掾孫儀受吏民租稅襍米起過五月十七日……（柒·4139/74）

七斛一斗一升曹保連年收四斛六升九合與(?)本領合二千五百五十一斛七斗

☐ (柒・4140/75)

升被書轉令語租民但入本領米不復收餽襍米言紀誠惶誠恐叩頭（柒）

4141/76)

其中簡 4137 正背均有文字，是戶品出錢簡，應是闌入的。其他簡牘，雖是文書簡，但其內容與領受吏民租稅雜米相關，和朱表盜米案內容上沒有連貫性，應當同屬闌入簡。其中簡 4138 頂格書寫“死罪死罪敢言之”，顯然是文書簡的結束句，難以判斷是否為闌入簡。但從簡的編

痕印、字迹等判斷,簡 4138 應與簡 4139、4140、4141 爲一冊,同是闌入簡。

排除以上闌入簡,揭剥圖核心區域的其他簡牘大概均屬朱表盜米案簡冊,現將這些簡牘釋文依次臚列如下:^①

1. 解行表軍法當遣主簿詣府白狀縣在治下吏役不得 (柒·4082 正/17)
2. 事史潘真以三月廿八日承詔覆量中倉祿米以四月二日畢訖覓(?)得表所割 (柒·4083 正/18)
3. 右尉寫下書到亟促依書諦^②更據^③科正謫罪法 (柒·4084/19)
4. □又表已先收繫自首者謂事□覺(?)問縛(?)後自首^④謂□□ (柒·4085/20)
5. 以今年正月廿日詣縣督繫曹遣吏張孟傳表以二月四日付臨湘錄 (柒·4086/21)
6. 府^⑤中部督郵移辛酉詔曰寫下度辭如牒又表以文入沒溺米事 (柒·4087/22)
7. 明府願無濟育□□乞可斷理楊全表^⑥澈命^⑦求哀求哀白 (柒·4088/23)
8. 亡而不亡謂故在識表已先收傳繫其有姦臧懷匿重罪□ (柒·4089/24)
9. …… (柒·4090/25)
10. □消息不□自覺主者問轉踵自首不應(?)^⑧□□□表^⑨□□□□ (柒·4092/27)
11. 以(?)表自首皆在真^⑩所覺後^⑪今^⑫聞□□^⑬訟愬□勉重罪者 (柒·4093/28)
12. 不應爲自首前已□□給□□罪自□□科正□□□□ (柒·4094/29)

① 錄入釋文凡例與《竹簡柒》一致。

② “諦”原釋作“識(?)”。

③ “據”原釋作“察(?)”。

④ “事□覺(?)問縛(?)後自首”原釋作“□□□□□□前”。

⑤ “府”原釋作“官”。

⑥ “全表”原釋作“金□”。

⑦ “命”原釋作“仰”,此字徐暢已改釋,參看徐暢《走馬樓簡所見孫吳臨湘縣廷列曹設置及曹吏》,長沙簡牘博物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293頁。

⑧ “應(?)”原未釋。“表”原釋作“克”。

⑨ “表”原釋作“克”。

⑩ “真”原釋作“直”。

⑪ “覺後”原釋作“覺(?)後(?)”。

⑫ “今”原釋作“令”。

⑬ 原釋文認爲缺三字。

13. 正^①月十八日臨湘侯相君告核事掾□記識…… (柒 · 4095/30)
14. 月十八日更復有辭以米給莽仁非^②自散用事既在真所覺^③□ (柒 · 4097/32)
15. 米一百七十斛表後以四月九日有辭以米□昔所遺^④兵□□ (柒 · 4098/33)
16. 入種粳米即已還賈見米^⑤百七十斛付湏(?)口(?)^⑥墜閣朱翻倉吏王 (柒 · 4099/34)
17. □□□運^⑦悉畢□□□書掾料校^⑧縣倉□所貸求^⑨□已償表^⑩ (柒 · 4100/35)
18. 會日遣主簿□□□□不得稽留言如□記科令^⑪ (柒 · 4101/36)
19. 溺米事錄事各畢願乞依事覺後(?)自首科^⑫結罪□□□^⑬ (柒 · 4102/37)
20. □謹買嚴^⑭上聞恩唯…… (柒 · 4103/38)
21. 收^⑮四月九日發^⑯臨湘吏□自首乞言以塵昔所遺兵覓到其自首□ (柒 · 4104/39)
22. 不^⑰如狀後吏實列乃米實已還償^⑱表□先□記自以文入沒 (柒 · 4105/40)
23. 道里長遠時值□□無□資斷(?)換以中倉溢(?)米□□斛^⑲給莽仁 (柒 · 4106/41)
24. 丹楊大男朱渡求哀以促作父表給吳昌昔遣吏鄴(?)莽予諸葛府君 (柒 · 4107/42)

① “正”或可釋作“五(?)”。

② “非”或可釋作“并”，

③ “覺”原未釋。

④ “□□”原釋作“……”，或可釋作“有覺”。

⑤ “還賈見米”原釋作“買宜(?)見(?)米(?)一”。

⑥ “付湏(?)口(?)”原釋作“□□□□”。

⑦ “校”原釋作“核”。

⑧ “求”原釋作“米”。

⑨ “表”原釋作“麦”。

⑩ “如□記科令”原釋作“……科令……”

⑪ “科”原釋作“私”。

⑫ “□□□”原釋作“不覺愬”。

⑬ “嚴”，字原釋作“叢”。

⑭ “收”釋可疑，或可釋作“以”。

⑮ “發”或可釋作“往”。

⑯ “不”原釋作“所”。

⑰ “償”原未釋。

⑱ “溢(?)米□□斛”原釋作“□□米□斛”。

25. □□傍爲道上糴米五十斛兩傍人各廿五斛及告□□詣府君 (柒·4108/43)
26. 換取南郡李□石□□□^①民所還種糴米□十斛分(?)^②給役□吏□周 (柒·4109/44)
27. □得潘掾文書□^③白表^④用米給莽等斛數相應表未(?)見□^⑤ (柒·4110/45)
28. 自首不如狀到十日^⑥表即復首對實□給莽^⑦等明^⑧十六日如見 (柒·4111/46)
29. 掾□□□□^⑨等乞從府還轉以倉中溢米七十斛…… (柒·4112/47)
30. 臨湘丞^⑩掾寫^⑪□書^⑫□曰亟促^⑬□□…… (柒·4113/48)
31. …… 嘉禾六年五月十七日起倉曹 (柒·4114/49)
32. 復正罪法可^⑭應會日……主簿……言表…… (柒·4115/50)
33. □詔覆量中倉襍米以四月六日畢訖□得(?)表(?)^⑮□□□用^⑯ (柒·4116/51)
34. □月十日□□長沙太守^⑰兼中部督郵書掾偉(?)督察移^⑱ (柒·4117/52)
35. □□如牒又表以文入沒溺米事今年正^⑲月廿日詣縣獄自繫 (柒·4118/53)

① “南郡李□石□□□”原釋作“□□□□□□□”。

② “分(?)”原釋作“米”。

③ “□”或可爲“習”。

④ “表”原釋作“表(?)”。

⑤ “□”或可釋爲“覺”。

⑥ “到十日”原釋爲“斛斗□”。

⑦ “莽”字原缺釋。

⑧ “明”或可釋作“即”。

⑨ “□□□□”或可釋爲“□厚正強”，或爲人名。

⑩ “丞”原釋作“書”。

⑪ “寫”原釋作“葛”。

⑫ “書”原未釋。“書”下爲編痕印，痕迹下不知是否有字。

⑬ “亟促”二字原未釋。

⑭ “可”或當釋作“所”。

⑮ “得(?)表(?)”二字原未釋。

⑯ “用”原未釋。

⑰ “□月十日□□長沙太守”原釋作“□吏(?)□□□□□下□”。

⑱ “書掾偉(?)督察移”等字原均未釋。

⑲ “正”字原未釋。“今年”二字間有留白，可以考慮此空本爲留下的編聯位，但編成冊後，編繩位置比估計的稍有偏移，編繩壓在了“月”字上，擋住了“正”字。

- 36.府……^① 告兼中部督郵書掾王偉臨湘今寫^② (柒·4119/53317/54)
- 37.口獄今臨湘結斛斗^③口後表自首狀口唯口所用米事覺自首 (柒·4120/55)
- 38.口遣吏張孟傳表以二月四日付臨湘錄事史潘真以三月廿八^④ (柒·4121/56)
- 39.先自覺主者問^⑤縛口繫^⑥自首不應爲自(?)首表^⑦唯口辭(?)皆爲真所(?)覺(?)^⑧ (柒·4122/57)
- 40.嘉禾六年正^⑨月口口日…… (柒·4123/58)
- 41.主簿口口省 (柒·4124/59)
- 42.……右……
- 口紀…… (柒·4125/60)
- 43.……見上口 (柒·4126/61)
- 44.口口先口繫自首口口口未(?)覺若覺後口對謂口得口更口口 (柒·4127/62)
- 45.朱(?)^⑩表坐割還口口倉吏口口所領溢米一百七十斛……畢 (柒·4128/63)
- 46.……記到…… (柒·4129/64)
- 47.正^⑪月一日吏昌寫……錄事史……復考實吳昌長 (柒·4130/65)
- 48.……覺後不……乞口前口口口口解行表軍法…… (柒·4131/66)
- 49.口月口日關中部督郵……口(柒·4132/67)
- 50.……詣口右…… (柒·4133/68)
- 51.皆口^⑫真所覺白後罪明科正事當促竟記到偉口口口口口 (柒·4144/79)^⑬

從形制上看,這些簡可粗分爲兩類。一類簡相對較長、較寬,長約 24 厘米,寬約 1.2 厘

① “府……”原釋作“敢言之”。

② “今寫”二字原未釋。

③ “斛斗”或可釋作“科正”。

④ “八”原釋作“七”。

⑤ “問”原釋作“間”。

⑥ “縛”後若留有編繩位置,則“縛繫”連讀。

⑦ “爲”“表”二字間僅能容一字。

⑧ “口辭皆爲真所(?)覺(?)”原釋文作“以口月七日吏廖口口口”。

⑨ “正”或可釋作“五(?)”。

⑩ “朱(?)”原釋作“口口米”。

⑪ “正”或可釋作“五(?)”。

⑫ “口”或可釋作“在(?)”。這枚簡不在揭剝圖的核心部分,散落一側,從內容看屬於朱表盜米案簡冊。

⑬ 這枚簡不在揭剝圖的核心部分,散落一側,從內容看屬於朱表盜米案簡冊。

米。一類簡相對較短,較窄,長約 23.5 厘米,寬約 0.7 厘米。其中第一類簡的揭剝圖編號為 17-19、21、25、28-30、34、57-68,對應本文編號為 1-3、5、9、11-13、16、39-50;剩下的簡牘為第二類簡,對應本文編號分別為 4、6-8、10、14-15、17-38、51。第一類簡牘大體處在簡冊收卷的外圈部分,而第二類較窄的簡大體分布在內圈部分。根據簡牘收卷的規律,寬簡和窄簡應分屬這份簡冊的不同文書,用窄簡書寫的文書大體編在寬簡之前。

考古發掘出土的簡牘,在發現時編繩一般早已散亂,簡牘難免發生錯位。即便長期放置不動,簡與簡之間的相互擠壓、地下水的浮力,也會發生簡與簡的錯位。而且在發掘過程中,即便整體揭取,簡牘難免也會被移動,因此也會錯位。以揭剝圖作為參照來整理復原簡牘,也要認識到揭剝圖的局限性,纔能更好地應用揭剝圖幫助復原簡冊。除了簡牘揭剝圖位置,簡牘的編痕、書寫風格、文書內容、文書行政運作的特點均能給冊書復原提供寶貴的信息。儘管如此,由於存留的簡文數量不多,且由多個文檔組成,所以要精確復原和整理“朱表盜米案”,難度還很大。

由於基本保持了簡冊原有的收卷形態,所以揭剝圖最核心的第 1 層或-1,很可能會包含簡冊的首簡。位於第一層的 2 號簡“丹楊大男朱渡求哀”正好可作為一份文書的首簡。所以,這份卷宗的第一份文書,應在簡冊的核心部分,基本位於該揭剝圖簡冊的第-2—2 層,是朱渡為父親朱表求哀全命的文書。

24. 丹楊大男朱渡求哀以促作父表給吳昌昔遣吏鄮(?)莽予諸葛府君
23. 道里[長]遠時值□□無□資斷(?)換以中倉溢(?)米□□斛給莽仁
26. [換]取南郡李□石□□□民所還種粳米□[十]斛分(?)給[役]□吏□[周]
25. □□傍為道上粳米五十斛兩傍人各廿五斛及告□□詣府[君]
16. 入種粳米即已還賈見米百七十斛付湏(?)口(?)墜閣朱翻倉吏王
17. □□□[運]悉畢□□□書掾料校縣倉□所貸求□已償表
29. 掾□□□□等乞從府還轉以倉中溢米七十斛……
27. □得潘掾文書□白表用米給莽等斛數相應表未(?)見□□
28. 自首不如狀[到十日]表即復首對實□給莽等明十六日如見
20. □謹買嚴上聞[恩唯]……

上列文書的字迹有連筆,較為隨意灑脫。其中簡 20 文字頂格書寫,下有留白,應當是一份上行文書的結尾之語。其位置靠近簡冊核心收卷位置,故置於這份文書之末。

揭剝圖的第 5-6 層,有幾枚寬度相似的窄簡,文字書寫工整、清晰,字符間距相近,應出

自一人之手。其中簡 7 的“求哀求哀白”，與前列簡 24“朱渡求哀”，在文意上相互呼應。雖然從揭剝圖收卷方式上，與第一份文書斷開，其字體風格、字符間距也與上揭文書有別，但還是分段附在第一份文書之後：

4. □又表已先收繫自首者謂事□覺(?)問縛(?)後自首謂□□

10. □消息不□自覺主者問轉踵自首不應(?)□□□表□□□□

8. 亡而不亡謂故在識表已先收傳繫其有奸臧懷匿重罪□

7. 明府願無濟育□□乞可斷理楊全表激命求哀求哀白

上文簡 7 中“明府願無濟育”之“明府”或應指長沙郡太守，^①故本冊案卷當有一份文書為長沙太守下文。

位於揭剝圖-4、-5、4 層的窄簡，可組成“長沙郡府告中部督郵書掾書”：

36. 府…… 告兼中部督郵書掾王偉臨湘今寫□

35. □□如牒又表以文入沒溺米事今年正月廿日詣縣獄自繫

38. □遣吏張孟傳表以二月四日付臨湘錄事史潘真以三月廿八

33. □詔覆量中倉裸米以四月六日畢訖得(?)表(?)□□□用

15. 米一百七十斛表後以四月九日有辭以米□昔所遺兵□□

14. 月十八日更復有辭以米給莽仁非自散用事既在真所覺□

37. □獄今臨湘結斛斗□後表自首狀□唯□所用米事覺自首

51. 皆□真所覺白後罪明科正事當促竟記到偉□□□□□

32. 復正罪法所應會日……主簿……言表……

31. …… 嘉禾六年五月十七日起倉曹

34. □月十日□□長沙太守兼中部督郵書掾偉(?)督察移

上述簡中，除簡 51 散落一旁，其他簡分別位於揭剝圖中心位置相對的第三、四、五層，符合簡冊的收卷方式。但以上編排却有疑問，即簡 38、15、14、51 是一種字體，簡 36、35、33、37、34 為另一種字體，它們之間的字符間距也不同。其中簡 36“府…… 告兼中部督郵書掾王偉臨湘今寫□”與簡 51“皆□真所覺白後罪明科正事當促竟記到偉□□□□□”，雖然字體明顯

① 此處“明府”，還有一種可能，或許是簡文中提到的諸葛府君。

不同,字符間距也不同,很可能屬不同文書,但考慮到這兩枚簡同屬郡對督郵下文的内容,我們暫將這些簡編聯在一起,這樣文意通順、上下關係連屬,有利於復原朱表事件經過。

以下是臨湘丞掾依“府記科令”敦促結正朱表罪法的文書。

30. 臨湘丞掾寫書曰亟促……

21. 收四月九日發臨湘吏自首乞言以廕昔所遺兵覓到其自首

22. 不如狀後吏實列乃米實已還償表先記自以文入沒

19. 溺米事錄事各畢願乞依事覺後(?)自首科結罪

18. 會日遣主簿不得稽留言如記科令

以下是臨湘侯相告核事掾文書:

13. 正月十八日臨湘侯相君告核事掾記識……

11. 以(?)表自首皆在真所覺(?)後(?)今聞訟愬勉重罪者

12. 不應為自首前已給罪自科正

9. ……

以下是右尉下書傳達中部督郵要求臨湘解表行軍法,并遣主簿到太守府白朱表案相關事宜的文書:

3. 右尉寫下書到亟促依書諦更據科正謫罪法

6. 府中部督郵移辛酉詔曰寫下度辭如牒又表以文入沒溺米事

5. 以今年正月廿日詣縣督繫曹遣吏張孟傳表以二月四日付臨湘錄

2. 事史潘真以三月廿八日承詔覆量中倉襍米以四月二日畢訖覓(?)得表所割

1. 解行表軍法當遣主簿詣府白狀縣在治下吏役不得

最後一份文書,是寬簡,位於揭剥圖-5、-6、-7、-8層。這些簡牘字迹大多漫漶不清,從内容看,應是相關部門“關中部督郵文書”内容。

47. 正月一日吏昌寫……錄事史……復考實吳昌長

45. 朱(?)表坐割還倉吏所領溢米一百七十斛……畢

39. 先自覺主者問縛繫自首不應為自(?)首表唯辭(?)皆為真所(?)覺(?)

44. 先繫自首未(?)覺若覺後對謂得更

43. ……見上

- 46.……記到……
- 48.……覺後不……乞□前□□□□解行表軍法……
- 49.□月 日關中部督郵…… ☒
- 50.……詣□右……
- 41.主簿□□ 省
- 40.嘉禾六年正月□□□日……
- 42.…… 右……
- 口紀……

因現存簡文有散落的情況，再加上文字漫漶，無法識別，以上初步整理祇是大致編排。但通過以上大致復原，我們還是能理清朱表盜米案的大致經過。

根據簡 24、45、47 可推斷，這份簡冊涉案人姓朱名表，任長沙郡吳昌長。朱表曾遣吏莽仁等到諸葛府君處，於此期間，割用一百七十斛沒溺米。因文人沒溺米事，朱表在嘉禾六年正月到縣自繫。^① 後由吏張孟於二月四日將朱表移送至臨湘錄事掾潘真處。潘真以三月二十八日覆量中倉，於四月二日完成核驗工作，獲得朱表割用的一百七十斛米的事實。四月九日，朱表供詞是將米給了以往的遺兵。但在四月十六（八）日，朱表更改之前的供詞。^② 朱表案結論是，朱表不是在未發覺前自首，而是在潘真核驗中倉事發覺後自首，當依事覺後自首對朱表軍法處置。

二 涓口倉

“朱表盜米案”還留給我們一些重要的歷史信息，如簡 16 中的“涓口”。在走馬樓其他簡中，“涓口”也有寫作“員口”。關於員口倉的地望，有兩位學者分別討論過。王子今認為“員口”之“員”，或即為“冑”，即涓水，一名易俗河。源於湖南雙峰蔣市街，北流，在湘潭北注入湘江的涓水，其與湘水合流之處，或許就是“員口倉”或“冑口倉”的所在。^③ 戴衛紅則認為，涓口在孫吳時期屬武昌郡，按其地理位置，在今湖北省武漢市東西湖區的新溝鎮。並認為吳國處於長江流域，為了運輸的方便，糧倉大多建在兩江相匯的江口。涓口處於涓水之口、漢水之濱，自然也成為天然的糧倉。^④

① 或是吳昌縣。

② 承認將米給莽等并自盜用了。

③ 王子今：《“烝口倉”考》，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 1 輯，武漢：崇文書局，2004，331 頁。

④ 戴衛紅：《長沙走馬樓吳簡所見孫吳時期的倉》，《史學月刊》2014 年第 11 期，96-97 頁。

我們贊同兩位學者的一致認識,即涓口不在臨湘。涓口邸閣“朱翻”在走馬樓吳簡中僅出現一次,屬孤例,而臨湘當地倉吏在吳簡中出現頻率是相當高的。

至於其方位,我們贊成戴衛紅的觀點,涓口處於涓水之口、漢水之濱。北京大學藏秦里程簡冊記載有“用船江、漢、員(涓),夏日重船上日行八十里、下百卅里,空船上日行百里、下百六十里。”^①可見,涓水與漢水、長江水系地域接近,亦證戴衛紅觀點更接近事實。但嘉禾年間“涓口倉”應不屬武昌郡,而屬江夏郡。要說明這一問題,必須討論孫權時期武昌郡的廢立問題。

關於孫吳武昌郡存在時間,歷代史志記載紛雜,莫衷一是。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二》:“(黃初二年),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爲武昌郡。”^②《元和郡縣志·江南道三》:“建安二十五年,吳大帝以下雒、尋陽、新城、柴桑、沙羨、武昌六縣爲武昌郡,黃武初,自建業徙都,廢。”^③《宋書·州郡志三》:“武昌侯相,魏文帝黃初二年,孫權改鄂爲武昌。”^④以上關於武昌郡建立的時間有二,一爲黃初二年(221),一爲建安廿五年(220)。陳健梅贊成黃初二年,孫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孫權徙都武昌時乃置武昌郡,武昌郡當爲京畿所在。^⑤以上說明,學者對武昌郡立郡時間分歧不大,黃初二年(221)孫權已立武昌郡并無疑義。

但武昌郡廢郡時間,學者觀點分歧較大。一認爲孫吳未省武昌郡。《晉書·地理志下》:“孫權分江夏立武昌郡,又分蒼梧立臨賀郡,分長沙立衡陽、湘東二郡。”^⑥後世地志多以晉志江夏武昌二郡并立,遂謂吳時武昌未省。二認爲武昌郡廢郡時間爲黃武初,如前引《元和郡縣志》。另,清人吳增僅據《晉書·王戎傳》王戎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率衆詣戎降,認爲武昌郡廢,江夏郡治武昌。又據《三國志·吳書·陸遜傳》等,赤烏七年(244)陸遜代顧雍爲丞相,孫權詔“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遜卒,諸葛恪代遜,權分武昌爲左右兩部,證明陸遜所領爲武昌都督,非武昌郡事,且陸遜所領三郡無武昌郡,進一步證明武昌郡省於黃武初。^⑦

① 辛德勇:《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冊的性質和擬名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7頁。

② 《三國志》卷四七,北京:中華書局,1982,1121頁。

③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七,北京:中華書局,1983,645頁。其校勘記曰:“‘黃武初’……此宜作‘黃初’”。

④ 《宋書》卷三七,北京:中華書局,1974,1127頁。其校勘記曰:“魏文帝黃初二年孫權改鄂爲武昌‘黃初二年’各本并作‘黃初三年’,據《三國志·吳志·吳主權傳》改。”

⑤ 陳健梅:《孫吳政區地理研究》,“廢武昌郡考”,長沙:嶽麓書社,2008,232頁。

⑥ 《晉書》卷一五,北京:中華書局,1974,454頁。

⑦ [清]吳增僅:《三國郡縣表附考證》卷八《吳荊州部》考證部分,刻本,4頁。

陳健梅補充 1955 年出土於武昌任家灣 113 號墓的黃武六年(227)鄭丑買地券“黃武六年十月壬戌朔十日辛未……江夏沙羨縣物故”,^①認為沙羨縣於黃武六年移屬江夏郡,進一步證明時武昌郡已廢。^②

在走馬樓吳簡中,“武昌”地名一般不是以郡名的情況出現,“江夏”地名出現不多,但却明顯是指郡名,如:

三人合爲錢二百一十萬五千其一百廿七萬五千各別在武昌安成建(總·陸·44982)

武昌□□軍督領□□□承書從事□□……(貳·1001)

□春江夏^③南郡宜都大守承書從事□□攝□□(肆·4487)^④

以上簡文中“安成”“武昌”并言,可見武昌不是郡名。江夏、南郡、宜都并列,可證江夏爲郡名。因而,孫吳嘉禾年間,並不存在江夏郡和武昌郡二郡并立。所以,我們認為吳簡中的涓口倉地望應當在涓水與漢水的交匯處,屬江夏郡。

三 諸葛府君身份猜測

本簡冊首簡提及的“諸葛府君”爲何人?兩漢三國地方郡級行政機構多稱作“府”,長官稱“明府”“府君”等。王素、王子今已列舉傳世文獻及碑刻中的諸多事例證明。^⑤我們再以《三國志·吳書》記載加以補充證明。《孫破虜討逆傳》裴松之引《吳錄》荊州刺史王睿稱孫堅爲“孫府君”,其時孫堅爲長沙太守。^⑥《三嗣主傳》裴松之引《會稽邵氏家傳》:“(邵)疇進(郭誕)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己,非府君罪。”^⑦邵疇面稱郭誕爲“明府”,與他人言稱郭誕爲“府君”,時郭誕爲會稽太守。《太史慈傳》

① 陳欣人:《武漢出土的兩塊東吳鉛券釋文》,《考古》,1965 年第 10 期。

② 陳健梅:《孫吳政區地理研究》,“廢武昌郡考”,232 頁。

③ “夏”字原未釋,此據圖版補。

④ 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長沙簡牘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⑤ 王素:《長沙走馬樓三國孫吳簡牘三文書新探》,《文物》1999 年第 9 期,47 頁;王子今:《居延漢簡所見“明府”稱謂》,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89-98 頁。徐暢也有相關論述,參見徐暢《走馬樓簡所見孫吳臨湘縣廷列曹設置及曹吏》,長沙簡牘博物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簡研究》第 3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292-393 頁。

⑥ 《三國志》卷四六《吳書·孫破虜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1097 頁。

⑦ 《三國志》卷四八《吳書·三嗣主孫皓傳》,1170-1171 頁。

太史慈對孔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①太史慈面稱孔融為“府君”，時孔融為北海相。可見“府君”之稱確多為郡太守或王國相。

“諸葛府君”無疑是對郡級長官的稱謂。《吳書·吳主傳二》：“（嘉禾三年）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楊太守，討山越。”^②又嘉禾六年，“諸葛恪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③嘉禾三年至嘉禾六年，諸葛恪為丹陽太守。所以，吳簡中提到的“諸葛府君”有可能就是時任丹陽太守的諸葛恪。

另外，簡 23 提到“道里長遠”，說明從吳昌前去諸葛府君處路途遙遠，應當至少跨越一郡的範圍。

再次，根據現存簡文，莽仁等前往諸葛府君處，經由道路如下。

據簡 23“換以中倉溢米”，說明從吳昌遣吏至諸葛府君處，莽仁等經過了中倉。走馬樓吳簡中的“中倉”常見，也稱作“州中倉”。針對其地望，學者有過相關討論。何佳綜合簡文、文獻及考古材料，推測臨湘縣依據本地特殊地理位置分設三州倉與州中倉於湘水兩岸。^④考慮還未發現湘水兩岸倉窖藏遺址，也有學者對州中倉的地理位置，持謹慎的態度。^⑤我們姑且不論州中倉的具體位置，從其在吳簡中出現的頻率而言，它們當均設在臨湘或其附近。因此可推斷，莽仁等從吳昌出發後，途經長沙郡郡治臨湘。

前文我們曾討論“涓口”在漢水和涓水的交匯處，屬江夏郡，地望接近武昌。不難看出，莽仁等詣諸葛府君，先西南行至長沙郡治臨湘，沿途再經江夏郡，輾轉進入丹陽。^⑥這條路徑雖顯曲折，但從水陸路交通的方便或其他特殊目的看，從吳昌至丹陽并非完全不可行。《漢書·武帝紀》：“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嶷。登灋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⑦武帝巡狩路線為：盛唐—灋天柱山—尋陽—樅陽，也是比較曲折，可以作為比照。

最後，本案卷涉案人朱表、朱渡亦為丹陽人，朱表遣吏至諸葛府君處，而諸葛恪正好為丹陽太守，或許這種巧合能說明一定的問題。

① 《三國志》卷四九《吳書·太史慈傳》，1187 頁。

② 《三國志》卷四七《吳書·吳主傳》，1140 頁。

③ 《三國志》卷四七《吳書·吳主傳》，1142 頁。

④ 何佳：《長沙走馬樓吳簡所見倉、庫及倉庫、庫吏的研究》，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編《簡牘學研究》第 4 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119-131 頁。

⑤ 戴衛紅：《長沙走馬樓吳簡所見孫吳時期的倉》，《史學月刊》2014 年第 11 期，第 98 頁。

⑥ 據 26 號簡文“換取南郡……”一語，我們懷疑莽仁等或許與南郡某人有过接觸，但是否途經南郡并不能肯定。

⑦ 《漢書》卷六《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196 頁。

綜上,本簡冊中的“諸葛府君”很可能就是孫權臨終委以大任的諸葛恪。另外,吳昌長朱表盜米案,這份留存較為完整的冊書,是認識三國孫吳行政程序的有益資料,值得進一步挖掘其中隱含的內在信息。

附記:本文被擬錄稿進行修改時,筆者適時正在組織“紀念走馬樓三國吳簡出土 20 周年長沙簡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務。其中陳榮傑女士和楊小亮先生提交給會議的文章與本文主題相似,均以“朱表案”為討論對象。特別是楊小亮先生在釋文訂正等方面與本文有許多結論不謀而合,因兩文并未正式公開,所以本文未參考引用,特此申明。另,感謝匿名評審給予本文很好的建議,在修改時我們已部分採納。

“帝國模式”的生成與演化*

——讀《秦漢軍制演變史稿》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崔建華

軍事問題對於歷代國家政權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不過,對於秦國而言,軍事問題的歷史意義非但重要,而且還十分特殊。如果說後世的軍事問題往往與週期性社會動盪及改朝换代密切相關。那麼,對於秦國而言,鐵血戰爭不僅使秦王替代了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更重要的是,秦國還經由軍事征服,建立起迥異於周代的集權統治模式,垂範後世長達兩千多年。從這個意義上說,孫聞博著《秦漢軍制演變史稿》(以下簡稱《史稿》),^①可謂從源頭上牽住了歷史演進的“牛鼻子”,從而使相關討論有力地推進了對秦漢歷史的微觀及整體認知。

所謂“軍事制度”,是一個內涵廣泛的概念,諸如武官制度、軍隊構成、集兵方式、軍事編制、後勤補給、裝備製造與管理、軍事設施與軍事交通、軍法軍紀等內容均可納入軍事制度的範疇。但《史稿》從特定的問題意識出發,摒棄面面俱到的常規做法,搭建了一個重點突出、個性鮮明的研究架構。

《史稿》主體共五章,內容依次為“武官制度的演進”“軍隊的構成與演變”“軍隊組建背

* 本文為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科研創新團隊項目“漢魏六朝帝制社會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① 孫聞博:《秦漢軍制演變史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景”“軍事征發”“軍事生活的制度史考察”。其中前兩章與第四章的主題，屬於習見的軍事制度範疇，而軍事制度的其他內容則沒有被納入研究視野。作者的選擇顯然有其特殊考慮。大致說來，在軍事制度的範疇內，後勤補給、裝備設施等內容，與硬件密切相關，主要為軍隊提供服務，屬於軍制體系中外緣性的因素。而武官制度、軍隊構成、集兵方式則不同，三者均圍繞着人的因素來發揮效能，關涉軍隊的領導、兵力的部署、民衆的役使，屬於軍制中的核心內容。通過對這三方面內容的探討，秦漢帝國集權體制對軍力、區域、民衆的控馭，無疑會得到更為直接、更為有力的揭示。

如果說《史稿》選取軍制中的三個主題為研究對象，體現其突出重點的寫作長處，那麼，第三章“軍隊組建背景”、第五章“軍事生活的制度史考察”，則彰顯了《史稿》的鮮明個性。作者對軍隊組建背景的關注，顯然是由於對軍事征發問題的思考而激起的。在以往的研究中，有關軍事征發的成果並不少，學界普遍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但作者特別指出，以往研究“多孤立地探討集兵方式，較少將此問題置於當時國家對社會群體人身役使的大背景下思考。而欲推進相關研究，直接而要緊的，是要首先弄清秦漢的社會結構、身份秩序。（第219頁）”此說將原本受到忽視的內容猛然提升到優先考察的位置，具有振聾發聵的效果。關於軍事生活，傳統的軍制史也很少將其納入研究視野。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軍中的生活情態往往受到制度的約束，軍事生活與軍制具有很強的關聯。作者認為從制度史角度來考察軍事生活，可以使軍制史研究“更為立體全面”（第307頁），這樣的學術判斷無疑會推進軍制史研究對象的延展。

在研究架構之外，《史稿》的研究視角與方法亦有顯著特點，首先是極為重視軍制在時段縱軸上的“演變”。以武官制度為例，傳統的研究偏於靜態，一般模式是列舉某朝代有某官，至於此官由何官演化而來，演化具體發生在哪個時段，為何演化，之後又在哪個時段演化為其他官稱，往往是史有明文則襲之，史無明文便闕略。《史稿》則不然，比如在探討文武兼宗的相邦一職時，作者指出，該職位是在爵官轉移的過程中出現的，其地位與爵官轉移之前的大良造庶長爵位相當。關於太尉一職，作者揭示，它的前身是秦國本土的邦尉，秦國在擴張過程中，新設之郡亦設郡邦尉，郡邦尉越來越多，倒逼秦國改本土邦尉為太尉，以區別於郡邦尉（第61-62頁）。再以邊地胡騎為例，作者不僅僅是指出漢代軍隊中胡騎的存在，還梳理出胡騎的地位與影響力越來越大的變化趨勢，並且對促成這一變化趨勢的原因進行分析。由此可見，《史稿》對軍制變化及其原因的分析，是極為重視的。

注重橫向的制度之間的相互影響，是《史稿》在視角與方法上的第二個突出特點。比如第一章第一節對爵官轉移與文武分職的討論，涉及到爵制與官制的關係。同章第四節對地方武官“邊地化”的討論，以及第二章第二節對地方武裝“郡兵”性質的穩定性的討論，均與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行政管理體制變革密切相關。第四章所關注的軍事征發，作者既然認為

該制度是以秦漢時代的身份制度為背景的,那麼,這一章的內容與秦漢身份制度之間的關聯,就是不言而喻的。在個別章節,即使所討論的并非軍制本身,但作者的思路仍然貫徹了制度關聯的精神。如第三章對秦漢軍隊組建背景的考察,討論對象并不直接屬於傳統的軍制範疇,但《史稿》從身份序列的角度指出:“以往探討秦及漢初身份秩序與社會結構,特別強調二十等爵”,“但功賞、刑罰相輔而成,秦及漢初的刑罰體系下,當時還存在數量較為可觀、身份相對穩定的徒隸、司寇”,“在刑罰等級、法律身份之外,他們所具有的社會身份、階層意義,同樣值得關注。”(第236頁)也就是說,作者認為爵位制度、刑罰制度雖然區別很大,但在身份序列中,有罪者與有爵者均有一席之地,實際上注意到了爵制與刑制之間的內在聯繫。

二

《史稿》對出土材料的應用水準特別值得稱道,充分體現了作者獨特的學術背景。因為有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的學習履歷,作者對以往研究使用文物考古資料的不足之處深有體會:“多以簡單引用已有研究成果,或離散提取相關簡文作輔助說明者為多。較少對簡牘帛書、璽印封泥、器物題銘、石刻資料及其他考古文物資料進行充分搜集與綜合分析。”(第29頁)有鑑於此,作者在討論過程中,特別注意文物材料的斷代、地域、語境等問題,從而獲得了大量令人信服的論斷。

文物斷代方面,比如關於爵名“大良造庶長”與官稱“相邦”的對應性,作者使用了一組關鍵文物,分別是秦封宗邑瓦書與“相邦繆游二戈”。前者銘文有“四年……大良造庶長游”,後者記有“四年相邦繆游”。作者推定,戈銘“四年”的具體所指,與瓦書中的“四年”一樣,均為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前334)。主要理由有:“1.銘文字體不早於孝公;2.形制為中長胡、寬闌、三穿均位於闌上,乃秦早期戈特點;3.瓦書記周天子致文武胙事與文獻記載一致,年代為秦惠文王前元四年,瓦書所記人名‘游’與此‘繆游’相合;4.秦惠文王後元稱王,目前所見後元時兵器,‘某年’前皆有王字,作‘王某年’;5.……廣州南越王墓出土有‘王四年相邦張義戟’。這顯示,秦惠文王後元四年張儀雖然在魏,却仍然為秦國相邦。”(第40頁)經此番詳細論證,作者對“相邦繆游二戈”的年代推定遂成不刊之論。由於瓦文與戈銘年代相同,進而便可以做出瓦文所謂“大良造庶長游”就是戈銘所謂“相邦繆游”的判斷,至此,爵稱“大良造庶長”與官稱“相邦”的對應關係也就自然而然地浮出了水面。

《史稿》對文物資料地域因素的關注也有突出例證。比如在論述地方武官的“邊地化”趨勢時,作者列舉了秦封泥所見大量郡武官,有郡司馬,如“東郡司馬”“臨菑司馬”“琅邪司馬”“南陽司馬”等。有郡候,如“琅邪候印”“城陽候印”“南郡候印”等。還有郡發弩、郡司空、郡輕車,如“衡山發弩”“琅邪發弩”“南郡司空”“四川輕車”等。根據武官資料的地域分

布狀況,作者得出結論,“上述武官在秦代地方各郡,或曾普遍設置”。至於西漢的地方武官,作者也對封泥、官印資料進行了廣泛搜集,如“長沙司馬”“膠西司馬”“濟南司馬”“菑川司馬”,以及“膠西候印”“菑川候印”“濟南候印”等。但作者特別指出,“這些均屬地方王國官印,而非郡(及所屬縣)印”。與內郡不見司馬、候等武官的情形相比,傳世文獻常見設於邊郡的司馬、候,如“天水司馬”“金城司馬”“(會稽)司馬”,以及張掖、酒泉“騎假司馬”,“酒泉候”“雲中候”等。作者的考證揭示了內地武職退縮而邊地武職得以保留且持續發展的歷史現象,這便是所謂的地方武官“邊地化”(第106頁)。觀察其論證思路,對考古材料地域因素的重視顯而易見。

至於對文物資料特定語境的關注,在《史稿》圍繞“徒隸”的討論中表現得十分明顯。作者注意到里耶秦簡J1(16)5、J1(16)6的記載:“(傳送委輸)必先悉行乘城卒、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貲贖責(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田時毆(也),不欲興黔首。嘉、谷、尉各謹案所部縣卒、徒隸、居貲贖責(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簿。”通過比對,作者發現這段文字後半部分的“徒隸”與前半部分的“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具有對應關係。也就是說,在秦代,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三者有一個專門的合稱,即“徒隸”(第239頁)。但是,學界此前習慣於將三者納入“刑徒”概念來進行研究,這樣的研究路徑存在較大缺陷。首先,秦及漢初的“刑”,特指肉刑。而在當時的司法實踐中,隸臣妾的附加刑多稱“耐”,實際上“多與‘完’同義”,並沒有受到肉刑處罰(第237頁)。因此,“徒隸”是無法等同於“刑徒”的,從“刑徒”的視角來觀察“徒隸”中的個別身份,易於造成誤差。其次,一些學者在研究中所使用的“刑徒”概念,現代色彩頗濃,甚至與秦及漢初所謂的肉刑之“刑”也不相符。這個意義上的“刑徒”,其涵蓋的身份已遠超古人所謂“刑徒”,更遠超秦及漢初的特定稱謂“徒隸”。視域過於寬泛,往往導致徒隸內部各身份之間的差別難以得到層序井然的深入探討。而《史稿》第三章第二節緊守秦及漢初特有的“徒隸”概念,細緻入微地分析了其內部隸臣妾與城旦舂、鬼薪白粲的差別,有力推進了對秦漢身份制度的深層次認知。

再如《史稿》對“徭戍”的辨析。過去,學界常使用“徭役”一詞,而具體用法不一。有的認為是指土木工程、轉輸漕運、手工業生產等勞動內容,在含義上與兵役對立;有的則認為,秦漢時期“力役與兵役的觀念分得不甚清楚,統稱之為繇役”。不管如何理解,總之,“徭(繇)役”是以往研究中慣用的概念,並不是秦漢時代的特定稱謂。而作者強調,欲透徹地研究秦漢時代的勞役、兵役問題,“首先需立足當時人的使用習慣,把握當時人的表述內涵”。正是在此種理念的主導下,作者決定,“據秦及漢初的出土、傳世文獻,與‘徭’連稱的往往是‘戍’,作‘徭戍’。”“這裏遵從當時人的觀念、習慣,而使用‘徭戍’一語”(第265頁)。在此基礎上,《史稿》對徭、戍分別進行細緻考索,指出秦及漢初的“徭”有廣狹二義,廣義以“受差使而外出服役”為特征,根據受差使對象的差異,會出現“奴徭”“吏徭”等不同情形。狹義的

“徭”主要指“月爲更卒”，即成年男子每年服役三十天。至於“戍”，有“屯戍”“更戍”“冗戍”“罰戍”“謫戍”等多種。相關考證因充分觀照了秦漢時代的特定語境，可信度很高。

三

在《史稿》的“後記”中，作者感言：“秦漢社會的歷史發展實深受軍制影響。能否從軍制演變的探討中對帝國確立的變革意義，西漢、東漢間的社會變動增進認識，是我感興趣的方面。”（第437頁）這個表述比較隨意。在書稿的“緒論”部分，作者曾對寫作意圖有更爲嚴謹的說明：“秦政的確立及向漢政演變，實際體現着‘戰國模式’向‘帝國模式’轉型的探索與嘗試。而這其中，軍制變化是一條重要綫索。”不止於此，帝國建立之後，還存在一個從“軍國體制”向“日常行政體制”演進的過程，作者認爲，欲理解這一過程，秦漢軍制研究仍是一個“基礎的方面”（第3頁）。

無論“西漢、東漢間的社會變動”，還是帝國從“軍國體制”向“日常行政體制”演化，實際上都屬於“帝國模式”成長發育的內容。那麼，《史稿》對秦漢軍制演變所做的研究，對我們理解秦漢時代的“帝國模式”，可以有哪些啓發呢？閻步克曾主張，自秦以來的歷代政體不妨貼以“集權君主制”的標籤，以替代之前常用的價值色彩濃鬱的“專制”一詞。因爲這個概念可以象“專制”一樣，揭示“周代政體跟帝國體制的重大差異”，同時又去除了“專制”概念當中的價值判斷。^①依照這個看法，所謂“帝國模式”的核心內涵就應當是“集權君主制”。由“集權君主制”出發，結合對《史稿》的閱讀體會，筆者認爲，所謂“帝國模式”，至少可以在軍權集中、地方掌控、民衆役使這三個方面得到解讀。

先談軍權的集中。《史稿》第一章先從爵官轉移的角度來認識“官員”稱謂的變化，認爲秦國最高官員的正式稱謂從“大良造庶長”變爲“相邦”，標志着“官僚組織頂端由爵官不分、以爵統攝，逐步向爵官兩立、以官定位發展”（第41頁）。但此時的“相邦”以及不久後出現的“丞相”，似乎還不能稱之爲“武官”，因爲他們職任的基本特征是“權兼文武”，除了領兵征戰，還有治國理政的重要一面。真正比較純粹的武官是將、尉，他們由大良造庶長以下仍處於庶長爵級的人擔任。^②

從後來的發展趨勢來看，丞相的軍事指揮權被剝奪，由地位稍低的尉官演化而成的太尉，被指定爲最高軍事官員。進入漢代，太尉或罷廢，或雖設而不掌實際軍務，軍權轉入中朝

^① 閻步克：《政體類型學視角中的“中國專制主義”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② 按《史稿》的說法，所謂“庶長”，“很可能是左右庶長以上諸庶長爵的泛稱”。就後來形成的二十等爵而言，指的是第十至第十八級爵，即左庶長、右庶長、左更（庶長）、中更（庶長）、右更（庶長）、少上造（庶長）、大上造（庶長）、駟車庶長、大庶長。參見《史稿》51頁。

將軍手中，因為中朝將軍的擔任者“多皇帝親信與外戚，背後一定意義上凸顯皇權的擴張”（第64頁）。隨着中朝將軍輔政論議的職能逐步加強，其軍事色彩日益淡化，作為宮廷宿衛重要力量的諸校尉、中郎將系統獲得了巨大發展空間，逐漸成為國家對外征討、屯駐監護的主要執行者，以及中央權力向邊地擴張、輻射的重要工具（第69頁）。

透過《史稿》對戰國秦漢時期軍事權力轉移過程的梳理，讀者可以清晰地看到，集權君主把控軍事權力的政治企圖從來都沒有停止過。戰國秦漢如此，後世莫不如此。

帝國模式中的地方控馭，也能够展現集權君主的持續探索。先看邊地防禦，君主當然具有鞏固邊防的強烈意願，在帝國孕育的過程中，秦國不斷開拓“新地”，當時已大量存在常規屯戍與移民實邊兩種情形。但秦漢大一統帝國建立後，“因幅員廣闊，民衆戍邊行程大為增加，供輸補給的成本亦遠超先前”（第178頁），因此，在民衆常規戍邊之外，徙民實邊策略受到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而邊地胡騎、歸義羌胡的使用，實際上也是秦漢帝國因應邊防事業給邊郡、內地造成的種種壓力，而探索出的新的邊防策略。祇是這一策略在為王朝減負的同時，也潛藏着危機。東漢時期北邊防綫大幅收縮，即便是曾為天下重心的三輔地區，也“逐漸蛻為邊地”，這種邊防新形勢的出現，即與邊地民族的持續內移密切相關。

再看帝國對內郡的控制。根據《史稿》所揭示的地方武官“邊地化”趨勢，內郡武官種類越來越少，與此相應，內郡的軍事色彩也越來越淡化。雖然內郡仍維持有一定的兵力，但郡兵“一般祇在郡界範圍內活動”，表明中央對地方兵權的矛盾心態，一方面認識到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又顧慮重重。所以，在地方行政體制從郡國到州郡的變化過程中，“‘州’一級的軍事作用愈受重視”，中央似乎有意在郡兵之上疊加一個控制層級。但在實際的軍政運作中，由於軍隊的兵士選拔、訓練校閱及調動指揮，多由郡長吏負責。因此，“地方兵的構成與性質相對穩定，仍然屬於郡兵”（第174頁）。這實際上反映一個問題，即中央與地方權力關係的調整，時常遭遇一些現實困境。

由帝國對邊地防禦、內郡管控策略的調整可以看出，所謂“帝國模式”固然有比較恒定的內容，即追求權力的集中。但歷史很複雜，“帝國模式”的成長並不是直綫式的，要應對很多始料未及的新情況。

至於集權君主制對民衆的役使，在戰國秦及漢初，主要依靠身份制度來實現，無論刑徒亦或有爵者，均通過不同等差的權利與義務，依附於國家。但隨着西漢政權轉入守成階段，文帝建立刑期制，刑徒“有年而免”，其等級身份的色彩漸淡。與此同時，爵制原先具有的名田宅、傳、免勞等權益亦“逐漸從爵制脫離，爵制的實際功能下降”（第238頁）。這勢必導致帝國對民衆的役使能力降低，從而出現兩漢間集兵方式從征兵為主向募兵為主的轉變。

但在民衆管理方面，秦漢國家何嘗不想加強集權呢？最近，有學者初步表達了一個觀點，認為秦漢至隋唐間對基層統治的重心發生了鄉—縣鄉—州縣的上移過程。而秦漢統治

重心之所以沒有上升到郡一級,戶籍書寫載體過於笨重,應當是一個重要因素。祇要條件許可,秦漢國家就會有強烈的衝動,將統治重心向上提升。^①此說實際上揭示了秦漢帝國科層制管理的困境,即中央權力在向基層傳導的過程中,因為現實條件的制約,出現了梗阻現象。這些現實條件,除了書寫載體以外,可能還包括資源總量、戶口繁衍、官僚及民衆自身利益等多種複雜因素。

儘管由於條件所限,秦漢國家行使對基層民衆役使與管理權力的重心仍止於縣這個層級。但《史稿》告訴我們,秦漢時代內地兵力的“郡兵”性質具有穩定性,這又從另一個側面表明,秦漢國家圍繞着加強對基層民衆的役使,曾經做出了努力,並且取得了成效。但是,當國家謀求繼續提升管理重心的時候,又是不成功的。由此亦可見,帝國模式在其成長過程中,並不總是勝利者,在現實面前,遭遇挫折,曲綫發展,是常有的事。

四

作為一部近五十萬字的著作,《史稿》取得了豐富的新認知。不過,也有個別論述或判斷似仍有討論的餘地。在本文最後,筆者謹將個人看法陳述於下,不妥之處,還請作者及學界同仁批評。

一、《史稿》對隸臣妾身份消亡原因的分析,或可進一步充實。作者注意到罪徒序列中的隸臣妾在秦漢時期逐步走向消亡的歷史現象,關於其原因,作者認為與漢文帝刑制改革有關。隸臣妾“具有官奴婢特征”,在秦及漢初的身份系統中,原本與私人所屬的“人臣妾”“人奴婢”等私人奴婢的“對應性較高”。並且在一般情況下,二者均為永久性身份。“文帝相關改革‘屬於結構性的變動’。司寇、徒隸‘有年而免’,使舊有身份結構開始發生變動。官、私奴婢雖依然存在,但私奴婢却不復與隸臣妾、收人對應。由於以往同私奴婢地位相當的主要是隸臣妾。伴隨後者刑期一併轉為有期,二者身份不匹配情形就顯得尤為突出。刑罰序列在後續演進中特將隸臣妾等級取消,或緣此故。(第260頁)”所謂“身份不匹配”,是指在文帝改革後,“人臣妾”等私奴婢仍然是永久性身份,而隸臣妾却由永久性身份變為暫時性身份,兩者的對應性大大降低。與此伴生的結果是,“隸臣妾”稱謂也失去了“臣妾”永久依附主人的原始意涵,成為名不副實的一個身份概念,將其取消祇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作者的解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個名不副實的概念,其生命力通常比較脆弱,自然容易消亡。不過,還有一個因素,或許也應當納入考慮範圍,即文帝刑制改革之後的身份銜接

^① 張榮強:《中國古代書寫載體的演變與基層統治重心的上移——以戶籍文書為例的考察》,陝西師範大學第十屆“西部大講堂·歷史學論壇”第四講,2016年7月12日。

問題。在秦及漢初的徒隸中，隸臣妾雖是官奴婢，但自由度較城旦舂、鬼薪白粲要高，除了官府永久役使的特征之外，其實際地位與庶民比較接近。^①而在庶民群體的底部，存在着居費贖債等在一定時段內接受官方役使的群體。在秦代罪徒身份永久存續的情況下，隸臣妾與暫時性役使的群體之間原本是不可逾越的，但文帝允許“有年而免”，將隸臣妾也改爲了暫時性役使。於是，隸臣妾在庶民中找到了同質群體。當原本地位相鄰的兩個群體出現同質化趨勢時，其中某一稱謂的消失也就不足爲奇了。^②

二、《史稿》的個別論證在邏輯上尚有繼續完善的空間。如關於秦國相邦、丞相是否并置的問題，總體感覺，作者比較謹慎，始終未明言“是”與“否”，但從其論述中可感覺到，作者更傾向於秦國相邦、丞相不并置。其理由有兩個：

首先，文物中有一件被稱之爲“昭王八年漆豆”的器物，其銘文中出現了“八年相邦薛君”“八年丞相受”。按照秦國工官生產制度，如果相邦、丞相是并置的，相邦薛君、丞相受的職位、名字應當一次刻寫完整，寫作“相邦薛君丞相受”。然而，漆豆的全部銘文是由兩條長銘文構成的，“相邦薛君”與“丞相受”的刻寫並不連貫，而是隔開的，分別位於兩條長銘文的起首部位。並且“兩條長銘的文字寫法有別，非出自一人之手，當是兩次刻寫”。可見，薛君的相邦之位與受的丞相之位不是同時存在的。

其次，文獻記載，秦昭王九年時“薛文以金受免”。“金受”即銘文中的“受”。此人在秦昭王七年時擔任左丞相，屈居右丞相奂之下。次年，奂免職，受仍爲丞相，而孟嘗君薛文入秦任相邦。那麼，受爲何非要將薛文拉下相邦之位呢？作者有這樣一段話：“按，受在七年居奂下，如八年仍任相，改居孟嘗君下，並不致與孟嘗君構釁，進而向秦王進言，奪其相位。”（第48頁）也就是說，受之所以構陷薛文，是因爲在奂免職之後，自己已是秦君之下職位最高的人，而薛文入秦之後，由於相邦、丞相不并置，受的丞相一職便被褫奪。假如秦國制度允許相邦、丞相并置，那麼，不管是免任右丞相，抑或是薛文任相邦，受都是秦國第三號人物，地位既然平穩，他也就沒必要構陷薛文。簡言之，由受構陷薛文的事實可推知，相邦、丞相二職是相互排斥的，不并置。

筆者以爲，昭王八年漆豆銘文中“相邦薛君”與“丞相受”分開刻寫，其原因還有其他可能性。比如器物製作過程中，掛名的監造者原本是祇有丞相受，然而，在製作過程還未結束

① 《漢書》卷二三《刑法志》記載，文帝刑制改革後，“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由重刑降等而來的隸臣妾，一歲後直接升爲庶人。至於原本即爲隸臣妾的刑徒，文帝刑制改革又規定：“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1099頁）雖然要經過司寇階段纔能升爲庶民，但據《史稿》的研究，“秦及漢初，司寇屬國家編戶，籍附縣鄉，可單獨立戶”，在權益上與庶民并無大的差異，祇是“課役不同於百姓，在尉、獄等機構從役”（第243頁）。由此看來，隸臣妾在身份序列上與庶民相銜接，仍無太大異議。

② 甚至可能存在兩個稱謂皆消失的情形。西漢中期以後，在一定期限內接受役使的居費贖債、隸臣妾都消失了，其替代刑名很可能是“復作”。詳情可參看崔建華《西漢“復作”的生成機制及身份歸屬探討》，《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2期。

的時候，薛文入秦任相邦。此時秦政權的高層變動可有兩種趨向，一是相邦、丞相不并置，罷丞相而專任相邦薛君，薛君的名字自然要出現在器物上，但由於已遭罷免的爰畢竟亦曾負有監造之責，故而掛名“丞相爰”的舊刻得以保留。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可能性，也不容忽視，那就是相邦、丞相可以并置。在此情況下，薛君來則來矣，並不一定導致爰的丞相之位被免。器物造畢，相邦、丞相應一并掛名，不過，爰既已掛名，如果再刻“相邦薛君丞相爰”，難免重複。為避免重複，另刻僅掛名“相邦薛君”的銘文，亦是理解的。

漆豆銘文不能確證相邦、丞相二職的互斥，“薛文以金受免”的文獻記載亦複如是。作者由激烈的人事鬥爭反推兩個官位不并置，但政治鬥爭往往是極為複雜的。制度上不允許兩個官職并置，一個人任職，導致另一個被奪職，固然很容易引起失勢者的反擊。但若制度允許兩個官職可以并置，政治傾軋也是經常存在的。即便官位較低者本身並不具備擔任高職的條件，也不妨礙其出於某種目的，積極構陷官位高者。這種情形其實並不鮮見。

三、《史稿》對個別引文的理解，或許可以更靈活一些。如《漢書·溝洫志》“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的“著”，之前有學者將這句話解釋為“治河的役夫因有功而得到‘著外徭六月’的獎賞”。作者對此有不同看法：“秦漢賦役涉及‘獎賞’義，除使用‘賜’外，多用‘除’‘復’‘復除’等語。而‘著’似無此義項，而多作登記、記載解”。這裏“理解作‘折抵’，似更合適些。（第286頁）”筆者以為，“除”“復”“復除”的原義其實亦非獎賞，而是免去、報償的意思。但在皇帝詔令文書的特定語境中，從政令發布者的角度來看，他們自認為是對臣民的恩賞。最典型的例子，比如漢文帝曾下詔“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①不過是免除田租而已，民衆實際上沒有從政府那里額外得到什麼，但在文書中的用語便是“賜”。至於《溝洫志》中的“著”，無論是直譯為登記、記載，抑或引申為“折抵”，都是正確的。但就皇帝發布這道命令的語境而言，應當是有獎賞、優待的感情色彩的，這與緊扣文句的理解並不衝突。

^① 《漢書》卷四《文帝紀》，118頁。

“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系列活動: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袁雅潔

2016年8月17-18日,由甘肅省文物局主辦,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西書局等七家單位承辦的“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系列活動——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蘭州召開,這是繼1991年和2011年蘭州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後在甘肅召開的第三屆國際性簡牘學研討會。來自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和內地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120多位簡牘學專家學者參加了本次研討會,此次會議共收到論文90篇。與會代表圍繞20世紀以來出土的簡牘帛書等相關文獻資料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展開熱烈探討,交流最新研究成果,發表學術見解,共同瞻望簡牘學的發展前景。此次會議與會學者提交的論文數量眾多,涉及面廣,本文主要從以下五個方面對此次研討會所提交論文進行綜述。限於學識,不妥之處,還祈方家批評指正。

一 絲綢之路歷史文化與西北漢簡研究

甘肅在絲綢之路上有着不可忽視的地位,本次會議上有數篇關於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的主題報告和論文。林沅《絲綢之路開通以前新疆地區的交通道路》依據近世以來的考古發現,詳細論證了在絲綢之路開通以前,新疆地區物質文化交流的具體路線,分別是額爾齊

斯河、諾姆河、伊黎河三條路線,這對我們重新認識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葛承雍《敦煌懸泉漢簡反映的絲綢之路再認識》參照懸泉漢簡的記載,分別探討了驛站里程路線、中西文化物質交流過程中西域胡人的身份、相貌以及與漢庭交流的物品。根據懸泉漢簡的相關記載,得出官方勘驗護送西域來客是一站站接力不斷,並且西域來客以官方使節與民間客商混合為代表,進行商貿來往、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豐富了漢代絲綢之路中西交流內容。雍際春《絲綢之路北新道的開闢與北道的形成》着重分析了自西漢意欲開通新北道始,車師後部首開車師古道與新北道,東漢通行新北道,開闢伊吾道,為北疆交通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及至隋唐一統王朝對西域統禦能力的強化,絲路北道不僅迅速貫通,而且逐步成為絲路諸道中最為重要的幹道。以此為例可以看出歷代對西域的有效管理及其絲綢之路各道的開拓經營,是一個中原王朝逐步深入、強化和拓展西域的過程。劉再聰《“徑易之路”——絲綢之路靖遠段的開通與演變》探究了絲綢之路靖遠段自張騫始至明清的發展演變過程,文中提出並着重分析了絲綢之路靖遠段是處於漢唐京師西安通往河西重鎮武威一綫之樞紐地段。楊富學、劉源《佉盧文簡牘所見鄯善國絲織品貿易》整理了佉盧文簡牘中的絲織品記載,着重分析了絲織品在鄯善國被作為個人財產、等價交換物、薪酬、稅費、罰款、禮物等,認為漢晉時期地處中亞十字路口的鄯善國,商品貿易發達,伴隨着絲路沿綫諸國的轉運貿易,中西物品、文化交融於此。顏亮《媒介傳播視域下的印度——于闐影響因素分析》從媒介傳播的角度討論了佛教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路徑,着重分析了佛教從印度傳播至于闐的過程及影響。認為“大西天”的印度作為傳播主體與受傳主體“小西天”于闐,兩者之間因為佛教這一文化媒介有了諸多交流與融合。

西北漢簡是本次討論會的熱點,討論話題中既有對單個出土地漢簡內容、形制的考證,也有對西北漢簡綜合性的研究,所涉及的議題相當廣泛。

(一) 西北漢簡綜合研究

這部分研究多以西北漢簡為研究對象,却並不僅限於具體某一處的漢簡做討論,研究的內容也很豐富。張德芳《近年來甘肅漢簡整理研究的新成就》着重介紹了《肩水金關漢簡(壹一伍)》和《甘肅秦漢簡牘集釋(壹一柒)》整理研究的過程和新收穫,同時談到計劃對懸泉漢簡、部分敦煌和地灣出土的漢簡展開整理工作。胡永鵬《西北邊塞漢簡中曆日的整理與研究》對西北漢簡中的曆日類別進行了歸納,同時整理了曆日中的內容,對部分曆日進行年代考證,加深了我們對曆日類簡的認識。陳玲《漢簡所見“見徒”身份探微》認為“見徒”既不是指不從他處調遣的現有之徒,更非無期徒刑,而是指那些觸犯刑律、已被判刑、正在服勞役的刑徒。王文濤、苑苑《關於漢代西北地方傳置的幾個問題》探討了河西四郡傳置的設置和間距,對傳置內部建制、職能及傳置人員展開討論。王文濤、苑苑《漢代西北傳置的傳馬和傳

車》比較了居延漢簡和懸泉漢簡中的馬匹,發現傳馬中母馬比例最小,較多使用的是去勢的公馬。傳馬的年齡也普遍較大。并且全部被刺上記號,傳馬有定額,不足可用私馬或騎馬補。在整理了懸泉漢簡中關於傳車的記載之後,得出傳車既有輶車送信,又有其他車輛載人。同時傳馬與傳車的管理與使用之責都歸廐。凌文超《西北漢簡中所見的“庸”與“葆”》主要依據肩水金關漢簡,對西北漢簡中的“庸”與“葆”再次進行考析,認為“庸”是代役制下的身份稱謂,體現了公的一面,而“葆”則是隨從本主服役的雇請者的身份名詞,反映了私的屬性。高榮《西漢居延郡縣建制考》認為從宣帝至新莽時期,居延不僅有居延縣,還曾設居延郡。在肩水都尉府轄區,還曾設過肩水縣和肩水郡。賈麗英《西北漢簡所見民爵分布與變遷》以肩水金關漢簡為主要研究對象,又參考張家山漢簡、居延漢簡等,認為公大夫與官大夫爵等差別弱化,附於爵的權益呈現上從下靠之勢,漢中期以後或在爵的授予中有區域性規定,最終成為繼“公卒”之後,被簡化的第二和第三個爵稱,時間大約在東漢中期或更早。張俊民《西北漢簡中“海廉渠”初探》主要依據懸泉漢簡,考證出“海廉渠”或稱在“玉門塞外”、或稱在“敦煌塞外”,當與史書所言辛武賢“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西,欲通渠轉穀”一事有關。白軍鵬《由“田章簡”談田章故事的演變》認為《呂氏春秋》《韓非子》等文獻記載的齊桓公時的“弦章”在漢代簡牘中演變為“田章”,《晏子春秋》的整理者又將本為桓公時人的弦章附會至景公時。魏德勝《西北屯戍簡牘中身高表達》發現在屯戍簡牘中,“高”用於馬等牲畜身高的描述,“長”則用於人的身高,從不混用。趙蘭香《從出土文獻看漢代河西邊塞官吏的出行活動》將河西官員的出行分為普通公務出行、郵驛出行和巡邊行塞出行三類,並認為官員的出行也存在明顯的等級差異。周艷濤、周序林《西北屯戍漢簡中的“居令延印”現象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認為西北屯戍漢簡中“居令延印”的讀序應為右上起橫讀,表明漢代官印印文讀序的主流雖是“右上起豎讀”,但尚有非主流印文讀序的存在,而武帝時的兩次官印改革很可能並沒有涉及到印文的讀序,這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這些非主流印文讀序以生存的空間,這也可以得到現存官印及封泥實物的證實。沈剛《簡牘檔案文書所見秦漢時期的“庫”》對秦漢時期庫的功能、體系及流變等問題做了考察。從里耶秦簡提供的信息看,秦代縣“庫”最基本的功能是武庫,用以收藏、修繕及轉運武器。西北漢簡反映出邊塞軍政和民政體系中均設置有武庫,而且庫吏通常可以兼行同級行政機構的職事,而武威郡下的姑臧庫是輻射數郡的武器集散地。秦漢時期的“府庫”與“武庫”有職能區別,府偏重於儲錢,庫偏重於甲兵,不過二者在管理上合二為一。謝坤《算術與行政——從西北漢簡看算術在邊塞地區的實際應用》通過討論西北屯戍漢簡中的戶籍管理、勞務分配、俸祿發放、財物借貸、物資統計、郵書傳遞等行政記錄與算術實際應用的關係,得出西北屯戍漢簡中的算術類文獻可視為漢代算術與西北邊塞行政互相滲透、相互結合的產物。

(二) 居延漢簡與居延遺址保護研究

居延漢簡一直是西北漢簡研究中的熱點話題。何茂活《居延漢簡所見燧名命意證解》(一)和(二)兩篇論文主要選取《居延漢簡甲乙編》和《肩水金關漢簡》(壹至叁)的部分燧名,予以分類證解,同時對少數釋讀有分歧的燧名作了形義方面的考辨和訂正,發現這些命名方式都突出體現了守邊禦敵的主題。白海燕《讀居延新簡零識》考析了簡牘中的“臧內”“兵內”“炊內”“臧中”,認為它們的構詞方法相類似。李迎春《西漢後期河務與清河郡行政變遷——兼論漢郡職能與都尉執掌之關係》以居延漢簡為基礎,探究得出西漢後期清河郡主要承擔治河職能,清河都尉也轉以治理黃河為基本職責。着重討論了西漢地方行政在“共通性”下所具有的獨特一面。楊永生《對居延遺址金塔段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的歷史辨析》從居延地區歷史沿革和居延遺址文物保護的現實文本入手,將居延遺址分為甘肅省金塔縣和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兩段,“三城一關”遺址(東大灣城、西大灣城、地灣城、肩水金關)應屬於金塔縣管理段。

(三) 肩水金關漢簡研究

此次研討會舉辦前,肩水金關漢簡的整理工作也宣告結束,作為這次會議的重要主題,參會者有着熱烈的討論。侯旭東《漢代西北邊塞它官兼行候事如何工作?——從肩水金關漢簡一封病書說起》(討論稿)考察了漢代邊塞兼行候事的情況,認為候暫時離署,需任命官吏兼行其職,通常會任命候官障城之外某機構的官吏兼行候事,此時候官依舊是文書的集散中心,祇不過利用原有的郵路將中心收到的上行文書先轉送到兼行者駐地,處理完留在兼行者駐地,若需繼續上呈,則先送還候官駐地,并再沿用原先的正常途徑上呈。一些要逐級下發的文書(詔書與移文),則直接由候官書吏循制度抄寫下發,但均需鈐兼行者的印來封緘。兼行候事的考察有助於認識漢代行政制度的運行機制。姚磊《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札記》依據簡文內容和簡牘木質紋理對《肩水金關漢簡(肆)》中的殘簡作了綴合,共綴合十枚簡牘。袁延勝《肩水金關漢簡家屬符探析》認為家屬符中記載的家庭以3-4人的核心家庭居多,但有的隧長、候史等家庭規模比較大,家庭關係較為複雜,這些家庭應該是以“宗親”或近親觀念組合起來的不完全的“臨時家庭”,并非戶籍意義上的一戶。“家屬符”的性質應該屬於出入關津所用之符。它應該是由橐佗候官與肩水金關共同製作、頒發的。郭偉濤《肩水塞東部候長駐地為A32遺址考》通過梳理A32出土的有關記載東部候長的簡文,考證得出A32是個複合型遺址,不僅駐有金關、通道厰、驛北亭,而且是東部候長的駐地。可能東部候長最晚始於地節四年、一直到居攝二年均駐於A32遺址。大約自陽朔四年始,肩水候的駐地也由A33(地灣)遷於此地。劉樂賢《讀肩水金關漢簡札記兩則》考察了漢簡中的熒惑占卜的簡文,認為西北漢代邊塞遺址的漢簡中已有星占文字。而漢簡中的玉德學說,與《說文解字》中的玉德說相一致,有助於重新認識《說文解字》的價值。趙寵亮《金關漢簡所見“囚錄”初探》

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結合,認為肩水金關漢簡中的“囚錄”應為郡縣等監獄有關囚徒統計的簿籍類文書。同時考析了邊塞屯戍機構中刑徒的種類、承擔勞役的種類以及來源問題。侯宗輝、王旺祥《肩水金關漢簡中的“作者”》認為漢簡中的“作者”主要是對漢代雇傭關係下短期的雇傭勞作者的一種專門性稱呼。魏振龍《肩水金關漢簡所見過所文書種類初探——兼論門亭的作用》以吏民所申請前往目的地不同,將過所文書分為內郡前往河西邊郡、河西邊郡之間往來以及由河西去往內郡三種;又根據過所使用者的不同,亦可分為公用—通知形式的過所和私用—路證形式的過所。同時認為門亭對於區分過所文書種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這種作用並非是絕對的,有時也會存在特殊情況。張英梅《〈肩水金關漢簡(四)〉所見太常郡及陵縣問題思考》認為西漢存在太常郡稱謂,且太常郡轄區為非封閉式政區形態。太常轄陵縣的發展演變過程,反映出漢人對陵縣的認識經歷了不同的階段。馬智全《肩水金關漢簡關嗇夫紀年考》考證了肩水金關漢簡中記載的 16 名關嗇夫的生活年代,另有 5 位關嗇夫年代不詳。趙爾陽《小議〈肩水金關漢簡〉中的地名“熒陽”》認為“熒”字在兩漢當從火,“熒陽”為標準寫法。在其另一篇《小議〈肩水金關漢簡〉中的濟陰郡、濟陶郡》中,趙爾陽考證了漢簡中的濟陶郡、濟陰郡,認為肩水金關漢簡中稱濟陶郡之簡,皆為昭帝至宣帝甘露二年(前 52)之前簡;稱濟陰郡簡的時間範圍為黃龍元年至河平四年(前 49—前 25)或建平二年至王莽時期(前 5—9)。故而贊成甘露二年前的濟陰郡名為濟陶郡的觀點。肖從禮《讀西北漢簡札記三則》結合西北漢簡,認為西北屯戍中存在河中布天田的現象。肩水金關漢簡中記載的“錯田”與新莽政權在始建國四年(12)廢除王田制,允許天下田地可自由買賣有關。推測西北漢簡中的“平斗”與傳世文獻中的“平斗斛”“平斗桶”所言為一事。韓華《肩水金關遺址所出封檢形制小考》就肩水金關漢簡中 27 枚封檢的形制根據封泥槽的不同分為四類,並分別進行考證,發現文書類封檢多於實物類封檢。

二 秦漢簡牘文獻與秦漢歷史文化研究

此次會議除討論西北漢簡之外,學者們還將秦簡、漢簡相結合,結合傳世文獻的記載,綜合探討秦漢歷史問題。于振波《秦漢校長考辨》認為出現在秦簡和漢初簡牘中的校長,其職責雖與亭長相似,却不是亭長,而是亭長的上級官吏。校長的秩次為有秩,可管理相鄰的若干個亭。西漢中期以後,校長的職責被游徼取代。游徼是縣吏而非鄉吏,其秩次比校長略有下降,為斗食之吏。亭長在秦、漢時的職責和秩次並無明顯變化。李炳泉《西漢衛將軍考論》認為衛將軍最早置於秦漢之際的趙氏趙國。漢高祖、文帝僅在政局不穩時設置,事畢即罷。景、武、昭三朝,由於皇帝不親征,故不置衛將軍。宣、成、哀三朝所置衛將軍,加“大司馬”號,

并兼領尚書事“輔政”，從而取代丞相，成為國家最高權力中心的要角之一。西漢後期則多用外戚寵臣充任。孫富磊《秦漢郡卒史設置考述》結合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證明漢初郡府卒史的設置源於秦朝，且是郡太守府中的一類屬吏。漢中後期至東漢郡府卒史的設置沿續了漢初，并有所發展，出現了文學卒史。臧知非《簡牘所見秦和漢初田畝制度的幾個問題——以阡陌封埒的演變為核心》結合簡牘材料考察，認為商鞅變法的授田制所施行的長條畝制和阡陌封埒制度是對周制的繼承和發展，農民所受之田，實際上包括了原來自墾地，自墾地不足百畝，由官府授足。官府授與農民的并非已墾良田，而是可墾未墾之地，農民受田之後，即要繳納額定的田稅。所以授田制的目的是以授促墾、以授保稅，以實現“富國”目的。為了“富國”，沃野良田則由官府直接經營，采用傳統的長條畝及其阡陌封埒制度，成為歷史的邏輯發展。後來，隨着農具的改進、耕作方式的變化和生產效率的提高，耒耜、耦耕逐步退出農耕領域，長條畝制為方塊田所取代，是田畝制度的自然發展。張榮強《“小”“大”之間——戰國秦漢課役身分的演進》認為戰國後期的秦國是根據身高、年齡并用的標準劃定課役身分，按身高劃分的“小”“大”祇是一級課役名目；“小”之下設有按身高劃分的“作”和“未作”，“大”之下至少有按年齡劃分的“免老”。參照睡虎地秦簡與里耶秦簡，推測當時民衆與刑徒的課役標準一致。漢代初年開始出現兩套課役身分體系，一套是以“小未傅”（未傅籍的未成年人）、“丁”（尚未成為法定的名目）、“老”構成的徭役身分，另一套則是以“小”“大”構成的口算身分。漢代與戰國戶籍上標注或體現出的“小”“大”，表面上名目相同，但無論其性質還是指代的年齡範圍都有很大差異。王彥輝《聚落與交通視閥下的秦漢亭制變遷》對傳世史籍及出土文獻中的“亭”的研究歷史作了梳理，認為亭有“城邑之亭”與“鄉野之亭”之分。同時探討了關於史籍記載的“十里一亭”與“十里一鄉”的不同記載，作者傾向於《漢書》中“十亭一鄉”的記載。日本學者畑野吉則《秦漢時代的文書傳遞和信息處理》認為無論是否存在時間、地點的差異，秦漢時期郵書記錄的格式與該記錄所記載的共通事項大致相同。論文通過對肩水金關、甲渠候官、懸泉置出土的郵書記錄傳遞範圍進行整理，闡明了三處的管轄範圍以及郵書記錄的不同聚集狀況。因此認為作為漢代上計制度的基礎、從地方向中央傳遞信息的路徑比既往研究估計得要複雜。楊小亮《從出土材料談對“解書”的初步認識》主要利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西北漢簡等材料，認為出土資料中所謂的“解書”應是下級向上級就行政或法律事務進行解說的文書，大概成熟於東漢時期，延及魏晉南朝。可獨立運行，亦可作為附件上報，其本身具有可資論斷的書證效力。按目的和功能的不同，“解書”又可分為“申辯解書”和“合議解書”，前者重在申辯而後者強調提供相關問題的處理意見，二者均需經上級批准纔能發揮作用。莊小霞在《秦漢急書考》中認為秦漢時期存在一類被命名為“急書”的官文書，最主要特征是在文書的封檢上題寫“急”字表示必須緊急傳遞。并對急書的命

名由來、相關法律規定、結構形式以及演變等做了比較詳細的考證。劉釗《出土文獻所見秦漢官文書平闕現象探論》結合簡牘碑志文書考察了秦漢平闕現象,認為秦漢平闕現象中,有“平”而無“闕”,東漢時代的平闕現象已比較嚴格和複雜,奠定了後世平闕制度的基礎。著為律令的詔書中平闕現象的出現和發展整體晚於同時代的公文性文書。平闕現象產生和發展變化的前期,與皇權的建立和發展壯大密不可分。湯志彪、沈浩《先秦出土材料所見藏納制度蠡測》認為,傳世文獻記載先秦、秦漢時期藏書有相應的機構和官吏,從出土材料來看,銅器、生活用具(工具)、兵器、糧食、材料(甲骨)和文書等都有相應的納、藏規章制度和相關的工作人員(官吏),先秦時期的納藏制度應該比較完善。孫銘《秦漢簡牘所見“畏戾”芻論》認為秦漢簡牘中,涉及到“畏戾”的律文有一定數量,尤其是在軍事活動中,因“畏戾”造成的處罰并不少見。從大的歷史背景來看,畏懦不行、臨陣脫逃、投敵降寇等行為均可被看作“畏戾”的表現形式。“畏戾”所生刑名,隨着兵法、軍法、刑法這一法源性演化過程的推進而逐漸顯現出等序性的特征。秦鳳鶴《讀秦漢簡小札二則》考察了張家山漢簡中《二年律令·戶律》的“留難”,認為“留難”是一種故意刁難以致延留的行為。“留難”本為官吏應及時處理的分內之事,官吏或為謀取私利而故意拖延不辦。而秦漢簡牘中的“案致”,不應分為“案”與“致”解釋,“案致”應為一詞,語義為“考查”。安忠義《髡、完、耐與秦漢以來的耻辱刑》從文字訓詁學解釋了髡、完、耐的字義,並利用文獻和簡牘資料作進一步的分析論證,認為漢文帝刑法改革並未觸動髡、完、耐等耻辱刑,這是因為耻辱刑關於刑德的論述符合漢初以來的立法思想。陳文豪《簡帛目錄學芻議》從目錄學的角度,說明了編輯簡帛目錄的意義及應注意事項,對之後編輯簡帛目錄有着借鑒作用。王化平《論〈漢書·藝文志〉“方技略”及簡帛醫術的分類》結合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資料,討論了“方技略”在分類、辨章學術兩方面的不足。文章在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類之外,增加了本草、祝由兩類,並將目前出土的所有簡帛醫書進行分類羅列。

近一個世紀以來,秦簡不斷發現,大大豐富了對秦研究的資料。而本次探討會對秦簡的研究主要包括睡虎地秦簡、里耶秦簡、嶽麓秦簡、放馬灘秦簡等,涵蓋了簡冊的編聯、簡文釋讀、年代考證、對個別問題的探究等方面。李力在《〈秦律十八種〉115簡的再解讀——兼及睡虎地秦簡〈徭律〉的編聯問題》中,重新考析了《秦律十八種》115簡,認為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115簡應該是《徭律》而不是《興律》的內容。嶽麓書院所藏秦簡中的《興律》內容,有助於認識秦漢以來《興律》的演變情況。周海峰《嶽麓秦簡〈戍律〉及相關問題研究》認為嶽麓秦簡《戍律》反映出徭戍是每個編戶齊民應盡的義務,謫戍則帶有懲戒意味,其往往針對賤民。徭戍是有規定期限的,謫戍則沒有固定的時間表。貲戍在本質上是一種經濟處罰,與罰戍者無別。罰戍是一種刑罰,犯法者必須前往邊境戍邊以抵罪。無論是罰戍、貲戍、適

(謫)戍或徭戍之人,還是招募而來的冗募群戍卒均可稱為戍卒,其所從事的活動均可稱為屯戍。曹旅寧《讀〈嶽麓秦簡(三)〉札記》結合《嶽麓秦簡(三)》奏讞書案例十五“綰等畏戾還走案”討論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律令意義。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與《嶽麓秦簡(三)》中的“未蝕”有奸未遂之意。《嶽麓秦簡(三)》案例三“猩、敞知盜分贓案”記載的“掘塚”可與《呂氏春秋·安死篇》的記載相對讀。《嶽麓秦簡(三)》案例十五“綰等畏戾還走案”中的“伍束符”是一個詞,有保持隊形識別之意。《嶽麓秦簡(三)》案例八可能存在書寫抄寫的錯誤。孫占宇《放馬灘秦簡古度應用年代考證》認為放馬灘秦簡《星分度》篇所見二十八宿距度應當屬於以《洪範傳》為代表的古度系統,這種古度的最初測定及應用年代應在春秋晚期,至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因“太初曆”採用更為精密的今度座標而退出歷史舞臺。王偉《嶽麓書院藏秦簡(肆)校讀記(三則)》對《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中的簡010/0797、簡084/2149+085/2016+086/2008、簡242/1261三枚簡文做了重新釋讀。張忠煒《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對里耶秦簡博物館所藏秦簡進行概略介紹,認為館藏10-15殘牘是迄今為止所見年代最早的功勞記載實物,並對9-1至9-12所見反印文進行考察,確定了9-1至9-12的疊壓關係。鄔文玲《里耶秦簡〈欣與呂柏書〉試析》圍繞《欣與呂柏書》展開探討,整理了里耶秦簡中關於欣和呂柏的簡文,推斷出欣生活的年代。同時釋讀《欣與呂柏書》的內容,並對相關書信的用語和格式加以討論。李世持《秦簡女性人名命名規律及文化內涵初探》通過對目前已刊布秦簡的全面整理,共得98個女性人名,其命名意義可分為三類:一是取名於自然,二是取名於社會,三是取名於其他。命名規律是人名取義在社會價值上的集中體現,表現為“三多”,即示“勞”“德”“弱”類的女性人名多。其文化內涵特點是,傳統“三從四德”思想雛形初見端倪。李迎春《秦基層行政“守官”制度再探》主要依據里耶秦簡,對秦基層行政“守官”展開討論,認為秦尚不存在“滿歲為真”的試守制度,除了個別“謫守”現象外,無論守丞還是守官都是在真官空缺時的代理,代理者往往需脫離本職,與兼本職而行文書事的假官不同。秦對守官種類和守職者身份有相關規定。對於部分守官來說,“守職”經歷是其仕途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相關考課結果,守官者有轉正、免歸、轉徙、退回原職等不同的仕進前途。朱錦程《秦郡官吏代理制度考略》主要探討了嶽麓秦簡中郡尉的代理制度,先對嶽麓秦簡中的相關簡文進行考釋,之後又結合里耶秦簡的內容,認為秦郡官吏的代理制度與其所代理之官的重要性直接相關,大體採取以秩祿高低和先真後守的順序,同時以令的法律形式對這種代理制度進行明確、嚴謹的表述,進而公示天下。在里耶秦簡的文書中可以清楚看到這種代理制度在實際行政過程中的具體體現。魏永康《秦漢律令簡所見農事禁忌考論》結合《張家山漢簡·田律》考察了“日書”中的農事禁忌土忌與田忌,並討論了日書與律令的關係,認為祇有《律令》與“日書”配合使用,纔能把成文的律令和不成文的規範相結合,全方位

地實現對百姓的控制。

三 吳簡研究專題

隨着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的不斷公布,學術界對其也有着熱切的關注。楊振紅《出土戶籍簡與秦漢三國時期的“編戶齊民”——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社會構造研究之三》結合出土的秦漢三國吳時期的戶籍簡,進一步辨析編戶齊民的概念內涵和發展變化,探討其所反映的戰國秦漢以來的社會結構及其變遷。熊曲、宋少華《走馬樓吳簡中的種糧給貸簿研究》復原了兩個官府種糧給貸簿書,即出禾給貸簿和嘉禾三年種糧給貸簿。認為官府借貸種糧以一户為標準,不論其家庭內勞動力的數量。百姓借貸種糧有兩種用途:一是用於耕種;二是用於口糧。政府貸給百姓種糧,主要是救濟貧民。陳榮傑《試論走馬樓吳簡“粢田”及相關問題》認為吳簡“粢田”當為種植粟的田地。因長沙地區以種植稻為主,稻的種植面積遠遠超過其他作物的種植面積。為與稻田相區別,種植粟的田地稱為“粢田”。吳簡“粢田”按不同的收米標準,分為粢租田、粢稅田和粢限田,這和《田家荊》中二年常限田按不同的收米標準分為租田和稅田是一樣的。

四 魏晉河西地區歷史文化研究

魏晉時期絲綢之路河西地區民間歷史文化具有獨特的內容和藝術價值。吳浩軍在《河西買地券叢考——敦煌墓葬文獻研究系列之四》對河西地區出土的10件買地券文書作了考證研究,並對這類文獻的性質作了討論,對了解魏晉河西地區民間信仰和社會習俗具有一定參考價值。高啓安《中國最早的“貓捉老鼠”圖——兼談鬼灶上出現老鼠圖像的意義》指出高臺駱駝城東漢墓葬中曾出土一枚鬼灶,上有一幅“貓捉老鼠”圖,這是中國最早的“貓捉老鼠”圖,說明當時河西人已經馴養貓用來捕鼠。鬼灶上鼠圖像的大量出現,不是作為食物,亦非源於某種信仰,而是生活場景的反映,是製作者的情趣創作。李永平《高臺出土魏晉論語類帛書的學術價值及有關問題》介紹了1991年出土於高臺縣駱駝城遺址墓葬區的帛書,現藏高臺縣博物館,帛書80行左右,8000餘字,是一份重要的儒家論語類論說文獻。高臺帛書擴展了魏晉早期書寫材質的範圍,在語言學、文字學、詞章學、思想史方面有獨特的價值。

五 出土文獻與古漢語古文字研究

近些年來,學術界從古文字學古漢語學角度對戰國秦漢簡帛的研究熱度不減,此次會議中學者們對這一問題也有着熱烈的討論,內容涵蓋清華簡、上博簡、秦漢簡牘帛書的語言文字等,同時也涉及到史事考證、思想流派等方面。

(一) 清華簡和上博簡等楚簡研究

李均明《清華簡〈殷高宗問於三壽〉“祥”說解析》對該篇文獻中的“祥”進行討論,認為簡文中的“括換妖祥,是名曰祥”體現出鬼神與人事并重的觀念,簡文中的“喜神而憂人”“神民莫責”“神民并尤”“恭神勞民”等,總是神人并列,二者并重,且恭敬前者,實惠後者,人的作用已被充分重視。李守奎在《釋“仍”》中認為清華簡七《越公其事》中的“𠂔”當讀為“仍”,訓為“重”。簡文“毆民生不𠂔,王其毋死”比《吳語》之“以民生不長,王其毋死”貼切,很可能是後人傳抄或整理過程中不認識“𠂔”字所做的改寫。石小力《清華簡第六輯中的訛字研究》對清華簡(六)中13個訛字現象作了研究,並對古代訛字現象產生的原因及判定訛字的標準等問題進行了討論。王輝《一粟居讀簡記(八)》是讀清華簡《良臣》的五則札記。一、討論伊尹與保衡的關係,說伊尹是湯臣,與保衡非一人。保衡時代晚於湯,但不會晚到武丁時。二、子產之師“肥仲”疑即苗賁皇,苗為封地,賁為其姓,皇為其名,仲為排行。肥、賁通用。苗賁皇見於《左傳》《國語》《漢書·古今人表》。他知禮知法,眼光遠大。三、子產之師“杜畜”疑即《左傳》所見之杜泄。他依禮行事,不畏強權,是子產效法的對象。四、子產之輔“子刺”應即鄭臣印段,刺讀為礪,與段(礪)義近。印段與子產同時,曾“從”子產離開鄭國一段時間,治國理念相同。五、子產之輔“王子伯”疑即《左傳》所見之王子伯駢,他長於外交辭令,與子羽一樣,是子產從政的幫手。吳良寶《從清華簡〈繫年〉說屬羌鐘銘的“楚京”》認為現有的史籍記載與出土文獻都不支持屬羌鐘銘文“富攸楚京”的“楚京”國名說,《繫年》的相關內容從根本上否定了將鐘銘“楚京”之“楚”理解為“楚國”“楚京”是楚國地名的各種意見。楚京地名的探求,與三晉伐齊的具體路線有關。劉國忠《也談清華簡〈厚父〉的撰作時代和性質》贊成清華簡《厚父》篇作於周初的見解,認為它是周武王時的作品,是西周初年借鑒夏、商治政得失而廣泛諮詢遺老的產物,並主張篇中的厚父很可能與周代杞國的始封君東樓公有關。認為清華簡《厚父》的學術價值體現在它對於後來的《酒誥》和周初禁酒的影響上,以及它對於周人夏代史觀和德政思想的影響上。趙平安《〈子儀〉歌、隋與幾個疑難字的釋讀——兼及〈子儀〉的文本流傳》結合清華簡《子儀》中的“歌”和“隋”考察了與之相關的文字,主張《子儀》內容上與秦有關,用楚文字書寫,但是受到了三晉文字的影響。韓國學者姜允玉《論

楚國儒家出土文獻中“仁”的含義》用傳世文獻和楚國出土儒家文獻材料來互證“仁”字含義和其來源問題。認為從孔子開始,仁字的含義成為做人的最高準則,使它成為一個學說。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所反映的包括孔子所言、整個春秋時代的各種“仁”觀念,實際都並沒有突破“仁”乃“親愛”“相人偶之人”的範圍。從文字學角度來看,從“身”從“心”的“惓”,以表示新的“仁”觀念。張新俊《上博簡〈君子為禮〉補釋一例》對上博簡《君子為禮》簡3+9A+4+9B簡進行考釋,認為簡文中的“顏淵起迭席”中的“迭”所釋無誤,“智而比信”的“信”應釋為“諫”,“斯人欲亅長貴也”的“長”應釋為“比”。上博簡《君子為禮》可以和郭店簡《成之聞之》對讀。

(二) 其他秦漢簡牘研究

這部分主要包括對簡牘中的古漢語分析、古文字考釋和音韻學研究。張顯成《〈漢語大詞典〉書證缺無簡帛補》收補簡帛文獻中的45個詞彙的書證:半徑、冊、余、舍、甸、兄嫂、平旦、奉、奉書、式、式、句、吹、後父、外王母、廖、它、宗、枕巾、某、栢、泰、威、相邦、發書、篤、裊、萬、翁、素履、綃、綸、紮、繆、縹、車鈎、裸、狔、賴、鉏、斬、鞠、頭足、頽、顏。李玥凝《漢簡“卿”字小札》認為秦漢時期“卿”從二人相向對食引申為公卿大夫,在秦漢時代可指代各階層的長官,還有了敬稱、第二人稱稱謂語、人名的泛稱等多種意涵。作為人名泛稱的“卿”主要見於河西地區出土的簡牘文書中,其他含義則在魏晉時期趨於固定,並一直沿用至今。“卿”在更多情況下沒有尊敬之意,這可能與其作為稱謂語時主要應用於尊對卑的稱呼有關。竇磊《夏侯妙妙衣物疏補釋》對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館藏的一枚木牘衣物疏進行了詳盡考釋。文中引用學界觀點,認為此衣物疏可能出土於甘肅省張掖市高臺縣西南的駱駝城遺址附近,並對“爪囊”“舜囊”等數詞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單育辰《〈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房中術竹簡校訂》結合新舊圖版對馬王堆帛書《十問》《合陰陽》《天下至道談》中的“握食”“厥”“款”“款”“已”“擻”“害”“數已”等諸字詞從古文字學角度進行了新的疏證。方勇《讀天水放馬灘秦簡札記四則》考訂放馬灘秦簡中乙214A+223之“𠂔”當讀為“𧈧”;簡乙298“𠂔”當讀為“弼”;簡300“𠂔”當讀為“雌”。簡282“𠂔”當讀為“貸”。張存良《新見英藏斯坦因所獲漢文簡牘未刊部分釋讀》整理和研究了英藏斯坦因所獲漢文簡牘中的一些削衣碎片,發現這些簡牘遺文的內容大多數與古佚書《蒼頡篇》有關,有助於對《蒼頡篇》的研究。古音研究方面,馮玉、孫占宇《從放馬灘秦簡通假字看秦上古方音系統》認為放馬灘秦簡中的通假字用例真實地反映了秦方音系統的若干特點:聲紐發音部位相同的字最易通假,除全濁音當時可能尚未分出外,其他聲母更符合黃侃“古音十九紐”之說;入聲“有勢無聲”的特點致使入聲韻在秦方言中正在逐漸消失,收尾於[-k]的最不穩定,收尾於[-p]的系統性最強,變化最慢;上、

去兩聲尚未分出,入聲分立,這也與黃侃上古聲調僅有平入兩調的主張相合。此外,本次會議還收到了一篇關於青銅器考釋的文章,黃錦前《釋“金𣎵”——兼談“鑾旌”》對近年刊布的獄盤、獄盃、衛簋及召簋銘的“𣎵”字進行了考釋,認為從文字的形、音、義及有關金文文例等各方面來看,“𣎵”應釋為“旗”,該字從“燕”得聲,係“旗”字的異體。束盃銘“鑾旌”之“旌”亦當釋作“旗”,從袁得聲,亦係“旗”字的一種異體。常見的“旗”字出現多種異體的寫法,或與當時用字習慣的差异有關,就現有材料而言,這一現象或僅在西周中期這一短暫的時段內存在。

此次會議上,甘肅簡牘博物館聯合多家合作單位正式發布并向與會代表贈送了《肩水金關漢簡(伍)》。會議期間,向與會代表展示了由甘肅簡牘博物館、西北師範大學和蘭州城市學院等多家單位學者合作撰寫的《居延新簡集釋(一一七)》,這是甘肅漢簡整理研究的重要成果,對弘揚甘肅簡牘文化和推動國內外簡牘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此次會議,還向與會代表贈送了《簡帛研究二〇一六(春夏卷)》、《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五輯、《四川文物》第1、3期、《簡牘學研究》第六輯等簡牘學和考古學專業刊物。

此次會議是2016年“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系列活動”之一,此次學術研討會議弘揚了甘肅古老悠久的歷史文化,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和學術論證,為“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增加了甘肅漢簡的獨特內容。此次提交論文作者,既有長期從事簡牘學研究的年長學者,也有來自國內外高校科研院所的年輕學者和在讀碩博研究生,簡牘學研究隊伍的壯大,加之近代以來全國各地不斷發現先秦秦漢魏晉三國時期的簡牘帛書,簡牘資料的不斷豐富,使簡牘學這門國際顯學愈發展現出蓬勃生機。當然,我們也應看到此次提交的論文,大都以具體個案的史事、文字等考證為主,對簡牘本身的保護研究以及簡牘學的整體評價、發展方向、基本規律等理論性的探討和宏觀上的分析尚顯不足,這應該也是以後簡牘學術界需要加強研究的一個方面。

代地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單印飛

河北省蔚縣在歷史上曾為代國、代郡治所所在。代居於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交界地帶、燕趙之間,具有獨特的歷史、文化、民俗。為了進一步加強蔚縣文化建設,促進代地歷史文化研究,加強科研單位與地方文化建設結合,河北省蔚縣縣委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聯合主辦的“代地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於2016年9月24日至25日在河北省蔚縣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鄭州大學、《河北學刊》雜誌社、首都師範大學、河北師範大學、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莊學院以及張家口市電視臺、蔚縣政協、蔚縣博物館等單位三十餘位學者參加了會議。開幕式由蔚縣縣委宣傳部部長宋豔蓮主持,蔚縣縣委副書記李衛森、張家口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劉喜、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主任楊振紅先後致辭。

與會學者圍繞“代的建國史”“戰國秦漢時期代的行政建制演變”“戰國秦漢時期冀、晉地區的歷史文化與民族關係”“冀北的歷史文化與社會風俗流變”四個論題,發表專題報告並進行了討論。現分幾個方面進行介紹。

第一,代地行政建制沿革、歷史地理、區域文化特征研究。關於古代國建立的時間和族屬,古今學者說法不一。黃紹雄《對古代國建立時間和族屬的再認識》,依據《逸周書》《路史》等傳世文獻記載以及考古學、體質人類學的最新研究成果,認為古代國是商代或商初建立的子姓族國的觀點是可信的,而春秋時期戎狄部族所建的通說值得商榷。李新威《代王城城址調查報告》,從地理位置、自然環境、歷史沿革與建制、城址現狀、代王城墓葬群等方面詳細地介紹了代王城遺址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新發現,並對代王城遺址的價值進行了學術評估。

孫繼民《春秋戰國東代城地望蠡測》，從《水經注》的記載入手，依次考訂了代城、將城、東代（後曰東城）三座古城的方位，認為代城即今代王城遺址所在，將城應在西合營以南一帶，並推測東代城在北大坪、小棗堡、任家莊一帶。毋有江《內生與外向視角下的地區發展——以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代地為例》，從資源、地緣文化和政治文化角度，將地方或區域發展分成內生與外向兩種基本模式，並以此對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代地發展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春秋以前代地是立足於游牧社會的內生型發展，但代地與華夏族群地緣上的頻繁互動改變了這種狀態，導致代地出現了游牧與農耕兩種社會生活形態，政治上開始走上外向型發展的軌道，並出現向農耕社會演進的歷史趨勢。飛狐道是連接內蒙古高原和華北平原的重要通路，曾磊《飛狐道與秦漢軍事交通》概述了飛狐道、飛狐關的險要形勢，認為飛狐口和飛狐關當在一地，並從光武帝下詔修治飛狐道的歷史背景考察了東漢飛狐道的走向問題。

第二，關於趙代關係、代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研究。袁延勝、馮西西《從〈史記·趙世家〉看趙、代關係》，充分挖掘《史記·趙世家》中有關趙、代關係的信息，揭示了趙國為吞并代國所做的準備工作以及滅代過程，指出趙國重視代地的原因是企圖將其作為跳板，繼續擴張趙國勢力，同時得到代地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援。許夢陽《小議戰國時期的代地史事——兼論〈史記〉秦滅代問題》，從趙、代關係的角度，論述了戰國至秦統一這一段時期與代地軍事地位相關的一些史事，對代王嘉敗於易水之後隨燕王東遷至鴨綠江中上游的觀點提出商榷，贊同代王嘉最終滅亡於秦始皇二十五年的通說。蘇輝《戰國代地所鑄趙兵三器的再分析》，以代地所出的趙國晚期兵器為中心，結合相關器銘與文獻，考察了局勢動盪與戰事頻繁的環境下兵器製造業和軍事供給情況的變化趨勢，並根據代地兵器的督造者對趙國封君與邊地行政管轄體制提出了新認識。賈麗英《“代馬丞印”小研究》，認為半通印“代馬丞印”不是漢初之印，而是秦時璽印；“代馬”不是地名而是職官名，與“家馬”同，是秦時官府在代郡所設的馬政官署，主要目的是馴養良種馬，以備軍、備胡。莊小霞《里耶秦簡所見代地簡文考述》，對里耶秦簡中涉及秦代代郡歷史的簡8-532+8-674+8-528作了進一步考釋。王文濤、苑苑《兩漢代地守相及相關問題略論》，分漢三年至元朔五年、景帝末至綏和三年、光武初至建安中三個時間段，對代地最高行政長官守、相的身份、任職情況進行分析，認為兩漢時期代郡的軍事地位呈現出階段性波動的特征，西漢武帝時代郡作為抵抗和反擊匈奴的前沿，軍事地位十分重要，武帝後隨着漢匈關係的變化，代郡的軍事地位逐漸下降。蔡萬進《竇太后“籍趙”“籍代”及相關問題》，對竇姬“籍代”所反映的漢代戶籍制度進行探討，並認為竇姬“籍代”的年代在漢惠帝元年至六年（或五年）之間，目的可能是利用她來監視劉姓諸侯王。趙天昱《西漢時期的代郡》，從隸屬關係、軍事地位、經濟、民風等角度對西漢時期的代郡進行了全面論述。張偉《魏晉南北朝時期代地的社會經濟》，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隨着各民族政權的更替、戰爭和自

然災害的頻繁發生,代地逐漸形成了自然經濟、農牧經濟以及救濟經濟相融合的經濟特色。

第三,關於代地歷史人物、風俗的研究。秦進才《衛綰奏請開啓罷黜百家的先河——兩漢代郡歷史人物與經學關係初探之一》,以漢武帝初年的學術背景、衛綰的生平爲切入點,辨析衛綰奏請的相關問題,認爲衛綰奏請開啓了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先河,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宋燕鵬《磨笄山與代王夫人信仰研究札記》,針對磨笄山地望的問題,認爲無論是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說還是代郡東南二十五里說都在代國範圍內,並梳理了定襄七岩山聖母形象向代王夫人轉化的過程。袁延勝《“代馬依北風”簡析》,對“代馬依北風”這一名句進行解讀,認爲從戰國到秦漢代地一直都是盛產良馬的重要產地;“依北風”表明代馬是北方馬的代表,表達了對家鄉風土的眷戀;隨着秦漢時期代地的郡縣化以及匈奴崛起的影響,“胡馬”逐漸取代“代馬”用來指代北方。

第四,與代地有關的趙、中山、匈奴等相關問題、歷史背景的研究。2014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工作人員在河北省境內首次發現了趙北長城遺址,韓金秋《趙北長城的新發現》簡要介紹了趙北長城的走向、現狀、特征、附屬建築以及相關遺存,指出其東段的年代爲戰國至漢代,採用因地制宜的修築原則。他特別指出,這次調查更正了以往關於張家口西部地區戰漢長城在尚義縣與懷安縣交界綫的觀點,將原先認爲的戰漢長城向北移動了10-20千米。孫聞博《范雎“遠交近攻”之策的提出及其內涵新探——兼論秦對外戰略的北移》,將范雎的“遠交近攻”之策置於秦對外戰略的整體發展綫索中,對這一戰略提出的歷史背景、戰略特征、施行內容進行了探討。馮金忠《漢景帝時匈奴諸王入附考》,首先對漢景帝時徐盧等降附者的人數、姓名、身份、受封地地望進行了詳細考辨,指出封地位不高的匈奴酋長爲侯主要是政治上的考慮,將其安置在內地反映出漢王朝對降附者的防範,這與武帝置其於邊地、建立屬國不同,顯示出不同時代漢匈之間力量的消長。李現紅《也談“慷慨悲歌”》,對“慷慨悲歌”的文化內涵進行分析,認爲“慷慨悲歌”最早不是燕趙的文化符號,而是中山國獨有的民風民俗,後來成爲中國歷史上士人的一種特殊情懷。

閉幕式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戴衛紅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副主任鄔文玲對此次學術研討會作了總結發言。她指出,這次會議內容豐富、成果顯著,從多層面、多角度深入探討了代地的歷史文化,取得了以下成果:一是辯駁舊說、提出新見,厘清了若干問題,進一步豐富了對代地歷史文化的認知;二是採用新的研究視角和理論框架,進一步突顯了代地的歷史地位;三是發掘出一些新史料,拓展了代地歷史文化研究的新領域,進一步呈現了早期代地歷史文化的區域特征。最後,蔚縣縣委副書記李衛森致閉幕詞,指出此次研討會是蔚縣文化事業上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將對發掘、整理、繼承蔚縣寶貴歷史文化遺產,進一步推動蔚縣文化事業大發展、大繁榮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附录:《簡帛研究》文稿技術規範

《簡帛研究》文稿技術規範在原有基礎上進行了適當調整,從《簡帛研究二〇一四》輯開始執行,敬請同仁垂注。

一、作者投稿,敬請惠寄打印稿或電子稿(WORD+PDF 文檔)。文稿務請達到齊(內容提要、關鍵詞、正文、注釋均完整無缺)、清(整齊清晰)、定(係作者定稿)。

二、文稿全文繁體橫排(如果需要保留格式,個別簡文可豎排)。標題下標出作者工作單位、姓名。如果是國外學者,請在工作單位前添加國別,並加“[]”,如[韓]。內容提要 300 字以內,關鍵詞 3—5 個。

三、文內分層或小節的標題數字順序依次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1.、2.、3.、4.……;(1)、(2)、(3)、(4)……。文內一級標題漢字數碼後用頓號,後出標題題文,文內二級、四級標題後緊接標題,三級標題阿拉伯數字後加“.”。如:

一、名籍的格式

(一)物價波動狀況與換算失誤

1.臨潼銀鋌與安邑分司

(1)婺源縣的事例

四、為突出引文的重要而另立段落者,引文第 1 行起首空 4 格,從第 2 行起,每行之首均空 2 格。引文的首尾不加引號。引文的注釋號標在引文最後標點之後。

五、系統在默認狀態下不能處理錄入的文字,請造字或以圖片形式插入正文。

六、關於數字的用法:

(一)數字用法以國家技術監督局 1995 年 12 月公布的《出版物上數字用法的規定》為基本依據,並考慮到本專業的特殊性。

(二)如下情形使用阿拉伯數字:

1.作者的一般性敘述。如:

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在全國 40 個郡國中設立鐵官 49 處。

2.公曆世紀、年代、年、月、日。如:

1922 年 12 月初,顧頡剛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專任編輯。

3.公制的度量衡單位計數與計量,包括正負數、分數、小數、約數和百分比,各種物理量值。如: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唐武德元年銅權重 464.2 克。

清代農業人口占人口總數 90% 以上,構成全國人口的主體。

4. 表示順序號、數據及計量單位均用阿拉伯數字。

(三) 如下情形使用漢字:

1. 古籍文獻中的數字。如:

《晉書》卷一一《天文志上》:“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

2. 古籍文獻中的卷數。如:

《冊府元龜》卷三五《帝王部·封禪一》

3. 中國朝代的年號及干支紀年使用漢字,其後加括號標出公元年代,但不寫出“公元”、“年”字。如:

乾道六年(1170),元狩四年(前 119)

4. 數字作爲詞素構成定型的詞、詞組或慣用語。如:

相差十萬八千里,十之八九,四分五裂

5. 帶有“幾”字的數字。如:

幾千年以來

七、文內標點符號用法

(一) 標點符號以國家技術監督局 1995 年發布的《標點符號用法》爲依據。

(二) 連接號“—”爲短橫(一字綫),占兩個字符。

如:中國秦嶺—淮河以北地區屬溫帶季風氣候。

(三) 引文或行文中的省略號,前、後均不加逗號或句號。

如:《左傳》隱公十一年《傳》:“與鄭人蘇忿生之田……盟……”

八、表格需注明表題,文中含一個以上的表需注明表序號,表中或表後應注明資料來源。如:

表 1 明天啓元年(1621)北京五城鋪甲戶數統計表

| 五城 | 鋪數 | 甲數(名) | 戶數(戶) |
|----|-----|-------|--------|
| 中城 | 53 | 2544 | 25440 |
| 東城 | 173 | 3608 | 36080 |
| 南城 | 135 | 4330 | 43300 |
| 西城 | 101 | 3764 | 37640 |
| 北城 | 63 | 873 | 8730 |
| 合計 | 525 | 15119 | 151190 |

資料來源:《明熹宗實錄》卷九。

九、注釋格式

(一) 注文採用頁下注,每頁連續編號。

(二) 注號採用阿拉伯圓圈數字,如:①、②、③。

(三) 正文中的注號,無論隨文還是提行引用,一律標注在引號、逗號、分號、句號的後面。

(四) 徵引古籍

1. 徵引古籍標注一般順序:撰寫時代/撰寫者/著作名/卷數/版本/出版地點(出版社社名中已標示其所在地者,可不必再標地名)/出版社/年份/頁碼。影印古籍、未經今人整理的古籍亦出冊頁。撰寫者時代以[]標出。如:

[宋]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231冊,45頁。

2. 習見古籍如二十四史、十三經、十通、《太平御覽》等書,徵引時可不出撰寫者時代和撰寫者。如:

《晉書》卷一四《地理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406頁。

《資治通鑑》卷一八五《唐紀一》貞觀元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5777頁。

(五) 近人專著標注一般順序: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出版地點/出版社/年份/頁碼。

1. 多卷本著作標明卷名,多人撰寫的著作應標出具體責任人。如:

林甘泉主編:《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上冊,第1章《緒論》(林甘泉撰寫),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8頁。

2. 文集責任者與析出文獻責任者相同,省去文集責任者。如: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徐中舒歷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78頁。

3. 文集責任者與文集析出者相同,但字面關係不明,可在文集前加上“收入其著”。如:

齊思和:《毛詩穀名考》,收入其著《中國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1981,24頁。

4. 文集責任者與文集析出者不同,應標出責任人。如:

顧頡剛:《九州島之戎與戎禹》,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組織選編《顧頡剛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101頁。

5. 期刊文章標注順序: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期刊名/年期(或卷期,出版年月)。同名异地刊物應有區別說明。如:

潘明娟:《從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關係看早商的主都和陪都》,《考古》2008年第2期。

李濟:《創辦史語所與支持安陽考古工作的貢獻》,《傳記文學》(臺北)第28卷第1期,1976。

6. 報紙文章標注順序: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報紙名稱/出版年月日/版次。如:

楊伯達:《東北夷玉文化板塊的男覲早期巫教辨》,《中國文物報》2008年4月9日第7版。

7. 網絡文章標注順序: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網站名稱/年月日。如:

邢義田:《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修訂稿),簡帛網,2008年4月5日。

(五) 外文文獻標注順序。西文專著: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出版地點/出版者/出版時間/頁碼。著作名用斜體,出版地點後用英文冒號,其餘各項間用英文逗點隔開。西文期刊:責任者與責任方式/著作名/期刊名/卷冊及出版時間。著作名用英文引號標出,期刊名用斜體。引文跨頁用“pp. X-X”。日文、韓文等專著和期刊標注方式基本相同。日文、韓文等中的漢字請遵照其本來寫法,如發展的“發”,日文寫作“発”;“變”寫作“変”,“學”和“國”仍用簡體等。如:

T'ung-tsu Ch' ü, *Han Social Structure*.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p.121.

Brain E. Mcknight, *The Quality of Mercy: Amnesti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Justic*.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1, pp.37-72.

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学前史》,京都:同朋舎,1971,179頁。

中村圭爾:《魏晋時代における“望”について》,《中国-社會と文化》2,1987,25頁。

方東仁:《韓國의國境線劃定研究》,首爾:一潮閣,1997,100頁。

金文植:《조선후기 지식인의 자아인식과 타자인식》,《大東文化研究》39,2001,19頁。

(六) 譯著格式:責任者國別/責任者與責任方式/翻譯者/著作名/出版地點/出版者/出版時間/頁碼。國別以[]標注,責任者需以括號標出本名,責任者和翻譯者間用逗點間隔。

譯文格式:責任者國別/責任者/翻譯者/著作名/刊名/出版時間或卷冊。國別以[]標注,責任者需以括號標出本名,以書代刊出版物標出出版單位和時間。如:

[英]柯林伍德(R.C.Collingwood)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155頁。

[德]科卡(Juegen Kocka)著,景德祥譯:《全球化時代的社會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7年第1期。

[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譯:《〈居延漢簡補編〉的出版》,《簡帛研究二〇〇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567頁。

十、各朝代的簡帛資料,參照所引底本內容、格式、符號、標記、編號照錄,或采用通行方法,如《吳簡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405頁)附錄的“吳簡徵引格式”。引用簡牘是否斷句、加標點,不做統一要求。

十一、其他

(一) 凡徵引文獻以“參見”、“詳見”、“并見”等引導,責任人直接與文獻連接。如:
參見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52 頁。

(二) 同一文獻再次引用時,注釋中祇標出責任者、著作名和頁碼。一律不採用“前揭”、“前引”、“同前注”、“同上注”等。

(三) 出版物的出版時間均採用公曆。

(四) 需要標出基金項目、資助等,在文章標題後加注,注釋符號為“*”號,在頁下腳注寫出說明性文字。

(五) 文稿附加文字如鳴謝等置於全文後,另段標出。

辨析字形
理解文義
璣珠重聯
審系篇題
終成圖籍
補史之逸

政煥學書



ISBN 978-7-5495-9651-5



9 787549 596515 >

定價：100.00元